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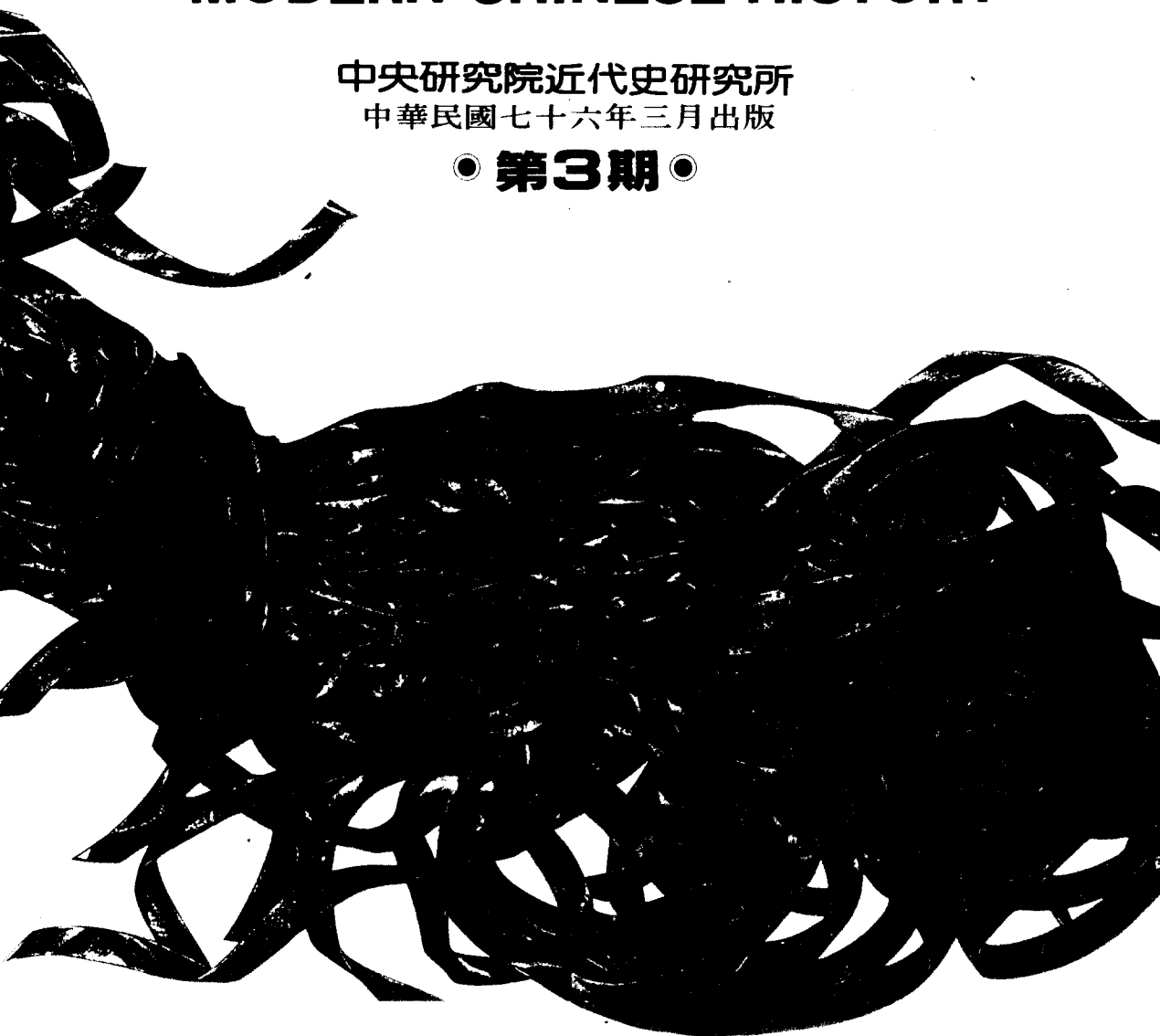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NEWSLETTER FOR
MODERN CHINESE HISTORY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三月出版

● 第3期 ●





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於七十五年十二月廿九日至卅一日舉行，
圖為「明清與近代史組」第七場討論情形



梁嘉彬先生之史學研究，最注重問題
之剖析，力求真象之瞭解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目錄

第三期·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三月出版

學術會議	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明清與近代史組·····	沈松橋	3
	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	張力	9
	香港「中國近六十年來之憂患與建設」學術會議·····	王綱領	11
	香港大學「臺灣歷史國際學術會議」·····	陳三井	14
	臺灣史研究暨史料發掘研討會·····	許雪姬	16
	出席「西安事變五十週年紀念國際學術討論會」 之追憶·····	李雲漢	19
	「第七屆中韓學術會議」報導·····	葉稱英	23
	第一屆中琉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	朱德蘭	30
	亞洲學會第三十九屆年會·····		32
	學術演講	歷史人口研究的基本觀念·····	劉翠溶
<i>Hsieh-tou Violence and Lineage Feuding in Southern Fukien and Eastern Kwangtung</i> ·····		Harry J. Lamley	43
梁嘉彬·····		王樹槐	61
學人簡介	衛藤瀋吉·····	張啟雄	76
	Otto Franke·····	Ursula Richter	85
研究概況	國史館研究近況簡介·····	遲景德	99
	簡介「早稻田大學中國近現代史學習會」·····	細野浩二	101
	英國的中國通：量的觀察(一)·····	朱滋源	103
	「中國近世幼兒史」研究·····	熊秉真	129
	Research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in West Europe (II): France·····	Ursula Richter	133
	「臺灣傳統民居之個案研究——龍井 林宅的歷史與建築」計劃·····	許雪姬	164
史料介紹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近代 經濟檔案保存與整編概況(二)·····	近史所檔案館編目組	165
	新出章炳麟致張學良兩函年代考·····	汪榮祖	169
	張維翰先生史料兩種·····	蔡相輝	17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報紙簡介·····	藍旭男	17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敬贈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832

書 評	史卡拉賓諾、于子橋合著：現代中國及其革命進程： 對傳統秩序的不斷挑戰(1850~1920).....張玉法 183
	韓特著：斯文的福音.....李又寧 189
	李健民著：五卅慘案後的反英運動.....李守孔 194

論文目錄	國內歷史研究所有關中國近代史研究之 博碩士論文目錄 (1985~1987) 197
	日本早稻田大學人文社會各研究所研究生 有關中國近代史研究論文目錄..... 199

大事紀要	一九八六年七月至一九八七年三月近代中國史 研究大事紀要.....楊明哲輯 204
------	---------------------------------------------

出版消息	新書出版消息.....楊明哲輯 218
------	---------------------

封面設計：黃憲鍾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編輯委員會□

主任委員 張玉法
 編輯委員 張玉法 張存武 張朋園 陳三井 黃福慶
 陳永發 熊秉真 楊翠華 林滿紅
 執行編輯 黃福慶
 助理編輯 張 力 黃克武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半年刊 第三期

編輯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臺北市南港
 郵撥帳號 1034172-5
 印刷者 永 裕 印 刷 廠
 臺北市西昌街168號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三月出版

定價 新臺幣 240 元 美金 8.0 元



學術會議

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

——明清與近代史組——

□沈松橋

中央研究院繼民國六十九年夏舉辦第一屆國際漢學會議之後，經長期籌劃，於民國七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再度召開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本次會議，共分為語言與文字、歷史與考古、明清與近代史、民俗與文化、文學等六組同時進行。應邀參加的國內外學者近三百人，宣讀論文凡二百一十三篇，規模浩大，人數眾多，洵為國際中國研究學界一大盛事。其中，明清與近代組假中央研究院近代研究所會議室一連舉行三天，共提出論文四十六篇，分作十一場進行宣讀及討論。各篇論文名稱如次：

場次	主持人	報告人	題目
第一場	李國祁	黃仁宇	中國近五百年歷史為一元論
		吳智和	謝肇淛的史學
		Andrew J. Nathan	Some Trends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Republican China
		陳捷先	清聖祖廢儲考原
第二場	Edward J. Farmer	全漢昇	三論明清間美洲白銀的輸入中國
		Lloyd E. Eastman	The State and Commerce in Ming and Ch'ing Times: The Brokerage System of Administration
		濱島敦俊	Land Exploitation and Trans-Regional Trade: Investing Activities by the Landlords of Kiangnan in the Mid-Ming Period
		呂士朋	明代預備倉之研究

第 三 場	徐	徐 泓	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以江、浙地區為例
		Edward L. Farmer	The Prescriptive State: Social Legislation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泓	吳 金 成	Social Change in the Neighbouring Area of Poyang Lake in the Ming Period
		Harriet T. Zurndorfer	Huang-shan, Local Cults, I-yang Ch'iang, and the People: Elite and Popular Culture in Hui-chou During the Ming and Ch'ing Period
		劉 翠 溶	宜黃北山黃氏之成長與社會經濟活動
第 四 場	陳 捷 先	吳 緝 華	明代西北邊患與榆林的發展
		黃 嘉 謨	清代前期的廣西邊務
		張 存 武	中國與明清時代的韓琉關係
第 五 場	全 漢	Bodo Wiethoff	Interregional Coastal Trade between Fukien and Tientsin During the Yungcheng Period—A Numerical Appraisal
		Evelyn S. Rawski	Property Rights in Land in Ch'ing China
	昇	William T. Rowe	Water Control and the Ch'ing Political Process: The Fan-k'ou (Hupei) Dam Controversy, 1876-83
		莊 吉 發	清代閩粵地區的社會經濟變遷與秘密會黨的發展
第 六 場	Harry J. Lamley	Romeyn Taylor	Hierarchies of Value in Chinese Religion: The Structures of Temple Inventories in Suchou Gazetteers
		Richard Shek	Eternal Mother Religion: Its Role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History
		Susan Naquin	The Pilgrimage to Miao-feng-shan: A Preliminary Study
		Harry J. Lamley	Hsieh-tou Violenc: Manifestations of the Chinese Communal Feud during the Ch'ing Dynasty
第 七	Marianne Bastid	李 國 祁	同治年間李鴻章的應變圖新思想
		張 玉 法	清末民初工業發展的背景分析
		趙 中 孚	晚清軍制的改革及其成就
		張 朋 園	中國內陸地區對西力衝擊的反應——雲貴個案研究

場		王爾敏	從政治局限看中國近代化的延誤
第八場	張	王家儉	晚清公羊學的演變與政治改革運動
		黃彰健	拙著「戊戌政變史研究」的再檢討——並評介最近幾年國人研究戊戌變法的成績
	灝	Marianne Bastid	The Influenc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on the 1911 Revolution
		蔣永敬	同盟會民報中的革命起義之理論與方法
第九場	張朋園	張灝	Liu Shih-p'ei (1884-1919) and His Moral Quest
		李守孔	趙聲與清季革命
	園	伊原澤周	臨時執政府與段祺瑞
		呂實強	民初四川軍政領導階層的遞嬗 (1911-1937)
第十場	朱匯森	林明德	清末民初直隸省的教育改革
		陳三井	五四時期工讀思潮的發生及其演變
	森	賴澤涵	廣州革命政府的對內與對外策略 (民六年至十四年)
		王樹槐	全國水利局對外資導淮的籌議
第十一場	秦	John Israel	The Fifth Martyr: Thoughts on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December First Movement
		馮兆基	Chinese Nationalist Policy on the Unequal Treaties, 1924-1931
	孝儀	李雲漢	中國對日抗戰的序幕：從盧溝橋事變到平津淪陷——國民政府決定應戰的過程
		李恩涵	一九四二年初日本軍占領星洲「檢證」之役考實
		王聿均	抗戰時期的人文思想

在第一場討論會上，黃仁宇博士從「大歷史」(macro-history)的觀點，指出自明代中葉以至民國初年五百年間，中國歷史發展在結構上的連貫性。這種統觀全局的論點，獲得與會學者的一致共鳴，也為本次會議將明清時期與近代史併為一組的用心，提供了最佳的闡釋。

不過，與會學者雖都體認到明清史與近代史的一元性，但為研究與討論

的便利，會中所宣讀的論文，仍明顯地可分為明清與近代兩大部分。

近年來，學者對明清史的研究，以社會經濟史為主流。本次會議亦不例外，在所有以明清時期為研究範圍的二十二篇論文中，涉及社會、經濟發展者即占十四篇之多。

在經濟史方面，關於商業部門的研究，所占比重極大。全漢昇賡續以往對明清之際美洲白銀輸入中國問題的研究，以其多方蒐集的豐富資料，作了更進一步的說明與補充。Lloyd E. Eastman 的論文，指出明清時代，政府利用牙行制度作為間接統制商業活動的手段。這種辦法造成了政府對商業活動既支持，又抑制的矛盾政策。濱島敦俊則透過對地主兼營商業的探討，說明了明代中葉以降江南地區農村經濟日趨商業化的現象。Bodo Wiethoff 也利用故宮所藏奏摺，對雍正時期福建與天津兩個地區之間的海路貿易，進行了量化分析。

政府角色與公共投資，也是與會學者關心的範圍。呂士朋的論文檢討了明代預備倉制度的創立、管理、功能及興廢，指出預備倉的良窳與明代政治社會的安危盛衰，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William T. Rowe 則以一八六〇年代湖北「房口大鬧」興建的爭議為中心，具體分析了地方勢力如何運用不同的策略，來影響政府的決策過程。

Evelyn S. Rawski 有關清代地權的研究，是本次會議中唯一討論到傳統農業生產關係的論文。Rawski 在此文中簡要介紹了閩北地契、四川巴縣檔案及乾隆刑科題本等新出重要史料，並指出這些資料在釐清清代各種地權形式上的價值。

在社會史的研究方面，徐泓根據大批明代方志，敘述了江浙地區自明代初期以至明代後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社會風氣由儉樸守禮漸趨奢靡僭越的變遷過程。Edward L. Farmer 則討論了明初朱元璋制定「大誥」、「大明律」等社會立法的動機與目的，並分析其對十五世紀中國社會所造成的影響。吳金成有關明代江西鄱陽湖附近農村地區之社會變遷的研究，則分就江西農民的省內、省外移民及外省農民、商人的移入，對江西社會經濟所造成的影響，作了詳細的敘述。劉翠溶對宜黃北山黃氏家族的個案研究，則說明了明清時代中國家族人口組成的特徵、消長及家族的社會經濟活動狀況。

關於社會衝突與秘密結社的研究，有兩篇論文。Harry J. Lamley 討論了清代閩粵地區家族械鬥的性質。莊吉發對同一地區的研究，則指出：十七世紀末期以降，由於人口的快速增長及商品經濟的不斷發展，使得閩粵地區

成爲秘密會黨滋生的溫床。

社會經濟史之外，本次會議中明清史部分的一項主要議題，是對民間宗教與通俗文化的探討。Harriet T. Zurndorfer 的論文以明清時期的徽州府爲範圍，檢討傳統中國精英文化與通俗文化以及國家祭祀與民間信仰的關係。Romeyn Taylor 則根據一二二九年至一九〇四年間所出版的七種府縣志書，分析傳統中國官方祀典中各類壇廟的層級次序。Richard Shek對明清時代無生老母信仰的研究，指出這些民間宗派對正統的倫理觀念與價值系統構成威脅，因而被政府視爲異端，力加查禁。Susan Naquin對清代北京地區妙峯山進香活動的個案討論，則試圖透過中西「朝聖」觀念的不同內涵，說明民間信仰活動在中國社會上的重大意義。

邊防與對外關係，是明清史組另一較爲集中的主題，共有三篇論文。吳緝華的論文，指出明代榆林城的發展，並非受經濟條件或政治因素的影響，而是因應西北邊防的需要而興起的特殊城市型態。黃嘉謨則以中越關係爲主軸，討論了一六六〇年至一八〇二年間，廣西邊禁與防務的具體內容與演變。張存武有關明清時代韓、琉關係的研究，則說明了在中國所建立的封貢制度基礎上，中國諸屬邦之間如何進行交往的過程。

從第二天的第七場開始，會議的議程轉向中國近、現代史的討論。Andrew J. Nathan 與 John Israel 兩人各有一篇檢討民國史研究成果的論文。Nathan 分析了近年來西方學界研究民國歷史的觀點與成就。Israel 則以海峽兩岸史家對一九四五年「一二·一」運動的漠視與曲解，說明了研究當代史事所易遭遇的困難。這兩篇研究史的回顧之作，在會場上曾引起熱烈的討論與批評。

其他二十一篇與中國近、現代史有關的論文，大致可分爲現代化運動、政治與軍事、教育與思想及經濟建設四大類。

討論清末民初中國現代化努力的論文共有五篇。李國祁以近代西方的兩大時代特質——注重海權與工商經濟爲標準，分析李鴻章在同治年間的應變圖新思想，並指出其對中國現代化的深刻認識。張玉法從外國工業技術對中國工業的刺激、政府的角色，以及中國工業發展的條件等三方面，探討清末民初工業發展的背景及其限制。趙中孚的論文，詳細論述了清季由綠營到常備陸軍的軍制改革，並指出其在近代改革運動中較爲突出的成就。張朋園對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西人在雲貴地區傳教、通商及其所引發的各項反應的研究，則一改以往偏重沿海沿江地區發展的研究方向，試圖闡明中國內陸

地區對西力衝擊所作的反應。王爾敏有關中國近代化之延誤因素的討論，則賡續郭廷以的研究成果，明確指出中國近代化所以遲滯不前，不在思想及文化傳統的阻礙，而繫乎身負領導責任之政府未能把握時機，誤國誤民。

有關清末民國政治軍事的論文共有十篇，涵蓋範圍相當廣泛。黃彰健的論文根據新出史料，對其舊著《戊戌政變史研究》加以補充修正，並評介一九八〇年以後，陳鳳祥、孔祥吉等人研究戊戌變法的成果。Marianne Bastid 檢討了一九一一年以前中國人對法國大革命的認識，從而指出法國大革命對辛亥革命在思想上的影響並不如一般論者所強調的那樣重大，反而是辛亥革命的爆發激起了國人對法國大革命的興趣。蔣永敬對清末革命派宣傳機關——民報的研究，則着重於民報對革命起義之理論與方法的探討。李守孔的論文敘述清末革命志士趙聲的革命活動，強調其雖無赫赫之功，但寄身新軍，援引革命同志甚多，於培植長江流域和嶺南新軍之革命風氣，貢獻甚大。伊原澤周對段祺瑞臨時執政府的研究，說明了民國時期軍閥的反動性格與對外投降主義。呂實強有關民國初年至抗戰前夕四川省軍政領導階層的探討，指出軍人長期掌政，妨礙了四川的現代化建設，直到抗戰前數年，四川才因與中央聯結，統一安定，各項建設得以突飛猛進。賴澤涵的論文為其對廣東革命政府之系列研究的一部分，主旨在探討廣州革命政府的內政和外交問題，並對其各項策略的得失與影響加以評析。馮兆基的論文檢討了一九二四至一九三一年間國民政府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努力經過。本文的研究指出，一九三一年以前，國民政府所以在對外交涉上不能獲致重大成就，主要在於內戰、派系鬥爭及政局不穩等內部因素妨礙了各項建設與改革的推展。李雲漢的論文則討論了自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至八月十三日之間，國民政府在應付日本侵略上，如何由希望和平解決轉至決定應戰的決策過程。李恩涵對一九四二年日軍在新加坡進行大屠殺事件的研究，則具體說明了日軍在太平洋戰爭期間的暴虐行徑。

涉及清末民國之文化思想的論文共有五篇。王家儉從公羊學本身的思想特質及晚清的時代背景兩方面，檢討了晚清公羊學復興並與政治改革運動密切配合的原因。張灝對清末無政府主義者劉師培的研究，指出：(1)劉師培的道德探尋起源於其對當代思想危機的反應，(2)其對當代思想危機的反應兼受中國文化傳統與西方思想的模塑。林明德的論文則出清末民初直隸省的教育改革有著專業化、重視高等教育、忽視女子教育、學制多取法日本等幾項特色。陳三井有關五四時期工讀思潮的探討，則強調由於其活動範圍太過狹隘，

主張溫和改良的工讀主義未能獲致太大成就，反而促成了主張激烈革命之社會主義派的崛起。王聿均的論文則對抗戰時期林同濟、雷海宗、唐君毅、宗白華、馮友蘭等人所提倡的各派人文思想加以闡述，並指出其對抗戰時期國人精神與心理所發揮的重大激勵作用。

討論民國時期經濟建設的，以王樹槐的論文為代表。王文以民國二年至十五年間全國水利局籌議導准之始末為研究範圍，論述民國初年導准計畫的決策、對外借款交涉以及該局的導准計畫，並分析其未能付諸實施的原因。

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

張 力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與中國歷史學會、國史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等機構為紀念蔣中正先生百年誕辰，聯合舉辦以「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為主題的大規模國際性學術研討會，於民國七十五年十月廿六日至三十日在國立中央圖書館舉行。此一研討會由中央黨史委員會主任委員秦孝儀擔任總召集人，應邀出席研討會的中外學者和專家計兩百餘人，包括國內學者一四五人，來自其他十三個國家和地區的外籍學者近六十人。研討會共分五組進行，四天之內各分組均舉行十二次討論會，合計六十次，共宣讀論文一百篇。

研討會的五個分組主題不僅圍繞著蔣先生的思想及其一生事功，同時也進一步探討了百年來中國的發展和對外關係。每一分組及其主要內容如下：

(一)「蔣中正先生之思想學術與行誼」組：本組廿二位學者提出了廿二篇論文，觸及的層面包括蔣先生的思想淵源、革命哲學、政治哲學、對三民主義的認識與發揚、軍事思想、戰爭哲學。來自美國的艾愷 (Guy Alitto) 教授則對數十年來西方歷史研究中蔣先生的地位，作了詳實的論述。

(二)「蔣中正先生與國民革命」組：此一部份有十八位學者宣讀十八篇論文，所討論的主題如討袁運動、蔣先生訪俄、黃埔建軍、清黨、北伐、撤廢不平等條約、對日抗戰、戡亂，這些不僅是蔣先生本人一生的重要事蹟，也是中國現代史上的大事。

(三)「蔣中正先生與中國現代化」組：參與本組討論的廿四位學者共宣讀十九篇論文，主要探討政府遷臺以前，中國在蔣先生領導下，如何從事政

治、經濟、社會的現代化建設。部分學者從全國性的發展來探討，亦有些學者以地區發展或某一特定主題為討論對象，俾能深入瞭解蔣先生在推動國家現代化中所扮演的角色。

(四)「蔣中正先生與世界」組：本組共有廿三位學者宣讀廿三篇論文，分別討論蔣先生的外交思想、世界觀，及我國與世界其它國家或地區的外交關係。本組之外籍學者亦有從其本國經驗，或運用本國資料，來探討蔣先生對維持國際秩序與世界和平的貢獻。

(五)「蔣中正先生與復興基地建設」組：本組的十八位學者分別就各個方面討論蔣先生與臺灣的關係，十八篇論文包括了蔣先生為光復臺灣所作的努力，以及政府遷臺後在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突飛猛進的發展，本組論文對蔣先生後半生的事功作了廣泛而詳盡的論述。

會議期間，各組之討論進行極為順利，不過來自各地的學者對某些歷史問題亦可能持有不同的看法，因此會場之中的激辯情形也屢見不鮮，使之更能顯現學術討論的氣氛。此次研討會之全部百篇論文、評論及討論記錄，已整理完竣，共分中文本五冊，英文本四冊，於七十六年年初由中央黨史委員會出版。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稿約

(一)本通訊蒐集近代中國史研究之各項資料，俾供研究參考，園地公開，歡迎各界惠稿，中、英文不拘。

(二)本通訊暫定為半年刊，每年三、九月各出刊一期，一、七月底截稿。

(三)來稿除特約者外，以不超過五千字為宜，請用有格稿紙謄寫，亦可附寄相關照片。

(四)來稿請署真實姓名、詳細地址和聯絡電話。

(五)本通訊編輯委員會對於來稿如有重大刪改，將商請作者同意。

(六)採用之稿件，致贈作者當期通訊五份。

(七)來稿請寄臺北南港 11529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收。

香港「中國近六十年來之憂患與建設」 學術會議

□□王綱領

「中國近六十年來（一九二六～一九八六）之憂患與建設」會議於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一日至二日在香港舉行，這是近五年來珠海書院繼「孫逸仙博士與香港」、「孫中山先生與中國現代化」之後所舉辦的大型學術會議。對孫中山先生逝世迄今六十年來中國歷史發展之意義與價值，作縱橫的探討。

一、內容簡介

研討會分兩組同時進行，內容簡介如後：

第一組含有論文十六篇，計有關政治及制度六篇、教育三篇、文化四篇、蔣中正行誼一篇、軍事一篇、經濟一篇。分述如下：雷飛龍的「政黨對選民的影響」，言中國國民黨對臺灣地區的黨員缺乏直接控制的力量，而其在選舉的獲勝，是因一、政策得宜；二、對工業地區的控制；三、透過其他初級、次級團體的影響力。李雲漢「抗戰初期國民政府的體制與政策」，言國民政府於戰爭爆發後，立即設立國防最高會議，給予蔣氏堅定的職權，並決定全民動員，爭取外援，由於政策得宜，故能獲得最後的勝利。陳三井「蔣中正先生與臺灣光復」，分析蔣中正因受孫中山的影響，關懷臺灣的同胞，至開羅會議，終於達到收復臺灣的願望。唐振楚「中國六十年來公務人員考試制度的建制與發展」，言考試權之獨立，為孫先生卓越的獨創，它使考選配合，並使憲法落實。王爾敏「先總統蔣中正五大建設之建國宗旨」，分析孫先生之建國方略可分為心理建設、社會建設及物質建設。其後蔣先生次第增加政治及武力建設，最後將五大建設定為心理、倫理、社會、政治及經濟五項，並以之建設臺灣。王更生「開國重典——國名國旗國歌之研究」考察三者之宗旨及確定過程，三者分別定於民國元年、十年及十七年。呂士朋「國民政府收回教育權的成就」，言鴉片戰後，列國教會擅自在華設校，自訂課程，民國以後經教育行政委員會、大學院、教育部的努力，終於民國二十五年收回教育權。宋晞「論抗戰期間大學播遷與西南地區高等教育之發展」，分析抗戰前半段四年間，二十九所大學遷至西南，條件雖然困難，但

效果良好，對當地文化的提升及資源的調查，尤有貢獻。王聿均「抗戰前後朱家驊對教育的貢獻」，論述朱氏兩次就任教育部長，不模仿亦不標新立異，以中國民情為考慮重點，對社會教育及高等教育等，均有前瞻性的措施。王曾才「現代中國人生活方式之創獲」，言近代中國之困難，在於不能因應時代的變動及遲誤中國現代化，而三民主義以民主政治為經，以計畫型的自由經濟為緯，足以濟之。岑練英「五十年代前後南來之士對國族文化之態度」，言傳統文化，經西力的東進、五四的提倡西化、中共的摧毀，日漸式微，而五十年代以後的南來之士，在香港等地多方努力保護國族文化，成績可觀。王壽南「六十年來的兩次文化運動」，比較新生活運動與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兩者的宗旨與方式不同，但均為強烈的愛國精神的顯示。蘇文擢「從歷史觀點看中國發展前途」，指出向來各種主張均不外中西體用，今海峽兩岸均各有危機，提出解決之道——大陸吸收臺灣的經驗，共同維護民本原則，倫理化的政治與法律化。涂公遂「繼承國父堅忍負重五十年紀念蔣公百年誕辰及其革命之偉大領導」，將孫先生逝世後的五十年分為五期，蔣公以堅苦卓絕的精神——克服，吾人亦將如是。王家儉「海軍對於抗戰的貢獻」以數字分析海軍勢力與政局的消長成正比，呼籲重視海軍。伍鎮雄「六十年來中國貨幣制度的癥結」，綜論六十年來中國幣制的缺失，主因在於未能趕上時代的潮流，又無法配合中國的國情，建議應仿效德國的幣制。

第二組有論文十七篇，計有關政治者六篇，外交及外人對中國及蔣中正者七篇，中共研究二篇，中國前途及香港前途各一篇。分述如下：韋慕庭（C. Martin Wilbur）的「北伐前夕：為研究中國建設之出發點」，指出北伐前廣東雖然富庶，但稅收少，預算制度亦不健全，國民黨能完成北伐，實為奇蹟。蔣永敬「汪精衛『舉一個例』所涉抗戰『機密』之真象」，以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日的國防最高會議紀錄，證明坊間金雄白（筆名朱子家）所撰「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乙書所言有所不確。來自印度的 A. K. Bhattacharyya「以新生活運動所根據的原則求中國的復興」，以該運動的八個原則及九十五個信條來分析其成功的原因。李守孔「閩變之研究」，由陳銘樞的號召名義、改變國號國旗、聯共聯日諸因素探討其失敗的因素，而中央卻能掌握先機，戡定此亂後威信更加鞏固。王樹槐「陳果夫與導淮入海工程」，言陳果夫身為導淮委員會的副委員長，實際負責人，籌集款項，克服困難，達成導淮入海的目的。陳錫餘「蔣公對中國近六十年的貢獻」，對蔣氏的貢獻予以肯定。艾愷（Guy Alitto）的「蔣介石在西方之形像」，指出西方學者如

Harold R. Isaacs, Andre Malraux, Edgar Snow, Sterling Seagrave 諸人，受西方史學的現在主義論和社會決定論的影響，認定毛澤東主義的勝利是無可避免的。糾正之道，是要以英文撰寫一本文字優美，具有可讀性及學術可信性的傳記來。（印度籍）Sabita Bhattacharyya「三民主義為求和平、自由繁榮的普遍福音與印度自由鬪爭中的甘地主義之比較」，言兩者革命方式雖然不同，但具有關懷民生的超凡胸襟。（意大利籍）Bruno Zoratto「在歐洲人觀察下的臺灣——中華民國的過去、現在以迄未來」，肯定孫、蔣二氏的價值，並稱讚蔣經國的政治、經濟現代化措施。楊允元「蔣公訪印與印度獨立」，分析一九四二年蔣公訪印之行，對盟軍進攻（駐印）日軍及後來印度之獨立頗有助益。吳圳義「蔣夫人訪美演講之宣傳功能」，論述蔣夫人之行與美國對華的道義支持、物質援助與移民法的修正，有正面的功能。王綱領「美國與北伐前後關稅自由與廢除領事裁判權的交涉」，比較美國對於兩項交涉主題態度的不同，並分析其原因所在。James A. Gregor「孫逸仙博士的帝國主義之涵義與中國之發展」，言先進國應助中國之發展而不干涉其內政。魏萼「中共的經濟實驗：從毛澤東到市場」，分析中共的經濟結構，不久就要追隨南斯拉夫的模式。梁鈺文「試論大陸知識分子」，分析傳統下的知識分子太重視自我，故為毛共所利用，現在他們對共產制度已經絕望，應先爭取彼等之認同三民主義。曹伯一「中國統一與重塑中國政治文化」，以文化的角度分析孫先生的民有、民治、民享、以及海峽兩岸對其構想的不同應用。楊意龍「香港現代化之文化因素」，研討香港現代化的過程及儒家思想在其中扮演正面功能角色的因果。

二、小 結

此次會議討論主題大致可分為一、北伐前後的建設，二、對日抗戰與世界和平，三、臺灣的建設成就與中國之前瞻。近六十年來中國憂患多，安定之日少，而此項會議討論其間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在憂患意識中，從事建設，自有不尋常的意義與認識。

本通訊歡迎世界各地學者，撰文介紹各該地區近代中國史研究情形、出版狀況、會議消息，及傑出學人之貢獻，以廣學術交流。

香港大學「臺灣歷史國際學術會議」

陳 三 井

一、前 言

香港大學校外課程部為慶祝該部成立三十週年，特於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假香港干諾道中二百號信德中心西翼九樓該部市區中心，舉行「臺灣歷史國際學術會議」，主題是「近代臺灣的社會發展與民族意識」。就記憶所及，在香港舉辦以臺灣歷史為主題的國際學術會議，雖不能說絕後，但似乎是前所未曾有之事。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次會議以邀請中華民國臺灣和大陸的學者為主，雙方各為五人，大陸來者有汪敬虞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陳旭麓教授（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李時岳教授（汕頭大學副校長），陳碧笙教授、陳在正教授（以上為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臺灣去者有陳捷先教授（臺灣大學歷史系），尹章義教授（輔仁大學歷史系），莊吉發教授（故宮博物院），許雪姬教授、陳三井教授（以上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就個人所知，這是繼一九八五年十二月該校所舉辦的「國際明清史研討會」之後，中華民國臺灣與大陸學者在學術會議桌上的再一次碰頭。此外，來自美國的有梁伯華教授（西東大學亞洲學系），日本的有若林正文教授（東京大學教養學部），香港本地參加的學者有杜維運教授（香港大學中文系）、徐聰垣教授（香港大學經濟系）、霍啟昌教授（香港大學歷史系）、黃康顯教授（香港大學校外課程部）、呂榮芳先生（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陳其南教授（中文大學人類學系）、廖光生教授（中文大學政治行政學系）、施達郎教授（嶺南學院社會科學院）、曹仕邦教授（新亞研究所）等，人數雖不多，但頗具代表性，可以說是一次精緻型的研討會。

十二月廿二日上午九點，舉行簡單的開幕典禮，由籌備會主席黃康顯博士主持，首先邀請港大校長王賡武博士致詞。王校長自謙說不曾涉獵過臺灣史，但對臺灣史的研究能夠利用滿文檔案、方志、族譜和老字據等材料，卻表示極大的興趣，對即將討論的幾個子題，從臺灣社會發展，建省措施到內

憂外患與民族意識，也提出了他的獨到見解，並指明了問題的探索方向。緊接著由贊助單位的「香港亞太二十一學會」會長黃枝連教授講話，他特別指出，在香港舉辦「臺灣歷史國際學術會議」，不但對於臺灣歷史研究的推進，意義重大，對於探索二十一世紀前後亞太區域的歷史發展規律，也是件意義深遠的事情^①。

其後，由黃康顯博士介紹所有與會的學者，並舉行簡單酒會，讓大家輕鬆交談！

二、論文宣讀

此次會議，共宣讀十五篇論文，因性質不同，分為四次進行，茲將主持人、報告人、評論人分別開列如下：

第一次會議：史料研究與檔案運用

主席：杜維運

1. 陳捷先：清代臺灣地區的方志、族譜與老字據（評論李時岳）
2. 莊吉發：故宮檔案與臺灣史研究（評論呂榮芳）
3. 曹仕邦：臺灣通史一書的體例與作者的動機（評論汪敬虞）
4. 呂榮芳：清乾隆年間手繪臺灣地圖考釋（評論陳碧笙）

第二次會議：社會發展

主席：若林正文

1. 陳其南：臺灣本土意識的形成與其含意（評論陳在正）
2. 許雪姬：臺灣竹城的研究（評論陳旭麓）
3. 陳碧笙：清代臺灣大租的性質和作用——駁所謂「莊園說」（評論徐聰垣）

第三次會議：建省措施

主席：陳捷先

1. 李時岳：劉銘傳與臺灣建省（評論曹仕邦）
2. 陳在正：從閩撫移駐的提出到臺灣建省的實現（評論杜維運）
3. 陳旭麓：臺灣建省與洋務派（評論尹章義）
4. 汪敬虞：建省前後的臺灣經濟（評論施達郎）

^① 黃枝連，「太平洋世紀和香港」，在港大「臺灣歷史國際學術會議」開幕講話，參見「華僑日報」，一九八六、十二、二三～二四，「論壇」。

第四次會議：內憂外患與民族意識

主席：李時岳

1. 梁伯華：臺灣事件與琉球問題的關係（評論陳三井）
2. 黃康顯：從牡丹社事件看英國對華外交（不宜讀）
3. 尹章義：臺灣的認同危機及其發展史（評論若林正文）
4. 若林正文：臺灣抗日民族運動當中的「中國座標」與「臺灣座標」（評論霍啟昌）
5. 陳三井：光復前臺灣的民族意識（評論廖光生）

三、總結與感想

這一精緻研討會的最後一個節目，是由大會主持人黃康顯教授，以「歷史使命與民族意識」為題，對前述論文做了一個總結。黃教授為籌備這次會議，不眠不休，相當辛苦，但基於研討會過程的順利成功，他仍然表示繼續主辦類似會議的決心和信心。個人有幸獲邀參加這次會議，深深覺得，有關臺灣史研究的方法、觀點和資料的討論，海峽兩岸的學者透過類似的國際會議的多邊溝通，互換訊息，確實有其嚴肅的意義！

臺灣史研究暨史料發掘研討會

許雪姬

一、前言

由中華民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與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聯合舉辦的「臺灣史研究暨史料發掘研討會」，於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召開，會期兩天。此次研討會，由中心主任許桂霖與三民所副所長麥朝成主持，與會者有來自各地的文獻工作者、國中校長、老師及學者專家約八十多人。

二、議程

十一月十四日

(一)第一場——黃福慶教授主持

溫振華：光復以前景美地區的民間信仰（林美容教授評）

(二)第二場——陳三井教授主持

1. 鄭梓：抗戰時期對於「收復臺灣」之輿論反映——國民政府擬訂「臺灣接管計畫綱要」的一個背景分析（呂芳上教授評）
2. 陳美妃：論漢字與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之關係（張炎憲教授評）

(三)第三場——周宗賢教授主持

1. 賴志彰：歷史名園——霧峯林家菜園
2. 吳敦善：從保護卑南遺址到促建史前文化博物館
3. 黃炫星：南投縣古碑探索錄

(四)第四場——金祥卿副主任主持

1. 陳炎正：以岸裏社為例看臺灣早期的開發
2. 楊仁江：石敢當初探
3. 黃榮洛：「渡臺悲歌」之發現

十一月十五日

(五)第五場——江慶林主委主持

1. 王世慶：清代道咸同年間臺灣北部民間農村金融及穀價初探——以興直堡銀主小租戶廣記為例（劉石吉教授評）
2. 吳文星：日據時期地方自治改革運動之探討（梁華璜教授評）

(六)第六場——曹永和教授主持

1. 鍾淑敏：日本據臺的初步（蔡淵聚教授評）
2. 翁佳音：一九一三年馬力埔事件的探析（曾迺碩教授評）

(七)第七場——賴澤涵教授主持

1. 戴寶村：臺灣大陸間的戎克交通與貿易（陳信雄教授評）
2. 朱德蘭：清康熙雍正年間臺灣船航日貿易之研究（陳慈玉教授評）

(八)第八場——呂實強教授主持

1. 葉振輝：一八六八年英國駐打狗領事館檔案分析
2. 張炎憲：連溫卿手稿淺介
3. 許雪姬：武翼都尉黃宗河傳——由德興黃氏族譜及故宮檔案談起

此次會議一共發表十八篇文章，依性質來分，學術論文有九篇，史蹟研究有五篇，史料介紹有四篇。

三、特 色

此次研討會的特色有二：

(一)是地方文獻會與學術研究的結合——中華民國史蹟研究中心可以說是臺灣省、臺北市、高雄市三個文獻會的聯合機構。平常的業務著重於史蹟勘考和史料發掘，但是這兩項工作只能引發研究臺灣史的興趣，真正要使臺灣史的研究成爲一門學問，非得靠學者專家不可。此次研討會邀請有關文獻工作者及學者共聚一堂，互相切磋，彼此都有收穫，雖然距學術研討會的理想尚有一段距離，但這樣的交流，對臺灣史今後的發展有其貢獻。

(二)重視日據時期臺灣史的研究——日據時期臺灣史的研究已是刻不容緩的事，此次研討會九篇論文中，有六篇是探討日據甚至日據以後的史事，極爲難得。

(三)此次史蹟研究中，霧峯萊園、石敢當這兩篇文章都由學建築的人所提出，他們由建築著眼來看古蹟，頗具特色；在講解時又能充分利用幻燈的效果，博得與會人士一致的好評。

四、檢 討

由於主辦單位的人手不足（皆係兼職），因此準備難免有不周之處：如論文的校對並不如理想；有些論文較冷僻以致無法引起較深入而廣泛的討論；又如每一場次的時間也未能控制妥當，這些都值得改進。至於論文的品質，由於提早徵稿，有充分的時間寫作，因此一般的水準都算不錯。據聞史蹟中心七十六年度仍將舉辦研討會，不過這次的研討會將只限於史蹟研究及史料發掘。

□ 近史所出版研討會論文集 □

- ① 辛亥革命研討會論文集
- ② 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
- ③ 中華民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 (1912-1927) (二冊)
- ④ 抗戰前十年國家建設史研討會論文集 (1928-1937) (二冊)
- ⑤ 抗戰建國史研討會論文集 (二冊)
- ⑥ 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論文集 (二冊)

※各類論文集內容豐富，極具學術價值，欲購者請洽中研院近史所。

出席「西安事變五十週年紀念 國際學術討論會」之追憶

• 李雲漢 •

一、小 引

去伊利諾大學 (University of Illinois) 出席「西安事變五十週年紀念國際學術討論會」(50th Anniversary of the Xi'an Incident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是去年 (民國七十五年，一九八六) 十月上旬的事。快半年了，現在來談會議的過程和感想，只能說「追憶」，而且是一鱗半爪的追憶。

有一點也要首先說明的：我是純粹以個人身分，應邀出席會議的；所提論文，當時講話以及現在寫出的觀感，都是我一個人的意見，並不代表任何方面。

二、緣 起

討論會議程表上印出的主辦單位有三個：北美洲二十世紀中國史學會 (The Historical Society for 20th Century China in North America)、伊利諾大學東亞及太平洋研究中心 (Center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Studies, University of Illinois)，及南伊利諾州大學國際教育計畫及服務中心 (International Programs and Services,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at Carbondale)。最早發起並實際負責籌備的人，則是南伊大歷史系教授吳天威博士。吳教授是國際史學界公認研究西安事變之權威學者，也是北美洲二十世紀中國史學會副會長，爲了召開這次討論會，他奔走聯絡，付出了最多的時間和精力，也表現出卓越的組織能力和服務熱忱，令人敬佩。

協助吳天威博士的，是兩位美籍人士：一是南伊大國際教育計畫及服務

中心主任杜基瑞 (Jared H. Dorn) 博士，他努力於經費之籌措；一位是伊利諾大學東亞及太平洋研究中心主任奚彼得 (Peter Schran) 博士，他洽商伊大提供了會議場地。

三、主題及出席人

依籌備人的設計，討論會的主題有三：(一)西安事變的新資料及新觀點；(二)張學良、楊虎城的生平及思想；(三)西安事變與中國國民黨及共產黨。論文的提出多能在此三項主題的範圍內，沒有明顯的「題外發揮」現象，令人感到很欣慰。

早在去年二月間，吳天威教授便寄出了邀請通知書。有的人接受邀請，有的人則不克分身，實際到會的學者有三十多人，加上列席聽講的研究生及新聞人員，大概在六十人至八十人之間。出席學者中，一人來自法國，一人來自加拿大，五人來自中國大陸，二人來自中華民國臺灣，其餘則為美籍學者，其中大部分是華裔。大體說來，這次討論會仍不外是「中國人，談中國事」，三五位真正的外籍學者，陪陪而已。

四、議程及論文

從十月三日到五日，會期三天。但第一天是報到、開幕式及歡迎酒會、餐會，實際開會討論只有四、五兩天，共開了三場討論會，其議程如下：

第一次討論會

主 題：西安事變的新史料及新觀點

主 席：Jared H. Dorn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at Carbondale)

評論人：Lucien Bianco (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郭成棠 (匹茨堡大學)

吳文津 (哈佛大學)

論 文：傅智松 (即傅晶，柏克萊加州大學)：「中國 (大陸) 最近出版之有關西安事變資料 (書籍、電影及私人訪問)」

劉紹唐 (臺北，傳記文學社)：「傳記文學刊載有關西安事

變之文稿及資料簡介與分析]

John W. Garver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he Comintern and the Xi’an Incident”

Steve Mackinnon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Agnes

Smedley and the Xi’an Incident”

第二次討論會

主 題：張學良、楊虎城的生平及思想

主 席：朱永德 (Richard Chu, 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評論人：唐德剛 (Te-kong Tong, City College of New York)

李本京 (Thomas B. Le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祖炳民 (John B. Tsu, JFK University)

劉子健 (James T. C. Liu, Princeton University)

論 文：陳崇橋 (遼寧大學)：「張學良的思想演變」

米鶴都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楊虎城將軍之經歷及思想與西安事變」

王 冀 (Wang Chi, Library of US Congress)張學良早年的事業

章念馳 (上海社會科學院)：「章太炎與張學良」

汪榮祖 (Young-tsu Wong, 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The Longest House Arrest: Why Couldn’t Jiang Jie-shi Set Zhang Xue-liang Free?”

第三次討論會

主 題：西安事變與中國國民黨及共產黨

主 席：Peter Schra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評論人：Lloyd E. Eastma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William Wei (University of Colorado)

齊錫生 (Chi Hsi-sheng,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James P. Harrison (Hunter College)

論 文：陳志讓 (Jerome Chen, York University): “Jiang Jie-shi in Xi’an-Coping With A Crisis”

Lyman P. Van Slyke (Stanford University): “The Strategies and Tactics Devised by the Nanking Leaders to the

Challenge of Jiang Jie-shi's Kidnapping”

徐乃力 (Lawrence N. Shyu, University of New Brunswick): “Provincial Reactions to the the Xi'an Incident”

鄭德榮 (東北師範大學) : 「中國共產黨與西安事變」

李雲漢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會) : 「西安事變之善後處理與抗日決策」

以上十四篇論文，係列入議程表者。實際上，王冀之論文未及提出，有兩篇只有綱要而無本文，而體系完整並經複印提供大會者十一篇。章念馳未到會，其論文由汪榮祖代為報告。吳文津、齊錫生等亦因事未到，John W. Garver 也因前往印度未及趕回參加。倒是另外有一個特殊人物，一直在會場中，也發言，也在餐會中講話，甚惹人注意。他就是來自北京的楊拯民，係楊虎城長子，職務是大陸政協的常務委員兼副秘書長。講演題目是「西安事變的必然性」，有英文稿分發給聽眾。

五、我的觀感

人世間，從來就沒有過盡善盡美，或十全十美的事。任何人做任何事，都有值得讚揚的地方，同時也難免有受人批評之處。就我個人的感觸而言，這次討論會的成果是尚滿人意的，尤其是對主辦人吳天威博士的辛勞和開明，私惻互為欽佩。但也不可否認，有些地方很叫人感到不平和失望。

有好幾篇論文，客觀公正，令人激賞。陳志讓和范力沛(Lyman P. Van Slyke) 兩位先生的言論，尤為公允。大多數學者都保持良好的學者風度，為討論問題而發表意見，也有少數幾位修養欠佳，口風甚差，自以為逞心快意，真正的效果可能是弄巧成拙。

學術會議就是學術會議，應當嚴守學術的規範，不要叫與會者有異樣的感覺。就這次會議而言，個人認為像楊拯民這樣與學術無關的人如果不來，氣氛會更好些，成果也會更大些。這個意思，我也曾對吳天威博士提過，也許是「形勢逼人」使然吧！討論會的初步紀錄，已由吳天威親自校訂後，發表於傳記文學四十九卷六期，吳先生說，全部論文「不久將整理成書，公諸於世」，我和諸位讀者一樣在熱心的期待著。

(編者按：美國華盛頓特區喬治城大學亦於一九八六年九月廿七日舉辦「西安事變五十週年研討會」，會議論文請參閱本期研究通訊「大事紀要」欄。)

「第七屆中韓學術會議」報導

□□葉稗英

一、前 言

爲交換中、韓兩國對共黨問題的研究心得，促進兩國學術界的交流，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與韓國西江大學東亞研究所於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六日在臺北木柵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會議廳聯合舉辦了第七屆「中韓學術會議」。正式會期爲十二月一、二兩日。應邀出席、提論文、擔任講評的國內學者計有于宗先、孔秋泉、江炳倫、朱松柏、呂亞力、沈雲龍、林秋山、吳中立、洪茂雄、曹伯一、葛永光、趙林、謝復生、邊裕淵等三十九人。韓方與會的學者有西江大學教授李相禹、全海宗、李泰旭、張達重、劉載天、李光麟六人暨前高麗大學校長金俊燁、國土統一院研究員陳性初、朴雄熙、廉煥哲、柳仁澤共十四人。大會主席爲國研中心主任邵玉銘，秘書長爲該中心副主任周煦。

會議於十二月一日上午九時開幕，由政大國研中心主任邵玉銘主持並致開幕辭。政大校長陳治世、韓方代表團團長李相禹、韓國駐華大使金相台相繼致辭，一再重申中、韓傳統友誼並預祝大會圓滿成功。九時三十分起開始進行討論，在短短兩天之內，中韓學者共發表論文八篇，全部議程於十二月二日下午五時結束，接著舉行閉幕式，中方團長邵玉銘，韓方團長李相禹先後致閉幕辭，順利地結束了此次會議。

二、議 程 表

(一)第一次討論會（十二月一日上午 9：30～～12：30）

主席：周煦（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主任）

報告人：葛永光（臺灣大學教授）

題目：「中華民國的政治發展經驗」

評論員：李甲允（韓國西江大學教授）

陳鴻瑜（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報告人：張達重（韓國西江大學教授）

題目：「韓國政治變化的結構分析」

評論員：呂亞力（臺灣大學教授）

廉煥哲（韓國國土統一院研究員）

(二)第二次討論會（十二月一日下午 2：00～5：00）

主席：謝復生（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秘書）

報告人：吳中立（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經濟組召集人）

題目：「中華民國經濟發展的回顧與展望」

評論員：朴雄熙（韓國國土統一院研究員）

邊裕淵（臺灣大學教授）

報告人：李泰旭（韓國西江大學教授）

題目：「韓國經濟發展策略及其影響」

評論員：于宗先（中華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陳性初（韓國國土統一院研究員）

(三)第三次討論會（十二月二日上午 9：00～12：00）

主席：全海宗（韓國西江大學教授）

報告人：朴商台（韓國西江大學教授）

題目：「海外韓僑的分佈與現況」

評論員：高崇雲（師範大學教授）

劉載天（韓國西江大學教授）

報告人：趙林（政治大學教授）

題目：「中華民國與海外華人」

評論員：李光麟（韓國西江大學教授）

江炳倫（政治大學教授）

(四)第四次討論會（十二月二日下午 2：00～5：00）

主席：金俊燁（前韓國高麗大學校長）

報告人：陳性初（韓國國土統一院研究員）

題目：「韓國的統一政策」

評論員：洪茂雄（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柳仁澤（韓國國土統一院研究員）

報告人：曹伯一（政治大學教授）

題目：「中國統一之道」

評論員：鄭富洛（韓國國土統一院研究員）

沈雲龍（世界新聞專科學校教授）

三、論文摘要

(一)葛永光：「中華民國的政治發展經驗」

本文作者先行提出中華民國的政治發展具有如後三大特徵：1.安全受到威脅的發展環境；2.一黨優勢下的民主政治；3.從軍人主政到文人政治的出現。然後套用美國政治學者克勞福·楊（Crawford Young）所訂的成長（growth）、平等（equality）、自主性（autonomy）、人類尊嚴（human dignity）、社會能力（social capacity）六項指標來衡量中華民國過去三十多年的政治發展。如此得出來的結論是：在達成成長和分配的目標上，中華民國政府表現傑出。在人權和參與的目標上，中華民國過去幾十年也有了很大的進步與改善。就自主性而言，中華民國在經濟上對美、日的依賴，雖未造成如依賴論學者所預言的會導致成長停滯及所得分配不均，但是，進出口貿易的過於依附美、日，風險太大，仍不是健全的發展方式。就決策能力的標準而言，中華民國政府在經濟決策上對環境的應變能力很強，但是在國內外政治的應變能力上則有待加強。

(二)張達重：「韓國政治變化的結構分析」

作者首先剖析韓國政治發展最重要的當前課題是和平的政權轉移及建立安定的、有效的民主政治體制。這個過程的成功與否為韓國的政治民主化提供了重要的契機。執政黨為了解決安保及經濟問題，企圖建立對政治權力有所限制的民主主義體制，在野的反對黨勢力則以為只有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體制，才是解決韓國當前政治、經濟、社會等所有問題的唯一途徑。雙方對民主化的主張各有不同的內容，彼此利害關係與見解的差異是造成當前韓國政治不安的根本原因。作者接著指出韓國過去四十年的經濟發展模式對韓國民主主義的前途，造成三大影響：1. 依靠國家權威主義促進產業化的結果，

形成國家權力結構的過度龐大，出現軍隊與警察組織膨脹的現象，政黨政治因而開始漸次衰退。2.官僚權威主義體制下的以實用主義、國際主義為特色的經濟政策，全然依賴美、日的資本、市場及技術，加深了南北韓經濟體制的異質化，使民族分裂的現實固定化，並妨礙了民族主義的發展。3.以輸出為導向的工業優先經濟發展政策，造成貧富之間的差距及都市與農村發展的失調，於是產生了批判這種經濟發展政策的反對集團。作者在論文結尾，預估韓國政治的未來發展將有以下三種情況：1.全面的民主化，即包括總統的直接選舉，透過競爭的選舉制度展開政治的競爭。2.為阻止因民主化運動而招來的混亂，而採取鎮壓與控制的手段。3.繼續維持執政勢力的權威主義統治結構，並採取有限的民主體制。這三種情況何者出現端視現執政的民正黨能否有效控制政府與社會、以及包括軍人等國家機關而定。

(三)吳中立：「中華民國經濟發展的回顧與展望」

此文分前言、經濟發展的回顧、經濟發展的評估、經濟發展所顯示的意義、經濟發展的展望五大段落來敘述。

作者首先概略地將二次世界大戰後中華民國的經濟發展分成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從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迄民國四十年代，建設的重點在於促進農業部門和進口替代工業的發展；第二個時期則是自四十年代末起，一直延續到目前，對外導向的工業化政策成了建設的依歸。然後分析中華民國經濟發展成功的因素全在於經濟計畫的成功採行，這包括：(1)貨幣和財政政策抑制了通貨膨脹，鼓勵了儲蓄和資本形成，同時也誘導採行了勞力密集的生產方式；(2)農業政策促進了技術的創新和制度的改變，成功地引導美援並發揮了生產的功效。(3)貿易政策激勵了出口，使進口更自由，劃一了匯率，也進一步貶低了新臺幣的匯率。作者在文章結尾指出：經濟發展策略的自由化、國際化與制度化三者是我國經濟長期發展的目標之所在。

(四)李泰旭：「韓國經濟發展策略及其影響」

本文先行探討韓國在過去二十幾年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經濟的質與量，並未能朝著大家所期望的方向來變化。在產業結構面，因政府當局全力培植產業的發展，而忽視了基本材料及資本財產業的發展，乃使基本材料及資本財產業之基礎相對脆弱；儘管出口金額大幅擴增，然而國際收支卻呈現長年赤字，外債總額亦逐年累積；由於偏重培植大企業發展的結果，導致經濟力集中於財團的手中；另由於採先成長後分配的政策，致使勞資關係合理的發展為之延後。

作者接著剖析韓國經濟發展的基本策略。在五〇年代，其經濟秩序及發展的基本政策方向，可歸納為以下兩點：第一，在經濟體制的運作面，係奠定民間導向的市場經濟體制，並排除政府的直接管制，擴大民間經濟活動，積極培植私人企業的發展。第二，主導經濟發展之工業化策略是以消費品為主的對向導向的進口替代。至六〇年代及七〇年代，基本政策改為在政府強力的參與下，採行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策略。但七〇年代後期所呈現的高度成長，以及因之所引發的景氣過熱局面，同時在國內經濟條件未臻成熟之際，輕率地推動重工業培植措施所引發的副作用，自一九七九年起陸續顯現出來。因此，對過去所採行之高度成長政策及太過於勉強地培植重工業的發展措施，開始進行批判與反省。結果認為應優先謀求經濟穩定的看法與主張，較過去任何時期更加迫切。

在結論裏，作者談到韓國經濟在過去的發展過程中，雖在數量成長量方面，獲致輝煌的成就，但卻忽視其他目標，因而各種副作用陸續顯現出來。韓國政府自一九八二年開始實施的第五期五年經濟社會計畫，轉換了經濟發展政策的基本方針，將經濟穩定列為最優先的課題，並進一步謀求國民生活的平衡發展及其素質的提高，如此或可有所修正或彌補。

(五) 朴商台：「海外韓僑的分佈與現況」

本文裏，作者將韓僑分佈分中國大陸、蘇聯、日本、美國四個主要對象國家來論述。先闡述韓僑殖民的歷史背景，再言及當前四區韓僑的分佈概況。作者比較韓僑在此四個國家內的處境與生活後，得出這樣的結論：韓國人移民至美國、中國大陸或蘇聯等多元民族國家，這些國家大致認可韓民族的特性，保障他們的身份，鼓勵歸化，並區別歸化人與非歸化人。但移民至日本等單一民族國家，則不鼓勵歸化，也不去理解其他民族的特性。

(六) 趙林：「中華民國與海外華人」

文章裏，作者首先界定華人的定義。海外華人，事實上，包括華僑（中國人僑居海外者）、外籍華人（中國人歸化為外國國民者），及華裔（在外國出生的華僑或外籍華人的後裔）。中華民國可以說是以一種近乎血統主義的統計標準來計算華人總數，因而往往與華人所在地主國採得的統計數字有很大的差異。依據中華民國僑委會一九八六年的統計，海外華人的口總數約為二八、一二四、二七二人。亞洲最多，美洲、歐洲、非洲，大洋洲次之。

文中特別談到海外華人對祖國的諸多貢獻；自國父孫中山在檀香山首創革命，革命運動在海外各地風起雲湧，如火如荼，革命黨人在國內屢次起

義，得力於華僑協助者最多。舉凡革命軍餉之籌措、黨員之聯絡，以至起義的策劃，莫不以華僑成員為中心，在「三、二九」廣州黃花岡一役，華僑直接犧牲者達二十八人。海外各地華僑在民國建立以後的討袁、護法、以至於北伐，完成統一諸階段，亦協助政府掃除封建軍閥勢力，所以在建國時期華僑對祖國的貢獻，實不下於革命期間，且為國人所公認。海外各地華僑在支持祖國對日抗戰期間，不論人力、物力，皆有捐輸，他們或毀家紓難，或回國殺敵，直接或間接地支持政府抗戰到底。

文章後段論及現階段中華民國的僑務政策為：「新舊一體、僑學兼顧、尊重前輩、培植後進」。

(七)陳性桂：「韓國的統一政策」

作者先行指出自一九八〇年代起，韓國的統一問題邁入一個新的局面。南韓基於民族自決的原則，以民主的程序與和平的方法，在韓半島鞏固和平。在實現民族和諧的基礎上，為完成國家的、體制的統一之藍圖，提出「民族和合、民主統一方案」，再三向北韓提出包容性的、實踐性的以及建設性的建議。相反地，北韓當局則基於對南韓赤化戰略，標榜所謂「建立高麗民主聯邦共和國方案」，為製造赤化環境而提出了先決條件，使用和平與戰爭的兩面戰術。

作者對韓半島未來局勢的看法是：國際情勢和韓半島的現實狀況，不僅要求南北分裂現狀轉向於統一的方向。並且，一九八〇年代將是國際情勢的轉變期，也是決定韓民族政治命運的重大轉捩點。與統一有關，而產生的中心課題是：將北韓的路線自「階級鬥爭」轉換為「民族和合」，自「赤化革命」轉換為「和平統一」。如果北韓的統一概念不能擺脫暴力革命，顯然那將是一個最難的課題。

(八)曹伯一：「中國統一之道」

作者對比海峽兩岸的政治發展，認為中華民國政府在中山先生思想指引基礎上，努力從事建設，就政治建設範疇而言，具有下列六項特點：1. 調適自由與權威的關係；2. 確立社會客觀評價準則；3. 提昇參與普遍化；4. 提昇政治體系合法性；5. 塑造多元社會；6. 建立以法制為基礎的社會秩序。中華民國政府長期來的努力，就以上各項觀察，顯然已獲得可喜成就。中共政權並不以全民福祉為最優先考慮，而只是要中國人與中國社會迎合共產主義者主觀的構思，毛澤東當年的「改造」，鄧小平目前標榜的「中國式社會主義道德」，都是如此。因此，中共利益與中國人利益產生嚴重衝突，於是中共

無可避免遭遇困難。

曹教授在文中接著指出，當前中國大陸已經顯現出來的社會變遷中失調的困擾計有四端：(一)馬克思主義功能與中共意識徬徨問題；(二)經濟體制改革與社會變遷的調適問題；(三)中共「政治堅持」面臨動搖問題；(四)中共內部各種矛盾問題。

文章結尾提出：中國的統一，並不祇是地理的合併而已，中國的統一要為中國人建立一個合理的制度，透過這一合理制度，求取全民最大福祉。而中華民國在臺灣基地的經驗，已為統一後的中國提供了珍貴的、可信賴的實效經驗。

四、後 言

此次會議，韓方代表多位為西江大學年輕教授，且獲有美國耶魯、柏克萊加州大學博士學位，素質顯見提高。韓方張達重的「韓國政治變化的結構分析」及李泰旭的「韓國經濟發展策略及其影響」二文，俱引用學理對現實狀況作了鞭辟入裏的分析，贏得與會學者一致好評。中方學者葛永光所提「中華民國的政治發展經驗」一文，亦套用西方學理來分析政治發展狀況。惟韓方評論員李甲允認為渠所提經濟發展的論據不够充分，對中華民國政治發展有過於樂觀的預估。中方評論員陳鴻瑜則以為渠所採用的衡量標準不適用於衡量政治發展。江炳倫認為該文對政治結構的變化未論及，影響政治結構變化的有思想、文化等問題均未述及。張存武認為政治發展應包括言論開放、司法獨立、婦女參政等問題，文章都未談到。中方代表趙林所提「中華民國與海外華人」一文，中方評論員江炳倫認為渠所引述的全係僑委會發佈的資料，似應引用各僑居國資料為宜。且每年全球各種語文出版的有關華僑研究的專著有數百冊之多，可惜本文都未引用這些資料。

總言之，此次會議，中韓雙方選擇了彼此共有的政治發展經驗、經濟發展經驗、海外僑胞問題、國土統一問題四個主題，廣泛、熱烈地交換了意見，藉著共同腦力的激盪，更增進了彼此對這些問題的了解。

一九八六年七月至一九八七年三月世界各地舉辦有關近代中國史研究之重要會議，請參見本期通訊「大事紀要」欄。

第一屆中琉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

• 朱德蘭 •

由中琉文化經濟協會主辦的「第一屆中琉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於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在臺北中央圖書館舉行。應邀出席的專家學者共七十二位，提供論文二十五篇。

這次會議除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奇祿的專題演講「明清中琉關係的歷史意義」；與會學者對中琉歷史關係、政治外交、文化交流、歷史人物、貿易、宗教……等學術問題進行討論外，大會並招待國外代表參觀臺北故宮博物院、美術館及臺南古蹟。現就所探討的問題簡介於後。

(一)有關中琉關係史方面：臺灣大學教授陳捷先的「清代奏摺資料與中琉關係史研究」，以奏摺資料說明琉球貢使與中國官方往來的經過；本文就參考文獻上來說，奏摺材料豐富，可校正「歷代實案」的缺誤，很值得研究琉球史學者的重視。韓國誠信女子大學教授李炫熙的「朝鮮王朝時代的對琉關係——以朝鮮、中國、琉球三國關係史為中心」一文，利用許多罕為學界所知的韓國史料，從中國、朝鮮、琉球三國間的關係，來探討朝、琉互補性的文化交流，對朝鮮政治、經濟方面的影響。

(二)有關琉球政治外交史方面：就讀日本名古屋大學博士班的豐見山和行先生，以中國冊封琉球為基軸，解說冊封儀式在琉球政治上的機能與實質意義，提出「琉球王位與冊封關係」一文。日本沖繩大學教授島尻勝太郎的「明清之際琉球方面的肆應之道」，考察明清鼎革，琉球對宗主國的內亂，如何謹慎地見機應變。日本九州大學眞榮平房昭先生以明清交替時期為範圍，發表「明清之際的動亂與琉球、日本之關係」一文，是從琉球外交政策與向薩摩藩提供中國政變情報的角度，探索琉、日間的關係。

(三)有關中國文化影響琉球方面：屬於這一部分的文章較多，以儒家思想為主題的論文有兩篇：一是沖繩縣立圖書館主任系數兼治的「琉球接受朱子學之研究」，探討琉球接受朱子學思想雖較亞洲諸國遲，然其特點是全盤性地吸收，朱子學至明治廢藩置縣止，始終為琉球政府的政治指導方針。一是師範大學教授吳靄華的「清代儒家思想對琉球的影響」，分析琉球以王道治

國、實行禮儀規範，都因接受儒家思想之故，而敬孔建廟興學，不但擴大了儒學的影響面，提高琉球的文化水平，更增進了中琉歷史關係。以民俗為主題的論文有三篇：日本東京大學教授窪德忠的「中國文化對琉球文化的影響」一文，認為琉球許多民俗起源中國，但因琉球有其獨特性的文化，故產生異於中國的習俗。他認為有關琉人如何有選擇性的接受中國文化是有待深入追究的課題。琉球大學教授比嘉政夫的「中國文化對琉球親族組織的影響」，是從中國宗族觀念影響琉球親族結構原理、習慣、成立家譜的視角，比較中、琉民俗的異同。那霸文化振興課的田名真之先生，以琉球王府、士族編纂家譜的歷程為中心，撰寫「琉球家譜的成立」一文。以藝術為主題的論文也有三篇：沖繩縣教育廳文化課主任專門員渡名喜明的「從美術工藝看琉球接受中國文化之形態」，是由傳入琉球的中國美工藝品、技術層面，對琉球接受中國文化的情形進行探索。沖繩縣立博物館學藝員知念勇的「琉球出土之明代陶瓷研究」，以琉球出土的陶瓷器物，推斷中、琉非正式貿易關係早於明代，約在十二、三世紀左右；另就出土物品的內容、數量分析，明代產物居多，其中以青瓷類的碗、皿佔大部分。日本津田塾大學教授岡崎郁子的「琉球戲劇『打花鼓』研究」，研討派遣至江戶的琉球使節，在奏樂、演劇時多採用明清時代中國的音樂、中國歷史故事編成的戲劇，並兼用若干中國的樂器，舉「打花鼓」為例，便可窺知琉球藝能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此外，沖繩圖書館高良倉吉先生的「古琉球海事思想狀況」一文，除肯定琉球在船舶方面也接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外，更從琉球古語 Surajo（造船所）、船名字尾 Tomi 問題出發，探討古代琉球的海事思想。

（四）有關中琉關係中的歷史人物方面：任職中國廣播公司的楊仲揆先生，就一七五六年王文治隨冊封使赴琉，留存在琉的作品，提出「王文治（夢樓）在琉球」一文。政治大學教授兼中琉文化經濟協會副理事長張希哲的「蔡溫對琉球的貢獻」，詳敘出身華裔的蔡溫，輔佐琉王不但締造了琉球史上的黃金時代，且於其卓越的貢獻裏，將中國文化傳播琉球。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研究員張存武的「謝杰對琉日關係之認識」，介紹謝杰因生長於福建長樂，故深悉中外海情，在使琉之後，除加深對琉、日的認識外，更因著「虔臺倭纂」一書，引起後人對日本的注意。就讀東京大學博士班的張啟雄先生發表「何如璋的琉案外交——以『失言事件』為中心」一文，就何如璋的琉案政策、交涉始末，檢討交涉失敗的原因。

（五）有關文學、宗教、航海、貿易問題的論文各有一篇，歷史地理方面的

研究有兩篇：美國揚百翰大學夏威夷分校副教授韓小敏（Sherman Han）的「評介雪堂燕遊草」，從中國古典文學的觀點，評論琉球漢學家程順則文集的特色。琉球大學教授照屋善彥的「基督教在琉球的傳布與中國」，探討中英南京條約後，西人藉國際情勢轉變，以南中國為基地，利用漢語、漢譯福音向琉傳教，琉球排拒的情形。史學界老前輩文化大學教授梁嘉彬的「明清兩代福州那霸間風帆去程之研究」一文，從航海針路、季候風、海流諸點，考察閩、琉兩地的航行日程。政治大學教授徐玉虎的「『冠船之時唐人持來品貨物錄』之分析」，由考釋「歷代寶案」裏的一篇殘缺記錄，來究明中、琉官方貿易的具體實相。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副研究員黃寬重的「南宋『流求』與『毗舍耶』的新史料」，依據「宋廬陵胡澹庵文集」、「山堂羣書考索」、「歷代名臣奏議」等文獻，就以往學者對流求、毗舍耶的研究，提出若干的澄清與補充。沖繩縣立圖書館資料課長富島壯英的「明末久米村之衰弱及其振興問題研究」，則是篇探討十五、六世紀，琉球三十六姓久米村因中、日對外政策改變而勢衰，復因薩摩侵琉，琉對日從事進貢貿易，採行補姓移入的措施，振興了此一華裔地區的文章。

這次會議總的來說，討論熱烈，與會者都認為大會聚集各地學者，彼此交換意見，互相切磋啟發，對促進學術交流、中琉關係史的深入研究，很有意義。大會除預備出版研討會的論文集外，並期待下次會議能在日本沖繩或臺灣繼續舉行。

亞洲學會第三十九屆年會

亞洲學會第卅九屆年會於今年（一九八七）四月十日至十二日，在美國波士頓市喜萊登旅館舉行。依照主辦單位公佈的議程，今年年會除一般性的會員大會、展覽和藝術交流活動外，主要仍以研討會為主。本屆年會共安排七項研討會：(一)「中國與內陸亞洲」，廿二個分組；(二)「日本」，十個分組；(三)「韓國」，四個分組；(四)「南亞」，十二個分組，(五)「東南亞」，十一個分組；(六)「區間關係和圖書館」，十一個分組；(七)「個人論文宣讀」，六個分組。因此本屆年會以討論主題劃分共七十六個分組，較去年年會多出一個分組。

「中國與內陸亞洲」研討會中，討論明清以來中國研究的主题就佔一半。明史方面，有綜合性的「明代史：探討十五世紀」分組，包括兩個部份，第一部份宣讀有關明代社會與經濟的三篇論文：①Mi Chu Wiens (居蜜)，"Fiscal Reform and Social Change," ②Elliot Sperling, "The Szechwan-Tibet Frontier in the 15th Century," ③John W. Dardess, "A Century of Social Change: T'ai-ho County, Kiangsi, 1400-1500." 第二部份宣讀有關明代思想和美學的三篇論文：①Chu Hung-lam (朱鴻林)，"Changing Intellectual Trends in the 15th Century," ②Cynthia J. Brokaw, "Confucian Loyalty Betrayed: The Changing Fortunes of the Yuan Family in Early 15th Century Jiangnan," ③Kathlyn Liscomb, "15th Century Painting: The Plurality that Preceded Orthodoxy." 今年為紀念明末地理學家徐宏祖(霞客)四百週年誕辰，特有四篇論文在此主題下發表：①Chun-shu Chang, "The Life and Times of Xu Xiake (1586-1641): Intellectual Challenge and Individual Creativity in Late Ming Times," ②Philippe C. Foret, "Traveling with Xu Xiake in Yunnan: Geography of the Borderlands," ③Jonathan Chaves, "The Yellow Mountain Poems of Ch'ien Ch'ien-i (1582-1664): Poetry as *Yu-Chi*," ④James M. Hargett, "The Literary Qualities of Xu Xiake's Travel Diaries."

明清以來的社會經濟史研究在比例方面仍佔多數，在「明末清初從徭役到雇傭」分組中，學者宣讀四篇論文：①Richard von Glahn, "Labor Service Reform and Urban Social Conflict in Late Ming Jiangnan," ②David E. Kelley, "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of Hired Labor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③Joanna F. Handlin-Smith,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the Poor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④Peter C. Perdue, "Dike Labor in the Qing Dynasty." 「清代海上貿易的研究新展望」分組中，共討論五篇論文：①Jane Leonard, "Geopolitical Reality and the Tributary Ideal in Qing Times," ②Robert P. Gardella, "Guilds and the Tea Trade in Nineteenth Century," ③Dian Hechtner Murray, "Commerce, Crisis, and Coercion: The Role of Piracy in Late-Eighteenth and Early-Nineteenth Century Sino-Western Relations," ④Frederic Delano Grant, Jr., "Litigation Involving Hong Merchants in Nineteenth Century United States Courts," ⑤Carl L. Crossman, "The Treaty Ports

as Depicted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ese Export Paintings.”「清代及民國的市場行爲及組織」分組中，有下列三篇論文：①Fu-mei Chen (陳富美)，“Product Markets and Economic Power during the Ch'ing Period,” ②Loren Brandt, “Silver and Markets in the 1930s,” ③Barbara Sands, “The Impact of War on Markets in Shanxi Province.”另有一分組主題爲「一九二〇年代初期的上海」，四篇論文爲 ①Lee Feigon, “Lurking in the Shadows: The Architectual Setting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CCP in Shanghai,” ②Byrna Goodman, “Native-Place Sentiment and Native-Place Organization in Shanghai,” ③Hans Vandeven, “The Effect of Shanghai on the Nature of Political Debate in the Early Twenties,” ④Herman W. Mast III, “‘Is There Any Man Who Does Not Have A Mind?’: Dai Jitao and the Social Consciousness of Shanghai after the May Fourth Incident.”

外文史方面，有一分組討論「中國對外關係史的新觀點」，下分兩個部份，第一部份有三篇關於對外認識的論文：①Christopher I. Beckwith, “Concepts of the ‘Barbarian’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Western Sinology,” ②John E. Wills, Jr., “Starting from Canton: Unities and Contrast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③Charles R. Lilley, “Tsiang Tingfu and the Origins of the Response Paradigm.”第二部份的三篇論文著重於對外關係層面的探討：①Wang Xi, “New Approaches to China’s Modern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②Daniel H. Bays, “Western Missionary Sectarianism and Chinese Folk Christiani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③Andrew J. Nathan, “Implications for Foreign Relations of Recent Trends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Republican China.”近代史人物的研究，有一分組的四篇論文討論這個主題：①Don C. Price, “Song Jiao-ren’s *My History*,” ②Vera Schwarcz, “Zhang Shen-fu: Life on the Periphe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③Wendy Larson, “20th Century Chinese Autobiography: Historical Context and Personal Identity,” ④Tani E. Barlow, “Ding Ling’s *Mother*: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Persona.”關於近代中國民間文化的社會史研究，有如下四篇論文：①Philip A. Kuhn, “Sorcery as an Object of State Control,” ②Roger R. Thompson, “Local Society, Opera, and

the Stat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③Prasenjit Duara, “The Modernizing State and Temple Communities: North China Village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④Ann S. Anagnost, “Folk Ritual and the Definition of Community in Post-Mao Fujian.” 此外，今年國內有不少學者呼籲學界從學術觀點來研究「二二八事件」，本屆年會的「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一個新的解釋」分組中，提出了三篇論文：①Lai Tse-han (賴澤涵), “Prevailing Interpretations of the February 28th, 1947 Incident,” ②Wei Wou (魏蕓), “A Methodology and New Historical Materials,” ③Ramon H. Myers,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February 28th, 1947 Incident.”

其它的研討會中，也有部份關於近代中國史研究的論文，較重要者，有「間諜之戰：一九三〇年代中日關係的新看法」一個分組，提出四篇論文為①Barbara J. Brooks, “Spies and Adventurers: Kawashima Yoshiko, the Mata Hari of the East,” ②Joshua A. Fogel, “Liberals and Collaborators: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Company,” ③Wen-hsing Yeh (葉文心), “Espionage and Righteousness: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 in Shanghai,” ④Parks M. Coble, “Superpatriots and Secret Agents: The Blue Shirts and the Japanese Secret Services in North China” 新的研究資料介紹，主要有①William R. Lavelly “Chinese Demographic Data: A Guide to Major Sources,” ②James Lee (李中清) and R. Bin Wong (王國斌), “New Research 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Late Imperial China,” ③Barry Naughton, “New Economic Data for Research.” 關於中國大陸近況之研究，也有少數分組討論，其詳細論文篇目，因篇幅有限，在此不一一列舉。

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論文集 (上、下冊)

定價 (精) 1400 元 (平) 1200 元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於民國七十五年八月廿二日至廿四日召開為期三天的「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討論十七世紀以來中國區域發展之有關問題。會中共宣讀論文廿七篇，探討中國文化區域之劃分與整合，臺灣地區之發展，中國社會史、政治史、經濟史之區域發展，列強與中國之區域發展，及區域研究之回顧。該項研討會論文集已於七十五年十二月出版，厚九四七頁。

※函購七折，郵撥 1034172-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帳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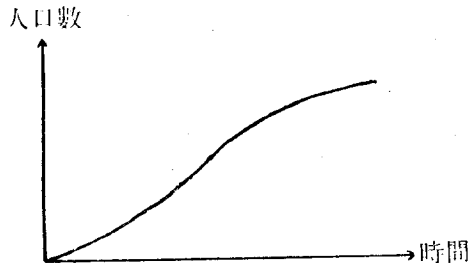
歷史人口研究的基本觀念*

• 劉 翠 溶 •

人口學研究的主要內容可以分爲四方面：婚姻、生育、死亡、以及移民。這四方面之中，婚姻、生育與死亡的計算方法已經比較精確，移民則仍較爲粗略。對於歷史人口研究，歐洲方面已有十分豐碩的成果，我國則較少人從事，但在美國漢學界，近年來則極關心中國人口的問題，並且用人口學的方法來研究。我個人所做的，則是用族譜來研究人口學上的幾個課題。以下就簡單介紹人口學的一些基本方法。

人口學探討人口的變遷，通常採用 $P_t = P_0 \cdot e^{rt}$ 的計算公式，以求得每年的平均成長率。至於人口長期的成長趨勢，也許不是一條直線，而可能是接近羅吉斯曲線 (logistic curve)。羅吉斯曲線的形狀像是拉長的 S 型，顯現出成長的速度是先快後慢 (如圖一)。例如，有些學者認爲歐洲歷史上的人口成長趨勢是出現幾個羅吉斯曲線，而不是一直線^①。

圖一：羅吉斯曲線



* 本文爲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劉翠溶教授，於七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應近代史研究所邀請，所發表之演講稿；由近史所副研究員朱泓源整理，並經劉教授校訂。

① D. B. Grigg, *Population Growth and Agrarian Change: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283.

人口學中計算各種比率，通常有二類：一種是「粗率」(crude rate)，一種是「殊率」(specific rate)。粗率又分為「粗出生率」，即 CBR (crude birth rate)，與「粗死亡率」，即 CDR。CBR 減去 CDR，得到的成長率，稱為「自然成長率」。自然成長率與每年平均成長率不同。這兩個成長率之間的差異，有時是移民的結果，假如兩項之間差距甚大，就代表有大量的移民存在；假如差距甚小，移民的傾向就很弱。

殊率為「特殊比率」的簡稱。殊率屬於較精確的計算方法，即計算以年齡別為區分的生育率以及死亡率。對於殊率，我想進一步分作死亡與生育兩項來探討。

計算死亡率，常用「生命表」(life table) 的觀念來表達。生命表是人壽保險的重要概念，它在人口學上的運用也很廣泛。生命表包含六個主要的變數：

1. 「 ${}_nq_x$ 」死亡機率，從 x 到 $x + n$ 歲的死亡或然率；
2. 「 l_x 」存活數：以一定的人數（如一萬人或十萬人）為基數，看這些人在 x 歲時存活的人數；
3. 「 ${}_nd_x$ 」死亡數：這些人在 x 到 $x + n$ 歲時死亡的人數；
4. 「 ${}_nL_x$ 」存活人年數，在 x 至 $x + n$ 歲中，這些人存活的人年數 (person-years)。
5. 「 T_x 」這些人在 x 歲及以後所存活的人年數。
6. 「 e^o_x 」預期壽命：活到 x 歲時，預期還能存活的平均年數。

這六項變數分別都有公式可以計算^②。詳細的生命表可以按每一年齡來編製，比較常見的是以五個年齡為一組的生命表。大致上，生命表上主要變數的規則性如圖二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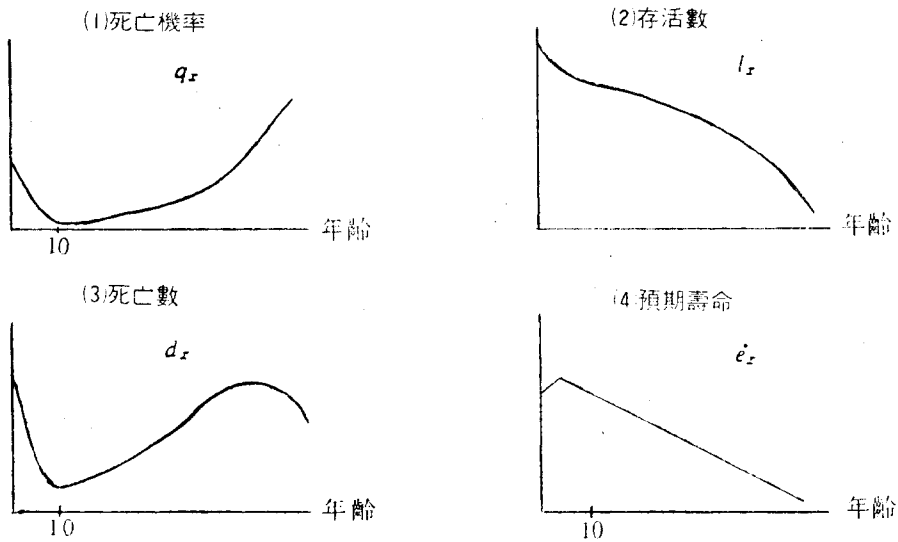
我國用族譜做家族生命表的例子不多。最早用生命表研究中國家族的是袁貽瑾 (I-chin Yuan)^③，他在一九三一年發表以廣東李氏為例所做的生命表，之後隔了許久沒人做。近來我從事族譜的人口研究，做了一些家族的生命表，得到的結果與袁先生的研究很相近。

生育率方面，通常分為三種基本概念。第一種為粗出生率 (CBR)；第二種為育齡婦女的生育率——GFR (general fertility rate)。

② 計算公式可見 Ansley Coale and Paul Demeny, *Regional Model Life Tables and Stable Populations* (Princeton, 1966), Part 1. p.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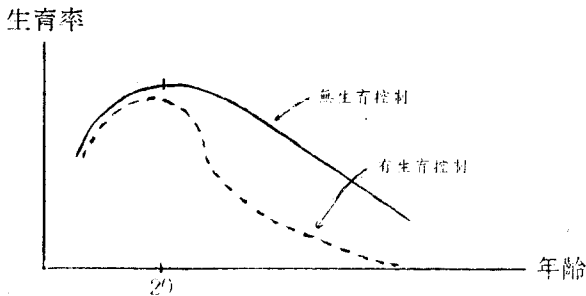
③ I-Chin Yuan, "Life Tables for a Southern Chinese Family from 1365 to 1849," *Human Biology*, Vol. 3, No. 2 (1931), pp. 157-179.

圖二：生命表上主要變數規則



$GFR = \frac{\text{出生人數}}{\text{育齡婦女(15歲—49歲)人數}}$ 。第三種為婦女的年齡別生育率 (Age Specific Fertility Rate, 簡稱 ASFR), 按照不同的年齡別, 從十五歲開始考慮其生育率的高低。每個年齡的生育率不同, 其情形通常如圖三所示。

圖三：年齡別生育率曲線



傳統的婦女一般在二十歲到二十四歲之間生育率最高。每個年齡別生育率的計算公式是： $ASFR = \frac{\text{活嬰數}}{\text{該年齡別的母亲數}}$ 。在歷史人口的研究上，通常

上述公式中的分母，不直接用人數而用人年數 (person-years)。Princeton 大學五位人口學家曾用卜凱 (John Lossing Buck) 等人在三〇年代的調查資料重新計算，得到一九三〇年代中國農村人口的生育率如下^④：

表一：一九三〇年代中國婦女生育率

年齡別	各年齡別每人每年平均生育率
15—19	0.1074
20—24	0.2683
25—29	0.2622
30—34	0.2212
35—39	0.1559
40—44	0.0740
45—49	0.0110
總生育率 ^⑤	5,5013

這種中國婦女生育率接近自然生育率，其生育行為沒有受到控制。在現代，許多國家都實施生育控制，有生育控制，所顯現的生育率的高低差別就較大，即比較集中在某一段年齡，其餘年齡的生育率就顯著下降。(見圖三)

用中國家譜、族譜來研究生育率有一些困難要先克服。中國族譜的缺陷在沒有女兒的資料，由於沒有女兒的紀錄，只好根據所生男兒來計算。因為人類出生時的性比率 (sex ratio at birth) 大致上在一·〇五到一·〇七左右，故補救的辦法是採取一個性比率來推估。即先以男兒數為基礎算出年齡別生男率，再以一定的性比率來推算年齡別生女率，兩者合計則為年齡別生育率。例如我曾以一·〇六估計浙江蕭山兩個家族的生育率^⑥。

與生育率有關的概念，是繁殖率。繁殖率分兩種，第一種為粗繁殖率 (gross reproductive rate 簡稱 GRR)，第二種為淨繁殖率 (net reproductive rate 簡稱 NRR)。前者不考慮死亡的因素，後者則將死亡因素

④ George W. Barclay *et al.*, "A Reassessment of the Demography of Traditional Rural China," *Population Index*, Vol. 42, No. 4 (October 1976), p. 614.

⑤ 總生育率(TFR) = $\sum ASFR \times 5$

⑥ 見Ts'ui-jung Liu, "The Demography of Two Chinese Clans in Hsiao-shan, Chekiang, 1650-1850," in Susan Hanley and Arthur Wolf eds., *Family and Population in East Asian History* (Stanford, 1985), p. 34-43.

考慮在內。繁殖率的多寡，只就一個性別來看。一般是以女性來看。意思是看這一代的母親可以生多少女兒；每一年齡別生女率之總和，就是 GRR。知道每一年齡別的生女率，再乘上每一年齡別的存活率（指生命表上的 ${}_nL_x/l_0$ ），其總和就是淨繁殖率（NRR）。如果， $NRR=1$ ，就代表一代一代的人口剛好相替，總人口數不致增加。換言之，就是人口零成長的意思。

在明白死亡率與生育率的估計方法後，我們要進一步談穩定人口（stable population）。穩定人口有幾個假定條件：1. 沒有移民，2. 在長期中死亡率維持固定，而出生率則按一定的比率變化。這樣的人口，其年齡結構不變，故可以稱為穩定人口。了解穩定人口，有助於作為基點，判斷是否需要改變人口結構。穩定人口的計算方法，一般是以積分公式表示：

$$\int_{\alpha}^{\beta} e^{-rx} p(x) m(x) dx = 1 \quad \textcircled{7}$$

它的目的在獲得真實的成長率，以與用觀察得到的成長率比較，來了解長期間成長率的變化。這方面，可以在我的論文中找到例證^⑧。

人口學研究另外也探討婚姻現象。討論婚姻，以 Nuptiality Table（婚姻表）最為細緻，按年齡來考察婚姻的情況，以了解在不同的年齡仍維持單身的情形。但婚姻表之製作須先有詳細年齡別的婚姻資料存在，否則沒有辦法做。

每個社會人口的婚姻年齡與生育率有關。John Hajnal 在所撰“European Marriage Pattern in Perspective”一文^⑨研究歷史上歐洲社會的婚姻型態，是討論婚姻的著名文章。他發現歐洲人在十八、十九世紀以晚婚的方式，來維持低的生育率。J. Hajnal 也從事理論性的探討。他設定一個公式，來計算平均結婚年齡。Singulate mean age at marriage (SMAM) 即第一次結婚年齡的平均數。這條公式是：

$$SMAM = \frac{15 + 5 \sum Si - 50S_{50}}{1 - S_{50}}$$

- ⑦ x 為年齡， r 為 Intrinsic Growth Rate，即真實成長率。 $p(x)$ 為 mortality schedule（死亡因素）。 $m(x)$ 為 fertility schedule（生育因素）。 \int_{α}^{β} 與 d 是積分公式中必有之符號。
- ⑧ 劉翠溶，「明清時期長江下游若干家族的人口動態」，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論文集（臺北，民國七十年），頁 834-847。
- ⑨ J. Hajnal, "European Marriage Pattern in Perspective," in D.V. Glass and D.E.C. Eversley eds., *Population in History: Essays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London: Edward Arnold, 1965), pp. 101-143.

$\sum Si$: 15—49歲之間維持單身比率的總和
 S_{50} : 50歲以上未婚的比率

這公式的意思是計算在結婚前維持單身狀態的平均年數。在中國的族譜之中，多不記載結婚年齡。我們憑族譜，不可能知道家族的成員幾歲結婚，無法做相似的研究。因為 S_i (proportion single at age i) 找不到，就無法了解在各年齡別中維持單身的比率。但我曾經以蕭山徐氏家譜的資料做此種計算，發現男子的 SMAM 是二十一歲多，從而推估女性為十六歲多，與一般對中國傳統婚齡的認識相近^⑩。除蕭山徐氏之外，其他族譜的材料，我仍不確定可否找到類似的資料。

移民是人口學上重要而困難的問題。研究海外移民，比較容易，研究國內的移民就相當困難。其所以困難，不在計算的公式，而在資料之掌握與解釋上面。移民的計算公式是：

$$m = \frac{\text{移民人數}}{\text{人口}(P)}$$

m 又可分移入的 m_i 及移出的 m_o

$$m_i = \frac{I(\text{移入人口})}{P}; \quad m_o = \frac{O(\text{移出人口})}{P}$$

淨移民的計算比較複雜些，可以用移入率或移出率來計算。可是為什麼會有移民產生呢？是「推」的力量大還是「拉」的力量大呢？這個問題很重要。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嚴密的理論可資引用。

歷史人口學也注意歷史上的家庭問題。Family History 的研究，歐洲學界運用許多種途徑，而人口學只是研究途徑中的一種。另外還有從心理學，從 sentiment，從 household economics 等途徑來研究的指^⑪。歷史人口學研究家庭，最早從一九五〇年代開始，探討歐洲工業化以前的社會中，是不是以複雜家庭 (complex household) 作為主要型態。這方面研究成果，最早要屬劍橋大學社會歷史學家 Peter Laslett 在一九六九年的發現。Laslett 研究一百個工業化以前的英國社區，發現十六世紀的英國仍以 nuclear family 為主，而非 complex household。這個發現給當時學界大驚奇，引起

^⑩ Ts'ui-jung Liu, "The Demography of Two Chinese Clans in Hsiao-shan," pp. 20-28. 參見 Barclay et al., p. 609.

^⑪ 可參閱 Michael Anderson, *Approaches to the History of the Western Family 1500-1914*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80).

許多人做這一類研究。結果，歐洲學者認為：第一，英國的家庭結構特徵，並非歐洲家庭的典型代表；第二，nuclear family 多見於英、法、比、荷以及北美；第三，歐洲家庭型態較複雜，而且必須考慮土地產權的問題。換言之，歐洲社會的家庭類型，與土地所有權之間，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土地所有權不能分割者，家庭較大，而以主幹家庭為主；可分割者，家庭較小。這種研究在歐洲十分重要，在中國則尚很少人做。當然，曾經有人做過相同主題的研究，但以這種新的 approach 來做的，目前還沒有。如 Patricia Ebrey 與 James Watson 曾將一九八三年在加州開會的結果編成論文集，其中有多篇論文很細膩地處理中國的家庭問題^⑫。

一九八七年一月間在美國將有一個關於中國家族人口研究的學術會議，我被邀參加，但決定不出席，只將我的論文寄去了。我在這篇文章中有一部分研究中國家庭結構的可能性^⑬。從族譜，我們無法知道實際生活中誰跟誰住在一起。假定在不分家的條件下，來看三代、四代同堂的可能性有多少。多代同堂的例子事實上不多見。我以江蘇武進周氏，宜黃北山黃氏，湖北武昌徐氏及湖南邵陽李氏四個家族為例進行研究，發現：

第一：三〇八個二代同堂的家庭中，有七十六個可能三代同堂，其中又有十三個可能四代同堂，但沒有五代同堂的。

第二：三代同堂的，父親年齡平均要小，即在二十五歲左右（一般家庭為二十八歲），而且祖父要長壽，其死亡年齡須在七十歲以上。四代同堂的，曾祖父的死亡年齡要在八十歲以上。總之，在傳統社會裏，由於人口條件的限制，想多代同堂極難實現。

第三：即使能够多代同堂，同堂的時間也不能維持很久。平均重疊 (overlapping) 的時間，三代同堂的是十六年；四代同堂的為八年；五代同堂的，即使存在，時間必定非常之短。

^⑫ Patricia Ebrey and James Watson eds., *Kinship Organiz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⑬ Ts'ui-jung Liu, "A Comparison of Lineage Population in South China, ca. 1200-1900," (draft) prepared for Chinese Lineage Demography Conference, Asilomar, California, January 8-11, 1987.

Hsieh-Tou Violence and Lineage Feuding in Southern Fukien and Eastern Kwangtung*

Harry J. Lamley (藍厚理)

The feud has long been universally recognized as a distinct type of organized violence. At present many communit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are still afflicted by feuding and related forms of strife. These feud-ridden localities are to be found in such diverse regions as Northern Ireland and India and Sri Lanka, where interethnic feuding persists, and in areas of the Mediterranea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where blood feuding lingers on. Moreover, in the provinces of Fukien and Kwangtung vestiges of communal feuding stemming from lineage and surname feuds of the Ch'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 have reportedly reemerged in some coastal areas.

The occurrence of feud violence in present-day mainland China should not be a cause of surprise. Traditional concepts of revenge and justifiable homicide have spurred on blood and communal feuding there since classical antiquity, and under Ch'ing rule the communal feud became a major category of local violence. The reappearance of feuding in Fukien and Kwangtung illustrates that the feud is by nature long lasting or interminable; feuding may lapse and then blossom forth again. The enduring quality of the feud, even under varied social conditions, makes this form of violence particularly attractive for historical study.

In this presentation I shall deal with lineage feuding in southern Fukien and eastern Kwangtung during the Ch'ing dynasty. This form

* 本文為美國夏威夷大學 (University of Hawaii) 歷史系藍厚理教授，於七十五年十月十八日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所發表之演講稿，並由藍教授親自整理後發表。

of communal feud, carried on between rival lineages or surname groups, became endemic in the coastal prefectures of the region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nd gave rise to serious armed affrays. In the Yung-cheng reign (1723-35) such lineage and surname feud strife began to be labeled as "*hsieh-tou*" 械鬪 (armed affrays) by concerned Ch'ing officials. Gradually, the *hsieh-tou* designation was also applied to interlineage conflicts elsewhere as well as to communal feud strife between other types of rival groups throughout China and among Chinese settlements overseas. Nevertheless, this term was used most consistently in reference to the endemic lineage feuding that prevailed in Fukien and Kwangtung, especially in those coastal prefectures (Ch'üan-chou 泉州 and Chang-chou 漳州 in southern Fukien, and Ch'ao-chou 潮州 and Hui-chou 惠州 in eastern Kwangtung) where *hsieh-tou* outbreaks were first reported and continued to persist throughout the nineteenth and over much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Research on lineage feuding in this region relies heavily on Ch'ing documentary and literary references to *hsieh-tou* violence. Here I shall first treat with the *hsieh-tou* designation by which the communal feud in its various forms may be identified. Next, I shall deal with major traits peculiar to the lineage and surname feuding in the four coastal prefectures, and then describe the feud alignments and networks that developed there. Finally, I shall briefly attempt to identify causes and motives for this sustained feuding. I have dealt more in detail with these aspects of *hsieh-tou* violence and lineage feuding in recent papers (Lamley 1986; and forthcoming).

The Hsieh-tou Designation and the Communal Feud

The *hsieh-tou* designation began to be used consistently by Ch'ing officials in 1728 when *pao* 包 and *Ch'i* 齊 surname alignments, in T'ung-an 同安 county of Ch'üan-chou prefecture, were reported to the throne. The term was derived from commonly used phrases depicting armed affrays, such as "*lieh-hsieh ko-tou*" 列械格鬪 (arrayal of weapons

and pitched battles), used in official accounts. This type of conflict was deemed more serious than ordinary affrays (*tou-ou* 鬪毆) due to the multitude of combatants and their ready use of weapons. Also clearly depicted in memorials reporting *hsieh-tou* violence was the element of revenge indicative of feud strife: in this case smaller lineages retaliating against the aggressions of larger ones over, apparently, a lengthy period of time.

Eventually, the *hsieh-tou* designation was recognized as a separate affray category based on legal distinctions drawn between such relatively large and prearranged (*yü-hsien* 預先) armed affrays and more ordinary collective or planned affrays (*kung-ou* 共毆 or *mou-ou* 謀毆). In 1822, two statutes pertaining specifically to *hsieh-tou* violence received imperial approval, and were subsequently incorporated in the Ch'ing Penal Code. One referred to lineage-financed affrays in Fukien and Kwangtung; the other to vengeful homicide (*ch'ou-sha* 讐殺) cases arising from lineage-type feud affrays. The latter statute reflects the spread of lineage or similar forms of communal feuding, for this law applied to six southern provinces: Kwangtung, Fukien (with the exception of Taiwan), Kwangsi, Kiangsi, Hunan and Chekiang (Hsüeh 1970: nos. 290-16 and 290-17, 841).

Meanwhile, the *hsieh-tou* designation continued to be extended to armed feud strife between other types of rival groups in both official reports and the private writings of apprehensive literati. The term was frequently used in reference to the subethnic feud strife (*fen-lei hsieh-tou* 分類械鬪) between groups of Chinese settlers in Taiwan during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These settler groups hailed from various parts of southern Fukien and eastern Kwangtung, and formed rival enclaves based on differences in speech, religious observances, and native-place origins (Lamley 1981a: 291-309). Distinctions of ethnicity and provenance also tended to set Chinese overseas communities apart. The *hsieh-tou* designation, however, was only applied occasionally to feud affrays in Southeast Asia and North America.

The term was used more in regard to interethnic feuding throughout mainland China: that is, rather frequently in reports of Hakka-Punti (本地) strife in Kwangtung and Kwangsi; and less often in accounts of Chinese-Moslem (*han-hui* 漢回) and Commoner-Christian (*min-chiao* 民教) affrays. Also, feud conflicts between sects, associations, or sworn-brotherhood groups were sometimes labeled "*hsieh-tou*," as were armed affrays between estranged villages in various parts of China (Lamley 1977: 10-16).

In all, these various *hsieh-tou* usages indicate that the most severe communal feuding assumed two major forms. One form prevailed among rival groups based on demonstrated or putative descent and kinship, such as the lineages and surname aggregates at feud in Fukien and Kwangtung. The other developed from competition and hostilities between discrete communities with pronounced ethnic and native-place differences.

The various sets of mutually hostile groups involved in these two major feud forms functioned ordinarily as corporate communities. That is, they were communities in which at least some part of the communal wealth was owned or shared collectively on a continuous basis, be they lineages or lineage branches, villages or neighborhood groups, or discrete territorial groupings of a rural or urban cast. Such communities were enduring groups, and tended to possess sufficient manpower and resources to engage in costly *hsieh-tou* engagements.

Feuds between corporate communities of this nature invariably involved the entire group membership at hand, including all social classes. Although the *hsieh-tou* label may occasionally have been applied to intermittent affrays between landlord and tenant bands, the designation was seldom indicative of direct class conflict among different social strata. This was also true in respect to *hsieh-tou* outbreaks reported between rival sworn-brotherhood groups or local associations—groups that may have represented a distinct class or else definite class interests. Class conflict crosscutting vertically structured communities,

however, did sometimes influence the course of communal feuds, as when poor members of lineages at feud strove to perpetuate *hsieh-tou* disorder for their own benefit.

Viewed in the context of organized violence, the *hsieh-tou* may seem tantamount to the feud. Both terms refer to vengeful actions capped usually by retaliatory homicides. The feud, however, is a lasting or intermina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ts of mutually hostile parties, characterized by murderous assaults in revenge for previous homicides, insults, and other alleged wrongdoings. *Hsieh-tou*, in contrast, should be regarded as short-term episodes of violence during the course of an enduring communal feud. Standard Chinese lacks an exact equivalent for the Western term "feud," and Ch'ing authorities were generally concerned with the *hsieh-tou* disorder at hand. Hence Ch'ing references tend not to differentiate clearly between short-term feud affrays and long-term feuding relationships, nor do they usually attempt to describe the feud process in its entirety.

Twentieth-century scholars who pioneered in research on *hsieh-tou* disorder also failed as a rule to deal adequately with the communal feud process in their major studies. These pioneers include Inō Kanori 伊能嘉矩 (1928: I, 929-53), who concentrated on subethnic and other forms of *hsieh-tou* violence in Taiwan; Niida Noboru 仁井田隆 (1952), who treated in general with various groups at feud throughout China; and Lang Ch'ing-hsiao 郎擎霄, who in several articles (including Lang: 1933 and 1935) described both lineage and ethnic (Hakka-Punti) *hsieh-tou* disorder in Kwangtung and Kwangsi. Hsiao Kung-chuan 蕭公權 (1960: 357-70, 419-33), writing in English, equated the terms "feud" and "*hsieh-tou*," and dealt at length with the background and causes for various forms of communal feud strife during the Ch'ing period. Nevertheless, he too did not treat with the feud as an enduring relationship, nor did he study the many impulses and incentives that serve to motivate feuding. The feud, after all, is a type of ongoing hostile relationship that can be perpetuated indefinitely by intangible

factors (such as pride and honor) and mutual grievances even though they may seem petty or irrational to the outsider (Black-Michaud 1975: 122, 178-80, 210).

The communal feud (as I have used the term here and elsewhere) denotes not only feuding between corporate communities, but also a relatively unrestrained kind of violent relationship. In this respect the communal feud differs from the blood-feud, a conflict subject to control by customary rules and restraints, as described by anthropologists (Beattie 1964: 267; Boehm 1984). The open-ended nature of lineage feuding in southern Fukien and eastern Kwangtung tended to make this regional form of communal feud particularly difficult to constrain or terminate either by informal social controls or by the formal workings of the Ch'ing state (Lamley 1981b: 21-8). Through systems of alliances large alignments of lineage and surname aggregates, or entire multivillage and district populations, were drawn into local feuds. Networks of outside mercenaries and other criminal and indigent elements also came to participate in *hsieh-tou* engagements. Within the turbulent regional setting even the state became party to the communal feud.

Lineage and Surname Feuding

In the four coastal prefectures the principal parties at feud were lineages or lineage branches, usually of neighboring villages. Interlineage conflicts escalated when other parties were drawn into the feud. The most substantial groupings among these auxiliary parties tended to be either surname groups, consisting of nearby lineages and branches, or else groups of inhabitants identified by their villages, neighborhoods, or districts. Feud alliances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alignments of a temporary nature or, at times,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surname confederations of a more permanent character.

Although lineage feuds sometimes escalated, the original sets of rival lineages remained the chief contenders and, initially at least,

the feuding was financed by the corporate wealth of their lineage communities. This corporate funding was mainly derived from ancestral estate (*chi-t'ien* 祭田 or *cheng-ch'ang-t'ien* 蒸嘗田) proceeds. *Hsieh-tou* engagements were costly affairs, however, and proved to be a severe drain on communal corporate wealth. As the feuding continued, the constituent families of the lineage were forced to make private (*ssu* 私) contributions.

Oftentimes, hardships caused by sustained feuding fostered divisive tendencies within the lineage community. Therefore, during the course of a feud Chinese lineages did not always maintain the intragroup cohesion and solidarity that have been generally regarded as major attributes of groups at feud (Beattie 1964; Black-Michaud 1975). On the other hand, the *tsung-tsu* 宗族 type of lineage, formed upon the principle of common patrilineal descent from distant ancestors and bound by agnatic kinship ties, proved to be hardy and flexible enough in its operations to engage in enduring feuds lasting over many generations.

Befitting commercialized areas with scarce resources, interlineage rivalry in the coastal prefectures centered around profitable enterprises and on things in short supply or of intrinsic value. Quite often, such rivalries were already deep-rooted, or else tended to become so when disputes failed to be resolved or when the parties involved directly resorted to retaliatory actions against one another. *Hsieh-tou* outbreaks amounted to mutual reprisals on the part of entire communities. Hence they often marked the formal outset of lineage feuds, as locally declared or perceived.

The basic preparations for *hsieh-tou* engagements, as summarized in the 1822 statute dealing with vengeful homicides, included the mobilization of manpower (*ch'iu-chung* 糾眾), gathering adequate funds (*lien-ch'ien* 斂錢), and setting the dates of battles (*yüeh-ch'i* 約期). Manpower was mainly needed for the armed bands of braves (*chung* 勇) who engaged in the fighting. Numerous able-bodied kinsmen were used for these interlineage affrays although wealthy lineages sometimes

preferred to hire mercenaries rather than risk the loss of manpower in their communities. Moreover, destitute kinsmen were contracted to serve as "substitutes" (*ting-hsiung* 頂兇) for those who committed homicides in battle.

Hsieh-tou engagements were expensive affairs. Hired mercenaries had to be paid. Also, pensions and other benefits were allotted to the families of those "substitutes" executed for having confessed to crimes of homicide. The purchase of arms became another substantial cost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hen modern firearms were used by lineages at feud. Even larger sums had to be set aside for expenses incurred subsequent to armed affrays. Then the civil and military officials, along with the retinues of soldiers and government underlings that accompanied them to the scenes of battle, had to be bribed and paid fees and "traveling costs." Finally, other large amounts had to be raised for the costly litigation that ensued as an outcome of the crimes and destruction brought about by feud affrays. Over the course of a feud the costs of bribes and litigation required continuous heavy payments that helped to deplete the corporate and private wealth of the rival lineages involved.

Careful planning was allegedly a hallmark of the interlineage *hsieh-tou*. The managers of such contests announced the dates of battle in advance so that the communities at feud could prepare and others in the vicinity would be forewarned of the impending outbreak of these spectacles of violence. However, sources indicate (especially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at *hsieh-tou* could amount to surprise attacks by one village on another. Neither were the arrangements so carefully planned, especially when lineage leadership gravitated to less cautious members or when parties from without, including powerful local elements and venal officials and underlings, sought to foment *hsieh-tou* outbreaks for their own profit.

Ch'ing accounts deal primarily with *hsieh-tou* actions, and provide little information on the less violent aspects of the communal feud.

They do reveal that lineages kept score of the dead and wounded so that they might retaliate in kind or use such figures in their litigation or peace negotiations. Following their feud affrays, truces or settlements also were sometimes arranged. On the whole, though, there seem to have been few if any customary rules and binding obligations developed for the pacification of feuds. Truces and peace settlements appear to have been drawn up and then broken primarily on the dictates of feud strategies.

The lack of customary restraints regulating interlineage feuds can be attributed in part to the crucial role that the state played in the feud process. When crowds gathered and homicides occurred, local officials were obliged to intercede, no matter how corrupt or tardy they proved to be in their responses. The homicide and affray cases that resulted were tried and reviewed in yamen courts at various levels. Feud-related lawsuits over "minor" grievances and disputes, if successfully initiated on behalf of rival lineage clients, were similarly judged in the courts of local government. Thus litigation normally formed important sequences in the course of interlineage feuds, and the Ch'ing legal process, involving arrests, trials and punishment, served as principal form of control in lieu of any well developed customary restraints. In this respect the state became a third party to the communal feud.

Dedicated officials also attempted to arbitrate between rival lineages or to sponsor mediation that could lead to truces and the pacification of feuds. Nevertheless, such positive efforts by the Ch'ing government to restrain local feuding were offset by the antics of venal officials and underlings who sought to incite and profit from *hsieh-tou* disorder. Due to their malicious influence the state more often became a predatory party to the feud than a pacificatory third party. The efforts by lineages at feud to gain advantages by way of officials and underlings through bribes and connections served to reinforce this predacious role of the state in the feud process.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importation of modern firearms

had a profound effect on lineage feuding in southern Fukien and eastern Kwangtung. Previously, a variety of old-style weapons, including types of musketry, had been employed in *hsieh-tou* engagements. Since these weapons were generally of a short-ranged use, armed feud affrays had entailed closely drawn pitched battles. Over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increasingly widespread use of western-type rifles, along with both old-style and modern cannon, led to alterations in the style of warfare. Armed feud bands fought more frequently from protected positions instead of engaging in open combat as before. This new style of warfare also brought on armed assaults against villages including surprise attacks. As a result, villages became more heavily fortified with stout walls and fortifications replete with cannon emplacements and watch towers.

The widespread use of modern firearms and a new style of combat created a need for skilled marksmen in feud affrays. So-called "gunmen" (*ch'iang-shou* 槍手 or *ch'ung-shou* 銃手), trained in the use of western-type rifles as well as old-style muskets, were contracted as mercenaries by lineages at feud in the more prosperous coastal areas. These hired killers also added to the terror spawned by feud strife. When not employed in *hsieh-tou* engagements, they were contracted for other vengeful acts of violence, such as assassinations, or else they robbed and pillaged on their own.

Feud Alignments and Networks

The prevalence of skilled mercenaries engaged in local feud operations is indicative of greater outside participation and an escalation of lineage feuding. Interlineage feuds initially had assumed more extensive proportions by way of surname and territorial alignments. Surname alignments were first reporte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hsieh-tou* outbreaks between *pao* and *ch'i* groupings in 1728. A year later, other different-surname (*i-hsing* 異姓) alliances bearing similar descriptive group titles (*t'ung* 同, *hai* 海 and *wan* 萬) were also

identified in Ch'üan-chou. Rival alignments, formed by alliances among local descent groups bearing the same or different surnames, were generally rural in nature. They spanned a number of villages in a given locality or district. Some surname confederations of this type lasted for many generations.

Territorial alignments, in contrast, tended to be more extensive but less enduring in nature. These alignments sometimes encompassed several districts, including towns and suburban areas. In order to survive virtually all households had to support the feud alignment that "protected" their particular locality whenever far reaching "district affrays" (*hsiang-tou* 鄉鬪) occurred.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feuding networks, organized and controlled by local chieftains and "strongmen" (*t'u-kao* 土豪), also brought about territorial buildups of a paramilitary character. These feuding networks developed after gangs of professional mercenaries had formed banner societies (*ch'i-hui* 旗會) in a number of counties. For example, Red and White Banners operated in Chang-p'u 漳浦 county in Chang-chou, as did banner societies displaying the same colors in Hui-an 惠安 county in Ch'üan-chou. Black and White Banners flourished in Nan-an 南安 county of Ch'üan-chou as well as in adjacent areas of the Yung-ch'un 永春 department and Hsing-hua 興化 prefecture. Elsewhere, Red and Black Banners sprang up in Hai-feng 海豐 and Lu-feng 陸豐 counties in Hui-chou after the territorial form of feud alignment had developed there during the 1820s. By around 1860, these two societies had expanded their operations to ten or more counties in Hui-chou and Ch'ao-chou. Such various banner-society sets functioned as competing feud bands in their respective county areas. When *hsieh-tou* engagements were staged, each hired out to a rival side.

Extensive feuding networks drew more criminal and indigent elements into lineage and surname operations. This was evident in Lu-feng where Red and Black chieftains readily recruited banner "gunmen" for

feud buildups, along with bandits and indigent sorts. Whenever they learned of impending *hsieh-tou* outbreaks, these chieftains negotiated contracts for their recruits, then assumed control of the fighting. Similarly, local "strongmen" are said to have become the chief instigators of armed feud affrays in areas of Ch'ao-chou. These unruly types had close contacts with bandits and the "fences" (*wo-tsang* 窩贓) and pawnshops that served their gangs. When feud strife flared up, they mustered bandits by the hundreds and collected crowds of vagrants from many districts.

In order to support more costly and devastating feud affrays, lineages had to turn elsewhere for financial support beyond that supplied by corporate estates and private contributions. Nineteenth century sources indicate that belligerent Fukien and Kwangtung lineages oftentimes depended heavily on remittances (and foreign arms) received from kinsmen overseas. From at least the Opium War period (1839-42) it also appears that lineages, or their powerful households, more frequently resorted to organized crime as a means to augment their income.

Causation and Motivation

Southern Fukien and eastern Kwangtung had long been a turbulent region. A dense population and scarce resources fostered rivalry and contributed to the dissidence and violence. More wealth was concentrated in the commercialized coastal lowlands than in the less productive mountainous areas further inland, yet this wealth was unevenly distributed and the competition was particularly keen. In the coastal prefectures acute social tension reflected not only general insecurity on the part of the inhabitants but deep-rooted conflicts in interest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state and the commercialized society as well. There powerful lineages, boasting of large ancestral estates and family households numbering in the hundreds and thousands, helped to perpetuate the uneven division of local wealth. Strong enough to

fend off the government to a great extent, such belligerent lineages enriched themselves at the expense of their weaker neighbors. Dominant lineages in the same vicinity became bitter rivals as well and also tended to feud.

From a broad perspective this lineage feuding appears to have been a response to unstable ecological and socioeconomic conditions and a product of the keen competition that prevailed. Issues of local contention included land and boundary disputes and controversies over water rights. Attempts to monopolize local markets, transportation systems, and mineral resources also created rivalries between lineage communities, as did competition over grave sites and even marriage in localities where shortages of marriageable females existed. Furthermore, intangible matters that were felt to be vital to communities at large became issues involving feud rivalry. The redemption of debts, misunderstandings concerning reputation and pride, and disputes hinging on ancestral and lineage honor are common examples of such sensitive issues.

Given these factors relating to historical causation, lineage feuding may be identified as an extreme form of competition for scarce resources, benefits, and things of an intrinsic value. Scholars (including Niida, Lang and Hsiao), in their research on *hsieh-tou* violence and the Chinese communal feud, have discussed similar causal factors in other Ch'ing-period settings. Depending on the setting, of course, the general character of local feud competition varied to some degree. Thus Elizabeth J. Perry (1980:74-80) has depicted feuding in the impoverished Huai-pei 淮北 region of North China as a form of predatory violence. View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stark ecology of this region, the communal feud seems to have been reduced to more of a struggle for the basic needs for human survival.

Cause and effect relationships also existed between communal feuding and other forms of dissidence and violence prevailing in Ch'ing China. Using an ecological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violence, Perry

has related the feud to various modes of local and regional violence in terms of predatory and protective strategies developed among hard-pressed Huai-pei populations. In a different vein, Chuang Chi-fa 莊吉發 (1982:11-18; 1986:21-35) has related the emergence of surname alignments and secret society bands (*mi-mi hui-tang* 秘密會黨) in Fukien and Kwangtung to local feud traditions. Arising from alliances and sworn-brotherhoods based on different-surname affiliations, these diverse types of *i-hsing* groupings appear also to have been formed in response to predatory and protective strategies. In my own forthcoming study of lineage feuding in southern Fukien and eastern Kwangtung I have dealt more with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al feud violence and the deviant customs and illicit practices that had long prevailed in the coastal prefectures.

Others have indicated more particular reasons for the sustained *hsieh-tou* violence and lineage feuding in Fukien and Kwangtung. The author of a recent draft history of Fukien (Chu 1986: II, 541-42) blames corrupt officials who regarded feud strife and homicide cases as opportunities to extort and enrich themselves. His reasoning is similar to that of Ch'ing writers who attributed vengeful feud affrays to the ineffective workings of local government and the legal system. On the other hand, Maurice Freedman (1966:115-17) has singled out powerful lineages in the two provinces as the key to rampant feuding. Such lineages not only opposed rivals in their localities but also were able to hold the state at bay and make use of it.

Belligerent lineages of the coastal prefectures certainly figure as key instruments in the feud process. They were the aggressors in the feud: communal feuding was initiated and financed on their part, and the momentum of the contest depended on the fortitude of the principal lineages involved. Corporate lineages at feud also operated as wealthy economic units in their respective localities. In keeping with the commercialized setting, these lineages relied in part on contractual agreements and pecuniary outlays to carry on their feud hostilities.

In addition, wealthy lineages could afford the services of pettifogger (*sung-shih* 訟師) networks vital to their feud strategies. These "litigation" contacts, as well as their other illicit connections with mercenary and yamen networks, were maintained at great cost usually through patron-client types of relationships.

Moreover, as Freedman has indicated, belligerent lineages functioned as powerful political entities in reigns of Fukien and Kwangtung where weak government prevailed.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however, that even powerful lineages did not wage war against local government, nor challenge the legitimacy of the dynasty. Neither did they disavow orthodox beliefs and practices upheld by the state. It is also evident that lineages at feud were vulnerable to parties who sought to instigate and capitalize on costly *hsieh-tou* engagements, and that these manipulators, whether bellicose kinsmen or enterprising outsiders, stemmed from nearly all social levels. Lineage feuding in Fukien and Kwangtung during the Ch'ing period cannot simply be attributed to the selfish designs of kinsmen who were of the gentry-landlord class, as a mainland scholar has recently argued (T'an 1985:8-11).

Since feuding is a private and secretive sort of venture, the specific motives that serve to perpetuate the feud are more difficult to discern than are the general causal factors that give rise to widespread feud violence. In the case of the lineage feuding discussed here even the various sorts of leaders and instigators are hard to trace. Nevertheless, it seems clear that the motives and strategies tended to change during the course of enduring feuds, as did the managers of such contests.

Feud motivation, to be effective, must center on attitudes, behavior and values that are also familiar to the entire group, not just the chief figures involved. In southern Fukien and eastern Kwangtung, where bitter rivalries and vindictive practices had long persisted, the inhabitants were well attuned to 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influences which stimulated feuding. Moreover, intense competition and disputes touching

on sensitive matters, such as pride and honor, had served to make violent practices commonplace among the coastal population. During the Ch'ing period, as feud patterns became more extensive through alliances and networks, larger segments of the population were affected by communal feud violence as well. These villagers and townspeople also became subject to reprisals on the part of vengeful adversaries and targets of abuse by venal local authorities. Closed off and under great tension, they too grew more susceptible to the hostile, ingroup inclinations of the feud.

At this stage of such open-ended feuding the motivation behind pervasive outbreaks of communal strife was undoubtedly diverse and even contradictory in nature, given the sizable populations involved and the variety of lineage managers and outsiders who manipulated feud strategies. Even under these extreme conditions, though, two elements still appear to have been predominant in lineage feud motivation. One was the impulse of fear; the other a profit incentive.

Recurrent acts of homicidal revenge naturally tended to foster dread and anxiety among sets of bitter rivals. Open-ended communal feuding induced fear and tension of a greater scope. Costly *hsieh-tou* engagements threatened not only to bring death and destruction to lineage communities and neighboring localities but also to incur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deplete the resources of the principal lineages at feud. The possibility of ultimate defeat at the hands of stronger adversaries was also a foreboding concern. Under such threatening feud conditions fear became a powerful impulse that helped maintain cohesion within rival lineages and counter divisive tendencies among their branches and household units. Fear also served to alienate feud-ridden localities from most outside contacts and to strengthen ingroup inclinations.

Fear, however, seems to have been offset by the prospects of profit, for the feud was regarded as a potentially profitable venture by all concerned. Rival lineages, alignments and networks expected to profit at the expense of their opponents. Even though armed

affrays were expensive and constituted an economic risk, lineages nonetheless calculated the extent of their corporate funds and private holdings, then invested in *hsieh-tou* contests with the intent of gaining tangible rewards and intangible benefits. A variety of predatory types also sought to profit from enduring feud strife. Meanwhile, destitute and criminal elements, both within and outside of feuding communities, fed off the feud during violent intervals as "substitutes" and mercenaries.

The profit motive was so keen that one may liken lineage feuding to a business venture or enterprise. Indeed, in feud-afflicted areas of the four coastal prefectures feuding amounted to a native industry akin to organized gambling, smuggling, and other illicit operations there (Lamley 1986; and forthcoming). The fact that lineage feuding became such a deeply ingrained tradition with roots in the local economy explains in part why lineage and surname groups remained so strong and vital in the coastal areas of southern Fukien and eastern Kwangtung over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why, even today under Communist rule, vestiges of lineage feuding persist in some localities there. The Chinese communal feud continues to be a significant topic worthy of historical study, as does communal feuding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REFERENCES CITED

- Beattie, J. 1964. "Feud." In Julius Gould and William L. Kolb, ed., *A Dictionar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 Black-Michaud, Jacob. 1975. *Cohesive Force: Feud in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iddle East*. Oxford.
- Boehm, Christopher. 1984. *Blood Revenge: The Anthropology of Feuding in Montenegro and Other Tribal Societies*. Lawrence, Kansas.
- Chu Wei-kan 朱維幹 1986. *Fu-chien shih kao* 福建史稿. Vol. 2. Fukien.
- Chuang Chi-fa 莊吉發. 1982. *Ch'ing-tai T'ien-ti-hui yüan-liu k'ao* 清代天地會源流考. Shihlin, Taipei.
- _____. 1986. "Ch'ing-tai Min Yüeh ti'ch'ü ti she-hui ching-chi pien-ch'ien yü mi-mi-hui-tang ti fa-chan" 清代閩粵地區的社會經濟變遷與秘密會黨的發展. Paper presented

- at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sponsored by the Academia Sinica. Taipei, December 29-31.
- Freedman, Maurice. 1966. *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Fukien and Kwangtung*. London.
- Hsiao Kung-chuan. 1960. *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eattle.
- Hsüeh Yün-sheng 薛允升. 1970. Compiler, *Tu-li ts'un-i chung-k'an pen* 讀例存疑重刊本. Edited by Hung Ching-chia 黃靜嘉. Taipei reprint.
- Inō Kanori 伊能嘉矩. 1928. *Taiwan bunkashi* 臺灣文化史. 3 vols. Tokyo.
- Lamley, Harry J. 1977. "Hsieh-tou: The Pathology of Violence in Southeastern China." *Ch'ing-shih wen-t'i* 3, no. 7:1-39.
- _____. 1981a. "Subethnic Rivalry in the Ch'ing Period." In Emily Martin Ahern and Hill Gates, ed., *The Anthropology of Taiwanese Society*. Stanford.
- _____. 1981b. "Belligerent Lineages at Feud under the Ch'i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Orthodoxy and Heterodox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ultural Beliefs and Social Divisions." Montecito, California, August 20-26.
- _____. 1986. "Hsieh-tou Violence: Manifestations of the Chinese Communal Feud during the Ch'ing Dynas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sponsored by the Academia Sinica. Taipei, December 29-31.
- _____. forthcoming. "Lineage Feuding in Southern Fujian and Eastern Guangdong under Qing Rule." In Stevan Harrell and Jonathan Lipman, ed., *Violence in Chinese Culture*.
- Lang Ch'ing-hsiao 郎擎霄. 1933. "Chung-kuo nan-fang hsieh-tou chih yüan-yin chi ch'i tsu-chih" 中國南方械鬪之原因及其組織. *Tung-fang tsa-chih* 東方雜誌 30, no. 19: 81-96.
- _____. 1935. "Ch'ing-tai Yüeh-tung hsieh-tou shih-shih" 清代粵東械鬪史實. *Ling-nan hsüeh-pao* 嶺南學報 4, no. 2: 103-51.
- Niida Noboru 仁井田陞. 1952. *Chūgoku no noson kazoku* 中國的農村家族. Tokyo.
- Perry, Elizabeth J. 1980.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 Stanford.
- T'an Ti-hua 譚隸華. 1985. "Lüeh lun Ch'ing-tai Kuang-tung tsung-tsu hsieh-tou" 略論清代廣東宗族械鬪. Reprinted in *Ch'ing-shih yen-chiu t'ung-hsin* 清史研究通訊 no. 3: 6-11.

「學人簡介」欄徵稿

傳略以二、三千字為宜，應包括出生時地、學經歷、學術貢獻等方面，並請附著作目錄。



學人簡介

梁 嘉 彬

王 樹 槐

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者，幾乎無人不知梁嘉彬先生，因為他是「廣東十三行考」的作者。此書至今仍是一部極具權威的著作。本文之作，意欲對梁先生詳加介紹，最重要的是介紹他在中國近代史研究方面的成就。本文首述其家世，次敘其求學時期，再詳其任職文教界情形，最後論其對學術的貢獻，並附以著作年表。所依據之資料，皆為梁先生發表之文章及其口述，不一一註出。

一、家 世

梁嘉彬先生，原號文仲，後自改號為文重、文鍾、文鐘。民國前二年五月二十九日生於北平，世為廣東番禺人。遠祖自宋入粵，居南雄，五世時遷居廣州省城，六世時遷居番禺縣北亭鄉。明初，始祖子美再遷至黃埔鄉。梁先生的太高祖梁經國先生（一七六一～一八三七），入廣州十三洋行為行夥，得行主信任與扶持，漸升司事。乾隆末年，漸稱富有。嘉慶十三年（一八〇八）請旨自設天寶洋行，遂為十三洋行之一，望重鄉里。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卒，享年七十有七。

梁經國先生第七子梁同新先生（一八〇〇～一八六〇），嘉慶二十三年（一八一八）中恩科舉人，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成進士，入翰林，授編修，後官至順天府尹，自是黃埔梁氏乃屢有擢科登仕者。其子梁肇煌先生（一八二七～一八八六），號檀圃，亦作檀甫或檀浦，咸豐元年（一八五一），年二十五歲，舉於鄉，三年（一八五三）成進士，九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充湖北正考官，四年放雲南學政，九年調順天府尹，光緒五年（一八七九）補福建布政使，因當時任閩浙總督者為其兒女親家之何璟，須迴避，轉調江寧布政使，以佐左宗棠，最得其信任。十二年（一八

八六)入京請覲，遽卒，享年六十歲。渠自幼喜邊疆國防之學，對雲南回亂、新疆回亂、中法越南戰爭皆曾致其力。因協餉邊防有功，賞加頭品頂戴。

梁慶桂（一八五八～一九三一），字小山，梁肇煌先生之子，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年十九，舉於鄉，自喪父後，即居里，潛心文史。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粵漢路收回自辦，粵人舉梁誠為總辦，梁慶桂為副總辦。因粵督岑春煊之阻撓未就任。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學部奏派赴美辦理華僑興學事宜，三十四年（一九〇八）二月，慶桂起程赴美，至宣統元年（一九〇九）二月回國，為期約一年，在美加東西共成學校八所，歸國後呈報續成立者四所，共計十二所，嗣後南洋及他國，亦皆紛紛成立華僑學校（注重國文及修身），此為振興僑教貢獻最大者也。

梁嘉彬先生的父親梁廣照先生（一八七七～一九五一），號長明，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派充肇慶端溪書院監院，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報捐主事，旋東渡日本，肄業東京法政速成科，歸國後，在刑部任主事十年，極得刑部（法部）尚書戴鴻慈信用，對收回粵漢鐵路、禁止廣東賭博、改革獄政有功。民國後任唐山鐵路學堂監學及國文教員，其後回廣，在香港設立中學兩所，並在香港官立漢文中學任教，致力於教育工作。

由以上家世看來，梁先生出身名宦世家，書香門第，對他一生自有其影響。梁先生自幼及壯，曾以入政界致力邊防外交為其職志，後自知非世俗之敵手，退而專心學術研究，以「廣東十三行考」一書成名，更與其家世有莫大的關係。

二、求學時期

梁先生自幼好學，三歲自北平返廣，六歲在香港開學，嗣後受家塾私塾教育，晚間別延教師在家中習英語。民國十一年冬，年十三，有書法成績獲刊上海少年雜誌。且喜作詩，當年他隨父入京，曾作詩云：「僕從南海來，安知中原病？嗟我愛國心，實屬遺傳性！」路經上海，曾遵父命，拜康南海先生為師，康氏郵寄「不忍雜誌」全套及相片與之，稱之為「文仲賢世講」。「不忍雜誌」曾對梁氏發生極大影響。次年考入匯文中學。民國十四年，孫中山先生病歿，先生任童子軍小隊長，曾扶柩入碧雲寺。後作一夢，以詩紀之曰：

夢余在暗室，中心起徬徨；

聞有鬼來擾，思欲奮與抗；
手持金質杖，恃此可毋傷；
遠見黑白類，贅余刀與鎗；
黑鬼持刀刺，白鬼射擊狂；
幸得中山來，呼余曰「大黃」；
賜余銀質杖，拜受膽益壯；
雙杖齊揮舞，白黑不及防；
喊殺驚同學，天色始光芒。

此詩所記，表現一個十六歲的少年，對中山先生的愛戴與景仰，其愛國的熱情，躍然紙上。愛種的思想，則因在香港曾受辱於英兵及印度警察。民國十五、六年及十七年上學期，先生轉學天津南開中學及南開大學預科，倡大黃主義，著「大黃救國論」，主張「黃族平等，黃族聯合，黃族革命，黃族復興」，又作飛沙歌：「飛沙走兮天黃黃，駿馬逝兮鞭揚揚；救黃族兮建聯邦，扶弱族兮天下匡！」頗得校長張伯苓的誇獎，曾在學校週會報告，南開同學遂以「大黃博士」戲呼之。十六年，五九國恥紀念，先生發表「大黃種族主義與日本帝國主義」一文於「南中周刊」，主張須先斬除日本叛族蠱賊。次年，五九紀念日，時蔣廷黻先生在南開大學任教，先生任南大預科同學會研究組組長，邀蔣氏在大學大禮堂演講「二十一條條件之背景」，聽講者千餘人，先生任主席，以為蔣氏必慷慨陳詞，不料蔣氏以冷靜客觀態度分析，但此一事給予先生印象甚深。先生年少氣盛，曾想「以中國統治黃族，以黃族統治世界」，與蔣氏見解似有相反。南開校長張伯苓曾發起組織「滿蒙問題研究會」，梁先生參加研究，因而對國防、外交問題感興趣，於探討問題之際，亦稍知研究方法及史料之選擇。為了廣集資料，他常到舊書肆搜羅史料，人棄我取。蔣廷黻先生為南開名教授，對外交史非常有研究，梁先生對他逐漸崇拜。由於此段經驗，奠定梁先生日後對史學的興趣，也奠定他研究的範圍偏重於國防及外交方面。

民國十七年夏，梁先生考入清華大學政治系，此則符合他自幼希望從政的心理。當時清華初改國立，在全國分四區招生，應考者數千人，錄取全額不過九十六人。民國十八年，蔣廷黻應清華大學校長羅家倫之聘，擔任歷史系主任，先生便由政治系轉入歷史系。當時蔣教授問其轉系的原因，梁先生說：「政治不過是歷史的果，歷史纔是政治的根。」

清華大學同學為了響應南開大學「滿蒙問題研究會」，亦組織「中國邊

疆問題研究會」，梁先生自然參加。在此之前，先生已在「益世報」，「庸報」發表短文，及到清華大一的時候，又得學長張蔭麟的介紹，在天津「國聞周報」發表論文，揭發日本對滿蒙的野心。清華的「中國邊疆問題研究會」在「華北日報」上開闢「邊疆週刊」，每週三出版，先生從大學二年級到四年級擔任總編輯，他自己也發表不少有關滿蒙及西藏的論文。

十八年七月間，中東鐵路發生中俄武力衝突，此時梁先生剛好完成一篇「中東鐵路問題之研究」，文長約三萬餘字，即寄至「國聞周報」。該刊通常不歡迎數萬字的長文，就是幾千字的文章，發表也極緩慢；而此文寄去，不到兩週便分四次刊出，頗為例外，編者並在文前加以推薦。

梁先生的文章的確出了不少的風頭，但蔣廷黻先生卻告誡他說：「你的文章我都看到了，文章不少，但你自問有那一篇是有永恆的價值呢？……你是廣東人，廣東的國際關係最是複雜，可供研究的題目太多了，何不研究廣東的國際關係？」梁先生聽了蔣先生的話之後，雖未完全放棄研究滿蒙問題，但開始集中精力研究廣東十三行的問題，可見蔣先生對他影響之大。民國二十年，梁先生即發表「Lampacao 考」一文，考證外人所稱的「Lampacao」即浪白澳，亦稱浪白洲、浪白灣，民國後改名飛沙島。二十一年三月，發表廣東十三行考序篇，甚得陳寅恪、向達等先生好評。民國二十一年，先生畢業於清華大學時，完成「廣東十三行考」初稿一部分。畢業後，受聘於國立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所，擔任編輯叢書的工作，並主編該所年刊。先生在此繼續完成「廣東十三行考」的大部分，原預定為國立中山大學叢書的一種。

梁先生原想去法國留學，曾在清華學習法語及日語兩年，但因受蔣廷黻先生之鼓勵，決定去日本留學，而且一定要考進東京帝國大學。民國二十三年，先生到日本後，惡補日文日語一年，於次年四月考上東京帝國大學的文學院。入學後受東洋史主任和田清教授指導。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十九日，研究期滿，等於取得博士學位候選人的資格（當時日本無碩士學位之設）。七七事變發生後，和田清教授加以強留，謂他人可去，汝決不許返國。但先生投筆從戎心切，與其兄方仲（時在日本考察），於八月間私行返國。

三、任職文教界

梁先生返國後，隻身自香港經廣州、漢口到達南京，投入「留日學生歸

國服務團」，身為小隊長。日軍已占大場，隨隊自南京撤入江西廬山星子嶺，繼續受訓，竟以代同學爭伙食費事下獄，遂離團走長沙。陳寅恪先生為之函介，前往重慶中央大學，見校長羅家倫先生。羅先生不能用，謂中國近代史已有人教。後經朱希祖先生（中大史學主任）介紹，在重慶南岸之私立廣益中學任教。朱先生表示亦同往任教，以示安慰。二十七年，蔣廷黻先生自俄返國，得其力薦於中英庚款董事會總幹事杭立武先生，受中英庚款協助，轉往昆明西南聯大做研究工作。不久，在香港的陳寅恪先生致函電在雲南任教的吳晗（清華校友），詢問梁先生現在何處，請其轉達「已與浙江大學張其昀先生談妥，請梁先生即往廣西宜山該校教授日文。」吳晗並願代向蔣、杭兩先生道歉，促梁先生前往。先生到該校後，除教授日文外，亦教授中國近代史，並兼師範學院導師，直到抗戰勝利為止。

民國三十五年正月，先生來臺，原受其帝大同學盧冠羣社長好意，應臺南「中華日報」主編之聘。但到臺北，便由另一位帝大同學介紹，任職於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曾奉命視察臺灣東部山地教育。其後調省編譯館，以編審委員兼歷史組召集人。省編譯館裁撤後，調教育廳編審委員會任編審，兼委員，負責教材供應。先生以內地教材為藍本，修訂平地中小學校教材，並創辦山地小學教材。嗣後又兼主編「新生報」史地周刊及「中華日報」（臺北版）海島問題雙周刊（後改名海島學術雙周刊）。先生在此期間，發表不少論文，多為揭發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行爲，以及臺灣、琉球先史偽說的原委。

民國四十年九月，由葉公超委員長派先生為僑務委員會簡任視察。民國四十一年七月起兼任國立臺灣大學教授。自四十四年八月起至五十二年七月止，先生得葉公超先生的介紹，杭立武董事長的支持，任教於私立東海大學。除了講授中國近代史、中日關係史、中外交通史及臺灣史外，並對琉球問題繼續研究。四十九年冬至五十年春，得亞洲協會之助，訪問琉球大學，環遊沖繩、久米、宮古、石垣各島搜集資料。五十一年六月至七月，到夏威夷大學史學系夏令營班任客座教授，同年九月至翌年七月，任東西文化中心（East-West Center）高級訪問學人，和阪卷駿三等三位專家共組琉球研究所，研究琉球問題。先生在此期間，發表不少論文。民國五十四年三月，東海大學將先生有關琉球的重要論文二十篇，輯成「琉球及東南諸海島與中國」一書，約三十萬言，由哈佛燕京學社資助出版。

民國五十四年至六十四年，先生執教於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六十

四年退休之後，繼續在私立中國文化學院史學研究所任教，先生在教學之餘，仍繼續研究，發表許多有關中日關係的論文及李鴻章的外交一長篇，俱能發他人所未發。

四、學術貢獻

梁先生對學術的貢獻，與其研究方法有密切關係。他的研究法是先決定一據點，如廣東十三行。據點決定後，再追問有關的各種問題。如探討十三行的起源，因屈大均所著「廣東新語」中記有關於十三行之事，便須考證屈大均生死年月和著作年代。廣州十三行爲一特殊的商業制度，是否與過去傳統有關，則須進而追究廣州乃至中國歷代的市舶制度、行會制度、專商制度（如鹽商）等。西人來華，首租澳門，故又須追究澳門的開港年代，船稅制度、租地性質等。每一問題多追索至明代或明代以前不可。爲了找尋答案，又不免至各處找資料。他從北平南返廣州，又親至澳門、香港、廈門、汕頭、寧波等地調查；所涉及的史料，有故宮檔案、政府官書、史料叢輯、私人文集、類書、地方志、家譜、傳記、碑記、年譜、日記、專著等，商人家藏文獻及手稿，稗史、小說等，以及十三行後人的口述，均在搜集之列。包括中、日、英、法等文字。先生每至一地，即注意收集資料。在日留學時，埋首於東洋文庫。民國四十九年，至琉球廣收資料。在夏威夷時，勤於研究琉球問題。五十二年自美回國，途經日本，逗留三個月，廣集各種資料。五十五年再至日本，親訪新宮徐福之墓，增加許多考證的資料。至於臺灣、澎湖，更是走遍各地，查對古籍所述。

梁先生的史學研究，最注重著作來源的調查（Investigation of Authorship），某一著作，據何史料？有何錯誤？其錯誤出自無心或故意？他必先調查研究清楚，這是因爲他時時處處不肯人云亦云使然。其次他肯耐心逐字逐句比較研究，使用眾多的工具與方法，將問題加以解剖，評定正反兩面的證據，然後下一結論。足見先生用功之勤，鍥而不捨的精神，力求真相之瞭解。這種研究的精神及方法，自然偏重於考據方面。他的著作，有專著十種，論文一一三篇，其中以「考」爲名者，計二十四種，其他以「觀察」、「辨正」、「正謬」爲名者，亦有六篇，約占總數四分之一。

先生的著作，所涉及的主題，除傳記、回憶等雜文之外，主要的有三類，貢獻最大者亦爲此三類，分述如下：

一、有關東北問題者。此為先生早年的著作，其中以「中東鐵路問題之研究」最佳，後來上海華通書局出版「日本在東三省的鐵路侵略」一書，收集此篇論文。民國六十四年臺北出版的「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列強侵略，第四冊，也收輯了這篇文章。足見對此文之重視。

二、「廣東十三行考」一書是先生成名之作。自民國十九年起開始研究，至二十六年二月出版，約經過八年時間始完成。二十一年時，僅發表序篇，即得到蔣廷黻、陳寅恪、向達等先生的稱讚。二十六年出版時，又得到朱希祖、蔣廷黻等人之讚賞，並為之序。（蔣序被國立編譯館取去。）三十三年一月，山內喜代美譯成日文，於序文中稱讚「其參考資料之豐富，實包羅東西兩洋而無餘，其評論之態度亦極為穩當。」四十八年三月，蔣廷黻先生由美歸來，梁先生請他在書上題字。他題了：「一個老朋友的舊著作，至今仍是朋友，仍是權威著作，」並非過譽。四十九年，先生將此書增訂再版，由二十餘萬字增為三十萬字，更為充實。因此書之成就，東京大學授予博士學位。民國五十二年，梁先生自美返國，途經日本，當時東京大學東洋史系主任榎一雄對他說：和田教授對「廣東十三行考」非常稱讚，如有意申請博士學位，可以一試。五十八年先生再去日本時，榎一雄再度勸促，梁先生始提出申請表，以此書為正論文，後於六十年獲得博士學位，亦可見此書之受讚許。

三、梁先生作為申請博士副論文者為「琉球及東南諸海島與中國」一書，實際上較「十三行」用力更深，自有其重要貢獻。以隋書疏求為臺灣者，初為法人 Le Marquis、Henrey de Saint Denys、荷人 Gustave Schelegel，及德人 Ludwig Reiss 等人所持之說，而 Reiss 實已模稜兩可，彼等不知中國有同地異名、同名異地之例。梁先生留日時，見日本學者又存心作偽，或故意屈從歐人之說，將臺灣、琉球兩地的先史混為一談，考其用心，一欲銷滅琉球之國史，二欲與臺灣拉上移民關係，三欲借此以毀蔑中國之航海技術與工具，間接掩飾徐福抵達日本之事實，梁先生即不敢苟同，暗中反對其師和田之說。來臺後，先生極力揭發日本製造禹貢之「島夷」、史記之「三神仙」、漢書之「東鯤」、三國志吳志孫權傳東伐之「夷州」、隋書之「琉求」、唐書之「流鬼」、宋史之「流求」、元史之「瑠求」，皆為臺灣之說的種種險惡動機，而另立己說，就教於正道。

日本學者的論文，有一共同前提：中國航海技術幼稚，中國大陸與臺灣、澎湖交通易，與琉球、日本交通難。此種前提，純以路程遠近衡之，而

忽略了風向及潮流的因素。風帆時代，航海之難易，不能概以路程遠近衡之，應考慮風向與潮流兩因素，以此視之，中國與琉球交通亦易，由福建閩江口至琉球，五天可到。再加上歷史文獻所述「琉求」情況，證明隋書之琉求，絕非臺灣，而是今日之琉球。民國六十年八月，日本學者松本雅明所著「沖繩の歷史上文化」一書，則已引用梁先生之說。

由於梁先生在學術研究方面的成就，於民國六十六年獲得教育部文科學術獎，得獎的作品是「隋書琉求國傳逐句考證」。

梁先生在學術上的成就，因而一些名人傳中亦可找到梁先生的大名，如民國二十九年出版的「中國文化人物總鑑」（橋川時雄編，東京，昭和十五年），民國六十九年出版的「中華民國當代名人錄」，民國七十三年出版的「中華民國現代名人錄」（中英日文版），*The International Who's Who of Intellectuals*, (International Biographical Center, Cambridge, England 1985)、*5,000 Personalities of the World: the International Directory of Distinguished Leadership* (Second Edition, the American Biographical Institute) 即將出版。其在國內擔任榮譽職務者甚多，民國五十六年六月，由張其昀先生聘為中華學術院研士，民國五十八年八月曾受聘為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正教授。民國六十年十一月，受聘為公務員典試委員。民國六十二年，孫科院長聘為考試院顧問，直到現在。這些都是對梁先生成就的一種肯定。

附錄：梁嘉彬先生著作目錄

專 著：

1. 廣東十三行考，南京，國立編譯館，民國二十六年二月。
民國三十三年一月，日本山內喜代美，日譯本。
民國四十九年三月，東海大學再版，修訂本。
2. 歷史，臺北市，國立編譯館，民國四十一年十月。
3. 歷史地圖，臺北市，臺灣省教育廳編審委員會，民國四十二年七月。
4. 麻六甲鄭和等，臺北市，僑務委員會，海外文庫本，民國四十四年。
5. 師範本國史，臺北市，復興書局，民國四十四年九月。

6. 琉球及東南諸島與中國，臺中市，東海大學，民國五十四年三月。
7. 明史佛郎機傳考證，臺北市，學生書局，民國五十七年。
8. 東北亞史，臺北市，商務印書館，民國五十九年。
9. 李鴻章與中日甲午戰爭，臺北市，大陸雜誌社，民國六十四年十一月。
10. 中國歷史圖說，第十冊，明代，臺北市，新新文化公司，民國六十八年五月。

論 文：

1. 日本在滿洲兩路侵略主義及應付方略之研究，（國聞周報，卷六期一，民國十七年）。
2. 中東鐵路問題之研究，（國聞周報，卷六期二十八～三十一，民國十八年七～八月）。
3. 東三省自築鐵路史略，（華北日報副刊邊疆周刊，創刊號，民國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4. 英國侵略西藏史略，（華北日報副刊邊疆周刊，期十，民國二十年一月二十八日）。
5. 日本在滿蒙勢力的進退，（華北日報副刊邊疆周刊，期十八，民國二十年四月一日）。
6. 安奉吉長兩路權利之喪失及急應收回之理由，（華北日報副刊邊疆周刊，期二十一，民國二十年四月二十二日）。
7. 錦愛鐵路與滿洲鐵路中立問題，（華北日報副刊邊疆周刊，期二十二，民國二十年四月二十九日）。
8. （葡人在華最初殖民地）Lampacao 考，（清華周刊，卷三十五期四，民國二十年）。
9. 英法聯軍之役廣東舊十三行商調停戰事史料，（國立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所月刊，卷一期一，民國二十二年）。
10. 明史佛郎機傳考證，（國立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所月刊，卷二期三～四合刊本，民國二十三年一月）。
11. 論蘇聯將干預遠東戰爭，（正義周刊，期四，民國三十四年八月）。
12. 請英國考慮放棄香港，（光明周刊，期一，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一日）。

13. 漫談越南，（大眾周刊，期八，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一日）。
14. 海島港灣——中國生命之一線，（大眾周刊，期九，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十五日）。
15. 澳門懸案有早日解決必要，（建國周刊，期二，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三日）。
16. 光復前後的臺灣中等教育，（臺灣月刊，期一，民國三十五年一月）。
17. （臺灣）本省的航務問題，（臺灣日報社論，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日）。
18. 關於本省（臺灣）的「歷史教育」（臺灣日報社論，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四日）。
19. 請認清「九龍城」「九龍租借地」和「九龍割讓地」的區別，（公論報專論，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十四日）。
20. 正視法越戰爭，（臺灣日報社論，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21. 日本侵略中國簡史：五月談國恨，（臺灣新生報副刊史地，期一～二，民國三十六年五月五、十二日）。
22. 通論澳門在歷史上條約上的地位，（臺灣新生報專論，民國三十六年六月五日）。
23. 隋代流求國確非臺灣考，（南京，中央日報副刊文史周刊，期六十，民國三十六年六月三十日）。
24. 東北問題與國際戰爭，（臺灣新生報副刊史地，期十，民國三十六年七月八日）。
25. 從中國地方志看臺灣物產，（臺灣新生報副刊史地周刊，期十，民國三十六年七月八日）。
26. 流求史論正謬，（國防月刊，卷四期四，卷五期一，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七年一月）。
27. 古琉球確即瀛洲考釋，（思想與時代，期五十，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
28. 日本民族源於中華民族考，（南京，中央日報副刊文史周刊，期八十四，民國三十七年三月十五日）。
29. 從許壽裳先生和編譯館想起，（中華日報，中華周報，期三十三，民國三十七年四月五日）。

30. 怎樣使臺灣安定繁榮，（中華日報專論，民國三十七年四月七日）。
31. 東吳夷洲考，（南京，中央日報副刊文史，雙周刊，期九十，民國三十七年五月十七日）。
32. 臺灣問題與美國，（中華日報海島問題雙周刊，期二，民國三十七年九月二日）。
33. 臺灣雜考，（南京，中央日報文史，雙周刊，期九十九，民國三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34. 琉球同胞！請讓我報告：我對你們的認識同情和關切！（中華日報海島問題雙周刊，期三，民國三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35. 海島問題與中國，（中華日報海島問題雙周刊，期一，民國三十七年八月十九日）。
36. 臺灣通考，（中華日報海島問題雙周刊，期三～八，民國三十七年九月～三十八年二月）。
37. 臺灣漢民族之來源，（中華日報海島問題雙周刊，期四，民國三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
38. 記東沙羣島，（中華日報海島問題雙周刊，期六，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39. 琉球舜天王爲日人血胤說正謬，（中華日報海島問題雙週刊，期七，民國三十八年一月七日，琉球蔡璋著，作者譯）。
40. 琉球亡國史譚一二，（中華日報海島問題雙周刊，期九，民國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五日，琉球喜友名嗣正著，作者譯補）。
41. 從中琉關係談到臺灣省管理琉胞問題，（中華日報專論，民國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二～二十三日）。
42. 琉球鳥瞰，（中華日報海島問題雙周刊，期十三，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十二日，琉球喜友名嗣正著，作者譯註）。
43. 由琉球問題談到中國在東亞之地位，（中華日報社論，民國三十八年四月二十一～二十二日）。
44. 隨筆越南——從保大皇帝談起，（中華日報海島問題雙周刊，期十七，民國三十八年七月二日）。
45. 爲琉球古代文字問題敬覆琉球蔡璋，（中華日報海島問題雙周刊，期十八，民三十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46. 南海諸島礁中外新舊名稱對照表，（中華日報海島問題雙周刊，期

- 二十，民國三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47. 論隋書流求，（中華日報海島問題雙周刊，期二十一～二十四，民國三十八年九月十日～十月二十一日）。
 48. 臺灣島的發現（中華日報海島問題雙周刊，期二十五，民國三十八年十一月七日）。
 49. 三國時代夷州亶州考，（中華日報海島問題雙周刊，期二十六，民國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50. 英國近百年來對華土地侵略，（臺灣學生月刊，期五～七，民國三十九年）。
 51. 宋代毗舍耶國確在臺灣非在菲律賓考，（文獻專刊，卷二期三、四合刊，民國四十年十一月）。
 52. 隋書流求傳的石器和鐵器，（公論報副刊，臺灣風土，期一四五，民國四十年十一月二日）。
 53. 明代以前中菲關係小考，（海外月刊，期四，民國四十年十一月）。
 54. 臺灣先史新考，（旁觀雜誌，十一號，民國四十年十一月）。
 55. 中日兩民族間的血緣問題，（日本研究，二月號，民國四十一年）。
 56. 論琉球歸屬問題，（自由中國半月刊，卷九期八，民國四十二年十月十五日）。
 57. 三國時孫權所伐夷州確爲琉球而非臺灣之證據，（幼獅，期十二，民國四十三年）。
 58. 中英中法戰役，（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中國戰史論集，第二冊，民國四十三年六月）。
 59. 泰國民族與華僑，（華僑問題論文集，第一集，民國四十三年十月）。
 60. 記清季設立僑校與中美文化交流，（華僑問題論文集，第一集，民國四十三年十月）。
 61. 鬼谷子考，（大陸雜誌，卷十期四，民國四十四年二月）。
 62. 論我國指南針指南車發明與方士入海，（幼獅，卷三期三，民國四十四年三月）。
 63. 麻六甲，（海外文庫出版社出版，海外文庫之一，民國四十四年四月）。
 64. 鄭和，（海外文庫出版社出版，海外文庫之一，與蔡鎮泉合編，民國四十四年六月）。

65. 從韓國「明刀」出土看東漢以前中韓交通，（中韓文化論集，民國四十四年十一月）。
66. 論明清廣東國際貿易與近代中泰關係，（中泰文化論集，民國四十六年六月）。
67. 關於徐福史料之觀察，（華僑問題論文集，第四輯，民國四十六年十月）。
68. 流求辨，（中央日報學人，期六十七，民國四十七年一月二十一日）。
69. 論隋書「流求」與琉球、臺灣、菲律賓諸島之發見，（學術季刊，卷六期三，民國四十七年三月）。
70. 論隋書流求與臺灣琉球日本海行記錄，（臺灣文獻季刊，卷九期二，民國四十七年八月）。
71. 從純學術立場論隋書流求答臺灣論者，（中央日報學人，期九十一，民國四十七年八月五日）。
72. 論隋書流求爲臺灣說的虛構過程及其影響，（東海學報，卷一期一，民國四十八年六月）。
73. 唐施肩吾事蹟及其「島夷行」詩考證，（大陸雜誌，卷十九期九，民國四十八年十一月）。
74. 日本是怎樣開國了的？（青年學術年會論文集，民國四十八年十一月）。
75. 關於華人發現美洲的觀察，（中央日報學人，期一六〇，民國四十九年四月十二日）。
76. 琉球古今見聞考實，（東海學報，卷二期一，民國四十九年六月）。
77. 從荷蘭史料看鄭氏驅荷入臺的背景，（新時代，卷一期四，民國五十年四月十五日）。
78. 論琉球問題，（政治評論，卷六期十一，民國五十年八月十日）。
79. 魏志侏儒（琉球）、裸國（臺灣）、黑齒國（菲律賓）考，（大陸雜誌特刊，第二輯，民國五十一年五月）。
80. 崎山氏の「梁嘉彬氏琉球古今見聞考實について」の讀後感想，（日文）（沖繩文化協會「沖繩文化」，第十一號，民國五十二年四月）。
81. 中日先史關係的幾個問題，（中日文化經濟協會會刊，「中國與日本」，期五十三、五十四，民國五十三年二月三日）。

82. 小琉球考，（臺灣文獻季刊，卷十九期一，民國五十七年三月）。
83. 近代中日關係探源及兩國外交使才舉例，（百年來中日關係論文集，民國五十七年五月）。
84. On the "Liu-chiu" in the Sui-Shu (隋書之流求)，1962 Conference Asian Historians, Taipei, *Chinese Culture*, Vol. X, No. 10, March 1969.
85. 中國近代外交史和中外關係史的學習興趣，（中國一周，期九八五，民國五十八年三月十日）。
86. 論中國琉球關係之本原，（中華雜誌，卷七期六，民國五十八年六月）。
87. 從徐福碑有真假追蹤蓬萊洲，（史學彙刊，期二，民國五十八年八月）。
88. 徐福に就いて（日文），（日本和歌山縣那智山徐福新廟落成典禮演詞，民國五十八年十一月）。
89. 陳寅恪師二三事，（清華校友通訊，新期三十二，民國五十九年四月）。
90. 日韓史辭典，（商務印書館「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第十二冊，歷史學，東北亞史」，民國五十九年八月）。
91. 中國與琉球之關係，（日本華僑新聞，十六號，民國五十九年九月十五日）。
92. 爲臺灣地位問題正告美國政府和人民，（中華雜誌，卷九，六月號，民國六十年六月）。
93. 從明清兩代中國日本琉球文獻看釣魚臺羣島問題及琉球問題，（食貨月刊，民國六十年六月）。
94. 宋諸蕃志流求國毗舍耶國逐句考證，（大陸雜誌，卷四十四期一，民國六十一年一月）。
95. 我和東京大學及東洋文庫，（中華雜誌，民國六十一年一月）。
96. 梁同新傳，（廣東文獻季刊，卷二期一，民國六十一年三月）。
97. 回憶清華寫作生活，（清華校友通訊，新期四十，民國六十一年五月）。
98. 隋書流求國傳逐句考證，（大陸雜誌，卷四十五期六，民國六十一年十二月）。

99. 吳志孫權傳夷洲亶洲考證，（大陸雜誌，卷四十七期一，民國六十二年七月）。
100. 總論南海諸島礁——喚國魂、告友邦！（中華雜誌，卷十二，總號一二九號，民國六十三年四月）。
101. 琉球亡國中日爭持考實，（大陸雜誌，卷四十八期五～六，民國六十三月五～六月）。
102. 梁經國傳，（廣東文獻季刊，卷四期三，民國六十三年九月）。
103. 李鴻章外交與中日間朝鮮交涉，（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期七，民國六十四年五月）。
104. 番禺黃埔梁氏五世傳略，（史學彙刊，期七，民國六十五年七月）。
105. 梁肇煌傳，（廣東文獻季刊，卷六期四，民國六十五年十二月）。
106. 梁廣桂傳，（廣東文獻季刊，卷七期一，民國六十六年三月）。
107. 梁廣照傳，（廣東文獻季刊，卷七期三，民國六十六年九月）。
108. 論中日先史關係兼論徐福與日本皇室，（華岡史料學報，期十一，民國六十七年十月）。
109. 律勞卑事件新研究，（史學彙刊，期九，民國六十八年一月）。
110. 箕子朝鮮考，（史學彙刊，期十，民國六十九年六月）。
111. 蔣廷黻傳，（中華民國名人傳，冊三，民國七十四年六月）。
112. 蔣廷黻先生與清華，（清華校友通訊，新九十三期，民國七十四年十月）。
113. 明清時代中琉海道交通及文化交流，（中琉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民國七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二至二十五日。）

近代中日關係史專刊四種

- | | |
|---------------------------|---------------|
| (18) 李毓澍：中日廿一條交涉（上） | 定價精120元 平100元 |
| (34) 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 | 定價精120元 平100元 |
| (42) 王 璽：李鴻章與中日訂約 | 定價精200元 平150元 |
| (45) 黃福慶：近代日本在華文化及社會事業之研究 | 定價精250元 平200元 |

· 函購七折，郵撥帳號 1034172-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衛藤 藩 吉

□□張 啓 雄

衛藤先生，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六日生於中國遼寧省瀋陽市，出身書香名門，父·衛藤利夫，東京帝國大學畢業，曾任「滿鐵」「奉天圖書館」館長，並曾講學於「滿洲」「大同學院」，以『韃靼』等名著聞於世。先生既秉承家學，復因思鄉情懷，有感於出生地「滿洲」，「既非異鄉，也不是他鄉」（先生自敘，『文藝春秋』一九八三年十月號），卻又「稱不得故鄉」（先生自敘，見岸陽子「藩吉先生と私」『衛藤藩吉先生 人と業績』）。基於此種「滿洲」情結，先生乃發憤以研究「中國學」為志。日後，先生能以此聞於世，誠非偶然。

一九四三年，先生考入東京大學法學部政治學系，入學未久，以戰局逆轉，被徵為「學徒兵」，配屬廣島通信部隊。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廣島遭受原子彈轟炸，先生雖以機智倖免於難，卻常為「原爆後遺症」所苦。戰後，旋即復學，一九四八年畢業，因「不願向占領軍低頭」，乃求職於「沒有勝者與敗者之分的學問世界」，於是「立志以研究學問為終身職志」（「社會科學とアジア研究」『學術月報』三十一卷三號，一九七八年六月）。同年應聘於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師事於高木八尺、岡義武、榎一雄、和田清、植田捷雄、仁井田陞諸名師，與坂野正高、川野重任等名學者共事，並組織研究會以不時切磋學問。一九五三年轉任東京工業大學副教授，講授政治學。一九五八年應其母校東京大學之聘請，擔任教養學部東亞國際政治史講座（講授課程）及演習講座（討論課程），並於研究部（大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科）開設國際關係史講座。自此，先生乃正式在東京大學展開其赫赫有名的「衛藤式教育」。

先生的專題討論講座（即「衛藤ゼミ」），被認為是斯巴達式的教育風格，對學生要求之嚴格，聞名於東京大學，戰戰兢兢是衛藤講座的特徵。但因其嚴教學風，學子治學不敢不嚴謹，受惠之處，及於終身。因此先生雖有「老式人物」（「舊制人間」）之雅號，然其講課，受歡迎之程度，歷久彌

盛，所以其弟子人才輩出。

一九八四年二月，先生爲告別東大，舉行最後一次講課，是時慕名而至者甚眾，講堂爲之爆滿；四月一日，先生退休，獲授名譽教授。學界及其弟子爲紀念先生退休而撰寫的論文集，質量厚重，在在顯示了先生育才有不凡成就。可是，先生之貢獻，育才僅其一端，其在學問上之成就及教育行政上之功績，亦常爲人所樂道。

「以近現代中國作爲研究中心的東亞國際政治史」，爲先生的主攻領域，因此先生乃以「我的堡壘」（「我が砦」）一語自喻，以之自許。在學術著作上，一九五二年，先生曾以「アヘン戦争以前におけるイギリス商人の性格」一文，初試啼聲，獲得熱烈反響，奠定了先生在研究東亞國際關係史上的學術地位。一九六一年又以“Hai-lu-feng—The First Chinese Soviet Government”一文，發表於 *The China Quarterly* 雜誌上，頓時名噪海內外，在國際上獲得很高的評價。

先生既以研究爲職志，對於導入研究方法與新學新說，不遺餘力。一九六八年乃嘗試以「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爲研究方法，發表「日華緊張と日本人——一九二五年から二八年までの朝日と日日の内容分析」（坂野正高・衛藤藩吉編『中國をめぐる國際政治』，東京大學出版會）一文，遂開以「研究方法」（approach methods）研究國際政治之風氣；同年又發表「中國革命における穩歩と急進」（『中央公論』，東京，一九六八年七月號）一文，指出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具有穩進與急進的往返擺動性循環現象，秉此觀點，先生又於一九八二年發表「中國政治における波動リズム」（衛藤藩吉編『現代中國政治の構造』，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東京）一文，鳥瞰中國三千年歷史，歸納出中國歷史具有：(1)權力盛衰的波動規律，(2)南北對立的波動規律，(3)民族主義的波動規律，(4)社會主義下穩進和急進的波動規律等四種特徵，進而認爲這些特徵將成爲今後中國研究的主要課題。

再者，先生曾於一九七一年根據 cultural conflicts 的概念，在國際學術研究會上，首倡以「文化摩擦」的觀點來研究國際關係。一九七三年再提出「文化摩擦と國際關係」（衛藤藩吉編『國際社會の變化と日本』，機械振興協會，東京）一文，試圖以文化摩擦來解析異質文化間，因接觸所產生的國際紛爭（如中華世界秩序體制 VS. 西歐國際法體制）。先生爲遂此志，乃以東京大學國際關係論爲中心，邀約比較文化、比較文學、政治學、經濟學、文化人類學、歷史學、社會學等學者專家，採學際整合的方式，共同開

拓文化摩擦的新研究領域，不久，獲日本文部省之支持，先生乃與山本達郎教授共同主持「東北亞、東南亞的文化摩擦研究」等大型集體研究計畫，並於近年提出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此為先生倡導新學新說之明證。

一九六五年，先生曾以「日本の安全保障力をどう高めるか」（『中央公論』，一九六五年五月號，其後英譯為“Increasing Japan's Security Capabilities”，轉載於 *Journal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Ideas in Japan*, Vol. 4, No. 2, August 1966.）一文，獲得日本第一屆吉野作造獎。自此，先生乃發揮其研究心得，進而縱談政論，並奔波於海內外，在各種學會上作報告、講演，直至退休前，計二十五年間，共出國六十八次，著作目錄厚達四十四頁。

一九六八～九年間，日本各大學發生空前的大學潮，東京大學國際關係論研究室，首遭嚴重影響，川田侃、齊藤孝等教授被迫相繼去職，江口朴郎教授隨後亦告退休，一時之間，國際關係論所有的行政重責，皆由先生一人獨當其任。先生乃趁此機會，大力整頓國際關係論，擴充國際關係論講座，創設教養學科亞細亞分科及相關社會科學分科；臨退休之際，亦不忘擴充研究部之規模，為創設「地域文化」組與「相關社會科學」組而極力奔走，並將之與既有的「國際關係論」、「比較文學比較文化」併為總合文化研究所，東京大學駒場研究部之規模，因之大備。此不可不歸功於先生每天「蟠踞」東京大學國際關係論研究室十三小時（上午七時～下午八時）之辛勞耕耘，及其表現於行政事務上的卓越能力（平野健一郎「衛藤先生の學問の人間性について」『衛藤瀋吉 人と業績』）。

東京大學「國際關係論學派」，所以能在日本崛起，成為雄霸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重鎮，先生無論在研究成果上，培育人才上以及教育行政上的種種貢獻，厥功甚偉。至於，先生在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領域上的卓著貢獻與國際地位，早有定論，自無庸本文贅述。

附錄：衛藤瀋吉先生著作目錄

一、專 書

1. 立ち上がるアジア（世界史の人びと8），東京，筑摩書房，昭和三十一年（一九五六）年。
2. 眠れる獅子（大世界史20），東京，文藝春秋社，昭和四十四（一九六九）年。

3. 日本の進路 (UP 選書), 東京, 東京大學出版會, 昭和四十四 (一九六九) 年。
4. 無告の民と政治 [新版] (UP 選書), 東京, 東京大學出版會, 昭和四十八 (一九七三) 年。
5. 近代中國政治研究, 東京, 東京大學出版會, 昭和五十 (一九七五) 年。
6. 東アジア政治史研究, 東京, 東京大學出版協會, 昭和五十四 (一九七九) 年。
7. 無告の民と政治——新生日本外政論, 東京, 番町書房, 昭和五十五 (一九八〇) 年。
8. 中共對日發言の内容分析——一九五八年の2つの時期における人民日報を材料として (合著), 東京, 外務省アジア局中國課, 昭和四十一 (一九六六) 年。
9. 中華民國を綴る國際關係, 一九四九~一九六五 (合著), 東京, アジア政經學會, 昭和四十二 (一九六七) 年。
10. 世界の中の中國 (合著), 東京, 讀賣新聞社, 昭和四十七 (一九七二) 年。
11. 中國報道の偏向を衝く調査報告——自由な新聞の危機 (合著), 東京, 日新報道出版部, 昭和四十七 (一九七二) 年。
12. 世界政治、經濟を見る眼 (合著), 東京, 世界經濟情報サービス, 昭和五十三 (一九七八) 年。
13. 國際關係論 (合著), 東京, 東京大學出版會, 昭和五十七 (一九八二) 年。
14. 鈴江言一傳——中國革命にかけた日本人 (合著), 東京, 東京大學出版協會, 昭和五十九 (一九八四) 年。
15. アジア現代史 (編著), 東京, 毎日新聞社, 昭和四十四 (一九六九) 年。
16. 大國におもねらず、小國も侮らず (編著), 東京, 自由社, 昭和四十八 (一九七三) 年。
17. 國際社會における相互依存の構造分析 (編著), 東京, 世界經濟情報サービス, 昭和五十二 (一九七七) 年。
18. 國際關係のイメージと分析方法 (編著), 東京, 産業研究所, 昭

- 和五十二（一九七七）年。
19. 現代の國際經濟關係とその動態（編著），東京，世界經濟情報サービス。
 20. 日本をめぐる文化摩擦（編著），東京，弘文堂，昭和五十五（一九八〇）年。
 21. 現代中國政治の構造（編著），東京，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昭和五十七（一九八二）年。
 22. 日本人對於中國革命的兩面性——其「光」與「影」——中國涿縣における孫中山研究學會，昭和六十年（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23. 中國外交文書辭典（清末篇）（合編），東京，學術文獻普及會，昭和二十九（一九五四）年。
 24. 中國をめぐる國際政治——影像と現實（合編），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昭和四十三（一九六八）年。
 25. 世界の中の日本——安全保障の構想（合編），東京，潮出版社，昭和四十四（一九六九）年。
 26. 新しい大學像をもとめて（合編），東京，日本評論社，昭和四十四（一九六九）年。
 27. 東アジア（現代の世界3）（合編），ダイヤモンド社，昭和四十五（一九七〇）年。
 28. 中國共產黨史 資料集第1～12卷（合編），東京，勁草書房，昭和四十五～五十（一九七〇～七五）年。
 29. 日本の新しい新路——七〇年代への提言——（合編），東京，鹿島出版會，昭和四十六（一九七一）年。
 30. 近代中國研究入門（合編），東京大學出版會，昭和四十九（一九七四）年。
 31. 戦後世界データハンドブック（合編），世界經濟情報サービス，昭和五十四（一九七九）年。
 32. 日本の安全・世界の平和（合編），東京，原書房，昭和五十五（一九八〇）年。
 33. アジア憲法政治年表（合編），昭和五十五（一九八〇）年。
 34. *The 1911 Revolution in China.* (et. al. eds.), University of

Tokyo, 1984.

二、翻 譯

1. E. H. カー 兩大戰間における國際關係史（合譯），清水弘文堂書房，昭和四十三（一九六八）年。
2. J. K. フェアバンク 人民中國論，讀賣新聞社，昭和四十五（一九七〇）年。
3. K. E. ボールディング 紛争の一般理論（合譯），ダイヤモンド社，昭和四十六（一九七一）年。
4. W. G. ビーズレー 自強と維新——十九世紀中葉中國と日本の西洋への對應。
5. 毛澤東思想萬歳 上、下（監譯），三一書房，昭和四十九（一九七四）年。
6. *My Thirty-Three Years' Dream: The Autobiography of Miyazaki Tote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三、論 文

1. "Japan in the Post-War World," The Canad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by the Baxter Publishing Company Behind the Headlines, Vol. 22, No. 4, 1963.
2. 「幣原外交から田中外交へ」，世界經濟八十二號，昭和三十八（一九六三）年。
3. "Outline of Formosan History," in Mark Mancall (ed.) *Formosan Today*. 1964.
4. 「田中義一と大陸進出」，中央公論，新年特大號，昭和四十（一九六五）年。
5. 「京奉線遮斷問題の外交過程」，東京大學出版會，昭和四十（一九六五）年。
6. 「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その時代——4つの型」，日本書院，歴史教育，昭和四十（一九六五）年十一月。
7. 「洋務派小論」，日本書院，歴史教育，昭和四十（一九六五）年十二月。

8. 「滔天と清國革命はどうして結びついたか」，思想，昭和四十三年（一九六八）年三月。
9. 「日華緊張と日本人」，東京大學出版會，昭和四十三年（一九六八）年。
10. 「植民地面積の消長」，東京大學，教養學科紀要，第一輯，昭和四十三年（一九六八）年。
11. 「アジア政治體制試論」，國際法外交雜誌，第六十七卷第二號，昭和四十三年（一九六八）年。
12. 「中國二十五年史稿」，每日新聞社，昭和四十四（一九六九）年。
13. “Communist China: Moderation and Radic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James B. Crowley (ed.) *Modern East Asia*. 昭和四十五（一九七〇）年。
14. 「日本人の中國觀——高杉晉作らの場合——」，仁井田陞博士追悼論文集日本法とアジア，第3卷，勁草書房，昭和四十五（一九七〇）年。
15. 「アジア研究の課題と方法——政治學的アプローチ」，アジア研究，第17卷2號，昭和四十五（一九七〇）年。
16. “Features Characteristic of the Economy of China,” Heiwa-Mondai Kenkyukai, Tokyo, *Peace Research in Japan*. 1971.
17. 「南北問題と日本」，東京大學出版會，昭和四十七（一九七二）年。
18. “Post-War Japanese-Chinese Relations,” *Survey* 18-4, 昭和四十七（一九七二）年。
19. “Japan and China: A New Stage?” *Problems of Communism* 21, 昭和四十七（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二月
20. 「文化摩擦と國際關係」，財團法人機會振興協會，國際社會の變化と日本，昭和四十八（一九七三）年。
21. 「日本における對外政策決定」，國際法外交雜誌，第72卷第6號，昭和四十九（一九七四）年。
22. 「中國革命と日本人——岸田吟香の場合」，講談社，日本社會文化史第七卷，昭和四十九（一九七四）年。

23. 「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政治地理」，朝倉書店，政治地理學，昭和四十九（一九七四）年。
24. “Policies toward China,” in W. Morley (ed.) *Japans Foreign Policy, 1868-1941: A Research Guide*. New York, London Columbia Univ. Press, 1974.
25. 「北京政府の對外イメージその2つの視點」，東洋經濟新報社，中國の政治と經濟，昭和五十（一九七五）年。
26. “Motivations and Tactics of Peking’s New Foreign Policy” in German Association for East Asian Studies (ed.) *China in the Seventies: International China Conference, Rosensburg* 1975.
27. “The Concept of Militarism in Marxism-Leninism and Maoism” in Harold Z. Schiffrin (ed.) *Military and State in Modern Asia*. Jerusalem Academic Press, 1976.
28. 「日本人の韓國理解—愛憎症候羣克服のために」，亞細亞政策研究院，亞政研究叢書第三輯，昭和五十三（一九七八）年。
29. “Military Weaponry and North-east Asian Security” *INSECURITY! The spread of Weapons in the Indian and Pacific Oceans*，昭和五十三（一九七八）年。
30. 「社會科學におけるインターディシプリナリーなもの」，東京大學，教養學報第二四六號，昭和五十三（一九七八）年。
31. “Foreign Policy Formation in Japan” The Simul Press in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ed.) *The Silent Power*，昭和五十四（一九七九）年。
32. “Asianism and Duality of Japanese Colonialism, 1879-1945” in L. Blusse, H. L. Wesseling & G. D. Winus (eds.), *History and Underdevelopment*. Leiden University, 昭和五十五（一九八〇）年。
33. 「社會科學におけるインターディシプリナリーなもの」，東京大學，教養學科紀要第十二號，昭和五十五（一九八〇）年。
34. 「文化摩擦とは」，弘文堂，昭和五十五（一九八〇）年。
35. 「戦後國境環境における中國」，原書房，昭和五十五（一九八〇）年。

36. "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 Rerspective: with Emphasis on Japanese Attitudes towards China," in Kuang-Sheng Liao (ed.) *Modernization and Diplomacy of China*.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1981.
37. 「日中關係」，文藝春秋社，民主社會主義研究會議編國際關係，昭和五十六（一九八一）年。
38. 「中國政治における波動リズム」，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昭和五十七（一九八二）年。
39. "Nationalism and Cultural Exchange," *Ideas and Policies in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The Japan Foundation, 昭和五十八（一九八三）年。
40. "Evolving Sino-Japanese Rela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37, No. 1 昭和五十八（一九八三）年。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二期 要目

七十五年九月出版，二〇三頁，定價 210 元，函購七折

- | | |
|-------------|------------------------------------------------------------------------------------------------------------------------------------------------------------------------------------------------------------------------------------|
| 學術會議 | 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林滿紅
記「辛亥革命與南洋華人研討會」／呂芳上
亞洲學會第三十八屆年會 |
| 學術演講 | 略論新航路發現後的海上絲綢之路／全漢昇
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方法上的一些問題／墨子刻 |
| 學人簡介 | 全漢昇／李木妙 沈雲龍／陳三井 市古宙三／林明德 |
| 研究概況 | 經世文編與中國近代經世思想研究／黃克武
中國大陸「中國近代歷史發展基本線索問題」／遼耀東
近十年來大陸的近代科技史研究／楊翠華
中國近代史研究在新加坡／梁元生
英國的中國通：量的觀察(-)／朱泮源
簡介日本「辛亥革命研究會」／小島淑男
Research Note: Some Recent Soviet Publications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y/Ursula Richter |
| 史料介紹 | 介紹葛懋春等編「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李又寧 |
| 書評 | 陳三井著：華工與歐戰／李國祜
魏秀梅著：陶澍在江南／王家儉
卓遵宏著：中國近代幣制改革史（1887~1937）／王樹槐
郝延平著：十九世紀中國的商業革命／劉石吉 |
| 論文目錄 | 國內政治經濟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學研究所有關中國近代史研究博碩士
論文目錄 |

Portrait of a German Sinologist:

OTTO FRANKE

Ursula Richter

Otto Franke was a pioneer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Studies in Germany, not only because he held the first regular professorial chair of Sinology in that country and subsequently did much to secure the discipline full academic recognition, but also because of his singularly broad and undogmatic approach to Chinese history, both ancient and modern. The formation of this approach was doubtlessly facilitated by two factors: First, he had finished a full university course in a different field, complete with PhD, before he read Chinese; second, he had gained his insights into Chinese society and institutions by immediate contact and not through the detachment of classical philology then still prevalent among European sinologists (their achievements notwithstanding). He had lived in China for 13 years, and even after his return to Germany he continued to seek and improve contacts with Chinese scholars, politicians and institutions. Furthermore, he set an example as an intellectual in the modern sense, being both a learned professional and a committed citizen who, unlike the secluded scholar of his time (alas! by no means extinct today), never stood aloof from political and social obligations. Apart from his copious publications and the education of a number of now world-famous researchers in the field, he dedicated himself to academic organizational matters, was actively involved in Sino-German contacts and even found time to look after the welfare of Chinese students in Germany.

Born into a middle-class family in Gernrode (Northern Germany) on 23 September, 1863, young Otto received a sound classical education before entering Freiburg University in 1882. Later that year, owing to the flexible German university system, he changed to Berlin where he read Sanskrit and also attended J. G. Droysen's lectures on historiography.¹ This encounter was to exert a lasting influence on his view of history. After further studies of Sanskrit,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general history etc., he received his PhD from Göttingen University in 1886 with an indological thesis.

Since he hoped to find employment in the diplomatic service for which a law degree was then required, he returned to Berlin in order to read Law; it was only then that he was introduced to classical Chinese. In 1887, the Seminar on Oriental Languages was established in Berlin, loosely attached to the University. Since it catered mainly to future civil servants in the interest of budding German imperialism, it offered a course in the Chinese vernacular (then deemed unfit for scholarly pursuit). Franke enrolled and had only just been introduced to the elementaries when, in 1888, the Foreign Office drafted him as an interpreter with the German Embassy at Peking.

Franke was to live in China (Peking, Tientsin, Shanghai, Amoy) for the next 13 years and became proficient in official Chinese while in his spare time he began to devote himself to sinological studies and also travelled widely in East and Central Asia.² During his stay, he witnessed some of the most crucial events of modern East Asian history such as the early stage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her struggle with the foreign powers; the war against Japan (1894/95) and the effect of the Shimonoseki intervention;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the negotiations

1) J. G. Droysen (1808-1884), historian and pro-Prussian politician; member of the Frankfurt parliament (1848); advocated liberalism and individualism and saw politics as the chief factor of history.

2) Franke's first scholarly publication was an outcome of some of his travels: *Beschreibung des Jehol-Gebietes in der Provinz Chihli* (Description of the Jehol area in Chihli province), Leipzig 1902, 103 pp.

over a British-German government loan; the awkward events preceding the granting of a German concession in Shantung; etc. etc. Franke made the personal acquaintance of many leading personalities on the Chinese political stage, including Li Hung-chang and Yuan Shih-k'ai.

His keen interest in those events prompted Franke to investigate into their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is would result in the double effect of making him an authority on East Asian affairs and starting him on his career as a sinologist.

After his retirement from the diplomatic service, Franke returned to Germany. From 1902 to 1907 he published a series of articles on East Asi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ffairs in the *Kölnische Zeitung* (Cologne Daily) most of which are still valuable reading for students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³ Franke's objective and well-informed presentation counter-balanced the bulk of "trash"⁴ by which the German public was then misinformed. Of likewise interest is a collection of Chinese reformist writings he translated.⁵

Upon request by the Manchu Yin-ch'ang (Chinese Minister to Germany, 1901-1905, and a close friend of Yuan Shih-k'ai) Franke once more entered the diplomatic service—on the other side: Between 1903 and 1909, he served the Chinese Legation at Berlin as adviser.

Meanwhile, his publications had drawn the attention of academic circles. Advised by F. v. Richthofen⁶ and others, Franke wrote the

-
- 3) A selection of these articles was published as *Ostasiatische Neubildungen. Beiträge zum Verständnis der politischen und kulturellen Entwicklungsvorgänge im fernen Osten* (East Asian Reforms. Contributions to an understanding of politic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s in the Far East), Hamburg 1911, 395 pp.
 - 4) cf. E. Haenisch, "Nachruf auf Otto Franke" (Obituary O.F.), in: *Jahrbuch der deut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46-1949*, Berlin 1949, pp. 145-149; p. 146. Also, F. Jäger, "Otto Franke (1863-1946)", in: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no. 100 (1950), pp. 19-36; p. 23.
 - 5) *Die wichtigsten chinesischen Reformschriften vom Ende des xix. Jahrhunderts* (The most important Chinese reformist writings of the late 19th century), Hamburg 1902 (Leiden 1904). For bibliographical details, cf. B. Theunissen, "Otto Franke in memoriam", in: *Monumenta Serica*, XII (1947), pp. 277-296; p. 282.
 - 6) F. von Richthofen (1833-1905), geographer and geologist who travelled widely in China.

dissertation required in Germany for a scholar to qualify as university lecturer (*Habilitation*) and received his *venia legendi* from Berlin University in October 1907. For his inaugural lecture, he chose to talk about the significance of Sinology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However, his desire to devote himself solely to research and teaching was not yet to materialize. On behalf of the German Navy Department, Admiral v. Tirpitz,⁷ who had known Franke in China, dispatched him to Peking in the Spring of 1908 to conduct preliminary talks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presented by Chang Chih-tung)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joint college in Tsingtao. The talks were successful, and in October 1909 the *Deutsch-chinesische Hochschule* opened its gates.⁸

Franke's success as a negotiator might have been a factor in his favour, apart from his academic merits, when, in 1909, he was offered the newly established chair for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history (later divided into a Chinese and Japanese section) at the Colonial Institute in Hamburg. He accepted and took up office in 1910. This was a breakthrough for the field of Chinese Studies which had so far been researched by individual scholars (often regarded as rather eccentric) but never been institutionalized. Due to Franke's untiring propaganda, Berlin University followed suit and set up a chair for Sinology in 1911, tenure of which was given to the Dutch scholar W. de Groot. As for Hamburg, Franke joined a group of professors and politicians in 1912, who had wished for some time to found a university in the northern seaport but had met with stubborn conservative opposition. Franke threw all the weight of his personal and professional prestige into the struggle. Negotiations were interrupted by the First World War, but in the Spring of 1919, Hamburg University was established,

7) A. von Tirpitz (1849-1930), Admiral, State Secretary in the German Navy Department; some time commander of the German cruise squadron in East Asia.

8) For details, cf. J.E. Schrecker, *Imperialism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Germany in Shantung*, Cambridge (Mass.) 1971, pp. 244-245.

and Franke's institute became part of it.

During his Hamburg years, Franke worked at a wide variety of research projects. Interesting in our own context are his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Confucian state. Having witnessed the 1898 reforms, he was interested in K'ang Yu-wei's revival of the Kung-Yang school. In his typical quest for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current events, he turned to the *Ch'un-ch'iu* which he, taking K'ang's theses for granted, regarded as formulae of state ethics issued by Confucius in a deliberately cryptic language. He then, rather logically, studied the *Ch'un-ch'iu fan-lu* by Tung Chung-shu (c. BC 179-104) and the beginnings of the Confucian state doctrine which, particularly after its revival in the Sung dynasty, he rejected as one of the factors that had obstructed China's transition into a modern state. Although his view of the *Ch'un-ch'iu* is now out of date, his research on Tung Chung-shu remains valid, and besides he had broken new ground.

After the War, Franke was again vigorously involved in organizational tasks. At the same time, he felt compelled to summarize East Asian events preceding the World War and show them in their international context. After a thorough scrutiny of official documents, files and memoirs, he compiled a monograph⁹ with the intent, as he stated in his foreword, to bring the historical truth to light. His book found its critics both in Germany and abroad, but for the objective reader it once again contains a wealth of useful material.

In 1923, Franke was offered deceased Professor de Groot's succession in Berlin which he gladly accepted. The following eight years until his retirement mark the zenith of his scholarly career. In Hamburg, he had not been able to draw a circle of promising students around him, and only Fritz Jäger rose to some prominence within the field, while in Berlin he trained a veritable school of sinologists who

9) *Die Großmächte in Ostasien von 1894-1914. Ein Beitrag zur Vorgeschichte Chinas* (The Powers in East Asia, 1894-1914. A survey of China's historical background), Hamburg 1923, 408 pp.

would rise to world fame, among them E. Balázs, K. Bünger, W. Eberhard, W. Fuchs, W. Simon and others. Also, the wide-ranging scholarly contacts offered by his election as fellow of the P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in 1923 stimulated him. Due to Franke's influence, Hu Shih was elected corresponding member—an honour never before bestowed on an East Asian scholar.¹⁰ The obligation to publish regularly in the *Sitzungsberichte* (Academy Reports) did not seem to burden Franke. In fact, many of his publications began to foreshadow the task he had set himself for the years of his retirement: They reveal an increasing preoccupation with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one of these essays he criticizes the fact that European concepts of Chinese history were almost exclusively based on the 13-volumes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by the Jesuit J. de Mailla (published in Paris, 1777-1783). This work had greatly informed the rejection of Chinese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by 19th century historians such as Hegel, Ranke¹¹ and Mommsen. In fact, however, the *Histoire générale* is essentially a rendering of Chu Hsi's *T'ung-chien kang-mu* which itself represents the highly biased delineation of China's history "as it should have been"; after all, its author (or rather, compiler), one of the patriarchs of Neo-Confucianism, had explicitly drawn it up as an aide in orthodox government. After de Mailla, no other European scholar had attempted to up-date this situation, and Franke had for a long time cherished the idea of taking the task in hand himself.

The chance to complete his *magnum opus* came after his retirement in 1931. He planned to compile a general outline of Chinese history, based on primary sources. At first he had hoped to put his survey into two small paperback volumes. Then, he negotiated with his publishers

10) cf. W. Franke, "Otto Franke und sein sinologisches Werk" (O.F. and his sinological oeuvre), in: *Sinologica*, I, 4 (1947), pp. 352-354; p. 353.

11) L. von Ranke (1795-1886), celebrated "father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who advocated painstaking research and objectivity, excluded China's history from his survey of universal history as he believed it had failed to contribute to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of mankind.

for a 3-volumes edition (two for the text, one for annotations). But the material outgrew his schedule. As A. Haenisch states, "It truly took courage to tackle such an undertaking, and uncommon stamina to realize it... Since now, East Asia is duly included in historiography, and each (volume of) World History contains an East Asian paragraph, the specialists are obliged to provide source material in order to dismiss unauthorized (writers). This means that we are in dire need of a scholarly sound, yet readable, History of China. Certainly, no one was more qualified for this task than Otto Franke... When Theodor Mommsen began to write his epochmaking 'History of Rome', he was in his prime; his material was all to hand. Franke, however, could not start his work before he was in his old age, and he found hardly any readily prepared material to rely on..."¹² Franke used the dynastic histories and supplemented them by other Chinese sources, always maintaining a critical distance, selecting carefully under the basic idea of the state whose nature and fate, he held, form the decisive factor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The first three volumes of the *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Empire) covering the period from antiquity to the end of the T'ang appeared 1930, 1936 and 1937. While at work at the subsequent volumes, he occasionally took up some old thread such as his conviction that Confucianism was ill suited to serve as a state ideology in the modern world, a view that directed his attention towards such Chinese thinkers who had maintained an independent stance, e. g. Li Chih (1527-1602), the subject of his last two papers published at the Prussian Academy. His sympathies with the Chinese reformers and revolutionaries had also prompted his earlier enquiries into the achievements of Hsin Shih-huang, the creator of the first unified Chinese state, who had been vilified by Confucian historians although much of his statecraft had been taken over by the Han and later dynasties; Franke's re-evaluation corresponded with the call of

12) E. Haenisch, *op. cit.*, pp. 147-149

Chinese intellectuals of the May–Fourth era for strong state leadership based on a code of laws rather than on ideology.

To escape the horror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Franke family moved from Berlin to the small town of Ballenstedt near Franke's home town. Here the ageing scholar was able to finish volumes IV and V of his *Geschichte* in manuscript. After having attended a meeting at the Academy, he died of a sudden illness on 5 August, 1946 in his 83rd year. The two volumes were published posthumously in 1948.

In the light of more recent research, some of Franke's positions certainly seem outdated. For instance, his summary condemnation of (Neo–) Confucianism as the sole reason for China's "stagnation" can no longer stand the test of serious scholarship. Also, social scientists have generally challenged the validity of the historical approach, demanding analytical rather than simple realistic description in order to relate events to each other causally instead of genetically, as Franke attempted. However, in his own time, with the social sciences only just forming themselves, Franke's endeavour to show China's contemporary problems before the background of her own recent history and to delineate her ancient history along the lines of indigenous sources must be recognized as pioneering spadework. Today's Western sinologists would not be ill–advised to emulate his independence of current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fashions.

Select Bibliography of Otto Franke's Publications

1. "Eine Reise in den Jehol–Distrikt" (Journey to the Jehol District) in: *Das Ausland*, 37, 38, 39 (1891).
2. "Notes on the Northern Parts of Kiangsi" in: *The Messenger*, V (1892), pp. 115–117.
3. "Die Audienz der fremden Gesandten in Peking zur Feier des 60.

- Geburtstages der Kaiserin Ex-Regentin" (Reception of foreign ministers in Peking on the occasion of the 60th birthday of the Empress Dowager) in: *Der Ostasiatische Lloyd*, 23. Nov., 1894.
4. "Ein neuer Thronfolger in China" (A new successor to the Chinese throne) in: *ibid.*, 2 Feb., 1900.
 5. *Beschreibung des Jehol-Gebietes in der Provinz Chihli*. Detailstudien in chinesischer Landes- und Volkskunde. (Description of the Jehol area in Chihli Province) Leipzig 1902.
 6. "Die wichtigsten chinesischen Reformschriften vom Ende des XIX. Jahrhunderts" (The most important Chinese reformist texts of the late 19th century) in: *Bulletin der Kaiserl.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St. Petersburg XVII* (1902).
 7. "Das Likin und die englisch-chinesische Vertrags-Revision" (Likin and the Revision of the British-Chinese treaty) in: *Kölnische Zeitung*, 21 Aug., 1902. cf. *Ostasiatische Neubildungen*.
 8. "Eine neue Eisenbahnlinie in China" (A new railway in China) in: *ibid.*, 29 Dec., 1902.
 9. "Deutschland und das Yangtse-Tal" (Germany and the Yangtze Valley) in: *ibid.*, 22 Jan., 1903.
 10. "Ein fürstlicher Reformator in China" (A royal reformer in China) in: *ibid.*, 9 Feb., 1903.
 11. "Chinesische Zentralisierungs-Bestrebungen" (Chinese attempts at centralization) in: *ibid.*, 8 March, 1903. cf. *Ostasiatische Neubildungen*.
 12. "Yuan Shih K'ai" in: *ibid.*, 31 March, 1903.
 13. "Ein neues französisch-chinesisches Missions-Abkommen" (A new Sino-French missionary agreement) in: *ibid.*, 8 April, 1903.
 14. "Jung Lu" in: *ibid.*, 15 April, 1903. cf. *Ostasiatische Neubildungen*.
 15. "Chinesische Währungs- und Finanzfragen" (Currency and finance in China) in: *ibid.*, 8 May, 1903. cf. *Ostasiatische Neubildungen*.
 16. "Russland und die chinesischen Ausländer" (Russia and the Chinese

- border regions) in: *ibid.*, 13 May, 1903.
17. "Der erste russisch-chinesische Vertrag" (The first Sino-Russian treaty) in: *ibid.*, 31 July, 1903. cf. *Ostasiatische Neubildungen*.
 18. "Ein Handelsgesetzbuch für China" (A trade law for China) in: *Vossische Zeitung*, 5 Aug., 1903.
 19. "Zur Vorgeschichte der sibirischen Eisenbahn"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Siberian railway) in: *Kölnische Zeitung*, 19. Oct., 1903.
 20. "Der amerikanisch-chinesische Handelsvertrag" (The Sino-American trade agreement) in: *ibid.*, 23 Nov., 1903. cf. *Ostasiatische Neubildungen*.
 21. *Die Rechtsverhältnisse am Grundeigentum in China* (The legal position of landownership in China), Leipzig 1903.
 22. "Japans asiatische Bestrebungen" (Japan's Asian aspirations) in: *Deutsche Rundschau* CXVI (1903). cf. *Ostasiatische Neubildungen*.
 23. "Geistige Strömungen im heutigen China" (Intellectual trends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Verhdlgen Dt. Kolonial-Ges.* VIII, 1 (1904). cf. *Ostasiatische Neubildungen*.
 24. "Der japanisch-chinesische Handelsvertrag" (The Sino-Japanese trade agreement) in: *Kölnische Zeitung*, 29 March, 1904. cf. *Ostasiatische Neubildungen*.
 25. "Die Neutralität Chinas" (China's neutrality) in: *ibid.*, 30 May, 1904.
 26. "Sir Robert Harts neuer Finanzplan für China" (Hart's new finance plan for China) in: *ibid.*, 25 July, 1904. cf. *Ostasiatische Neubildungen*.
 27. "Der chinesische Staatsgedanke und seine Bedeutung für die abendländi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The Chinese idea of the State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Western-Chinese relations), in: *Marine-Rundschau* 15 (1904), pp. 515-30. cf. *Ostasiatische Neubildungen*.
 28. "Das neue chinesische Markenschutzgesetz" (The new Chinese copyright law) in: *Kölnische Zeitung*, 22 Oct., 1904.
 29. "Die Eisenbahn von Peking nach Hankou und Kanton" (The Peking-

- Hankow-Canton railway) in: *ibid.*, 31 Oct., 1904.
30. "England, Tibet und China" in: *ibid.*, 22 Dec., 1904. cf. *Ostasiatische Neubildungen*.
 31. "Zur Kreditfähigkeit Chinas" (On China's solvency) in: *ibid.*, 15 March, 1905.
 32. "Die Beseitigung des staatlichen Prüfungs-Systems in China" (The abolition of the state examination system in China) in: *ibid.*, 12 Nov., 1905. cf. *Ostasiatische Neubildungen*.
 33. "Zur Beurteilung der Pekingerg Vorgänge von 1898" (An evaluation of the 1898 events in Peking), publ. under pseudonym "Sinicus" in: *Marine-Rundschau* 16 (1905), pp. 1289-306. cf. *Ostasiatische Neubildungen*.
 34. "Zur Frage des chinesischen Seezollwesens"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ystem) in: *Kölnische Zeitung*, 16 June, 1906. cf. *Ostas. Neubildungen*.
 35. "China auf dem Wege zur Verfassung" (China on her way towards a constitution) in: *ibid.*, 2 Nov., 1906. cf. *Ostas. Neubildungen*.
 36. "Die Missionar-Frage in China" (The missionary problem in China) in: *ibid.*, 7 Nov., 1906. cf. *Ostas. Neubildungen*.
 37. "Eisenbahnbau und Eisenbahnpolitik in China" (Railway construction and policies in China) in: *Marine-Rundschau* 17 (1906), pp. 536-60. cf. *Ostas. Neubildungen*.
 38. "Die deutsche Industrie in China und ihre Aussichten" (German industry in China and its auspices) in: *ibid.*, pp. 335-38.
 39. "Die politische Entwicklung in China seit dem russisch-japanischen Kriege" (China's political development since the Russo-Japanese war), publ. under pseudonym "Sinicus" in: *ibid.*, 19 (1908), pp. 167-86. cf. *Ostas. Neubildungen*.
 40. "Die deutsch-chinesische Hochschule in Tsingtau" (The Sino-German college in Tsingtao) in: *ibid.*, 20 (1909), pp. 1321-36. cf. *Ostas. Neubildungen*.
 41. *Ostasiatische Neubildungen. Beiträge zum Verständnis der polit-*

ischen und kulturellen Entwicklungsvorgänge im fernen Osten. (East Asian Reforms. Essays o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s in the Far East). Hamburg 1911. X, 395 pp.

42. "Die Sinologie in Deutschland" (Sinology in Germany) in: *Der Tag*, 28 July, 1911.
43. "Die Revolution in China, ihre Gründe und ihre Folgen" (Revolution in China, its origins and results) in: *Hamburger Nachrichten*, 20 Oct., 1911.
44. "Die staatsrechtliche Entwicklung in China seit 1901" (Development of constitutional law in China since 1901) in: *Jb. des öffentl. Rechts*, VI (1912), pp. 503-29.
45. "Ostasien und der Krieg" (East Asia and the War) in: *Das grössere Deutschland*, 33 (1914), pp. 988-1000.
46. "Die Grossmächte in Ostasien" (The Powers in East Asia) in: *Deutschland und der Weltkrieg* (Germany and the World War), Leipzig, Berlin, 1915, pp. 435-60.
47. "China auf dem Rückweg zur Monarchie" (China's retreat to monarchy) in: *Deutsche Politik*, 1 (1916), pp. 145-64.
48. "Die internationale politische Lage in China"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ituation in China) in: *Wirtschaftsdienst*, 9 (Oct. 1916), pp. 93-95.
49. "Zur Vorgeschichte des Abbruchs der deut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cessation of Sino-German relations) in: *ibid.*, 21 (May 1917), pp. 325-29.
50.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s konfuzianischen Dogmas und der chinesischen Staatsreligion: Das Problem des Tsch'un-ts'iu und Tung Tschung-schu's Tsch'un-ts'iu fan lu.* (On the history of the Confucian dogma and the Chinese state religion-The problem of the Ch'un-ch'iu and Tung Chung-shu's Ch'un-ch'iu fan-lu). Hamburg 1912. II, 329 pp.
51. "China als Kulturmacht" (China as a cultural [state] power) in: *Zeitschr. d. Dt. Morgenl. Ges.*, 2/77 (1923), pp. 1-30.

52. *Die Grossmächte in Ostasien von 1894 bis 1914. Ein Beitrag zur Vorgeschichte des Krieges.* (The Powers in East Asia, 1894–1914, an evaluation of the background of the War) Braunschweig, Hamburg 1923. XXIV, 408 pp.
53. “Li Hung-tschang” in: *Meister der Politik* (Master politicians), vol. 3, Stuttgart, Berlin 1923, pp. 485–517.
54. “Yuan Schi-kai” in: *ibid.*, pp. 518–51.
55. *Der Ursprung der chinesischen Geschichtsschreibung* (The origin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Sitzungsberichte d. Pr. Akad. d. Wiss., Berlin 1925, pp. 276–309.
56. “Internationale wissenschaftliche Beziehunge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relations) in: *Hamburger akademische Blätter*, 1 Dec., 1925.
57. *Zur Beurteilung des chinesischen Lehenswesens* (An evaluation of Chinese feudalism), Sitzungsberichte d. Pr. Akad. d. Wiss., Berlin 1927, pp. 359–377.
58. “Das konfuzianische System und die chinesische Krisis der Gegenwart” (The Confucian system and China’s contemporary crisis) in: *Forschung und Fortschritte*, 5 (1929), pp. 85–86.
59. *Das Tse tschi t’nung kien und das T’ung kien kang-mu, ihr Wesen, Verhältnis zueinander und Quellenwert.* (The Tzu-chih t’ung-chien and the T’ung-chien kang-mu, their characters, relation to each other, and their value as source materials), Sitzungsberichte Pr. Akad. Wiss., Berlin 1930, pp. 101–44.
60. “Der Gedanke des Weltstaates bei den Chinesen” (The Chinese idea of a universal state) in: *Forschungen und Fortschritte*, 6 (1930), pp. 317–18.
61. *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 Eine Darstellung seiner Entstehung, seines Wesens und seiner Entwicklung bis zur neuesten Zeit. I. Band: Das Altertum und das Werden des konfuzianischen Staate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Empire. An Evaluation of her formation, character and development until now, Vol. I:

- Antiquity and formation of the Confucian state), Berlin, Leipzig 1930. XXVI, 431 pp.
62. "Zur Geschichtsauffassung von Liang K'i-tsch'ao und seiner Schule"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by Liang Ch'i-ch'ao and his school) in: *Orientalische Literaturzeitung*, 34 (1931), pp. 420-28.
63. "Staatssozialismus in China im Altertum und Mittelalter" (State Socialism in ancient and medieval China) in: *Scientia* (1932), pp. 39-45.
64. *Zur Geschichte der Exterritorialität in China* (History of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 Sitzungsberichte Pr. Ak. Wiss., Berlin 1935, pp. 944-994.
65. *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 II. Band: Der Aufstieg zur Weltmach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Empire, Vol. II: The rise to universal power), Berlin, Leipzig 1936. VIII, 610 pp.
66. *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 III. Band: Anmerkungen, Ergänzungen und Berichtigungen; Sach- und Namenverzeichnis* (Vol. III: Notes, addenda, corrigenda; subject & name index), Berlin, Leipzig 1937. IX, 576 pp.
67. "Li Tsch'i.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Geistesämpfe in 16. Jahrhundert" (Li Chi—An essay on Chinese intellectual struggle in the 16th century), *Abh. der Pr. Ak. Wiss.* no. 10 (1937).
68. "Li Tsch'i und Matteo Ricci" in: *ibid.*, no. 5 (1938).

□近代中國軍事史研究專刊五種□

(9)王爾敏：清季兵工業的興起	精 75 元	平 50 元
(20)劉鳳翰：新建陸軍	精 120 元	平 100 元
(22)王爾敏：淮軍志	精 120 元	平 100 元
(38)劉鳳翰：武衛軍	精 300 元	平 250 元
(47)陳存恭：列強對中國的軍火禁運（民國八年—十八年）	精 250 元	平 200 元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函購七折



研究概況

國史館研究近況簡介

· 遲 景 德 ·

一、館刊復刊

本館為加強國史研究，介紹重要史料，促進學術交流，決定自本（七十六）年起恢復館刊。館刊內容略分論著、專著、國史擬傳、碑傳備采、書評選載、史料選載、學術簡訊、館務報導，及其他等九類。雖較舊有館刊稍作增減，形式略為更易，精神則仍依循過去，求其一貫而有深度。館刊工作重點及特色如下：（一）館刊暫定為半年刊，為期客觀詳實，富於水準，本館特成立編輯委員會，分負撰稿、約稿與審稿之責。編輯委員會下設編務小組，負各項工作實際執行之責。（二）凡今人有關史學、史法、史評、史觀之論著、專著，國內外學術活動之有裨中國史研究者，皆在擇優刊載之列。（三）史料選載列為重點工作，含分類目錄、分類編案、目次表及重要史料介紹三項。所有本館檔案，悉依現行國家檔案分類法，逐期逐次作持續而有系統之整理公布。凡清季以來公私家專載筆記之有資史料者，則圖文並重，分期選載。（四）書評選載旨在提升國史研究水準，促進學術評論風氣。凡近三年內有關中國近代、現代史之名著、專著，有其獨創見解或誤解、曲解史實者，悉予以學理上之客觀評介。（五）為使國史修纂承先啟後，求其定法，本館現階段各工作，均將撰成專文介紹，期能集思廣益，相互討論，取得共識。（六）凡開國革命勳賢，勦匪、抗戰、戡亂殉國忠烈，民間節義之士，及對國事著有貢獻或影響，經本館依據史事纂修成傳者，均入國史擬傳。凡屬其人行狀、事略、墓誌銘等，則入碑傳備采。館刊復刊第一期已於元月出版，深受各界矚目。

二、「國史專題研撰座談會」主講人及專題

「國史專題研撰座談會」自民國七十三年九月廿四日起開始舉辦，至七十六年二月，共舉行卅一次。現將七十五年一月以後所舉行座談會之主講人及專題列舉如下：

- | | |
|------------|---------------------------------|
| 七十五、一、二十二 | 遲景德：抗戰損失調查機構的設置沿革 |
| 七十五、二、二十七 | 王婷婷：瞿秋白對歷史的誤會 |
| 七十五、三、二十六 | 路守常：現代史料管理發展的趨勢 |
| 七十五、四、二十三 | 郭鳳明：日本東京有關中國現代史的收藏管理及中國現代史的研究概況 |
| 七十五、五、二十一 | 朱匯森：如何改進史事紀要編校工作 |
| 七十五、六、二十五 | 汪幼絨：從民法親屬篇的修正試探女性權益 |
| 七十五、七、二十三 | 張明凱：恭述蔣公對治軍事史的提示 |
| 七十五、八、十八 | 朱匯森：國史作業自動化規劃 |
| 七十五、九、二十四 | 洪桂己：蘇爾格事件 |
| 七十五、十、二十二 | 孫常煒：蔡元培先生的戀愛與婚姻 |
| 七十五、十一、二十六 | 簡笙簧：第八路軍與平型關戰役 |
| 七十六、一、二十一 | 蕭良章：論蔣百里在西安事變中的親和作用 |
| 七十六、二、二十三 | 卓遵宏：孔祥熙及其因應日本侵略之金融措施 |

三、國史館最近出版品

1. 國史館編，中華民國史事記要——民國二十年一至六月，七十五年六月出版，一〇六〇頁。
2. 國史館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二十三年一至六月，七十五年六月出版，一二九四頁。
3. 國史館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三十四年一至四月，七十五年六月出版，一二四二頁。
4. 國史館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六十二年七至十二月，七十五年六月出版，一〇五〇頁。
5. 國史館編，清史稿校註（五冊），七十五年二月至九月出版，四二六五頁（預計出版十五冊）。
6. 國史館編，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一）——中共書籍，七十五年六月出版，五二〇頁。
7. 國史館編，中國現代史書評選輯（二）——中共書籍，七十六年三月出版，三五八頁。
8. 國史館編，黃季陸先生論學論政文集（三冊），七十五年十一月出版，二一四六頁。

9. 卓遵宏，中國近代幣制改革史（一八八七～一九三七），七十五年一月出版，五八六頁。
10. 賴淑卿，國民政府六年禁煙計畫及其成效，七十五年三月出版，五三二頁。
11. 孫常煒，蔡元培先生年譜傳記（中），七十五年六月出版，一一一二頁。
12. 洪桂己編，近代中國外謀與內奸史料彙編（一八七一～一九四七），七十五年六月出版，八二四頁。
13. 遲景德，中國對日抗戰損失調查史述，七十六年三月出版，三〇四頁。

簡介「早稻田大學中國近 現代史學習會」

• 細野浩二 •

早稻田大學中國近現代史學習會（以下簡稱學習會）成立於一九八二年四月，是由一羣早稻田大學文學部專攻東洋史而且對中國近現代史有興趣的學生所組成的研究團體。歷史雖然很淺，但是學生的研究熱忱卻很高昂。該會在每星期六下午二點半至五點半都舉行例行討論會。其過程是前一個半鐘頭是由一位學生報告，後一個半鐘頭是全學生對報告內容的檢討。報告的內容包括①學生畢業論文的期中報告，②讀書報告，例如學生選擇竹內好・橋川文三編的「新らしきアジア學の展開のために」（蒼樹社發行）作為報告題材時，因該書係由好幾篇論文輯成，因此由學生各自選擇其中一篇論文，整理其主要內容並提出幾個問題作報告。像這種例行討論會，一年要舉行二十次左右。而且在每年的夏、冬、春學校放假期間，該會會選擇某一風景區舉行三～四天的校外「合宿討論會」，利用早上與晚上進行學習活動，討論極為熱烈。

學習會原來是大學部的學生互相切磋研究心得而組成，但是自前年（一九八四）起即有早稻田大學文學研究所而在大學時代參加學習會的研究生，東京都立大學文學研究所的研究生及其他大學（如明治大學，東京學藝大學

等)的學生，也前來參加該會的活動，進行校際之間的學術交流。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學習會輯成「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文獻目錄」，這是該會發行的第一部刊物。一九八六年七月該會會報「漁夫之理」創刊號發刊，該會成員的學習風氣都表現於該會報之中。

學習會係取自早稻田大學建校的精神——「自學之精神」而來。東京專門學校(即早稻田大學的前身)的創辦者之一的小野梓曾經很感慨地說過這麼一段話，他說像東京大學所聘任的洋教習，授課時使用洋書與洋語，這正是日本淪為歐美列強的精神奴隸的途徑，這樣一來，想早日恢復日本的對外獨立，希望很渺茫。因此他倡導使用日本語文來教學，他並基於「自學」精神而使歐美各國產生不少近代科學的事實，主張以「學問的獨立」作為早稻田大學最重要的標幟。因此「自學之精神」即成為早稻田大學的教育理想，一直被繼承下來。參與該會的學生，將早稻田大學「自學之精神」換稱中國式的「學習之精神」，「學習會」是因此而命名的。

學習會在學生的推動下，於一九八二年成立，此年正值早稻田大學創校一百周年，是一個很好的象徵。學習會的例行研究會或「合宿研究會」皆由學生主持，本人(作者)除偶而提出幾個意見外，盡量留更多的時間讓學生發言。每一次討論會的發言都極為踴躍，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本人自一九八六年四月一日起前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作為期一年的研究，該會不在日本而停止各種活動，仍然照常進行，他們熱衷於切磋學問的精神，由並不因本人此可知。會報「漁夫之理」是他們發抒感想，發表研究心得的園地，以後每年擬定期發刊一冊，相信以後每期的內容將會更臻充實，並計畫於十幾年後將學習會出身的學生所發表的文章，輯成論文集。

最後為鼓舞該會會員的研究士氣，特將會員名單列舉如下：

河野昭昌 大和田隆之 金丸裕一 大西文一郎 近澤市子 西村聰一
 林岳寬 平田英樹 白石徹 弁納才一 松重充浩 兩角智彥
 山腰敏寬 渡邊壽惠 大澤宣子 三光穰 土屋陸 時岡明弘 松尾
 理世 小林奈津子 佐伯彌生 長尾知真子 野本哲矢 天野一哉
 石川茂利 衣笠正則 久保田俊夫 品川正彥 武居俊樹 堤茂樹
 前野秀樹 細萱敦 毛利陸美 渡邊順子 西村裕介 安武史惠
 市岡吾朗 稻田與志一 岩瀬雄高 柏山淳志 木戶孝之 小市昭夫
 榑陽子 杉山一秀 中原孝治 西野真紀 廣瀬寬 前田啟子 湯淺
 惠美子

英國的中國通：量的觀察(二)

• 朱滋源 •

五、專業內涵

本項所要探究的，就是英國學者研究中國的那些方面？那些時段？以及那些地區？

所謂「研究」，在本文中分為「講學的主題」，「研究的興趣」以及「著作的方向」三類。以下將用這三類為主題，分別探討上面所提出來的三個問題。

1. 講學的主題

英人講中國，在學科方面可以分為多種：有的人從自然應用科學講中國，如介紹中國的地理變遷或考古學的新發現；有人講社會科學，如介紹中國的政治、國際關係、經濟、社會、商業、軍事以及人類學等；有人講人文學科，如中國語言、中國文學、歷史、藝術、宗教和哲學。就手邊的回件加以統計，我們得到以下結果：

表十三：英國漢學者講學重點

科學種類	學科別	時 段			小 計	合計
		現代與近代	古 代	通論古今		
自然與應用科學	考 古 學		1		1	2
	地 理 學		1		1	
社 會 科	政 治	9	1		10	34
	國 際 關 係	7			7	
	經 濟	4			4	
	社 會	7	2	1	10	
	商 業		1		1	

學	軍	事	1			1	
	人	類	1			1	
人 文 學	語	言	16	1		17	51
	文	學	7	8		15	
	歷	史	7	2		9	
	藝	術		5		5	
	宗	教		1		1	
	哲	學	1	2	1	4	
合		計	60	25	2	87	

備註：1.有些教師開授多門課程，因此課程總數大於教師人數。

2.表列各科課程數目，係根據問卷而得，並非根據英國各大學開課的實際情況。

表十三告訴我們，英國漢學者在大學開課，其教學的重點，第一是從人文學（五九%），第二是從社會科學（三九%），第三是從自然與應用科學（二%）的角度。人文學之中，以語言為最重要，文學其次，歷史再次之；社會科學之中，以政治與社會掛帥，國際關係再次之；自然與應用科學方面，以中國的科學史為名來開班授課的幾乎沒有，祇有極少數的人在教授關於考古以及中國地理變遷的知識。整個看起來，語言與文學仍是最重要的項目。想要了解中國，首先仍然需要先聽得懂、看得懂中國語文。這是常情。至於中國的政治、社會、歷史、國際關係、藝術、哲學、經濟等項，在略通中國話與中文之後，自然就必須進一步去了解。

在教學方面，我們還有一個問題要解答：對於中國各方面的介紹，這些大學教師是偏重古代，還是現代（近代）呢？依常理判斷，自然應以現代為重了，但實情細節又是如何呢？請讀者看上表。表十三另外告訴我們，英學者講授中國古代的，八十七門課中有二十五門，是二九%，講授現代中國各方面的，有六十門，佔六九%。現代中國與古代中國，在他們所開課程上看，是七與三的比例。如果再往細部去看，又可發現政治、國際關係、社會、語言、歷史等方面，英人側重現代或近代。祇有文學、藝術、哲學等等，他們較重古代。英國人素以務實（practical）聞名於世，此種性格在這一點上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然則教學之時，在大陸與臺灣之間孰重孰輕的比例又是如何呢？這個問題，從他們回答問卷上的“Teaching activities related to China”一項的答案上是看不出來的，但在主要著作 (Major publications on China) 欄，由於著作的名稱較為確定，可以看得清楚些。因此，對於這個問題，我們要留待第 3 目：「著作的方向」中才來解答。

2. 研究的興趣

講課的方向與研究興趣的方向時常相近，但不全同。表十四可以看出來：

表十四：英國漢學者研究興趣所在

科學種類	學科別	時 段			小 計	合計
		現代與近代	古 代	通論古今		
自然與應用科學	一般科學	1	2	1	4	13
	化學		2		2	
	生物化學		2		2	
	建築		2	1	3	
	考古		2		2	
	地理					
社會科學	政治	8		1	9	42
	國際關係	5			5	
	經濟	5			5	
	社會	8		5	13	
	教育	3			3	
	法律	1			1	
	商業觀光	4			4	
	軍事	1			1	
	人類學	1			1	

人 文 學	語	4			4	36
	文	10	4		14	
	歷	1	2	1	4	
	藝		5	4	9	
	宗	3	1		4	
哲		1		1		
合 計		55	23	13	91	

備註：有些學者具有多樣研究興趣，因此興趣所在的總數大於樣本數。

表十四給我們幾個印象：

第一：在時段方面，研究興趣的重點，仍以當代以及近代的問題為主，與上一目講學重點相差不遠。研究現代的有五十五人，佔六〇%，研究古代的有二十三人，佔二十五%，通研古今的有十三人，佔十五%。

第二：在學科方面，研究興趣的重點則與講學重點不同。在講課方面，人文學的重要性最高，其比重為五九%；在研究興趣上，則對人文學有興趣的為三十六人，佔四〇%，比起講課的要低得多。反之，社會科學與自然、應用科學方面就相對提高。在講課方面，社會科學的比重為三九%，而在研究方面則提高到四十二人，佔四六%；自然與應用科學方面，開課的比率是二%，但作為研究興趣的則有十三人，佔一四%。

第三：對社會科學各面的研究，一面倒傾向對當今中國現況的研究。古中國的社會情況如何，有興趣的就十分之少。當然，李約瑟及其週遭的一羣學者，對中國古社會的內容也有極高的興趣，李約瑟甚至已經決定在他中國科學文明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的第七卷中深論中國科學與文明的「社會背景」。照理說我們應也將他列入表十四的「社會科學」的政治、社會、教育等項目中，作為對古中國社會、政治、教育、經濟等各方面具研究興趣的一人。還有魯桂珍，似乎也可以列入。其實不是這樣。他們二人的研究興趣主要仍在科學史，而其「科學文明史」的第七卷，則絕大部均交由他人代為捉刀，如法人 Marianne Basid 負責教育篇等等^⑩。對於今日的中國，英人最感興趣的是社會方面的問題，政治居次，其次則為國際

⑩ 朱滋源：「李約瑟的成就與困境」，中山社會科學譯粹，卷1期2，民75年9月，頁一七九。

關係、經濟與商業等。

第四：在人文學方面，以語言作為研究興趣的就比作為授課對象的要少得很多。這也是常態。畢竟大部分人都拿語言當「工具」，而不作為「學問」。把語言作為學問的，只有少數的語言學家，如劍橋大學的 Dr. Paul Kratochvil，他研究興趣是：“Beijing dialect phonetics with special interest in prosodic features.”

第五，在自然與應用科學方面，英國學者的重點自然多放在古代。這些人與李約瑟相同，都埋首在發掘、整理與介紹古中國的科技上面。

以上五點，是我們根據回收問卷上面，將“Please describe your main present field of research in Chinese studies”一欄的答覆內容整理得到的。由於答覆者回答的不一定很詳盡，自然會有一些偏差。例如劍橋大學的 Dr. Michael Loewe 素以研究中國古代著稱^①，但他也對考古有興趣，今（一九八六）年九月在第三十屆歐洲漢學會議上宣讀：“Archaeology: Recent Finds and Their Significance”一文。可是在答覆問卷時，他寫得較簡單，他說：“the 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依照這種答案，我們祇能把他歸入「古代歷史」一類了。我們在這裏舉這個例子，意在說明表十四的統計，在數字方面並不能算是非常精確的，特別是看到每一個細目時，這些數字只能作為一個大致的方向與程度。讀者們須容許誤差的存在。

最後，對於政治態度，在研究興趣上是不是看得出來呢？他們是偏大陸或偏臺灣？從表十、十一、十二及圖一我們已確定這些漢學家幾乎一面倒向大陸。在研究興趣上，猜想也是如此的，但因沒有確切資料，我們沒法在此討論，仍然要等下一目：「著作的方向」才能揭曉。

3. 著作的方向

在問卷上有一欄是：“Major publications on China”這一欄顯然是用來調查其著作的「大致」情形的。由於此，我們無法獲得非常詳盡的著作目錄，把英國每一個漢學者的研究成果都弄清楚；我們所得到的，仍然只是一個大概的情形，權充參考之用。當然，其可信度也並非完全沒有，因為曾寫過專書的，主要著作即是專書，而不會是文章；不曾寫過專書的，其著作目

^① Dr. Loewe 晚近出版一書，介紹及討論漢朝的時候的生死觀念：*Chinese Ideas of Life and Death: Faith, Myth and Reason in Han Period (202 BC—AD 220)*,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1982.

錄上祇會有文章名稱，而不會有專書。這是一點。另一點，他們在寫文章名稱或專書書名時，通常都會照原來名稱書寫。如劍橋大學經濟系的Dr. Peter Nolan，他寫的著作目錄是：

- ① *Inequality: India and China Compared, 1950-197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with T. J. Byres.
- ② *Growth Processes and Distributional Change in a South Chinese Province: The Case Study of Guangdong, C. C. I.*, 1986.
- ③ "Chinese Collectivisation: Some Comparisons with the USSR",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1976.
- ④ "De-Collectivisation of Agriculture in China, 1979-83: a Long-term Perspectiv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Aug. 8th & 13th, 1984, reprinted in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4.

這種清晰的目錄予我們在統計分類上極大的便利。我們不祇可以看出其著重的學門、注意的時段，還能看出是研究臺灣、香港、大陸，或者是整個的中國。此外，我們甚至還略可看出著作量的大小。爰依照表十四的結構，先行製表，再根據地區別與著作量兩個變項進一步製表說明：

表十五：英國漢學者的著作重點(1)——就時段言

科學種類	學 科 別	時 段		小 計	合 計
		現代與近代	古 代		
自然與應用科學	一 般 科 學		3	3	4
	化 學				
	生 物 化 學				
社 會	建 築		1	1	
	考 古				
	地 理				
社 會	政 治	2	1	3	
	國 際 關 係	8		8	
	經 濟	1		1	

科 學	社	會	8		8	26
	教	育	1		1	
	法	律	1		1	
	商	業、觀	1		1	
	軍	光	2		2	
	人	類	1		1	
人 文 學	語	言	2		2	17
	文	學	2	1	3	
	歷	史		1	1	
	藝	術		10	10	
	宗	教	1		1	
	哲	學				
一 般 通 論			5	5	10	10
合 計			35	22	57	

表十五告訴我們，回件的七十五人當中，除亞非學院的 Prof. C. Howe 並未填寫著作目錄外，有五十七個人是曾經發表過專文或專書的，其餘的十七個人則多在回信的「主要著作」欄中明言沒有著作（“none”）。換言之，在回件當中，有五十八人有著作（包含 Prof. Howe），十七人沒有著作；有著作的佔七七%，沒寫過文章的佔二三%。以下，我們要在這七七%之中的五十七人（Prof. C. Howe 除外）作進一步的剖析。也就是說，要以有著作的作為細部分析的對象。

表十五告訴我們，英國學者在古代與現（近）代之間，的確較重視現代。這種情形，與表十四以及表十三相較，可以發現實際著作與研究興趣（我們把表十四的「通論古今」一欄算入「古代」）的差距較小，而與講學課程的差別較大。講學時或許考慮到學生多係初學，而且對「今天」的事務較有興趣，課程的方向自然就偏重現代了。

表十五（以及待會兒要介紹的表十六與十七）另外還告訴我們，五十七

個有著作的人當中，有四個在自然與應用科學上著力。另外，有二十六個把精力集中在社會科學所涵攝的九個項目上，其中，社會仍是最受矚目的，與表十四、表十三的情況相接近。而社會與國際關係以及政治仍受到相當注意，亦與前面兩個表相當（但政治受到關心的程度已大為降低）。倒是經濟方面略嫌單薄，只有劍橋的 Dr. Peter Nolan 一人。而軍事（包含戰略）方面有兩人，比例上高於經濟學者，也是頗饒趣味的事情。另外的十七個則重視人文學科所涵蓋的六個項目，其中，令人驚訝的是研究中國藝術品的竟然高居首位；研究文學的居次，但人數上離研究藝術品的甚遠。除了這三大類外，我們還發現另有一類，是表十三與表十四所沒有的，那就是「一般通論」。從事以普遍性 (generality) 或通俗性 (popularity) 為主，廣泛介紹中國古代與現代各面的，亦不乏其人。之所以有這種現象，主要原因自然在於英語世界的市場需要。由於中國大陸宣稱「竹幕」甫落，世人爭先，多想一睹「莫名其妙 (inscrutable)」中國的廬山真面目，通俗性百科全書型的書籍自然應運而生了。另外還有極少數學者，由於撰研的領域廣濶，涵蓋的論題無法歸屬在某些項目中，這幾個人也被劃入「一般」之類。

接者，我們想談一談，從地區的觀點而言，英國學者的著作方向是重視臺灣呢？香港呢？抑或是大陸？還是整個的中國？他們是不是除了上述三區之外，也注意海外的華僑社會呢？底下，我們想用四個變項「臺灣」、「大陸」、「中國」以及「其他（用來包括香港、新加坡和其他中國人的社會）」來看這五十七個學者的著作焦點。

表十六顯示，沒有一個學者以臺灣的問題作為其主要的關切點。而祇有一個學者用全付精力探討包含香港、新加坡在內的華人社會。當然，我們必須聲明，他們並不是全然不注意臺灣的問題的，五十七個人當中，有一個在倫敦市立大學社會科學系擔任高級講師，教授社會學的德裔英人 Stephan Feuchtwang，曾經寫過兩篇人類學的文章，討論臺灣的家庭以及社區裏的祭祀以及臺北的寺廟。但他的研究重點並非臺灣，而是中國古時的所謂風水 (Geomancy)^⑫，因此他被分在人類學的「中國」欄，而不是「臺灣」欄。另外，亞非學院的年青講師 Stuart Thompson 也曾為一文介紹臺灣的鄉村。但因他的著作重點亦不限於臺灣，所以也無法分在「臺灣」一欄（附錄

^⑫ Stephan Feuchtwang, *An Anthropological Analysis of Chinese Geomancy*, 1974. 其他著作，請見附錄二。

表十六：英國漢學者的著作重點(2)——就地區言

科學種類	學科別	地 區				小 計	合 計
		臺灣	大陸	中國	其他		
自然與應用科學	一般科學			3		3	4
	化學						
	生物化學						
	建築考古地理			1		1	
社會科學	政治		2	1		3	26
	國際關係		8			8	
	經濟		1			1	
	社會		5	2	1	8	
	教育		1			1	
	法律			1		1	
	商業、觀光		1			1	
	軍事人類學		2		1	3	
人文學	語言			2		2	17
	文學		2	1		3	
	歷史			1		1	
	藝術工藝			10		10	
	宗教哲學		1			1	
一般通論			5	5		10	10
合計		0	28	28	1	57	

二)。除了 Feuchtwang 與 Thompson 以外，我們手上的五十七份著作目錄中，幾乎再沒有文章討論臺灣的。對於香港，情況似比臺灣還好些，我們已經發現至少有四本專書，即倫敦亞非學院的斐達禮 (Hugh D. R. Baker) 所寫 *A Chinese Lineage Village, Ancestral Images: A Hong Kong Album*，與 Peter Y. L. Ng 合寫 *New Peace Country: A Chinese Gazetteer of the Hong Kong Region*，以及 Leeds 大學地理系的高級講師 Frank Leeming 所寫的 *Street Studies on Hong Kong*。此外 Werner Klatt 也注及香港，所撰 *The Chinese Model* 一書，以及 “Hongkong, China and Britain” (*Asian*, No. 8, July, 1983)一文皆直接討論香港的問題。雖如此，專心注志單研究香港的人，似乎祇有 Hugh Baker 一人。

這種一面倒地傾向大陸與中國的現象，是不是真實的呢？由於過於明顯地偏頗，令人懷疑本份統計是否可信。我們論到這裏，也幾乎不敢輕信本表的真實性。但是，經過重新查閱這些人自行開列的著作目錄，的確無法再找到其他論述臺灣或香港的文章。我們認為，絕對不討論臺灣當然不可能，但因英國政府與民間均有重大陸而輕臺灣的作法與風氣，使我們肯定：表十六的數字縱令有些誤差，也決不致於離真實太遠。

我們如果再看得仔細些，並與表十五相配合，會發覺注重人文學的十七人中，有兩個人注意大陸的現代文學，一個人注意大陸現代的宗教問題，其餘十四人均注意中國古代的事務。在社會科學方面，則二十六人之中有十八人注意大陸的現代問題，七人注意中國的現代問題，注意古代事務的，祇有一個人。社會科學中的這種現象，與人文學裏的現象剛好完全相反：研究社會科學各面現象的，側重今天或近代的問題，研究人文學各面的，則重視古代的問題。

現在，我們還想知道，這些漢學家究竟有多少著作，寫過多少文章或出過幾本書。要測量這些人（五十七人）的著作量，單靠問卷中的答案並不一定準確，因為我們在問卷中所問的不是全份著作清單，而祇是 “major” publications。根據「主要」著作目錄，來測量其著作量，必然會生低估的現象。對於這項缺失，以目前接觸範圍所限，實在無法彌補。但我們仍然認為，縱令低估了些，也不致於相差太遠。讓我們看表十七（並請參考附錄二）。表十七將數量分為六等，即：一到五篇文章、六篇以上文章、一本專書、兩本專書、三本專書以及多本專書。

表十七：英國漢學者主要著作數量統計表

科學種類	學科別	著作數量 (以人為單位)						小計	合計
		1-5 篇文章	6篇以 上文章	一本書	二本書	三本書	多本書		
自然與應用科學	一般科學					1	2	3	4
	化學								
	生物化學								
	建築考古地理						1	1	
社會科學	政治			1	2			3	26
	國際關係	2	1	2	1	1	1	8	
	經濟				1			1	
	社會	3		2	2		1	8	
	教育			1				1	
	法律				1			1	
	商業、觀光				1			1	
	軍事人類學	1		1			1	2	
人文學	語言學	1					1	2	17
	文學			1	1	1		3	
	歷史						1	1	
	藝術工藝	2			3	1	4	10	
一般通論	宗教哲學			1				1	10
	合計	11	2	9	13	6	16	57	

表十七顯示，有十一人寫了一到五篇文章，兩個人寫了六篇以上文章，但沒出專書，有九人寫過一本書，十三人寫過兩本，七人寫過三本，十五人寫過三本以上的專書。這些數字，如加以合計，也是相當可觀的。就以專書來說，我們以最保守的方式來統計，把「多本書」當作「四本書」^⑩，則這五十七人共出版了 $16 \times 4 + 6 \times 3 + 13 \times 2 + 9 \times 1$ 的專書，也就是出了一百〇七本。換言之，七十五個人之中的五十七人有著作，其著作量是一〇七本專書（專文不計）。那麼，（容我們大膽而樂觀地）依此類推，英國有漢學家一五〇人以上，對於中國研究，他們的著作量（文章全部不計，祇計算專書）應在兩百一十二本以上了。這是就整體言。我們再看細部。

就「自然與應用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學」三大類言，則人文學者的著作最稱豐碩，自然與應用科學者次之。本表「一般科學」欄之在「多本書」項下的兩人，指的即是李約瑟與魯桂珍。李、魯二人終生勤於研究與創作，單是他們兩人，其著作量之豐，即可與社會科學類裏類二十六個漢學家所出版專書與專文的總和相埒。因此，「自然與應用科學」欄中雖然祇有四人，但這四個人的著作量，絕對不低於社會科學中的二十六人，而且也可能不亞於人文學的十七個學者。李、魯二人因而成為英國漢學界的兩塊瑰寶。

撇開李、魯二人，則研究中國古代「藝術與工藝」的十一人似乎是著作最多的了。除了藝術與工藝，則「一般通論」裏的十人也有不惡的表現。

六、對近、現代中國的研究

表十四使我們曉得，以社會科學為取向來研究中國的二十六個漢學者之中，有二十四個研究現代與近代；以人文學為取向的十七人中則有五人專注現代與近代；自然與應用科學方面，則全數注意古代；至於一般通論類，則十人中有五人注意近、現代。總共研究近代與現代中國的漢學者，並且有著作行於世的，在我們手上所有的五十七份資料中，佔了三十五個；而研究古代的祇佔二十二個比較起來，研究近、現代的大約佔了六成，研究古代的則佔四成。

^⑩ 其實不止四本書，因為像李約瑟，他一個人在過去的六十年生涯中就出過六十本以上的專書。這六十本當中，至少有四十本與中國有關。而他寫過的文章則更不計其數。詳情請逕閱 *Who Is Who* 或拙作「李約瑟的成就與困境」。

表十八：英國專攻近現代中國之學者主要著作數量統計表

科學種類	學科別	著作數量 (以人為單位)						人數小計	人數合計
		1-5篇文章	6篇以上文章	一本書	二本書	三本書	多本書		
自然與應用科學	一般科學								0
	化學								
	生物化學								
	建築								
	考古地理								
社會科學	政治		1		1	1	1	2	25
	國際關係	2	1	2	1			8	
	經濟				1			1	
	社會	3		2	2		1	8	
	教育			1				1	
	法律				1			1	
	商業、觀光				1			1	
軍事人類學	1						1	2	
人文學	語言學	1					1	2	5
	文學史			1	1			2	
	藝術工藝								
	宗教哲學			1				1	
一般通論			1			1	3	5	
合計		7	3	8	8	2	7	35	

接下來我們想把注意焦點縮小，把專門研究（兼攻古代與現代的不計算在內）近現代中國（包含大陸、臺灣、香港三地）的學者，依學門別以及著作量兩項來分析，而為表十八：（見前頁）

我們對於表十八，與對表十七一樣，都要再次聲明，這是一種極保守的估計。在人數方面，這三十五個人，是從七十五份回收問卷中，五十七個寫明有著作的人之中，分類計算而成的。因此：

1. 就有著作的五十七個人來說，三十四所代表的，是五十七分之三十五的比率。也就是說，在發表文章，以著作問世的英國漢學者之中，61.4%的人專攻近代與現代。
2. 五十七人中除「專門」研究近現代的三十五人之外，其他約百分之四十的人當中也時有專文，論列近代及現代中國。如 Mark Elvin。他曾撰文多篇，泛論近代中國的科技、經濟、思想、社會、政治等等，其所探“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高度均衡的陷穽）”理論來解釋中國科技與經濟至十八、十九世紀即已停滯的現象，亦頗受國際間研究中國近代社會經濟發展之學人所注意。（Elvin 有關近代中國的著作，請見附錄二）另外，Anna Merton, Shio-Yun Kan, William Dolby, Michael Sullivan, 以及 W. J. F. Jenner 幾人，也多有討論近代中國的專文與專書。（附錄二）這麼一來，五十七個人之中，至少有四十個人在探討中國近現代的問題。換成比率，為七〇%以上。
3. 由於是根據他們的「主要」著作而非「全部」著作所做的統計分類，在每個人著作數量的歸類上，就必然有低估的現象。

職是之故，根據表十八，我們可以得到一些印象，爰分為四點加以說明：

1. 對於「自然與應用科學」學科晚近在中國的發展情形，似乎沒有人加以討論。當然，晚近在大陸出土的一些文物與古屍，仍相當吸引英國人。但若提及大陸與臺灣的科學與技術在二十世紀的發展情形，則恐怕極少英人注意。「社會科學」領域內的各科則最受英國人關切。注意這個領域且為文討論的比自然科學以及人文學都要超過甚多。這種一面倒的現象，自與現實的需要相關連。注意「人文學」各科的，人數幾乎只是注意社會科學各面人數的五分之一，的確是太低了一些。

2. 注意社會科學各面的學者，以留心國際關係的人為最多，其次為研究社會的人士。相對地，專門研究經濟的人竟然祇有一個（劍橋的 Peter No-

lan)，就令人不祇感覺太少，而且覺得懷疑。因為今天的經濟學已躍居「社會科學之后 (Queen of the Social Sciences)」，研究中國經濟的人照理不會這麼單薄。這種懷疑確是有道理的。我們在調查時也發現，或許是回件的學者之中較少專攻中國近代經濟的關係。如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 Prof. Christophe Howe 即以研究經濟問題而著稱。但因他的回件過於簡略，上文並未加以計算。可是，根據我們了解，Howe 在中國大陸經濟問題上，確實曾有豐富的著作。(附錄二) 另外，如劍橋大學經濟政治系還有一位教師 Dr. A. Singh^⑭ 以及一位今年(一九八六)年初過世的 Mrs. S. H. Paine^⑮，也曾有些許著作。研究現代中國經濟而且有著作的學人無論如何都不可能祇有一個。

研究政治(內政)的比國際關係的還要少得多也是一個有趣的現象。它的原因，或許可以分為兩種：一、從英國本身需要，與從我國自己的需要比較起來，英國學者所關切的，由於只是英國的國家利益，而非中國的國家利益，因此他們最想知道的，自然不是中國內部的政治問題。二、資料限制，在英國研究中國，國關的資料自然比內政的資料多得多。

3. 注意人文學各面的學者之中，專門研究近代中國且有著作的竟然祇有五人，也是較為特殊的現象。五個人中，有兩人注意語言，兩人注意文學，另有一個牧師(Whyte)注意宗教。歷史、藝術、哲學方面則無專人寫書。這絕非表示無人寫過中國近代史的文章，因為「近代史」所涵蓋的範圍極廣(表十八裏所有的著作，都可以歸入中國近代史的藩籬)，而是說，專門從歷史(時間推移)的角度，寫成例如「中國近代史」之類專書的，則幾乎是鳳毛麟角^⑯。

沒有人「專論」現代中國哲學也是很奇怪的現象。當然，在討論中國近代文學時，自然涉及哲學，如亞非學院的 Prof. D. P. Pollard 的 *A Chinese Look at Literature: the Literary Values of Chou Tso-jen (周作人) in Relation to the Tradition*；也有些人偶撰數篇，論列中國近

^⑭ Dr. Singh 開的課是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Development" 他又與 Peter Nolan 合開："The Socialist Countries the Third World and the World Economy"

^⑮ Mrs. S. H. Paine 英年早逝，她在1985年開過的課是：
"Advanced Development Theory";
"Theory of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China";
"Chinese Economic Reforms Post-Mao".

^⑯ Peter Corrigan 也許是比較上接近的一個人，但他的書以通論今日中國(大陸)各面為主，又與從時間的推移來看中國者不同。(請見附錄二。)又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為美國學者費正清所主編，也無法列為英人所出版的專書。

代政治思想，如新堡大學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upon Tyne) 講師 James Cotton 的 “Mao Tse-tung” 與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Tradition of Political Thought” (附錄二) 等文。但因 Pollard 主要興趣是文學；Cotton 討論思想，主要是從政治而非哲學的角度，我們就把他倆分別歸入「文學」與「政治」而未劃入「哲學」一類。

4. 在近代與現代中國的研究上，著作等身，足與 Joseph Needham 相埒的學者並不易見。當然，像 Dr. Hugh D. R. Baker (倫大)、Dr. P. C. Lowe (曼徹斯特大學高級講師)、Dr. Gerald Segal (布里斯陀 (Bristol) 大學政治系講師)、Dr. Paul Kratochvil (劍橋大學東方系講師)、Michael Schoenhals (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博士班研究生)、David S. G. Goodman (新堡大學東亞中心主任) 以及 Dr. Peter Corrigan (West Sussex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地理系高級講師) 等人以及通論古今中國的 Dr. Mark Elvin (牛津大學東方系講師) 都有十分卓越的表現。而 John Gittings (“The Guardian” 日報國際新聞助編) 與曾經擔任對華外交工作 (一九三三~一九五二) 的退休教師 (一九五二~一九七九) Derek Bryan 亦不弱。另外，劍橋大學經濟政治系的 Dr. Peter Nolan 與擔任新堡大學政治系講師 Dr. James Cotton 等等，都是後起的新秀，未來仍大有發展餘地。

結 語

想調查某個國家的學者對另一個國家了解的情形，牽涉的問題並不僅止於知道其了解的內容。如何避開敏感的政治問題，如何使問卷本身具備周延性，如何使問卷不致太冗長，如何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答覆，又如何使這些學者樂於回答問題，這些都是從事本次調查所曾觸及的主要難題。結果告訴我們，在總共一二四封問卷之中，能回收七十三封，回收率已到達近六〇%，可以說是相當令人滿意。但分析的方法為何，則是接著而來的一個難題。直到今天，這個問題仍然沒有完全解決。因為它牽涉的不祇是方法，而且也及於資料的充足與否。

因此，這份報告並非調查研究結果的全部，它不過祇是第一個部分：從「量」的觀點來分析英國漢學家的背景資料、接受的訓練、工作的內容、與中國往來的情形、專業的內涵以及對近現代中國研究的成果等項目。在這

之後，仍有其他的工作值得再繼續往前做去。而且，由於想在一篇字數有限的文章中，解答一連串為數高達一、二十個的問題，也未免負擔過重。另外，雖然已經回收了將近六成的問卷，但這六成不可能完全代表整個英國漢學界的實際情況。更何況我們所調查的這一百二十四人，也不是在英國的「中國通」的全部。在英國的中國通究竟有多少人？我們猜測至少應有一百六十人以上。惟實際數目究竟是如何？恐怕連英國人自己也不曉得。基於以上各點，這一份報告之中，錯誤自然很難避免。所幸這祇是一個開端，接著下來，還望有志一同者努力繼之，使我國人能更清楚在英國的中國通的動態。

英國確實已在明日黃花的路途上，日不落國的時代已成歷史。但英國人愛惜心靈智慧結晶的習慣仍舊保存著，英國仍舊擁有多樣智識的寶藏，英國仍為當今自由世界七大強國之一，英國的漢學研究仍然值得中國人去注意。而英國的中國研究，也決不僅止於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文明史。一如我在本文裏頭提到的，在英國人所從事的區域或者國家研究之中，中國的研究雖然並非顯學，但也相去不遠，中國研究在英國可觀之處仍多。

從本文中，我們似可掌握英國的漢學研究概況：我們除了確知英國漢學研究，以倫敦大學的亞非學院為重鎮，劍橋、牛津、立茲、愛丁堡等校次之。我們也知道，他們除開注意中國古代科學史外，對近代社會的各面也十分著力。當然，由於彼此間並無協調，更無明顯的分工，英國的漢學者自不能平均分配，來普遍注意中國各面以及各個地區，使得某些學科，以及中國大陸以外的地區，尤其是臺灣，並未得到應有的重視。這些偏失，一方面來自彼此的不可能分工，二方面來自這些學者對自己國家社會的關切，三方面則更為中國大陸的開放竹幕所影響。熱門與冷門之間，確有相當的不同。

我們經過這一次小規模的初步調查研究之後，已將原有的迷霧吹開一些。依據本篇文章，有意者似可進一步就興趣所在，追索更為深入、精緻、而且有趣的內容。能如此，則本篇文章就算達成拋磚引玉的目的了。

(本研究曾蒙教育部駐法國文化參事處補助，特此致謝。又：調查進行的過程，承蒙在劍橋攻讀語文的鄭繡紹代為打發問卷，西班牙旅英神經分泌學家 Francisco Diez Guerra 惠借 Word Processor，方便工作之進行甚多，亦在此一併致謝。)

附錄一：調查所用的問卷

—CHINESE STUDI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NAME (CAPITAL LETTERS):

(CHINESE NAME:) YEAR OF BIRTH:

ADDRESS: PLACE OF BIRTH:

..... NATIONALITY:

DEGREES: PRESENT POSITION:

TITLES:

Where did you receive your academic training?

Previous employment or experience:

Visits to Mainland China (when & how long?).....

Visits to Taiwan (when & how long?).....

Visits to Hong Kong (when and how long?).....

Major publications on China:

Teaching activities related to China (please indicate level and approximate number of students).....

Other public activities related to China (e.g. lecturing, newspaper articles, etc):

.....
.....
Please describe your main present field of research or interest in Chinese studies:

Have you any general comments that you would like to make on the state of Chinese studi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Please continue on a separate sheet if necessary.)

Date:

Signature:

附錄二：英國漢學家關於近現代中國主要著作目錄

Baker, Hugh D.R (1937-)

1. *A Chinese Lineage Village: Sheung Shui*, London & Stanford 1968
2. *Chinese Family and Kinship*, London & N. 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Taiwan, 1981.
3. (Co-authored with Peter Y.L. Ng) *New Peace Country: a Chinese Gazetteer of the Hong Kong Region*, Hong Kong, 1983
4. *Ancestral Images: A Hong Kong Album* (3 Vols).
5. "Life in the Cities: the Emergence of Hong Kong Man," *China Quarterly*, 95, 1983, pp.469-479.

Beyer, John (1950-)

1. *Investment Guide to China*, Macmillan.
2. "Party Novel, Risqué Film", in W. Kubin, *Essay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ritton, Carolyn (1948-)

(著作不詳，惟曾撰某些文章，論述今日大陸的社會)

Bryan, Derek (1910-)

1. *The Land and People of China*, Black, 1964
2. (Co-authored with Liao Hongying) *Let's Visit China*, London: Burke, 1966. (rev. 1985.)

Corrigan, Peter (1941-)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eries of four), Gateway, 1978.
2. *Life in China's Communes*, Common Ground, 1978.
3.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China* (series of six), E.P. 1978.
4. *China* (series of five), A.V.P., 1979.
5. *Industry in China*, Common Ground, 1983.
6. "Ping Chow, a Chinese Commune", *Geography*, Apr. 1977.

Cotton, James (1949-)

1.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D. Miller (ed), *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Thought*, Oxford: Blackwell, 1986.
2. "Mao Tse-tung", *Ibid.*
3. "Reforms for Intellectuals", in Kim Dalchoong (ed), *Reforms in China and Their Implications*, Seoul: Sogang University Press, 1986.
4. "The Intellectuals as a Group in the Chinese Political Process", in D.S.G. Goodman (ed), *Groups and Politics in the PRC*, Cardiff, Wales: University College of Cardiff Press, 1984.
5. "The Six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f China", *Communist Affairs*, 3, 1984.
6.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Tradition of Political Thought", in N. O'Sullivan, *Revolutionary Theory and Political Reality*, Brighton, England: Harvester, 1983.

Davin, Delia (1944-)

1. *Womanwork: Women and the Part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2. (Coed. with Elisabeth Croll and Penny Kane) *China's One Child Policy*, Macmillan, 1984.

Elvin, Mark D. (1938-)

1. "The Gentry Democracy in Shanghai, 1905-1914,"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967.
2.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3. (with Caroline Blunden) *A Cultural Atlas of China*, Phaidon, 1983.
4. "Why China Failed to Create an Endogenous Industrial Capitalism: A Critique of Max Weber's Explanation", *Theory and Society*, 13:3, 1984.
5. "The 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 The Causes of the Decline of Invention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Textile Industries", in W. Willmott (ed),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Uni-

versity Press, 1972.

6. "Mandarini e macchine", in L. Lanciotti (ed), *Sviluppi scientifici, prospettive religiose, movimenti rivoluzionari in Cina*, Olschki, 1975.
7. "The Technology of Farming in Late-Traditional China", in R. Barker and R. Sinha (ed), *The Chinese Agricultural Economy*, Westview, 1982.
8. "The Administration of Shanghai, 1905-1914", in M. Elvin and G.W. Skinner (ed), *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9. "Mandarins and Millenarians: Reflections on the Boxer Uprising of 1899-1900", *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Society of Oxford*, 10:3, 1979, lecture delivered in memory of Professor Maurice Freedman at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即 SOAS, 以下同)
10. "The Revolution of 1911 in Shanghai", *Papers in Far Eastern History*, March, 1984.
11. "Self-Liberation and Self-Immolation in Modern Chinese Thought", 39th Morrison Lecture, pamphlet,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78.

Ferdinand, Charles Ian Peter (1947-)

1. *Communist System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Soviet, Chinese and Yugoslav Models*, 1987.
2. "Political Succession in China", in M. McCaulvy and S. Carter (eds), *Leadership Succession in the Soviet Union, Eastern Europe and China*.

Feuchtwang, Stephen (1937-)

1. "Domestic and Communal Worship in Taiwan", in Arthur P. Wolf (ed), *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1974.
2. "City Temples in Taipei under Three Regimes", in M. Elvin and G.W. Skinner (eds), *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 Stanford, 1974.
3. "School Temple and City God", in G.W. 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1977.
4. "The People's Livelihood and the Incidence of Poverty", in S. Feuchtwang and A. Hussain (eds), *Transforming the Chinese Economy*, 2 vols, London: Zed, 1986.

Gardner, John (1939-)

1. *Chinese Politics and the Succession to Mao*, Macmillan, 1982.
2. *Communist Political Systems: An Introduction*, Macmillan, 1983.

3. "Study and Criticism: The Voice of Shanghai Radicalism", in C. Howe (ed), *Shanghai, R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Asian Metropolis*, Cambridge, 1981.

Gittings, John (1938-)

1.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Army*, OUP(OUP 即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以下同。), 1966.
2. *Survey of the Sino-Soviet Dispute, 1963-1967*, OUP, 1968.
3. *The World and China, 1922-72*, London Eyre Methuen, 1974.

Goodman, David S. G. (1948-)

1. *China: The Politics of Public Security*, 1976.
2. *Research Guide to Chinese Provincial Newspapers*, 1976.
3. *Chinese Local Newspapers*, 1979.
4. *Beijing Street Voices*, 1981.
5. (ed) *Groups and Politics in the PRC*, 1984.
6. *Centre and Province in the PRC*, 1986.
7. *Directory of Provincial Leadership in the PRC, 1949-85*, 1986.

Herdan, Innes (1911-)

1. *Introduction to China*, Anglo-Chinese Educational Institute, 1974 and 1979.

Howe, Christopher B. (?-)

1. *Wage Patterns and Wage Policy in Modern China, 1919-1972*, Cambridge, 1973.
2. *China's Economy: a Basic Guide*, London: Paul Elek, 1978.
3. *Employ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Urban China*, Cambridge: CUP (CUP 即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以下同), 1971.
4. (ed) *Shanghai: R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n Asian Metropolis*, CUP, 1981.

Jenner, W. J. F. (1940-)

1. "Les Nian et le Laonihui: les rebelles et leurs adversaires dans la tradition populaire", in Chesneaux, Davis and Ho (eds), *Movements populaires et sociétés secrètes en Chine aux XIX^e et XX^e siècles*, Paris: Maspero, 1970, pp. 205-218.
2. Forword to Wang Fan-hsi, *Chinese Revolutionary: Memoirs, 1919-1949*, Oxford: OUP, 1980.
3. "1979: A New Start for Literature in China?" *China Quarterly*, No.

- 86, 1981, pp. 9-16.
4. "Lu Xun's Last Days and After," *China Quarterly*, No. 91, 1982, pp. 424-445.
 5. "Is a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Possible?" in Wolfgang Kubin and Rudolf G. Wagner (eds), *Essay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Criticism*, Prockmeyer, Bochum, 1982, pp. 192-230.
 6. "Chinese Writers Break New Ground", *Index on Censorship*, Vol. 9, No. 4, 1984, pp. 3-5.
- Kan, Shio-Yun** (1953-)
1. (with Anna Merton) *China*, in Macdonald's 'Life and Countries' series, 1986.
- Kirkby, Richard J. R.** (1948-)
1. *Urbanization in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 Klatt, Werner** (1904-)
1. (ed) *The Chinese Model*, Hong Kong University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2. "The Staff of Life: Living Standards in China, 1977-81", *China Quarterly*, March 1983.
- Kratochvil, Paul** (1932-)
1. *The Chinese Language Today*, London: Hutchinson University Library, 1968.
 2. *Three Stories by Lu Hsun: An Annotated Reader*, CUP, 1970.
 3. *A Course in Chinese Pronunciation*, Cambridge: Chinese Language Project, 1972.
 4. "Modern Chinese and Linguistic Change", *China Quarterly*, 92, Dec. 1982, pp. 687-695.
- Lee, Gregory Barry** (1955-)
1. *Dai Wangthu-a Literary Biography* (to be published).
- Leeming, Frank** (1926-)
1. *Street Study o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2. *Rural China Today*, London: Longman, 1985.
- Lockett, Martin** (1954-)
1. *Chinese Industry: Management and Division of Labour*, London: Department of Employment, 1978, 43p.

1. *Chine: direction et division du travail dans l'industrie*, Paris: U.I. M.M., 1978, 44p.
2. (with A.R. Thomas) *Choosing Appropriate Technology* (Open University T361 "Control of Technology" course Units 15-16), Milton Keynes, 1978; 2nd revised edition, 1983, 117p.
3. "Bridging the Division of Labour? the Case of China,"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Democracy*, 1:4, 1981, pp.447-486.
4. "Self-Management in China?," *Economic Analysis and Workers' Management*, 15:1, 1981, pp.85-114.
5. "Cooperative di lavoro: integrazione o sfida al sistema?," *Rivista della Cooperazione*, 11, 1982, pp.35-73.
6. "Enterprise Management Moves towards Democracy?," S. Feuchtwang and A. Husain (eds), *The Chinese Economic Reforms*, London: Croom Helm, 1983, pp.224-256.
7. "Organizational Democracy and Politics in China", F. Heller and C. Crouch (eds), *Organizational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Processes: International Yearbook of Organizational Democracy*, Vol 1, New York: Wiley, 1983, pp.591-635.
8. (with C.R. Littler) "Trends in Chinese Enterprise Management, 1978-1982", *World Development*, 11:8, 1983, pp.683-704.
9. "Cooperative di produzione in China, 1919-1981", *Rivista della Cooperazione*, 15, 1983, pp.9-49.
10. (with C.R. Littler) "The Significance of Trade Unions in China", *Industrial Relations Journal*, 14:4, 1983, pp.31-42.
11. (with C.R. Littler) "Urban Inequality and Living Standards: a Note on the Staff of Life", *China Quarterly*, 97, 1984, pp.91-93.
12. "Small Business and Socialism in Urban China", *Developments and Change*, 17:1, 1986, pp.35-67.

Lonsdale, Anne (1941-)

1. *University Administration in China*, UFA (?) Press, 1982.

Lowe, Peter (1941-)

1. *Great Britain and Japan, 1911-1915*, Macmillan, 1969.
2. *Great Britain and The Origin of the Pacific War*, Clarendon Press, 1977.
3. *Britain in the Far East, 1819 to the Present*, Longman, 1981.

Merton, Anna (1953-) (詳見：Kan, Shio-Yun)

Nolan, Peter Hugh (1949-)

1. (with T. J. Byves) *Inequality: India and China Compared, 1930-1970*, OUP, 1976.
2. *Growth Processes and Distributional Change in a South Chinese Province: the case of Guangdong*, London: SOAS, CCI, 1983.
3. "Chinese Collectivisation: Some Comparison with the USSR",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1976.
4. "De-Collectivisation of Agriculture in China, 1979-1983: a long-term Perspectiv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Aug. 8th and 13th, 1984, Reprinted in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4.

Patrikeeff, Felix (1952-)

1. "Prosperity and Collapse: Banking and the Manchurian Economy in the 1920s and 1930s", in F. N. H. King (ed), *Eastern Banking*, London: Athlone Press, 1983.
2. "Russian and Soviet Economic Penetration of North China, 1895-1933", in J. W. Strong (ed), *Essays on Stalin and the Stalin Era*, 1987.
3. "Stalin, Mao and the Friedrich/Brzezinski Totalitarian Model", *Samizdat*, Oxford University, 1979.

Pollard, David E. (1937-)

1. *A Chinese Look at Literature: the Literary Values of Chou Tso-jen in Relation to the Tradition*, London: C. Hurst, 1973.
2. (with P. C. T'ung) *Colloquial Chinese*, 1982.

Schoenhals, Michael (1953-)

1. *China's Food Industry*, Stockholm, 1981 (in Swedish).
2. *China's Light Industry*, Stockholm, 1982 (in Swedish).
3. *Chinese City Planning*, Stockholm, 1983 (in Swedish).

Segal, Gerald (1953-)

1. *Defending China*, OUP, 1985.
2. *China and the Arms Trade*, Croom Helm, 1985.
3. *The China Factor*, Groom Helm, 1982.
4. *Chinese Defence Policy*, Macmillan, 1984.

Sklair, Leslie (1940-)

1. "The formation of the Rural People's Communes in China",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April 1979.

2. "Shanghai: A Chinese Development Zone in Global Perspectiv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ct. 1985.

Sprenkel, Sybille van der (1919-)

1. *Legal Institutions in Manchu China*, London, 1962, revised, 1977.
2. (Some article (s)) in J. Gray, *China's Search for a Political form*.
3. (Some article(s)) in G. W. Skinner (ed), *The City in Imperial China*.
4. (Some article(s)) in W. Schluchter (ed), *Max Weber's Studie Uber Konfuzianismus V. Taoismus*, Frankfurt: Suhrkamp, 1983.

Steeds, David (1935-)

1. (With Ian Nish) *China, Japan and 19th Century Britain*, 1977.

Sullivan, Michael (1916-)

1. *Chinese Art in the XXth Century*, 1959.
2. *The Arts of China*, 3rd. rev. ed, 1984.

Thompson, Stuart E. (1955-)

1. "Taiwan: Rural Society", *China Quarterly*, 99, Sept. 1984.
2. "Chinese Death, Food and Fertility" (forthcoming).

Whyte, Rev. R. E. (1944-)

1. (ed) *Relig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ince 1979*.

Wood, Frances (1948-)

1. *Through the Year (1976) in China*, London: Batsford Academic and Educational, 1981.
2. *Chinese Language Collections in the British Library*, British Library, 1984.
3. *Chinese Illustration*, British Library, 1985.

Wright, Elizabeth (1946-)

1. "Foreign Relations", in Christopher Howe (ed), *Source book on China*, SOAS, 1978.

Yohuda, Michael B. (1940-)

1. *China's Role in World Affairs*, London: Croom Helm, 1978.
2. *Towards the End of Isolationism: China's Foreign Policy after Mao*, Macmillan, 1983.

備註：

1. 本目錄依作者姓氏英文字母順序排列。
2. 本目錄依作者所回覆之問卷內容編輯而成，格式雖儘可能統一，但繁簡不一，過份簡化者，將來擬予補齊。
3. 作者姓名之後附上出生年，聊備參考。
4. 本目錄約介紹四十人，無法包括所有研究近代中國的英國漢學家。
5. 這些人並非均專門研究近現代的中國。
6. 限於資料以及調查時間，錯誤在所難免，歡迎讀者指正。

「中國近世幼兒史」研究

熊秉真

一、研究目的及一般說明

中國近世幼兒史（一六〇〇～一八三〇）研究計畫，意在運用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初期有關幼兒成長過程之資料（如當時少小科醫書、家庭保健資料、家範、家訓與啟蒙用圖書），對中國近代早期中國幼年兒童（0～7歲）的衛生康健情況（包括生理衛生與精神健康）與其社會化過程之型態（包括家庭教育與社會教育雙方面之考察），作一綜合性的分析研究。

一個社會教養及對待其幼兒的狀況，常為該文化中之價值觀、行為法則及社會經濟現實環境最忠實而直接之反映。因而幼兒史之研究，嘗被視為整個文化對自身觀念與行為規範之系統性反省，亦可為社會心理發展過程之一自剖。近代歐美社會史關於幼兒成長過程之多方研究，將西方幼兒在不同時間，各個地區及多類社會階層中的身心雙方面的歷程，展現於世人之前，不但提供當代社會科學家與自然科學家以豐富的素材，以為其進一步構思理論及發展臨床工作之參考。而且，就歷史學本身而言，亦使一般性的政治史及經濟史、思想史上的若干問題，得以作社會面與心理面的考慮，而加強其深入分析與解釋的潛能。因得此類研究成果之助，使近二十年來史學對某一政治事件（如法國革命、美國獨立等）及其集體經濟行為模式等，得有嶄新之收穫，此為近代史學界之盛事，亦為有目共睹之事實，近來中外史學家，因而意識到，任何一個社會中個人的價值觀或其集體之性格傾向，對該社會長期的政治發展與經濟成長型態，實有密不可分之關係，而社會幼兒之成長歷程，適為探討此類價值觀、習慣行為與物質環境之一具體指數。

念及於此，本計畫擬集合中國近世有關幼兒之相關資料，輔以近代社會學、心理學及醫學上重要的相關知識，對當時幼兒（出世～七歲）的健康（包括生理衛生與心理健康狀況）及其社會化過程（考慮社會教育與家庭教育之功能），作一綜合的歷史研究，其目的在使中國近世社會史的研究，能脫離印象式或描述性的層次，而走向較廣泛的考察，較精細的認識，與專業化

的分析。

此研究之目的，在使中國近代社會史的知識，在資料上能不受筆記小說材料的限制，在觀點上能脫離印象式或描述式的層次，而走向較廣泛的考察、精密的認識與專業化的分析。中國近世幼兒史研究之重要性，至少可從四方面來說明：

1. 爲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開一嶄新之領域：截至目前，中國近代社會史之研究，以不同的社會羣 (social group)、社會階層 (class)、職業羣 (occupational group) 爲對象，或以特殊的社會活動 (social activities, 如廟會、市集、民俗活動等) 與社會現象 (social phenomena, 如城市暴力、鄉間結社等) 爲關心之焦點，尙少有以年齡羣 (age group) 以界定問題之標準，而作深入之研討者。本計畫既以十七至十九世紀期間，七歲以前幼年兒童的健康與社會化發展狀況爲研究，此計畫之順利執行，可視爲對中國近世某一特定年齡羣的身心情況的深入探討，其結果亦可使學界對現代以前中國社會結構與社會狀態，多一專精的分析。

2. 更深入探討近世中國社會與文化：任何一個社會，其對幼兒照養與教化的情況，常爲該社會文化價值觀，行爲法則與現實環境之最忠實反映，故中國近世幼兒史的研究，可助大家對傳統中國倫常觀念、行爲規範及當時各區域、各階層家庭實況的進一步瞭解。

3. 認識傳統文化，常可爲現今發展之參考：專門史如健康史 (history of health) 或社會化發展模式 (models of socialization) 等，尤可提供當今社會學家、心理學家及醫學與公衛學者以一豐富的資源，作爲彼等發展理論及解決問題時的參考方案。

4. 科技整合之一新例：中國近世幼兒史之研究，既決定採比較健康史學社會化模式之方法進行，此研究計畫之實現，勢必帶動高度之科技整合，不論社會科學 (如社會學、人口學、心理學) 與人文科學 (歷史學) 得藉此特殊問題之檢討而互相交流，甚至自然科學 (如小兒科醫學、公共衛生、護理等) 亦得與人文社會學科交換訊息與心得，此研究之成果，當更可提供醫學學者與社會心理學者以中國近世幼兒健康與心理狀況之個案實情，爲其研究與教學之具體資料。

尤有甚者，此研究實有極大之發展潛力，得到初步成果後，即可擴張而從事其他相關研究，如同一時期的其他年齡羣 (青少年、成年人、老年人) 之健康與教化狀況調查，或作近代中西接觸頻繁以後，十九、二十世紀中國幼

兒史之研究，均可期待豐碩成果，可為中國近代史拓展出大片新鮮的園地。

二、研究方法

除一般社會史之研究分析方法外，本計畫擬特別考慮從比較健康史（comparative history of health）及幼兒社會化型態（early socialization of young children）之角度，以顯現此研究題材之特殊本質與價值所在。

本研究固為整體中國近代社會史之一面，然在近世之時代範疇內，拘於當時中國社會觀念之限，專門記錄幼兒生活情態之資料並不多得，因而如今學者若要解決一些重要的幼兒史上的問題，如幼兒成長之衛生狀況及精神健康等現象時，必須倚重近代社會及自然科學之相關理論及知識，如社會化理論、幼兒一般成長階段及其生理與心理之狀態等等，方能對中國近世此方面之直接與間接史料，作恰當之運用，且能明白該類資料所呈現之意義所在。

同時，有些與幼兒史相關之問題，如幼兒死亡率、營養狀態、男童女童社會化型態之差異等等，或者由於中國近世之資料殘缺不全，或者因為中國社會文化之特殊背景，必須採用比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的方法，才能使我們所獲得的有關中國近世幼兒知識，免流於過度零碎或難解之孤證。因為近代西歐、美國、北歐及東歐近世幼兒史與家庭史的研究，已頗有成就，其結果正足於與中國此時期類似問題之對照，以補若干中國方面資料之缺憾，亦足以襯托出中國幼兒史之突出特質。

三、預期成果

一般學者對中國近世幼兒史之研究計畫，目前之可行性大致有三方面之質疑：

第一是印象中不知以何類史料來解決此等問題，或者竟懷疑中國近世之原始史料恐根本無法支持如此之研究，而達到近代歐美幼兒史之輝煌成果。此等態度，細究之下即知不然。因為初步的資料調查，已知中國近世少小科醫書及家庭日用醫療手冊等，流傳至今日者仍頗有可觀，再輔以當今歷史人口學者及歷史人類學方面對人口結構，飲食習慣以營養狀態已有之認識，已足以對近世中國幼兒之健康狀態，作相當之瞭解與分析。而傳統中國重視家族倫理與教育之觀念，更使此時期各種家訓、啟蒙用書，及家範典中，內容

豐富，適當運用之後，必能得到相當突出之收穫。

第二方面可能影響近代幼兒史研究之順利進行者，為當今本地各圖書館，並無此類典範資料之專門收藏，而有些明清社會史之資料，又散藏世界各國之圖書館，惟恐一時不易取得，而使此研究因資料之單薄，遂流於浮泛。不過，幸因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已於第二個五年計畫中，釐訂中國近代社會史之研究為其未來發展重點之一，因此方向之擇定，決非倉促舉事，實由於年長之研究人員早已意識到社會史研究之重要。緣此，近代史圖書館近幾年來，乃先朝充實此方面圖書設備之途上求進，其所購置一般性社會史圖書資料及期刊，已足以輔成本計畫之研究工作。今得國科會部分特別購書經費之助，及時買入某些專門之史料及比較用書，必能使此研究成果更為豐碩可期。

第三方面之困難，即推中國近世幼兒史方面已有之中外作品，幾乎完全付之闕如，在無重要二手研究成果的情況下，或有學者覺得首作此項嘗試，必因獨學無友，而艱辛倍增，甚至短期內走不出一條學術途徑。此方面之困難，一則可以歐美學者對西方近世幼兒史之研究成果，作為彌補，並以比較研究之方法，實獲其益，二則一位專業之研究人員，若有機會從事若干拓荒式的研究工作，其挑戰性適足以鍛鍊其能力，其成果亦可貢獻於同道，確饒富趣味，意義深遠之一嘗試。

本研究已得國科會之支持，並獲助理馮彩雲小姐之積極協助，在此學年度內加緊進行中（75.9—76.8）預計在一年之後，撰寫「中國近世幼兒史研究」初稿一部，其中有關幼兒健康史及社化過程之討論，各占其半。此研究成果，將可提供史學界首度對中國幼兒史之深入認識，並可為社會心理學家及健康史家，醫學基礎研究學者之重要參考，或可有助於其理論之推敲，及公衛與醫療研究之具體比較對象。

近代人物年譜四種

- | | | |
|----------------|---------|---------|
| ①王家儉著：魏源年譜 | 精 90 元 | 平 75 元 |
| ②郭廷以編：郭嵩燾先生年譜 | 精 360 元 | 平 300 元 |
| ③陶英惠著：蔡元培年譜（上） | 精 200 元 | 平 180 元 |
| ④陸寶千著：劉蓉年譜 | 精 180 元 | 平 160 元 |

※中研院近代史所出版，函購七折。

Research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in West Europe (II): France

Ursula Richter

I. Preliminary Remarks

1. Chronology

While compiling the material for this survey, I was confronted with some chronological confusion as to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In the view of different researcher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the term seems to describe quite dissimilar spaces of time. Apparently, younger scholars often feel that “Modern China” did not emerge until the *Hsin-hai* Revolution of 1911 and continues into the present, the 1949 communist takeover notwithstanding; on the other hand, recent bibliographies list works on 17th to early 20th-century China under “History of ancient and classical China”¹; a periodical explicitly calling itself *Modern China* contains articles on post-1949 Mainland China²; in accordance with European chronological classifications, a well-known French scholar subsumes China of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under “contemporary China”³; yet other scholars, particularly those investigating Chinese history of ideas, tend to regard Ming-Ch’ing-early Republican China as belonging to a coherent historical

1) cf. *bulletin d’association francaise d’études chinoises* 3 (April 1982), p. 56, and *ibid.*, 3(1984), p. 142.

2) e.g. an article by K.E. Brogsgaard on economic changes in Communist China between 1953 and 1981, in: *Modern China* 9, 1 (Jan. 1983), pp. 37-83.

3) cf. Marianne Bastid, “A Survey of Recent Trends in French Studies o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State of the Field” in: *Pacific Affairs*, 53, 4 (Winter 1980-1981), translated by René Goldman, pp. 698-707.

period⁴. However, certain rather conservative West European scholars employ a more rigidly specified chronology (sharing this predilection, if any, with their Soviet colleagues) according to which Ming and early Ch'ing China pertain to "pre-modern" history, late Ch'ing (1840-1911) and the Republic until 1949 to "modern" history, and post-1949 China to ("recent" and) "contemporary" history.

2. Scope

Since I subscribe to the latter chronological terminology, only such data as concern pre-1949 modern Chinese history were selected while a few exceptions were made in favour of materials exceeding the period up into pre-modern or down into contemporary times. This decision may not do full justice to various scholars in the field who work on a broader historical scope (in fact, current European research on 20th century China focuses on contemporary history) but is determined by limits of time and space. For the same reason, a number of eminent sinologues had to be banned from these pages as materials on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were excluded—again with a few exceptions when socio-political aspects are discussed.

Any further omissions are unintentional, and I apologize for having passed over in silence any important data, as may well be the case.

II. Introduction: The General State of the Field

Although France was ahead of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in establishing sinology as a valid academic discipline, setting up the first professorial chair as early as 1814, research remained dominated by classical philology for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Among those European sinologues who began to introduce modern historiographical, sociological etc. methodology to the field were not a few Frenchmen

4) cf. Michael Gasster's review of Eto Shinikichi and Harold Z. Schiffrin (eds.), *The 1911 Revolution in China: Interpretative Essays*, in: *The American Asian Review*, IV, 1 (Spring 1986), p. 96.

(cf. part I of this survey), but it was not until after World War II that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a was placed in the forefront of scholarly concern by a growing number of French researchers, as indeed by their colleagues elsewhere in Europe. At the same time, the number of popular and semi-popular publications on contemporary China, fostered by a new wave of fashionable leftism, also rose spectacularly. Although the bulk of these printed matters was of a journalistic rather than scholarly nature, it helped to rouse interest in the "reality" of China, "an interest which has been reflected in the more specialized, scholarly research. Thus... the bulk of research over the past... years has been on post-1949 China. This particular area of inquiry has benefited more than any other from increased material allocations and special credits."⁵ However, recent publications as well as dissertations prove that in spite of a certain bias in favou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noteworthy research is also carried ou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If Ms Bastid, in her 1980 article, still modestly concedes that "financial and organizational efforts have been all too recent, and French capacity for 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China remains on the whole weak and spread unequally among the disciplines", hampered by "the small number of research tools produced in France"⁶, this situation appears to have improved during the six years that have passed since.

This survey cannot detail each and every French research precept, scholar, department or institution engaging in Chinese studies (although some enjoy high academic prestige). As mentioned before, both classical sinology and linguistic and literary studies—in which French scholars excel—have to be passed over. The new interest in present-day China also brought about an increase of Chinese (or Cantonese) language courses, not only at the universities, but even at normal colleges, vocational schools and senior highschools, and de-

5) cf. M. Bastid, *op. cit.*, p. 699.

6) *ibid.*

partments or individual scholars dealing with one or another aspect of China can now be found in all sorts of institutions all over France, including libraries, museums, publishing companies etc. etc.

III. Major Research Institutions

1. Collège de France and CNRS

The Chair of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China, held by Jacques Gernet, recently offered, among other activities, a course on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China" based on Chinese source materials of the 11th through 18th centuries, and a seminar o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writings by Ku Yen-wu. As visiting professors were invited G. Bertuccioli (Italy) and E. Zürcher (Holland) who gave conferences on Sino-Italian relations and early Christian communities in China in the late Ming period. J. Gernet published an essay on late Ming society (cf. bibliography). An interdisciplinary project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Japan and Korea, involving about 20 scholars, was launched in 1984, to be sponsored by the National Centre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CNRS.

Apart from the Ministry of Universities, the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CNRS) is one of the main public institutions to grant financial assistance in academic activities. It also operates its own research teams and publishes occasional papers of these (e. g. the Group for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history, cf. M. Bastid's paper in part 3 of the bibliography below).

2. IHEC

Linked to the Asian Institute of the Collège de France is the *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Institute of Advanced Chinese Studies, IHEC) whose director is Donald Holzman. A series of monographs, *Bibliothèque de l'IHEC*, has been 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since the 1930s and is mainly devoted to classical research, very occasionally including pre-modern materials. A new series, *Mémoires de l'IHEC*, was started in 1975 and contains mostly dissertations.

The *Mémoires* reflect the wide range of research done at the Institute, including pre-modern and modern Chinese studies, e. g. on the 17th century mathematician Mei Wen-ting, on the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or on the reform of Chinese characters as well as indices such as a three-volume index of Chinese narrative vernacular literature (cf. bibliography).

Some of these materials were prepared by the Research Group for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Etudes littéraires et historiques chinoises*) of IHEC which is attached to CNRS and whose staff include D. Holzman (responsible director), M. Cartier, H.-h. Chan, J. Dars, M. Hemery, Y. Hervouet, A. Lévy, R. Mathieu, M. Orange, L. Vandermeersch and P. E. Will. The late Professor Robert Ruhlmann (d. 1984) was also affiliated.

3. Ecole Pratique and EHESS

In 1949, the *Centre Franco-Chinois* in Peking was closed (cf. part I of this survey), and in 1953 all of its French researchers had returned to Paris. Subsequently, high-level courses o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a were instituted at the *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 (Institute for advanced research) in Paris. Being a non-degree granting graduate-level university without formal curriculum, the *Ecole Pratique* offers lectures and seminars to students of the regular universities of Paris as well as to unattached scholars. It is divided into sections.

In 1970, Jacques Guillermaz set up a number of research teams at the VIth section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grouped according to topics such as domestic politics, economy, foreign policy and culture, focusing o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75, section VI was detached from the *Ecole Pratique* and became the independent *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Advanced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sciences, EHESS) to which was attached what is now the Contemporary China Research and Documentation Centre (*Centre de Recherches et de Documentation sur la Chine*

Contemporaine, in short *Centre Chine* or “China Centre”) of EHESS. In 1976, the Centre was attached to CNRS. Current directors of the “China Centre” are Pierre-Etienne Will and Yves Chevrier⁷, while young researchers Jaqueline Nivard, Hua Chang-ming and others act as its librarians (cf. list of theses below). Annual conferences are being held at the “China Centre” on political, socio-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s in contemporary China, seen in historical and/or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The Centre is essentially a library. Research is done by users of that library who are sometimes affiliated with other institutions. Since these are scattered all over Paris, while some are even situated in other cities, the Centre plays the role of a meeting place as well.

Appointed research preceptors of EHESS include the following scholars:⁸ Marie-Claire Bergèr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a); Lucien Bianco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⁹; Michel Cartier (economic anthropology of China); Donald Holzman (institutions of imperial China); Pierre-Etienne Will (socio-economic history of pre-modern China).

Another research group of EHESS is the *Equipe de Recherche Interdisciplinaire sur la Chine contemporain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group for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a) attached to CNRS. It includes L. Bianco (responsible), P. Bady, M. Bastid-Bruguière, M. C. Bergère, Y. Chevrier, N. Dulioust, C. Gipoulon, Hua C.-m., J. Nivard, and A. Roux. This group works in close connection with the “China Centre”.

Also attached to the CNRS is the *Centre de Recherches Linguistiques sur l'Asie Orientale* (Research centre for East Asian Linguis-

7) Until 1985: Lucien Bianco (director), Marie-Claire Bergère (vice-director), P.-E. Will (secretary).

8) The French academic functions, ranks or titles of most of the persons mentioned in this text were omitted (having, as a rule, no exact equivalent in the Anglo-American academe).

9) Mr. Bianco is known to this institute also as 畢昂高cf. his article 法國對近代及現代中國之研究概況簡介, in: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no. 11 (June 1982), pp. 439-444.

tics) of EHESS with A. Peyraube (until 1985: A. Rygaloff) as responsible research director. Though the Centre's main concern is, of course, linguistics, some of its activities may be of interest here: 1. a research project launched in 1984 under A. Lucas on language policies of communist China, Singapore, Hong Kong and Taiwan; 2. a conference held in April/May 1984 by M. Dandolo on the codes of law of imperial, republican and communist China; 3. the publication of a work on modern Chinese mathematical terms by F. Hominal (cf. bibliography); 4. a project for a modern Chinese-French dictionary with *Han-yü p'in-yin* transliteration, carried out by four native speakers of French and three Chinese.

Apart from numerous other publications by members of these groups and a journal on linguistics founded by scholars of the Linguistics Centre, mention must be made of the ambitious project of Mohamed Ziane of the Interdisciplinary Group, who started a semi-popular quarterly *Paris-Pékin* in 1979. However, in these days of academic dearth when even time-honoured scholarly periodicals cease to appear, this attempt was bound to fail, and after only three issues the journal had to stop.

As for other sections of the *Ecole Pratique*, individual scholars occasionally carry out research on various aspects of modern China, e.g. Michel Soymié (at section IV, history and philosophy), Kristofer Schipper and Léon Vandermeersch (at section V, religious studies).

4. INALCO

Formerly known as the *Ecole Nation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 (National College for modern Oriental languages), the *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 (National Institute for Oriental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INALCO) was part of the University of Paris III but is now independent. While its Department for Chinese Language and Civilization caters mainly to students, its Chinese Studies Centre is research-oriented and provides another French centre for modern Chinese history. Its long-time director

was Hsiung Ping-ming. Scholars such as M.-C. Bergère, who is head of the Centre, Ch. Henriot and the late R. Ruhlmann (among many others) have carried out projects or held conferences on the following major topics: 1.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as presented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2.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a colloquium yielding 31 papers, including contributions by Mainland Chinese, US and Canadian authors); 3.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in the 20th century (responsible: M.-C. Bergère). In 1985, the Centre was reorganized, and research was grouped into the following main topics: 1. History of Shanghai; 2.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rt and philosophy of China; 3. Geography of China; 4. Chin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ançois Godement is responsible for the publications of the Centre, which appear in the collection *POF Publications Orientalistes de France*; this series includes a collection of Chinese texts, selected by M.-C. Bergère and published bi-lingually (Chinese-French), supplemented (as a rule) by an interpretative essay. These texts concern 20th century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are mainly prepared as study aids. Between 1977 and 1979, four titles appeared. The collection is called *La China par les textes*; and *Cahiers d'études chinoises* (Papers on Chinese studies), no. 1 of which appeared in 1980 under the general topic, "Press and society" and had 302 pages (cf. contributions by Castellino, Dulioust and Henriot in the bibliography), while later ones deal with economics and cultural influences (cf. Roy and Tchen in the bibliography).

5. CERI

The *Centre d'Etudes et de Recherches Internationales*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CERI), headed by Jean-Luc Domenach, is attached to the National Foundation for Political Science. Its "Section for China and the Far East" include J.-P. Bèjà, C. Cadart (responsible), Cheng Y.-h., J.-L. Domenach and Hu C.-h. They specialize, as the name suggests, on the political life of China.

Research projects may be grouped into three major topics: 1. Chinese communism between 1920 and 1949; 2. Domestic political development after 1949; 3.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fter 1949.

In 1980, a collective research programme elaborated by C. Cadart was accepted, concerning regional aspects of China'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political history.

6. The *Institut National de Recherches Agronomique* (National Research centre for agriculture) in Paris with researchers such as Claude Aubert has carried out surveys on rural development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a.

7. Comparative Law

Modern Chinese political, administrative and legal institutions have been under investigation by the late Tsien che-Thao, F.-P. Cabestan et al. at the *Service de Recherches Juridique Comparative* (Research Services for comparative law) at Ivry, an institution attached to CNRS.

IV. Universities

1. Universities of Paris

One of the oldest European universities, Paris originates in medieval religious colleges (of which "la Sorbonne" had been only one and was founded c. 1170.) Throughout the centuries, Paris University dominated French academic life, such as Oxford and Cambridge did in England. Although new universities were established in many French towns, Paris still holds a predominant position. In 1970, owing to increased enrollment, the needs of modern speci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s, the University of Paris was re-organized into thirteen faculties most of which are still situated in Paris ("*la Sorbonne nouvelle*"). Chinese language classes and other China-related lectures are taught at various faculties, but it is at Paris III, VII and VIII that the bulk of future researchers on modern China are

educated.

Paris III: The Department for Chinese Language and Civilization is headed by Hsiung Ping-ming, while P. Trolliet is responsible. In Spring 1985, 1700 regula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and about 150 "free auditors" were enrolled.

In 1982, the teaching staff for modern Standard Chinese ("Mandarin") was enlarged and a Chinese conversation class set up. Audiovisual teaching aids are utilized. Occasionally, students form a Chinese drama group (in the Winter of 1984/85 they played sequences of Ts'ao Yü's *Sunrise*) and record their performances on video (in fact, training classe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audiovisual media are integrated in the regular undergraduate courses). In order to prepare students not only academically, but for future professional life as well, two new classes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vocabulary" and "commercial and economic vocabulary" were recently arranged, both taught by Chinese native speakers.

Exchange agreements have been signed with Nanking and Peking Universities and the Foreign Languages Institutes of Peking and Shanghai (mainly for language instructors).

The teaching staff of Paris III includes professors Bergère and Hsiung Ping-ming; six major assistants; assistants Godement et al.; seven assistant-masters; and eleven lecturers including M. Cartier, Y. Chevrier, J.-L. Domenach, D. Eliseef and J. Pasqualini.

Paris VII: The Department for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is headed by Y. Hervouet (until 1980: L. Vandermeersch who then changed to the *Ecole Pratique*). This Department may be seen as the French centre for the education of young sinologists. Emphasis lies on classical studies, and literature, but modern China is also dealt with. Well-funded by the Ministry of Universities, the Department encourages junior researchers to carry out field studies in China.

Paris VIII: The Department for Slavonic and Oriental Studies

at Vincennes Saint-Denis contains (among others) the following staff: Professor M. Loi, Assistant-Masters Alain Roux (responsible), Chantal Chen and Catherine Gipoulon, and François Jullien, a specialist on classical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Recently, Professor Hsiung of Paris III held audiovisual Chinese language courses. The general educational guideline demands a balance between Chinese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general knowledge of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Emphasis is put o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a. During the first three years, language training is intensive (eight hours per week).

Research activities include studies o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evaluatio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hanghai in the 1930s (C. Gipoulon, A. Roux, G. Ko); Chinese poetics from the T'ang to the 20th century.

A co-operation agreement was reached with the Language Institute of Hsi-an University. In May 1979, the writer Pa Chin held a conference about his novel, *Chia*. The scholars Liu Kui-sheng of Ch'inghua University (Peking) and Li Hsin,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of th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eking) gave a conference on Li Ta-chao in March 1981.

In 1982, the Department launched a journal dedicated to comparative studies, *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 which until now has published eight issues, each with a central theme.

Alain Roux carried out a research project on the labour movement in Shanghai in the 1920s.

2. Regional universities

Aix-Marseille I (Université de Provenc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Both the educational programmes and research projects at this Department focus around "pedagogic strategies" of language teaching (including audiovisual methods) and the compilation of special scientific vocabularies.

The course, "Foreign literature and civilizations", offers thorough

training in both classical and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and civilization. Among others, Catherine Gipoulon teaches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nother course,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offers classes in modern Chinese, but these form only a third of the programme, while the remainder is taken up by another foreign language (one third) and optional classes taught in French on typewriting, tourism, political science, law and economics. More than a hundred students are enrolled in these two programmes.

Bordeaux III, Languages Department, Chinese Section: Professor André Lévy et al. This institution had to strive quite hard to survive certain curtailing policies (such as the granting of funds) typical for many universities all over Europe during the past ten years or so. It is struggling, like most of the other French regional centres for Chinese studies, in an attempt to hold its own against the "monopoly" of Paris universities. In spite of this, student enrollment seems to increase, possibly because Bordeaux offers fairly flexible programmes including (nearly mandatory) Japanese classes in order to use sinological source material from Japan, and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spend some time in China, for which purpose exchange arrangements have been made with Peking University.

Lyon III, Université Jean-Moulin: Head of the Department for Chinese and Vietnamese Studies is Christian Henriot. The Department belongs to the "Far Eastern Section" of the Languages Faculty. Emphasis is put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 and contacts with Mainland China. The Section has inherited the library of the "French-Chinese University Association". Another staff member is Léon Thomas.

Nice: University of Nice; among others, Nora Wang is a staff member. In 1977, the Department started a Journal, *Approches-Asie* dedicated to East Asian Studies, which has published eight issues until now.

V. The French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Association Française d'études chinoises* was founded in April 1980 with the objective to maintain and develop 1. research in the field and contact between scholars; 2. a dialogue between the various university institutions of the country, particularly concerning docmenutations, publications and translations; and 3. contacts between French and foreign institutions interested in co-operation.

The Council of the AFEC consists of C. Aubert, M. Bastid, M. Bonnin, M. Cartier (President), C. Chen (Secretary), Y. Chevr-ier, J.-P. Drège, N. Dutrait, M.-J. Lalitte (Secretary), A. Lucas (Treasurer), R. Mathieu, Th. Pairault, P.-E- Will (Vice-president).

The AFEC publishes a journal, previously *bulletin de l'association française d'études chinoises*, as of 1983 *Etudes Chinoises*, whose first issue appeared in March, 1981. It was scheduled to appear biannually but has so far had no more than seven issues. Its main sections are: 1. Association news; 2. Information about Chinese studies in France, including short up-to-date portraits of all institutions dealing, in one way or other, with China, past or present; 3. Classified Bibliographies of recent French publications in the field; 4. Articles. Started as a slim Association newsletter, the periodical has gained both in size and quality and is now well on its way to becoming a scholarly journal.

VI. Concluding Remarks

Apart from the periodicals of individual institutions some of which were mentioned above, articles on modern China do occasionally appear in the French learned journals of general character, e. g. *La Revue Historique*, *Les Annales ESC*¹⁰, *Le mouvement social*, *Tiers-Monde* etc.

In general, an intensification of research on modern and particularly on contemporary China can be observed. However, "the 19th

10) ESC="Economies, Societies, Civilizations".

century remains relatively unexplored, particularly in contrast to the period betwee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the Japanese invasion, which has constituted the starting point for French research on modern China. Moreover, matched against the orientalist tradition with its awareness of historical continuity, sensitivity to the specificity of civilizations and demand for a high level of linguistic competence,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though undoubtedly improving in quality, still do not give the cultural dimension the kind of attention it receives in works dealing with ancient China.

In general, one does not find in France a sufficient degree of familiarity with Chinese erudition or a very intimate knowledge of life in Chinese society. Indeed, for various historical reasons, compared to England and the U.S., there are very few scholars of Chinese origin engaged in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a in France—few of them have been drawn into French universities. The majority of Frenchborn specialists have received their basic training in the more general disciplines—history, economics or political science—and then complemented the latter with varying degrees of linguistic apprenticeship. One finds, therefore, in the work dealing with the post-1911 period a tendency for students to rest content with Western sources, preferably in English, as if that language certified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information; a few documents in Chinese are then cited for form. Finally, whereas the re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in 1964 should have conferred upon French scholars certain advantages, research in China itself has in actuality been rather rare; meanwhile, opportunities for research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have been left unexploited for a variety of reasons.

No wonder that certain disciplines which most require fieldwork—such as anthropology and sociology—are not represented at all in French scholarship on modern China, while others, like geography, have only produced works of synthesis. Ethnological studies make only rare appearances in the literature.

Rerearch has been conducted under conditions that are peculiar to a country of confining dimensions. Thus, the small size of the French specialized public has until now discouraged any efforts to launch in France a learned journal devoted to contemporary China. It has made it very difficult, if not impossible, to finance such publications and has obliged authors to combine vulgarization with original research. It may surprise the reader to learn that, unlike the situation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the French government has made no determined effort to promote 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China. This is due in part to the complex sentiments that have always characteri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power and the universities in France.

There are nevertheless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two elements likely to provide a new impetus to French studies on contemporary China. First is the fact that the recent proliferation of contacts between France and China has created more public demand for better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on the Middle Kingdom. The other stimulus comes from a closer cooperation between French specialists and those of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and the European Science Foundation have sponsored two projects which may foster such contacts: the compilation of an analytical dictionary of works of twentieth-century literature, and a research project on the conceptions and the reality of the state in China. These projects have brought together specialists, not only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Europe, but also from the fields of classical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¹¹

However, the bleak picture Ms Bastid delineated six years ago has meanwhile brightened at least in that there is now in France a group of younger scholars at work who read and use Chinese sources and who endeavour, in spite of the prevailing financial encumbrances, to put out well-researched and-documented publication, although, it is true, with

11) M. Bastid, *op. cit.*, pp. 705-707.

an emphasis on contemporary (Mainland) China.

VII. Bibliography

This list is divided into three subgroups, namely I. Bibliographical materials; II. Monographs and articles, classified as follows: 1.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tics, ideology, law; 2. Society, regional studies, religion; 3. Economics; 4. Intellectual history,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III. Theses (unclassified).

The emphasis lies on recent publications but a few exceptions were made with earlier materials as a point of information.

I. Bibliographical materials

Barman, Geneviève, and Nicole Dulioust (comp.), *Etudiants-ouvriers chinois en France, 1920-1940* (Chinese student-workers in France, 1920-1940), a catalogue of the archives kept at the "China Centre" of EHESS. Paris, May 1981.

Béjà, Jean-Philippe, "Histoire contemporaine et science politique" (Contemporary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s), a list of recent publications, in: *Etudes Chinoises*, IV, 1 (Spring 1982), pp. 149-150. id., "Histoire contemporaine et science politique" (cf. above), in: *ibid.*, 3 (1984), pp. 137-139.

Cartier, Michel, *Inventaire des périodiques chinois dans les bibliothèques françaises* (Inventory of Chinese periodicals in French libraries), Paris: Editions de l'EHESS/Collège de France, IHEC, 1984, 278 pp.

Dulioust, Nicole, cf. G. Barman.

Hervouet, Yves, cf. M.-J. Lalitte.

Lalitte, Marie-José, and Y. Hervouet, "Littérature chinoise modern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 list of recent publications, in: *bulletin de l'association française d'études chinoises*, 3(April 1982), pp. 52-55.

Lévy, André, *Inventaire analytique et critique du conte chinois en*

langue vulgaire (Analytical and critical Inventory of Chinese vernacular stories), *Mémoires de l'IHEC*, VIII, vols. 1, 2, 3: part 1: Paris 1978, 336 pp.; part 2: Paris 1979, 464 pp; part 3: Paris 1981, 516 pp.

Mathieu, Rémi, "Histoire de la Chine ancienne et classique" (Chinese ancient and classical history), a list of recent publications, in: *bulletin de l'association française d'études chinoises*, 3 (April 1982), p. 56.

This list includes some materials on pre-modern and modern China.

Nivard, Jacqueline, "Histoire et politique de la Chine modern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modern China), a list of recent publications in: *bulletin de l'association française d'études chinoises*, 1 (1981), pp. 42-50.

id., "Publications in France, 1983-1984", in: *Republican China*, X, 3 (Special Issue, June 1985), pp. 68-70.

id., "Publications in France", in: *ibid.*, XI, 2 (April 1986), pp. 43-45.

Vienet, René, (project) An exhaustive catalogue of (worldwide) iconographic and cinematographic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20th-century China.

For this information, cf. *Modern China Studies Bulletin*, 15, p. 36.¹²

II. Monographs and articles

1.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tics, ideology, law

Aubert, Claude, Cheng Ying, Leung Kiche, "Entraide spontanée, entraide provoquée en Chine rurale: l'intervention communiste (1943-1944)" (Spontaneous and instigated mutual aid in rural China: The communist intervention, 1943-1944), in: *Annales ESC*, 3 (May-June

12) *Modern China Studies Bulletin*, "An annual Bulletin of current post-graduate research, new research materials, conferences, and staff movements." Published by the Contemporary China Institute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Unfortunately, this useful Bulletin ceased publication in 1981.

- 1982), pp. 407-434.
- Bastid, Marianne, "Histoire de la fin de la dynastie des Qing et de la révolution de 1911" (History of the late Ch'ing Dynasty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in: *Missions en Chine 1980-1981*, Paris: EHESS, pp. 12-28.
- id., "La question de l'idéologie chinoise contemporaine" (The problem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ideology), in: G. Duprat (ed.), *Analyse de l'idéologie*, Paris: Galilée (1983), pp. 417-421.
- id., "La prison des lettres: censure et inquisition sous la dynastie de Qing" (The prison of literature: censorship and inquisition under the Ch'ing Dynasty), in: *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 4 (1984), pp. 71-80.
- Bergère, Marie-Claire, and Tchang Fou-jouei, "Sauvons la patrie! Le nationalisme chinois et le mouvement du 4 mai 1919" (Save the fatherland!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the May 4th Movement), Paris: *Publications orientalistes de France*, 1978, 186pp.
- Bianco, Lucien, "Rappel historique et perspectives du conflit sino-soviétique" (Historical outlines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of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in *Défense nationale* (November 1979), pp. 7-16.
- Broué, P. (ed.), *La question chinoise dans l'Internationale Communiste (1926-1927)* (The China question in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26-1927), Paris: EDI, 1965.
- Cadart, Claude, cf. Peng Shuzhi.
- Cheng Ying, cf. C. Aubert
- Cheng Yingxiang, cf. Peng Shuzhi.
- Chesneaux, Jean (ed.), *Popular Movement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 1840-195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 id., and F. Le Barbier, *La marche de la révolution, 1921-1949* (The course of the revolution, 1921-1949), Paris: Hatier, 1975, 224 pp.
- Chevrier, Yves, *La Chine moderne* (Modern China),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Que sais-je?"), 1983, 127 pp.

- id., "Le modèle russe dans la révolution chinoise" (The Russian model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 2 (1983), pp. 41-107.
- id., "Vers une nouvelle histoire du communisme chinois (note critique)" (Towards a new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 a critical note), in: *Les Annales ESC*, 4 (July/August 1985), pp. 931-944.
- id., "Utopian Marxism: 'Populist Strains' and Conceptual Growth Pains in Early Chinese Communism, 1920-1922", Conference Paper, Taipei 1986.
- Domenach, Jean-Luc, F. Godement, M. Jean, F. Joyaux, *La Chine face au monde. La stratégie chinoise, constantes et évolution* (China facing the world: The Chinese strategy; constants and evolution), Paris: Laffont, 1983, 256 pp.
- Gernet, Jacques, "L'homme ou la paperasse: aperçu sur les conceptions politiques de Tang Zen (1630-1704)" (Man or red-tape: an essay on the political ideas of T'ang Tsen, 1630-1704), in: *State and Law in East Asia: Festschrift Karl Büniger*, Wiesbaden (W. Germany), 1981, pp. 112-125.
- Gipoulon, Catherine, "De Montargis à Pékin: Une lettre de Cai Hesen à Mao Zedong (13 août 1920)" (From Montargis to Peking-A letter by Ts'ai Ho-sen to Mao Tse-tung of 13 August, 1920), in: *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 2 (1983), pp. 139-149.
- Godement, François, cf. Domenach, J.-L.
- Guillermaz, Jacques, *Histoire du parti communiste chinois, 1921-1949*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49), 2 vols., Paris: Payot, (revised & enlarged) 1975, 475 pp.
- id., Entries on the Chinese army, Ch'en Cheng, China (general), Chou En-lai, Chu Teh and Ho Ying-ch'in in: *Dictionnaire de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Dictiona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I, Paris: Larousse, 1979; and on Kung Hsiang-hsi, Li Tsung-jen, Manchukuo, Song Tse-wen, Chiang Kai-shek and his wife, and Wang Ching-wei in: *ibid.*, vol. II, Paris: Larousse, 1980.

Hu Chi-hsi (transl. & introd.), *Mao Tsé-toung et la construction du socialisme: voie soviétique ou voie chinoise?* (Mao Tse-tung and the building of socialism: the Soviet line or the Chinese line?), Paris: Seuil, 1975, 192 pp.

Jean, Michel, cf. Domenach, J.-L.

Joyaux, François, cf. *ibid.*

Le Barbier, F., cf. J. Chesneaux (1975).

Leung Kiche, cf. C. Aubert.

Lew, Roland, "Révolution, classes social et nationalisme, 1911-1945: quelques réflexions sur la trajectoire de la révolution chinoise" (Revolution, social classes and nationalism, 1911-1945: some reflections about the trajectorie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Revue des pays de l'est* (Brussels, Belgium), 2 (1979), pp. 101-120.

Peng Shuzhi (P'eng Shu-chih), *Mémoires de Peng Shuzhi: l'envol du communisme en Chine* (Memoirs of P'eng Shu-chih: the beginnings of communism in China), collected by Claude Cadart and Cheng Yingxiang, Paris: Gallimard, 1983, 490 pp.

Roux, Alain, "La stratégie léniniste de la grève en Chine" (The Leninist strategy of Strikes in China), in: *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 2 (1983), pp. 109-137.

Tchang Fou-jouei, cf. M.-C. Bergère (1978).

"Le Trotskyisme et la Chine des années trente" (Trotskyism and China in the 1930ies), in: *Cahiers Léon Trotsky*, 15 (September 1983).

Will, Pierre-Etienne, *Bureaucratie et famine en Chine au 18^e siècle* (Bureaucracy and famine in 18th century China), Paris: Mouton, 1980.

2. Society, Regional Studies, Religion

Aubert, Claude, and Cheng Yingxiang, "L'entraide agricole dans la Chine du Nord précommuniste" (Rural mutual aid in pre-communist Northern China), in: *La Chine par les textes*, 5, Paris: INALCO, 1981.

Aubin, Françoise, "Quelques étapes dans l'histoire des villages en Chine

- impériale et républicaine" (Some stages of rural history in Imperial and Republican China), in: *Recueils de la Société Jean Bodin*, 42 (1982), pp. 227-282.
- id., "Islam et sinocentrisme: la Chine, terre d'Islam?" (Islam and Sino-centrism—China as Islamic Territory?), in: *L'Islam de la seconde expansion*, Paris 1983, pp. 235-294.
- Bastid, Marianne, *L'évolution de la société chinoise à la fin de la dynastie des Qing, 1874-1911*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society in the late Ch'ing Dynasty, 1874-1911), Paris: "China Centre" of EHESS, 1979, 150 pp.
- Bergère Marie-Claire, *La bourgeoisie chinoise et la révolution de 1911* (The Chinese bourgeoisie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Paris: Mouton, 1968.
- id., cf. list of theses (1975).
- id., "Shanghai ou 'l'autre Chine', 1919-1949" (Shanghai or 'the other China', 1919-1949), in: *Les Annales ESC* (September/October 1979), pp. 1039-1068.
- id., "'The Other China': Shanghai from 1919 to 1949", in: *Shanghai, R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n Asian Metropoli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1-34.
- id., "Cycles of Modernization and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Modern China, 1842-1949", Conference paper, Taipei 1984.
- id., and N. Castelino, C. Henriot, Ho Puiyin, "Essay de prosopographie des élites shanghaiennes à l'époque républicaine 1911-1949" (Tentative prosopography of Shanghaiense élites during the Republican era, 1911-1949), in: *Les Annales ESC* 4 (July/August 1985), pp. 901-909.
- id., "Nationalism and Cosmopolitanism in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Post May Fourth Era, 1919-1923", Conference paper, Taipei, Nov. 1985.
- Bianco, Lucien, "Les paysans et la révolution: Chine 1913-1949" (Peasants and Revolution: China 1913-1949), in: *Politique étrangère*

- 2-3 (1968), pp. 117-141.
- id., "Peasants and Revolution: The Case of China", in: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II, 3 (April 1975), pp. 313-335.
- id., "Peng Pai, 1896-1929", in: *bulletin de l'association française d'études chinoises*, 1 (1981), pp. 60-74.
- id., cf. *Dictionnaire biographique du mouvement ouvrier international*.
- Cartier, Michel, "Une tradition bien ancrée, la petite exploitation familiale" (A firmly established tradition, small-scale exploitation in the family), in *Aujourd'hui la Chine*, April 1984, pp. 12-13.
- Castelino, Noël, cf. M.-C. Bergère 1985).
- Cheng Yingxiang, cf. C. Aubert.
- Chesneaux, Jean, *Le Mouvement ouvrier chinois de 1919 à 1927* (The Labour Movement in China, 1919-1927), Paris 1962.
- id., *Le Mouvement paysan chinois, 1840-1949* (The Peasant Movement in China, 1840-1949), revised, Paris: Seuil, 1976, 190 pp. (An English translation was published in London by Thames & Hudson.)
- Chevrier, Yves, cf. *Dictionnaire biographique du mouvement ouvrier international*.
- Dictionnaire biographique du mouvement ouvrier international; La Chin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movement: China), co-operative work under supervision of Lucien Bianco and Yves Chevrier, Paris: Editions ouvrière, Presses de la Fondation National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1985, 845 pp.
- Georges, Michel, "L'Islam en Chine" (Islam in China), in: *Projet*, 147 (July/August 1980), pp. 863-873.
- Gernet, Jacques, "La société chinoise à la fin des Ming" (Chinese society at the end of the Ming), in: *Une rencontre de l'Orient et de la Chine: Matteo Ricci* (An encounter with the East and China-Matteo Ricci), Paris: Centre Sèvres, 1983, pp. 33-43.
- Gipoulon, Catherine, *Pierre de l'oiseau Jingwei: Qiu Jin, femme*

- révolutionnaire en Chine au XIX^e siècle* (The Ching-wei bird's stone: Ch'iu Chin, a revolutionary woman in 19th-century China), Paris: Editions des femmes, 1976, 303 pp.
- id., "L' 'intellectuel' au féminin: Féminisme et révolution en Chine au début de XX^e siècle" (The female "intellectual"—Feminism and revolution in early 20th-century China), in: *Extrême-Orient Extrême Occident*, 4 (1984), pp. 159-173.
- Henriot, Christian, "Municipal Power 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 China*, XI, 2 (April 1986), pp. 1-21.
- Ho Puiyin, cf. M.-C. Bergère (1985).
- Hu Chi-hsi, "Le 'Rapport sur une enquête à propos du mouvement paysan dans le Hunan' de Mao Zedong" (Mao Tse-tung's "Account of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peasant movement in Hunan"), in: *Dictionnaire des grandes oeuvres politiques* (Dictionary of important political work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85.
- Leung, Angela Kiche, "Autour de la naissance: La mère et l'enfant en Chine aux XVI^e et XVII^e siècles" (About nativity: Mother and child in 16th and 17th century China), in: *Cahiers internationaux de Sociologie*, Vol. LXXVI (1984), pp. 51-69.
- id., "L'accueil des enfants abandonnés dans la Chine du Bas-Yangzi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Admission of abandoned children in 17th and 18th Lower Yangtse China), in *Etudes Chinoises*, Vol. IV, No. 1 (1985), pp. 15-54.
- Roux, Alain, "Le poids du passé dans le mouvement ouvrier entre 1920 et 1937: le cas du syndicat de la Nanyang" (The burden of the past in the labour movement of 1920-1937: the case of the Nanyang Syndicate), *Occasional Papers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I (1978), pp. 31-55.
- id., "La classe ouvrière chinoise et la question de son rôle dirigeant" (The Chinese working class and the question of its leading rôle), in: *Recherches internationales*, September 1983, pp. 3-51.
- Schipper, Kristofer M., "Neighbourhood Cult Associations in Tradi-

- tional Tainan", in: G.W. 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 id., *Le corps taoïste. Corps physique-corps social* (The Taoist Body-Physical and Social), Paris: Fayard, 1982, 347 pp.
- Will, Pierre-Etienne, "L'intervention étatique dans la gestion d'une infrastructure hydraulique: la province du Hubei, XVI^e-XIX^e siècles" (State intervention in the formation of an hydraulic infrastructure-Hubei province, 16th to 19th cent.), Conference paper,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meeting at Schloss Reisensburg (W. Germany), September 1981.
- Wong Bin, "Les émeutes de subsistances en Chine et en Europe occidentale" (Survival movements in China and Western Europe), in: *Annales ESC*, 2 (1983), pp. 234-258.
3. Economics
- Bastid-Bruguière, Marianne, "La place de l'administration financière dans l'appareil d'Etat en Chine à la fin de l'époque impériale, 1864-1906" (The position of the 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within the state apparatu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864-1906), in: *Travaux et recherches du group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du CNRS*, Histoire de l'Etat (History of the State, conference of 31 May, 1980), Paris 1981, pp. 84-99.
- Bergère, Marie-Claire, "Aux origines historiques du sousdéveloppement chinois" (On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the Chinese underdevelopment), in: *Tiers-Monde*, XXII, 86 (April-June 1981), pp. 467-476.
- id., *Capitalisme national et impérialisme: la crise des filatures chinoises en 1923* (National capitalism and imperialism: the crisis of the Chinese spinning-mills in 1923), Paris: "China Centre" of EHESS, 1981, 84 pp.
- Cartier, Michel, "Mesure de la valeur et structure des prix dans la Chine médiévale et pré-moderne" (Value definition and price structure in mediaeval and pre-modern China), in: J. Day (ed.),

Etudes d'histoire monétaire, XII^e-XIX^e siècles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money, 12th-19th cent.), Lill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1984, pp. 145-158.

Lew, Roland, "Economie, classes sociales et révolution: Chine, 1900-1925, les sources modernes de la crise chinoise du XX^e siècle" (Economy, social classes and revolution-China 1900-1925, modern sources for the Chinese crisis in the 20th cent.), in: *Revue de l'Institut de Sociologie*, 3-4 (1983), pp. 387-422.

Will, Pierre-Etienne, "Le stockage public des grains en Chine à l'époque des Qing (1664-1911): problèmes de gestion et problèmes de contrôle" (Public grain stocking in Ch'ing China-problems of formation and control), in: *Annales ESC*, 2 (1983), pp. 259-278.

4. Intellectual history,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Bady, Paul, "Pour une histoire littéraire de la Chine moderne: quelques sources chinoises et japonaises" (For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ome Chinese and Japanese sources), in: *Journal asiatique*, CCLXVI, 3 & 4 (1978), pp. 437-456.

Bastid, Marianne, "L'ouverture aux idées d'Occident: quelle influenc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sur la révolution républicaine de 1911?" (The opening for Western ideas-how much influence did the French Revolution bring to bear on the Republican Revolution of 1911?), in: *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 2(1983), pp. 21-39.

id., "Li Yuying (Li Shizeng, 1881-1973) et l'image de la France en Chine" (Li Yü-ying/Li Shih-tseng, 1881-1973/and the image of France in China), Conference paper,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meeting at Tübingen (W. Germany), 1984.

Bergère, Marie-Claire, "L'influence du monde soviétique sur la politique des minorités nationales en Chine" (Soviet influence on Chinese minority policies), in: *Revue franç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 29, 8 (June 1979), pp. 402-425.

Castelino, Noël, "Guanha (l'observateur): un périodique libéral de Shanghai (1946-1948)" (Kuan-ch'a <the observer>: a liberal per-

- iodical of Shanghai, 1946-1948), in: *Cahiers d'études chinoises*, 1 (1980), pp. 145-196.
- Chen Chiaming, "La révision d'un autre 'modèle' révolutionnaire: l'analyse de la commune de Paris par les historiens chinois d'aujourd'hui" (Revision of an alternative revolutionary "model": analyses of the Paris Commune by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ians), in: *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 2 (1983), pp. 151-167.
- Chen, T.S. John, *Les réformes de l'écriture chinoise* (Reforms of Chinese characters), Paris: *Mémoires de l'IHEC*, vol. XII, 1980, 258 pp.
- Chevrier, Yves, "Mort et transfiguration: le modèle russe dans la révolution chinoise" (Death and transfiguration: the Russian model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 2 (1983), pp. 41-108.
- id., "Chine, 'Fin de règne' du lettré? Politique et culture à l'époque de l'Occidentalisation" (China: "end of reign" of the literati? Politics and culture during the era of Westernization), in: *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 4 (1984), pp. 81-139.
- id., "De l'occidentalisme à la solitude: Chen Duxiu et l'invention de la modernité chinoise" (From Westernization to solitude: Ch'en Tu-hsiu and the invention of Chinese modernity), in: *Etudes chinoises*, 3 (1984), pp. 7-34.
- Drège, Jean-Pierre, and Hua Chang-ming, *La révolution du livre dans la Chine moderne: Wang Yunwu éditeur* (Book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the editor Wang Yün-wu), Paris: Publications orientalistes de France, 1980.
- Drège, Jean-Pierre, *La Commercial Press de Shanghai (1897-1949)*, Paris: *Mémoires de l'IHEC*, vol. VII, 1978, 290 pp.
- Dulouist, Nicole, "Quelques aspects de la presse parallèle chinoise pendant le mouvement du 30 mai 1925" (Aspects of the Chinese press during the movement of 30 May, 1925), in: *Cahiers d'études chinoises*, 1 (1980), pp. 81-144.

- Dutrait, Noël, "Une forme littéraire originale en Chine: la littérature de reportage (*baogao wenxue*)" (An indigenous Chinese literary genus: the reporting commentary, *pao-kao wen-hsüeh*), in: *bulletin de l'association d'études chinoises*, 3 (April 1982), pp. 58-68.
- Eliseeff-Poisle, Danielle, *Nicolas Fréret (1688-1749), Réflexions d'un humaniste du XVIII^e siècle sur la Chine* (N. F., 1688-1749, reflections of an 18th-century humanist on China), Paris: *Mémoires de l'IHEC*, vol. XI, 1978, 251 pp.
- Fabre, Guilhem, "Lu Xun devant la guerre: la littérature de défense nationale et la question de l'esprit critique" (Lu Hsün before the war: the literature of national defence and the problem of a critical spirit), in *Etudes chinoises*, 2 (1983), pp. 47-54.
- Henriot, Christian, "Le nouveau journalisme politique chinois (1895-1911: Shanghai-Hong Kong)" (The new Chinese political journalism, 1895-1911, in Shanghai and Hong Kong), in: *Cahiers d'études chinoises*, 1 (1980), pp. 5-80.
- Himelfarb, H., and Neveu, B., "Saint-Simon, les jésuits et la Chine. Correspondance inédite avec le P. Foucquet et le cardinal Gualterio sur les affaires chinoises" (S.-S., the Jesuits, and China. Unpublished correspondence between Father Foucquet and Cardinal Gualterio on Chinese affairs), in: *Cahiers Saint-Simon*, 7 (1979), pp. 26-36.
- Hominal, F., *Terminologie mathématique en chinois moderne*, Paris: EHESS, 1980, 151 pp.
- Houang, F., *Les manifestes de Yen Fou* (Yen Fu's manifests of 1896), Paris: Fayard, 1977, 155 pp.
- Hu Chi-hsi, "Une mémoire collective d'un demi siècle: la collection des *Wenshi ziliao*" (Collective memory of half a century: the *Wen-shih tse-liao* collection), in: *Etudes chinoises*, IV, 1 (Spring 1985), pp. 112-120.
- Hua Chang-ming, cf. J.-P. Drège (1979).
- Jullien, Francois, *Luxun Sous le dais fleuri, Les luttes idéologiques*

- en Chine durant l'année 1925*(Lu Hsün. Under the Flowery Canopy. Ideological strife in China throughout 1925), Lausanne (Swiss): Eibel, 1978, 336 pp.
- id., "Lu Xun écrivain-Perspectives de l'année 1925-Symbolisme figurateur et symbolisme dénonciateur"(Lu Hsün the writer. Perspectives of 1925. Symbolism as a figurative or accusative mode), in: *Etudes chinoises*, 1 (1983), pp. 55-73.
- Lew, Roland, "L'intelligentsia chinoise: du mandarin au militant, 1898-1927" (The Chinese intelligentsia—from Mandarin to Militant, 1898-1927), in: *Le Mouvement Social*, 133 (Oct.-Dec. 1985), pp. 53-79.
- Maillart, E., *De Pékin au Cachemire: une femme à travers l'Asie Centrale en 1935* (From Peking to Cashmere: a woman travels across Central Asia in 1935), Paris: Payot, 1984, 269 pp.
- Martzloff, Jean-Claude, *Recherches sur l'oeuvre mathématique de Mei Wending (1633-1721)* (Research on the mathematical works of Mei Wen-ting, 1633-1721), Paris: *Mémoires de l'IHEC*, 1981, 472 pp.
- Neveu, B., cf. H. Himelfarb.
- Pelliot, Paul, *Carnets de Pékin, 1899-1901* (Notebooks from Peking during the Boxer upheaval), Leiden: Brill, 1976, 74 pp.
- Pisani-Ferry, Fresnette, *Jules Ferry et le partage du monde* (J. F. and the partition of the world), Paris: Grasset, 1962.
- Roux, Alain, "De la rupture avec la tradition lettré aux incertitudes de l'engagement révolutionnaire: l'itinéraire de Qu Qiubai ou le refus d'être un intellectuel de trop" (From breaking with the tradition of literatus to the uncertainties of revolutionary commitment: the itinerary of Ch'ü Ch'iu-pai or the refusal to be too much of an intellectual), in: *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 4(1984), pp. 141-154.
- Tchen Ysia, *La musique chinoise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Chinese music in France in the 18th century), Paris: Collection POF

..... (INALCO), *Cahiers d'études chinoises*, 1980.

Vandermeersch, Léon, "L'Académie de médecine de la Chine impériale" (The Medical Academy of Imperial China), in: *Nouvelles de la Société francojaponaise de médecine*, II (1983).

Wang, Nora, "Da Chen Lu!—Le mouvement du 30 mai 1925 à Paris suivi de Xiao San: Comment j'ai adhéré au Parti Communiste Français" (Ta Ch'en Lu! The May 30 (1925) movement in Paris according to Hsiao San's "How I adhered to the French Communist Party"), in: *Approches Asie*, 2nd trimestre, 1983.

III. Theses

Apart from "Licences" and Master's degrees, French universities grant two different doctorats: the "house" degree of the third (educational) cycle, and the "state" degree, which enjoys much higher prestige as it is harder to obtain and requires a considerably higher level of scholarship (and is not obtainable by foreigners). I have, however, decided not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se two as it seems of little relevance for the point of this survey, but indicate indifferently "Ph. D. thesis".

Barman, Geneviève, *L'expérience occidentale et l'évolution intellectuelle d'un lettré chinois: Huang Tsun-hsien (1848-1905)* (Western experience and the intellectual evolution of a Chinese literatus: H. T.-h., 1848-1905), Ph. D. thesis EHESS, 1979, 226 pp.

Bellefroid, Emanuel, *Qiu Jin et le féminisme chinois à la fin du XIX^e et au début du XX^e siècles* (Ch'iu Chin and Chinese feminism in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y), Ph. D. thesis EHESS, 1979.

Bergère, Marie-Claire, *Problème de développement et bourgeoisie chinoise: la crise de 1921-1923* (The problem of development and the Chinese bourgeoisie: the crisis of 1921-1923), Ph. D. thesis Paris VII, 1975, 808 pp.

Castelino, Noel, *Les intellectuels non-engagés et l'opinion publique en Chine: 1945-1949* (Non-committed intellectual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1945-1949), Ph. D. thesis EHESS, 1983, 367 pp.

- Charbonnier, J., *L'interprétation de l'histoire en Chine contemporaine*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in contemporary China), Ph. D. thesis Paris VII, 1980, 2 vols., 960 pp.
- Chin Day-hsi, *L'action des partis démocratiques en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1949-1957): la double méprise inhérente à la politique du front uni et ses conséquences* (The activities of the democratic parties in the PR China, 1949-1957: the double mistake inherent in the United Front policy and its consequences), Ph. D. thesis EHESS 1984, 350 pp. and 130 pp. (Part of this thesis is dedicated to democratic parties before 1949.)
- Cramerotti, Cristina, *L'établissement du front uni: Mise en place des fondements politiques dans la revue Qianfeng* (The formation of the United Front: Political foundations put into place in the journal *Ch'ien-feng*), M. A. thesis INALCO, 1985, 179 pp.
- Godement, Francois, *Accident climatique et guerre civile en Chine: la crise alimentaire de 1921-1923* (Climatic accident and civil war in China: the food crisis of 1921-1923), Ph. D. thesis EHESS, 1978.
- Henriot, Christian, *Le gouvernement municipal de Shanghai de 1927 à 1937*.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of Shanghai, 1927-1937), Ph. D. thesis INALCO, 1983, 535 pp.
- Ho Puiyin, *Etude biographique des académies en sciences sociales et lettres de 1928 à 1938*, (Biographical survey of the academies of social sciences and literature, 1928-1938), Educational degree Paris III, 1983, 93 pp.
- Hu Chi-hsi, *La lutte entre les deux lignes sur le plan militaire dans le soviet du Jiangxi. Essai d'interprétation sur la montée au pouvoir de Mao Zedong au sein du parti communiste chinois* (The struggle between two lines about the military plan at the Chianghsi soviet. An attempt at interpreting Mao Tse-tung's rise to power within the core of the CCP), Ph. D. thesis, Paris VII, 1976.
- Janin, C.-M., *La condition féminine et le parti communiste chinois*

- en action: la politique du mariage au Shaanganning, 1935-1946* (The condition of women and the CCP: marriage policy at Shangkanning, 1935-1946), Ph.D. thesis Paris VII, 1978.
- Kreissler, Françoise, *L'action culturelle allemande en Chine de la fin du XIX^e siècle à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German cultural activity in China from late 19th century to World War II), Ph.D. thesis EHESS, 1983, 438 pp.
- Labat, M., *Le triple déisme et les origines de la philosophie de Sun Yat Sen* (Triple Deism and the origins of Sun Ya-tsen's philosophy), Ph.D. thesis Lyon III, 1984, 300 pp.
- Li Bao Shu, *L'apprentissage par les étudiants chinois de l'emploi du temps en français* (French part-time employment apprenticeship of Chinese students), Ph.D. thesis Paris IV, 1983, 217 pp.
- Mao Tsui-ying, *Les massacres de Nankin de décembre 1937* (The Nanking massacres of December 1937), M.A. thesis, Paris VII s. a.
- Messant, David, *La diplomatie française en Chine (1916-1919)* (French diplomacy in China, 1916-1919), Ph.D. thesis EHESS, 1984, 402 pp.
- Nalet, Yves, *Chen Duxiu 1879-1915: Formation d'un intellectuel révolutionnaire* (Ch'en Tu-hsiu 1878-1915: The making of a revolutionary intellectual), Ph.D. thesis EHESS, 1984, 423 pp.
- Nivard, Jacqueline, *Histoire d'une revue féminine chinoise: Funü zazhi 1915-1931* (History of a Chinese women's magazine: *Fu-nü tsa-chih* 1915-1931), Ph.D. thesis EHESS, 1983, 303 pp.
- Poncin, Marie-Christine, *Le développement des filatures de coton de Shanghai 1937-1941* (Development of cotton mills in Shanghai, 1937-1941), Educational degree, INALCO, 1983, 119 pp. & annexes.
- id., *Une grande entreprise shanghaienne face à la guerre: la famille Rong et ses filatures de coton (1937-1940)* (A big Shanghai enterprise faces the war: the Jung family and their cotton mills, 1937-1940), Ph.D. thesis INALCO, 1985, 342 pp.
- Wang Yingnan, *La résistance de la Chine à la politique continentale*

japonaise à travers les problèmes de la construction ferroviaire en Mandchourie (1905-1921) (China's opposition against Japanese continental policy towards the problems of railway construction in Manchuria, 1905-1921), Ph. D. thesis Paris III, 1983, 235 pp.

(to be continued)

「臺灣傳統民居之個案研究——龍井林宅的歷史與建築」 計劃

許雪姬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最近通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提出的「臺灣傳統民居之個案研究——龍井林宅的歷史與建築」，預計自七十五年十二月展開，為期一年。本計劃是張光直院士所主持的「臺灣史田野研究計劃」的分支計劃。其目的係想結合歷史和建築兩種學門的特長，對即將坍塌又富建築之美的民宅，做一系列的研究工作。

本省值得研究民宅不少，之所以挑選臺中龍井林宅為第一個研究對象，有幾個原因：

1. 就歷史學方面：林家後代保存相當豐富的史料文件、戳記、丈單、執照、圖書、契約、族譜。而林宅主人曾為臺勇，在霧峯林文察率領之下，曾到大陸助剿太平軍，並回臺援剿戴潮春，在歷史上有其地位。

2. 就建築方面而言，龍井林宅的建築是多護龍的三合院式建築，除了燕尾脊式的單層內罩外，最引人入勝者莫過於位於正廳前的三開間軒亭。軒亭本身不僅燕尾脊之曲線優美為全省民宅之冠，三開間之作法亦為本省所僅見。

3. 就實際情況來看，龍井林宅並未列入古蹟，隨時有被拆建可能；更因本宅的木料結構部分已有腐壞的現象，若再遭地震，很可能倒塌。

本計劃着重於單棟民居之歷史與建築個案研究，藉以明瞭使用該建築物者之移民發展狀況，及該建築物建構之詳細歷史背景、建築過程與營建特色，對於閩南建築在臺灣地區的發展提供一個完整的輪廓。此舉，不僅有助於空間架構的探討，甚且得以從歷史的軌迹中瞭解生活空間創造的意念與初衷。

負責這項計劃者為近代史研究所的許雪姬及楊仁江建築師。



史料介紹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近代 經濟檔案保存與整編概況(二)

• 近史所檔案館編目組 •

疊床架屋，分歧並出，為國民政府初期（民國十七年至二十六年）經濟建設機構之特色，各機構之間復多從屬改隸之演變，要而言之，當時掌理經濟相關事務之部門主要有實業部（係農墾部與工商部合併而成）、全國經濟委員會（接收各水利建設機構）、建設委員會三者，前二者掌管事務以農墾、工商、水利為主，目前留存之檔案涵蓋時間為民國十七年至二十六年，後者（建設委員會）主管事務龐雜，其中以電氣事業為主。所謂電氣事業，多為民營各電燈公司、電力公司之設立與營運狀況，各公司中，少數自清末已經設立，歷北京政府時期、國民政府時期而營業依舊，其檔卷亦自清末郵傳部時期一貫保存下來，故建設委員會目前所存檔案的時間範圍上起清末光宣年間，下迄民國二十六年止。

根據建設委員會組織法，建設委員會之職權包括：

1. 計劃關於全國之建設事業。
2. 辦理水利電氣及其他不屬於各部會主管之國營事業。
3. 民營電氣事業之指導監督改良，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屬於建設委員會。
4. 國營事業之屬於各部會主管而尚未舉辦者，建設委員會得經主管部會之同意辦理之。
5. 建設委員會創辦之事業仍由建設委員會完成之。

換句話說，建設委員會為一帶有游離性質之機構，其主管事業遂多龐雜，現存建設委員會檔案經整理編日後，共得四八四個函套，分類及檔案內容大要如下。

(一) 總務處事務類檔案共十一函，包括建築會所，籌辦電瓷製造廠，籌劃南京市路燈，規劃中央政治區建築等。

(二) 總務處人事檔案二二函，包括各級員職工之任免、分發、考績、職員調查表、薪額表、動態表等。

(三) 總務處文書檔案二十函，包括各種組織法規、章程條例、建委會二十~二十五年度各期行政計畫、施政成績報告等。

(四) 事業處會計檔案二十四函，包括公債、抵押借款、年度概算、負債表、江南鐵路公司案等。

(五) 模範灌溉管理局十八函。此為建委會所屬主管農業及水利性質之機構，檔案包括組織章程、人事案卷、工程計畫、東流實驗農場、安徽鳳懷區農林實驗場、振興農村實驗區、龐山湖灌溉實驗場、武錫區灌溉工程等。

(六) 電機製造廠七函，包括組織章程、人事案卷、經費運用、業務概況、結束遷移等。

(七) 鑛業類十九函，包括淮南煤鑛局及長興煤鑛局兩機構檔案。

(八) 全國電氣事業指導委員會二十八函，包括各種電氣事業規則、辦法、發電計畫、電業糾紛、建築電氣試驗所、國際電力會議、各省電業狀況視察報告、各電氣公司年度營業報告、各省電業圖等。

(九) 首都電廠七函，包括人事任用、經費、電業計畫等。

(十) 戚墅堰電廠六函，包括人事任免、售電合同、經費等。

(二) 各省民營電氣事業，分省敘述如下：

1. 河北省共二十二函，有近二十家電氣電燈公司留存有檔案，時間自宣統二年至民國二十六年，其中以北平華商電燈公司歷史最久，規模最大。

2. 山東省共十九函，有二十九家電燈公司，檔案時間自宣統元年至民國二十六年，其中以濟南電燈公司歷史較久。

3. 河南省共一十函，有十三家電燈公司，檔案時間自民國三年至民國二十六年。

4. 山西省共三函，有八家電燈公司，檔案時間自民國十一年至民國二十六年。

5. 陝西省有四函，只有兩家電燈公司向建委會登記註冊，檔案時間自民國二十三年至民國二十七年。

6. 甘肅省有三函，分別為涼州、蘭州、天水省會電燈公司，檔案時間不詳。

7. 江蘇省，計有四十縣一一六家電燈公司，僅次於浙江省，檔案函數共七十八函，時間自民國五年至民國二十六年。

8.安徽省，有十六函，三十七家電燈公司，其中蕪湖明遠電氣公司歷史最久，檔案涵蓋時間自宣統元年至民國二十六年。

9.浙江省電燈公司最多，計一二二家，共五十七函，以杭州電廠資料較多，時間自民國三年至二十六年。

10.江西省，有十七函，二十一個電燈公司，南昌新明電燈公司自光緒三十三年至民國二十一年，歷史最久，其餘檔案時間自民國三年至二十六年。

11.湖北省，有二十個電廠，共十六函，檔案時間自民國四年至二十六年。

12.湖南省，約二十個電廠，十三函，檔案時間在民國四年至二十六年。

13.四川省，有二十家電氣公司，九函檔案，時間從民國十九年至二十六年。

14.福建省，有十二函檔案，二十八家電氣公司，福州電氣公司、廈門電燈公司，自宣統三年到民國二十六年，資料最爲完備，其餘電廠資料約從民國三年起到二十六年。

15.廣東省，有二十個電氣公司，七函檔案，以廣州電力公司歷史最久，檔案時間自宣統元年至民國二十六年。

16.廣西省，有三函，四家電廠，時間自民國四年到二十五年。

17.雲南省，只有一函，三家電廠，檔案自民國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

18.貴州省，只有一函，一家電廠，檔案時間僅限於民國二十五年。

19.綏遠省，有一函，包括包頭、綏遠二家電廠，時間自十八年至二十六年。

20.新疆省，只有一家電廠，一函資料，時間約民國七年至一十年。

21.上海市，有二十九函，十一家電廠，資料時間自民國三年至二十六年。其中以浦東電氣公司及閘北水電公司所留存檔案數量較多。

(三) 調查浙江經濟所計一函，檔案內容有該機構組織章程，人事任用等。

建委會目前所存檔案中，農業（水利），鑛業（煤鑛）資料雖然不多，但可與實業部農業司、鑛業司的檔案合併參看，對研究一九三〇年代國民政府之農、鑛建設事業仍具參考價值。人事檔卷中的職員調查表數量甚夥，由之可以略窺當時建委會人事行政運作之概況，爲研究專技官僚的絕佳資料。

電氣事業類檔卷最多（實業部亦存有部份電氣事業公司資料，容後介紹實業部檔案時再行分析），除首都電廠，威墅堰電廠為政府經營者外，其餘各省電燈、電氣公司俱屬民營。各公司檔案數量多寡不一，資料性質亦頗繁富，大致而言，包括公司申請設立（登記註冊）、營業章程、資本額、營運狀況、股東名簿、營業區域等，為研究清末以來我國電氣、電燈事業發展史之第一手資料，亦民國商業發展史中重要的一個環節，就電燈公司營業額（供電數）、分佈區域加以分析，亦為觀察一個省縣或特定地區區域發展（現代化）的重要指標。

某些規模較大、歷史較久的公司留有豐富資料，具備多種史料價值，茲以北平華商電燈公司為例說明。

北平華商電燈公司原名京師華商電燈公司，於光緒三十年八月十七日向清廷商部註冊立案，民國十七年以後改稱北平華商電燈公司。目前該公司所存檔案有以下幾類：

甲、申請設立及登記註冊的有關文件，包括向清廷商部、農工商部的呈文、北京政府交通部發給的電氣事業執照、創業經費概算、營業章程、設備情形、營業區域、電費計價問題、股東名冊、資本額。

乙、民國六年至二十四年歷年營業報告表、資產負債表、損益表、工程狀況報告。

丙、其他類，如與北平電車公司、洋商電氣公司爭執供電權，電費計價方式糾紛，與其他機關之交涉等。

甲、乙兩類檔案為研究中國近代商業或經濟發展史的極佳史料，其中的設備與工程狀況資料，亦可供研究中國近代電氣事業技術發展史之參考，丙類檔案亦不失史料價值，例如，根據該公司民國二十四年的股東名簿，可以發現該公司的最大股東是黨國元老李煜瀛（石曾），民國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間冀察政務委員會非法侵犯該公司權益，與建設委員會發生爭執，則又為政治史之最佳史料。總之，較大的電氣公司檔案可作為個案研究之對象，一省或某一地區之公司檔案則為研究地區甚至全國商業發展與經濟變遷者所不可忽視之史料。

中國近代經濟檔案已完成整理編目者，歡迎學界參閱研究，有關申請借閱手續請洽近史所檔案館。

新出章炳麟致張學良兩函年代考

汪榮祖

去年（一九八六）北京圖書館〈文獻〉季刊公佈章炳麟致張學良兩函，章以世兄稱張，而且詞意親切，可見兩人交情非比尋常，實為罕見而珍貴的史料。原件真跡今仍藏北京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文獻〉總二八期，據之排印，見頁一三七～一三八。惟原函二通俱未署年份、僅有月日、分書四月十五日與十一月三十一日。〈文獻〉據十一月三十一日函中所說，「直系僭竊，已歷旬餘」，遽推斷為「一九二三年十月七日曹錕賄選，通電就任大總統後所書。後函與前函相距半年，則兩函均當為一九二三年所書」（見頁一三八）。但此一九二三年說，與兩函所述其他情節，多有不合。再者，兩函既皆無年份，四月十五日函未必即早於十一月三十一日函。謹試加考證兩函年份，以供治民國史者參考。

(一)四月十五日函全文：

漢卿世兄執事：

前由成君濟安賚致 尊容，不意衰頹伏捩之軀，得君小驥引為同志也。

此次戰爭，實生死存亡之會，西南、東北，休戚是同。中山先生與各省首領，現已結合鞏固，待關東出師之後，亦能急起直追，相為犄角。唯湖南一省，自十年戰敗以後，子彈缺乏，前盧子嘉允與接濟，猶恐浙江一省力不足供。貴省如能量與補助，湘軍豈肯端坐待斃？好在海軍獨立，運輸之事，較前為便。以上望致意孫公，力為扶助，是則老病病夫所馨香頂禮以求之者也。詳情統屬濟安面罄。

章炳麟頓首 四月十五日

民國初年，戰爭甚多，「此次戰爭」，自難確指，但「生死存亡之會」，則必係具決定性的大戰，自非一九二二年的直奉大戰莫屬。當時曹錕、吳佩孚聲勢最大，張作霖感到威脅，於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二日派代表李夢庚（紹白）到桂林晤孫中山，已有奉粵聯合之勢。至於西南諸省當時主張聯省自治，而吳佩孚虎踞洛陽，屯兵湖北，聲言要武力統一中國，直接威脅自

治。所謂「西南、東北，休戚是同」，應即指此而言。

「中山先生與各省首領，現已結合鞏固」云云，乃不得不如此說之詞，以與東北「相為犄角」。實際上，西南諸省首領只是陽奉孫中山的大總統稱號（中央政府），陰為聯省自治之計。章氏本人此時也是力主自治，他在〈自定年譜〉中云：

（民國十年）四月，孫公以議員二百人選為非常大總統……余聞孫公就選，以為非法，然知孫公不得大位必附北。而唐紹儀在粵，猶為徐世昌謀，反對孫公則使徐、唐快意。念武侯賀仲謀稱尊之事，故不與爭。孫公來電亦自言不得已。余答曰：廣東地治，一以付陳，他省逋逃，屏絕勿近，得一夫而失一國，非謀也。終以聯省自治不可反對為獻，言甚切至。（中華民國十年五十歲條，頁四十九）

此乃章氏心目中，「結合鞏固」之真相。他希望藉東北為犄角，尊孫中山為名義上的大總統，以對付北方曹、吳武力統一的威脅，以維護西南聯治的持續。

西南聯治諸省，以湖南最為先進，於一九二二年元旦公佈省憲，故湖南最不願介入南北戰爭。故於一九二二年三月十六日派代表到桂林見孫中山，欲阻北伐軍入湘，同時要求吳佩孚撤退在岳州的軍隊。因此章氏在四月十五日的信中，略作解釋。謂湘軍在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八月被吳佩孚打敗，元氣未復，「子彈缺乏」。盧子嘉者，乃浙江都督盧永祥，當時盧氏亦贊同自治，曾於一九二一年六月四日電主各省自定省憲，故與湖南以「接濟」。章氏自然希望以東北之富，來「補助」湖南，湘軍必不肯在吳佩孚的威脅下，「端坐待斃」。所謂海軍獨立，應指海軍獨立於曹、吳勢力之外，故可經海道濟湘。「致意孫公」，必係「致意魯公」之誤，十一月三十一日函有「代啟魯公」之語。

若此函果撰於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五日，與史實之發展也相符合。章氏於四月十五日函，待「關東出師」，四月十九日，張作霖果然通電入關，四月二十一日吳佩孚下達討伐奉張令，四月廿八日，奉直戰爭大起。

（二）十一月三十一日函全文：

漢卿世兄執事：

半歲以來，天地否塞。直系僭竊，已閱旬餘，東南兵弱，殆無進取之望，貴省待時而動，亦審時察勢者所應有，所幸川、滇合作，已下重慶，夔、萬亦指日可破。事定以還，川軍祇患其多，滇亦不能坐

守，直下施、宜，蓋必然之勢。懸揣兩軍精銳，窺鄂者可三、四萬人，西南聲勢，唯賴此方。貴省爾時與之犄角，或不以孤軍挺進為憂耳。至鄂西一方，民黨相時觀衅者亦屬不少，而急起直追則以楊玉山為最，計所部地方民軍槍枝，不下萬六、七千，大部多駐襄陽，與豫南張國信等合勢，出軍計畫則在直搗襄陽。民軍紀律或不如正式軍隊，然倡勇敢死，不憚犧牲，則有勝於正軍者。值此羣情觀望之時，此種奮身直前之民軍，斷不可少。唯餉糈多取之地方，不可長久。軍行在即，執事能代啟尊公，量與補助，裨益實多。玉山本武昌元勳蔡濟民部下，今者仗義而興，非獨為國家效力，亦為其舊帥復仇，此鄙人所深知，斷不忍逗留觀衅也。其軍隊編制及駐札地點，另有節略，並託楊秀翹兄代陳。兼頌 凱祺不具。

章炳麟頓首 十一月三十一日

此函就整個內容而言，應寫於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年底，時章氏在四川。章氏到西南的任務，不僅替孫中山拉攏唐繼堯，而且希望聯合西南兵力，東進奪取武漢，以制北洋勢力。因而他想憑藉民二在東三省籌邊使任上與張氏父子建立的關係，請他們「待時而動」，「審時察勢」，有所反應以為犄角。「川滇合作，已下重慶」，顯然指的是川軍第五師師長熊克武、滇軍師長顧品珍、趙又新，於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三日，逐走吳光新，佔領重慶。此函署十一月三十一日，十一月既無三十一日，必然有誤，其為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誤，可能性最大（以常情而論，月較日容易誤記）。若然，正合「已下重慶」一語。集合川、滇，進窺荆、襄，亦正是當時章氏亟力主張的策略。〈太炎先生自定年譜〉民國六年條有云：「蕘（唐繼堯）問計，余言南北相持，不得湖北，不能取均勢，今桂軍方援湖南，荆襄黎天才、石星川亦思獨立，君必待破重慶，定成都，然後東下，則歲時淹久，事將中變」（頁三四～三五）。但既下重慶之後，唐繼堯仍不欲東下，章氏「如是十餘上，蕘終託故不出」（頁三六）。很可能章氏因而想到奉張，並說之以當時散在川東鄂西民軍的優點，並特別提到楊玉山的部隊，「其軍隊編制及駐札地點，另有節略，並託楊秀翹兄代陳」，可為章氏作此函時尚在四川的旁證，否則他何以能夠節略地方部隊的駐札情況，託人代陳？楊玉山為蔡濟民部下，蔡氏於民國八年（一九一九）春在四川為人襲殺。章稱蔡為楊之「舊帥」，而未稱「故帥」，可見此函必寫於民八之前。「為其舊帥復仇」，公私兼顧，因蔡本武昌起義元勳，而當時武昌已為北洋佔據，故云「復仇」。

若因蔡爲川人襲殺而報仇，則不知如何著手矣。

若此函果撰於民國六年年底，則所謂「半歲以來，天地否塞」，顯指民六自七月以來，復辟、護法等一連串危機。「直系僭竊」，若必指民國十二年十月曹錕就任賄選總統，未免失之於泥。北洋乘復辟之便，趕走黎元洪，章氏即稱之爲「僭竊」。在此所謂「直系僭竊」，似指民六十一年月中旬，馮、段鬭爭，十一月底直系馮國璋主和派得勢，十一月廿二日段祺瑞辭職。十一月三十日王士珍署國務總理。十二月九日馮國璋電徵各省和平意見，在西南的陸榮廷與唐繼堯立即響應，通電主南北和解，打破了章炳麟的戰略計畫。章氏甚是痛恨，認爲是北方的緩兵之計。如「直系僭竊」指馮國璋之代段祺瑞而起，「竊據」權乘，在時間上也可合「已歷旬餘」一語，也符合章氏所謂「僭竊」之旨。

以上求證，以爲「十一月三十一日函」，實寫於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時爲民國六年。「四月十五日函」，則寫於一九二二年，時爲民國十一年。

一九八七年二月四日初稿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一期 要目

七十五年三月出版，一五一頁，定價 150 元

- 學術會議** 抗戰建國史研討會／楊明哲
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呂芳上
記「臺灣開發史研究會」／許雪姬
- 學術演講** 蔣廷黻先生對中國現代史研究的倡導／王聿均
- 學人簡介** 郭廷以／呂實強·張瑞德
韋慕庭 (C. Martin Wilbur) 張玉法·張朋園
吳相湘／陶英惠
- 研究概況** Research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in West Europe
(I)／Ursula Richter
「中國現代化區域研究」第二期研究計劃
近年來大陸對臺灣史的研究——介紹與評估 (許雪姬)
- 史料介紹** 英國「國家檔案館」(Reblic Record Office) 收藏有關
中國史料初步調查報告／朱泮源
- 書評** 張著「民國初年的政黨」評析／蔣永敬
評介胡著「民國初期的復辟派」／趙中孚
柯著：美國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張朋園
- 論文目錄** 國內歷史研究所歷屆有關近代史研究之博碩士論文目錄

張維翰先生史料兩種

蔡相輝

張維翰先生文集，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會編，民國七十五年五月出版
張維翰先生年譜，余繩文編，民國七十五年五月出版

張維翰先生（民前二十六年至民國六十八年，一八八六～一九七九）雲南省大關縣人，早歲參與革命，民國成立，即因羅佩金將軍及陳英士先生之介，加入國民黨。民國十七年，奉國民政府任命為雲南省政府委員兼外交部駐滇特派交涉員，參與中法越南商約改訂及滇緬界務交涉。民國二十年起，即歷任風憲，翊贊中樞，垂五十載。政事之餘，兼擅詩學、書法，道德文章為世所重。民國七十五年，適逢張氏百歲誕辰，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乃蒐羅張氏有關論述，編為文集二冊；並請監察院秘書余繩文先生編次張維翰先生年譜一冊，印行於世。

張氏生前有寫日記習慣，復重視史料，晚年曾親自將其文稿、講稿、詩稿、聯語彙為「蕪漚類稿」。張維翰先生文集即以「蕪漚類稿」為底本，增補散逸及民國六十四年至六十八年張氏有關論述、自撰回憶錄「隙駟流萍九五年」及有關活動照片等資料而成。全書分為五編，第一編專著，為張氏所撰學術性文章及回憶錄。第二編講詞，為張氏於民國十七年至六十八年間，在黨、政、學術公開場合演講詞之總集。第三編詩，蒐羅民國二年至六十八年張氏吟作、「除夕疊韻」及「采風集」、「環遊集」而成。第四編聯語，蒐集張氏歷年所撰壽聯、婚聯、輓聯、題贈及「海角鐘聲」而成。第五編雜著，輯張氏歷年所撰記、序、傳、墓銘、墓表、壽文、獻詞等而成。

張氏修持得法，克享遐齡，其本身經歷即係一部中國現代史之縮影；對中國古文、詩、詞造詣又深，相信從事中國現代史及古典文學研究之學者，可自張氏文集中獲得相當之啟發。

張維翰先生年譜係以張氏日記為藍本編輯而成，內容則以民國三十九年張氏來臺以後事蹟為主。三十年間，張氏讀某一部書、見某一人、參加某一會議，皆可詳細覆按，書末附錄文件、地圖、宗譜等二十餘件，其中有關民國十七年中法商約改訂，滇緬界務處理等意見書及地圖，彌足珍貴。其餘部分多涉及監察委員監察權之行使，若能配合監察院印行之「在臺監察院實錄」、監察院各期公報研閱，對我國監察權之運作，可有相當明晰的瞭解。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收藏報紙簡介

藍 旭 男

報紙所載有時事消息、議論、文學、學術專題研究和廣告等。雖其消息非盡可靠，近來中外學者多有用此資料撰寫論文者。故報紙已與官方檔案遺物等並列為最重要之史料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對近代中國史料的搜集不遺餘力，除公私檔案、期刊及圖書外，報紙為重要的一項。歷年所搜集的報紙有數十種，數量龐大，其含蓋時間達百餘年（見附表）。為便利讀者們之利用，故在此加以介紹。

近代史研究所搜藏之報紙最早者為公元一八四五年發行之 *China Mail*（德臣〔西〕報），距今一百四十年，為微捲型式。此報雖為週刊，而消息不少。近史所搜藏的報紙均刊行於國內外重要都會，如香港、上海、星嘉坡、北京、長沙、天津、重慶、廣州、漢口、延安、南京、臺北、東京、巴黎和紐約等地。至於歷時最久之報紙則數 *North China Herald*（北華捷報），達九十二年。天津大公報有五十五年，其他持續三十年以上者尚有八種之多。為便利讀者瞭解，製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報紙一覽表」於下，並冠以凡例說明。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報紙一覽表

凡 例

- 一、本表根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卡片目錄及庫存報紙彙編而成。微捲及影印型式之報紙，部分大陸地區出版之原版報紙，以及非臺灣地區出版之外文原版報紙，係根據近史所圖書館卡片目錄，其餘皆根據近史所庫存報紙。本表將公元一九八五年（民國七十四年）以前近史

所收藏之原版報紙、微捲報紙及影印報紙按時序統一排列，以利檢索。本表亦為近代史研究所收藏報紙之第一次統一目錄。

- 二、本表共分五欄，第一欄為報紙名稱，第二欄為發行地，第三欄為發行時間，第四欄為型式，第五欄為數量。報紙名稱採各該報紙原用正名，以省篇幅。英文報有中文名稱者，附之。如「北華捷報」乃英文 *North China Herald* 報之譯名，本表用 “*North China Herald*”，下註「北華捷報」。又如 “*Wa Tze Yah Pao*” 乃「華字日報」之拼音名，係同一報紙之不同名稱，本表只用「華字日報」。其中文名不明者從缺。報紙名稱之前附加編號，一個報紙名稱使用一個編號，同一報紙有不同出版地點或不同版別者，亦只用一個編號，然另加子碼，如「大公報」有天津、長沙、香港、重慶、上海及北平出版者，共同使用一個編號「6」，而以「6.1」，「6.2」表示天津、長沙等地發行者。
- 三、報紙發行之年月日，公元及年號並用，以便讀者。報紙之排列以其最早發行時間為序，如「時報」始於一九〇七，「申報」為一八七二，故「申報」排列在前。
- 四、報紙型式，分為原版、微捲、影印三種。原版報紙係該報紙發行之原來形質。近史所搜藏之原版報紙大部分為歷年按日搜集當天發行之報紙，再加裝訂。微捲報紙為顯微膠捲報紙之簡稱，需用映讀機才能顯示。近史所之微捲都是自國外進口。影印報紙係原版報紙之影印本，與原版同樣大小或縮小。近史所之影印報紙部分購自本地，部分自島外進口。同一報紙有不同型式者，仍予並列，以便讀者選用，如一九一〇、一〇、一一～一九一三、九、四之「民立報」有影印本三十三冊，亦有微捲十八捲。
- 五、報紙數量以冊或捲為單位。在型式欄為微捲者，其數量欄之單位為捲，在型式欄為影印或原版者，其數量欄之單位為冊。散裝係未經裝訂之原版報紙，暫時按日期排列，按月捆紮，以待日後裝訂。本表之末有簡單統計，以作參考。
- 六、本表編輯匆促，錯誤難免，請不吝指正。

報 紙 名 稱	發 行 地	發 行 時 間	型 式	數 量 (冊或捲)
1. <i>China Mail</i> 〔德臣(西)報〕	香 港	1845. 2. 20~1853. 12. 29 (道光25. 1. 14~咸豐3. 11. 29) 1854. 1. 5~1860. 10. 11 (咸豐3. 12. 7~咸豐10. 8. 27)	微 捲	2
2. <i>North China Herald</i> (北華捷報)	上 海	1850~1941 (道光29~民國30)	微 捲	114
3. 申報	上 海	1872. 4~1879. 12 (同治11. 2~光緒5. 11) 1912. 1~1933. 1 (宣統3. 11~民國22. 1) 1923~1948 (民國12~民國37)	影 印 微 捲	200 130
4. <i>The Chinese Times</i> (天津時報)	天 津	1886~1891 (光緒11~光緒17)	微 捲	4
5. 華字日報	香 港	1895~1940 (光緒21~民國29)	微 捲	81
6.1 大公報	天 津	1902. 6~1934. 6 (光緒28. 4~民國23. 6) 1929. 11~1956. 12 (民國18. 11~民國45. 12)	影 印 微 捲	120 55
6.2 大公報	長 沙	1917. 1~1927. 3. 1 (民國6. 1~民國16. 3. 1)	影 印	57
6.3 大公報	香 港	1938. 8~1964. 12 (民國27. 8~民國53. 12) 1955. 6~1968. 12 (民國44. 6~民國57. 12)	微 捲 原 版	65 124
6.4 大公報	重 慶	1941. 8~1946. 12 (民國30. 8~民國35. 12)	微 捲	11
6.5 大公報	上 海	1948. 8~1952. 12 (民國37. 8~民國41. 12)	微 捲	20
6.6 大公報	北 京	1956. 6~1959. 10 (民國45. 6~民國48. 10) 1957. 1~1964. 12 (民國46. 1~民國53. 12)	原 版 微 捲	38 18
7. 中國日報	香 港	1904. 3. 5~1904. 5. 4 (光緒30. 1. 19~光緒30. 3. 19) 1907. 2~1907. 11 (光緒33. 12~光緒33. 10)	影 印	4

報 紙 名 稱	發 行 地	發 行 時 間	型 式	數 量 (冊或捲)
8. 民呼日報	上 海	1905. 5. 15~1909. 8. 14 (光緒31. 4. 12~宣統1. 6. 29)	影 印	2
9. 中興日報	星嘉坡	1907. 9. 27~1910. 3. 13 (光緒33. 8. 20~宣統2. 2. 3) 1948. 1~1948. 3. 3 (民國37. 1~民國37. 3. 3)	} 微 捲	7
10. 時 報	上 海	1907~1937 (民國32~民國26)		
11. 民吁日報	上 海	1909. 10~1909. 11 (宣統1. 8~宣統1. 10)	影 印	1
12. 民立報	上 海	1910. 10. 11~1913. 9. 4 (宣統2. 9. 9~民國2. 9. 4) 1910. 10. 11~1913. 9 (宣統2. 9. 9~民國2. 9.)	影 印	33
			微 捲	18
13. 順天時報	北 京	1912~1930 (民國 1~民國19)	微 捲	92
14. 中華新報	上 海	1917. 2~1917. 12 (民國6. 2~民國6. 12)	影 印	9
15. 時事新報	上 海	1924. 12~1925. 6 (民國13. 12~民國14. 6) 1932. 11~1933. 6 (民國21. 11~民國22. 6)	} 微 捲	9
17. 廣州民國日報	廣 州	1926~1927 (民國15~民國16)	微 捲	2
18. 實 報	北 平	1928. 10~1944. 4 (民國17. 10~民國33. 4)	微 捲	18
19. 1 中央日報	南 京	1932. 11~1937. 11 (民國21. 11~民國26. 11)	微 捲	19
19. 2 中央日報	臺 北	1949~1985 (民國38~民國74)	原 版	289
20. 益世報	天 津	1935. 12~1937. 7 (民國24. 12~民國26. 7)	微 捲	7
21. 1 新華日報	漢 口	1938~1947. 2 (民國27~民國36. 2)	微 捲	18

報 紙 名 稱	發 行 地	發 行 時 間	型 式	數 量 (冊或捲)
21.2 新華日報(華北版)	山 西	1941.1~1941.6.29 (民國30.1~民國30.6.29)	微 捲	1
21.3 新華日報(太行版)	山 西	1944.10~1949.8.19 (民國33.10~民國38.8.19)	微 捲	6
21.4 新華日報(太岳版)	山 西	1944.4~1949.3 (民國33.4~民國38.3)	微 捲	4
21.5 新華日報(華中版)	淮 陰	1946.1~1949.4 (民國35.1~民國38.4)	微 捲	3
21.6 新華日報	北 京	1980~1983 (民國69~民國72)	微 捲	4
22. 漢口民國日報	漢 口	1938.1.5~1939.9.30 (民國27.1.5~民國28.9.30)	微 捲	2
23. 新民報和新民晚報	北 京	1938.1~1942.10 (民國27.1~民國31.10)	微 捲	12
24. 新中華報	延 安	1939.2~1941.5 (民國28.2~民國30.5)	微 捲	2
25. 大眾日報	山 東	1939.1~1942.12 (民國28.1~民國31.12)	微 捲	3
26. 抗戰日報	山 西	1940.9~1946.6 (民國29.9~民國35.6)	微 捲	4
27. 晉察冀日報	晉察冀 邊區	1941.4.27~1948.6.14 (民國30.4.27~民國37.6.14)	微 捲	5
28.1 解放日報	延 安	1941.5.16~1947.2.5 (民國30.5.16~民國36.2.5)	微 捲	22
28.2 解放日報	北 京	1979~1983 (民國68~民國72)	微 捲	5
29. 東北日報	山海關	1945.11~1949.9 (民國34.11~民國38.9)	微 捲	7
30. 正 報	香 港	1946.7~1948.11 (民國35.7~民國37.11)	微 捲	2
31. 光明報	香 港	1946.9~1949.9 (民國35.9~民國38.9)	微 捲	1
32. 香港時報	香 港	1949~1985 (民國38~民國74)	原 版	293

報 紙 名 稱	發 行 地	發 行 時 間	型 式	數 量 (冊或捲)
44. 光明日報	北 京	1956. 6~1959. 10 (民國45. 6~民國48. 10)	原 版	38
		1977~1981 (民國66~民國70)	微 捲	5
		1982~1985 (民國71~民國74)	原 版	散裝
45. 1 <i>The New York Times</i> (俗稱紐約時報)	巴 黎	1957. 2~1957. 6 (民國46. 2~民國46. 6) 1960. 11~1960. 12 (民國49. 11~民國49. 12)	原 版	5
45. 2 <i>The New York Times</i>	阿 姆 斯 特 丹	1959. 1~1959. 6 (民國48. 1~民國48. 6) 1959. 11~1960. 10 (民國48. 11~民國49. 10)	原 版	18
45. 3 <i>The New York Times</i>	紐 約	1977. 11. 24~1978. 2 (民國66. 11. 24~民國68. 2)	原 版	7
46. 文匯報	北 京	1957. 3~1959. 10 (民國46. 3~民國48. 10)	原 版	16
		1979~1981 (民國68~民國70)	微 捲	3
		1982~1985 (民國71~民國74)	原 版	散裝
47. <i>China News</i> (英文中國日報)	臺 北	1960~1985 (民國49~民國74)	原 版	204
48. 徵信新聞	臺 北	1960~1968 (民國49~民國57)	原 版	52
49. 自立晚報	臺 北	1960~1961 (民國49~民國50)	原 版	27
		1984~1985 (民國73~民國74)		
50. 公論報	臺 北	1960~1961 (民國49~民國50)	原 版	8
51. 青年戰士報	臺 北	1961~1963 (民國50~民國52)	原 版	145
		1972~1984 (民國61~民國73)		
52. 華 報	臺 北	1961~1962 (民國50~民國51)	原 版	2
53. 星島日報	香 港	1962~1969 (民國51~民國58)	原 版	81

報 紙 名 稱	發 行 地	發 行 時 間	型 式	數 量 (冊或捲)
54. 經濟日報	臺 北	1967~1985 (民國56~民國74)	原 版	178
55.1 <i>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i> (俗稱先鋒論壇報)	巴 黎	1967.7~1971.12 (民國56.7~民國60.12) 1975.1~1975.8 (民國64.1~民國64.8) 1977.8~1977.12 (民國66.8~民國66.12) 1979.11~1979.12 (民國68.11~民國68.12) 1980.1~1980.3 (民國69.1~民國69.3)	原 版	138
55.2 <i>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i>	蘇黎世	1977.10~1977.11 (民國66.10~民國66.11) 1978~1979.2 (民國67~民國68.2)		
55.3 <i>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i>	倫 敦	1980.6~1980.7 (民國69.6~民國69.7)		
55.4 <i>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i>	香 港	1980.10~1985.12 (民國69.10~民國74.12)		
56. 臺灣日報	臺 中	1967~1985 (民國56~民國74)	原 版	135
57. 中國時報	臺 北	1968~1985 (民國57~民國74)	原 版	170
58. 中華日報	臺 北	1972~1985 (民國61~民國74)	原 版	150
59. 大華晚報	臺 北	1973~1985 (民國62~民國74)	原 版	141
60. <i>The Japan Times</i>	東 京	1977.8~1977.9 (民國66.8~民國66.9)	原 版	2
61. <i>The Times</i> (俗稱泰晤士報)	倫 敦	1977.8 (民國66.8)	原 版	1
62. <i>Asahi Evening News</i>	東 京	1978.1~1978.6 (民國67.1~民國67.6) 1978.10~1978.12 (民國67.10~民國67.12)	原 版	9

報 紙 名 稱	發 行 地	發 行 時 間	型 式	數 量 (冊或捲)
63. 民生報	臺 北	1978~1985 (民國67~民國74)	原 版	94
64. <i>South China Morning Post</i> (俗稱南華早報)	香 港	1978~1980 (民國67~民國69)	原 版	52
65. 工商時報	臺 北	1979~1985 (民國68~民國74)	原 版	83
66. 南方日報	北 京	1979~1983 (民國68~民國72)	微 捲	5
67. 朝日新聞	東 京	1979. 9~1985. 12 (民國68. 9~民國74. 12)	原 版	136
68. 臺灣時報(北部版)	高 雄	1980~1985 (民國69~民國74)	原 版	69
69. <i>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i>	香 港	1980. 8~1982. 11 (民國69. 8~民國71. 11)	原 版	14
70. <i>China Daily</i> (中國日報)	北 京	1982~1983 (民國71~民國72) 1984. 3~1984. 12 (民國73. 3~73. 12) 1985 (民國74)	原 版	散裝
71. 青年日報	臺 北	1985 (民國74)	原 版	12
72. 民族晚報	臺 北	1985 (民國74)	原 版	7
73. 北京晚報	北 京	1985. 8~1985. 12 (民國74. 8~74. 12)	原 版	散裝

以上合計報紙七十三種，原版四、一七〇冊，微捲一、一四二捲，影印五五六冊，散裝未計。

附記：上文定稿之後，近代史研究所又陸續收到報紙多種，如「申報」(民國22. 2~民國26. 12)，「(天津)大公報」(民國23. 7~民國38. 1)，「盛京時報」(光緒32. 8~民國5. 12)，「華商報」(民國30. 6~民國38. 10)，以及民國三十九年以後中國大陸地區發行的報紙二十餘種，其中地區性報紙「西安晚報」等七種，專業性報紙「北京科技報」等十餘種，皆未列入上文表內，希望以後有機會再加補充。



書評

史卡拉賓諾、于子橋合著：
現代中國及其革命進程：對傳統秩序的不斷挑戰
(1850~1920)

張玉法

Robert A. Scalapino and George T. Yu, *Modern China and Its Revolutionary Process: Recurrent Challenges to the Traditional Order, 1850-192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814 pp.

本書是史卡拉賓諾和于子橋合著三冊系列巨構中的第一冊，題名「現代中國及其革命進程：對傳統秩序的不斷挑戰（一八五〇~一九二〇）」。第一冊概括的時間是一八五〇至一九二〇年，第二冊概括的時間是一九二一至一九四九年，第三冊概括的時間是一九四九年到現在。此三冊系列巨構寫作計劃起於二十五年以前，當時他們曾決定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背景和發展寫一部解釋性的歷史。本冊是從太平天國之亂（作者稱為Taiping Rebellion）寫起，一直寫到中共的正式成立。由於全書的寫作經歷了二十多年的時間，先後參與寫作的助理人員達二十四人之多，其中二個為日本人，三個為美國人，十九個為中國人。

全書的寫作重點，從目錄及作者序言中可窺其大要。除序言、註釋、書目、索引外，書分十三章，第一章題名「傳統、變遷、與太平之亂」，第二章題名「改革、倒退、與叛亂——晚清的一些對立課題」，第三章題名「梁啟超對改革的辯護」，第四章題名「孫中山與革命運動」，第五章題名「無政府主義派的興起」，第六章題名「辛亥革命的到來」，第七章題名「共和主義——一個混亂的開始」，第八章題名「分裂的威脅」，第九章題名「自由主義、社會主義、與知識階層——對各種主義的反應」，第十章題名「自由主義、社會主義、與知識階層——知識界的主流及其反對派」，第十一

章題名「布爾賽維克主義與中國——初期的影響」，第十二章題名「平地崛起——青年時期的蔣與毛」，第十三章題名「中國革命的根源」。作者在序言中謂：本書除注重各時期的政治及社會經濟制度外，亦注重關鍵性的人物，尤其是這些人物應付各種不同危機的思想。從前述十三章的標題，即可了解本書在此種架構上所作的努力。

第一章「傳統、變遷、與太平之亂」，有三十七頁的篇幅，主要在解釋太平之亂的由來及影響，因為太平之亂在十九世紀中期搖動了中國傳統、促進了中國變遷。由於本書以太平之亂作為現代中國的起點，本章一開始對現代化的經濟和政治意義作了介紹。又由於本書以中國傳統解釋中國現代化的限度，本章接著也對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作了分析。不可否認的，本書在為中國革命的結局以及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得勢找根源。因此，本章即開始在這方面著筆，如把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陰、陽以及陰陽調和與黑格爾的正、反、合相比（頁五），從而解釋中國文化向來即有衝突和調和的一面，即為一例。在界定了現代化和分析了中國傳統文化之後，本章即開始敘述太平之亂，作者認為太平之亂是現代中國革命的前驅，無論國民黨還是中共，都自認自太平之亂中承襲了什麼。接下來敘述了洪秀全的倡始、網羅羣眾的方法、起兵的經過等等。作者強調太平軍的排滿性（頁十七），不贊同中共以階級鬥爭的觀點把太平之亂解釋為農民革命（頁十八至十九）。

第二章「改革、倒退、與叛亂——晚清的一些對立課題」，有七十頁的篇幅，主要論述自強運動、戊戌變法與拳亂。自強運動時期的主要工作為削平太平之亂及捻亂、建立洋務機構、設立語文學校、譯書、從事軍事裝備更新、進一步發展農工商業。作者把晚清的自強與中共的自力更生相比，更以民族主義、國際主義及二者的合流，反射出傳統中國陰、陽及陰陽調和，以及唯物辯證法中的正、反、合。本章對於自強運動的論述甚為簡略，對於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諸人介紹亦無多。接下來論述戊戌變法，在對康有為、梁啟超略加介紹之後，即論述一八九八年前夕的中國工商業、基督教的傳佈、中西關係、人民生活等方面，然後論述戊戌變法時期的財政改革、軍事改革、中央權與地方權失衡的影響、教育與考試制度的改革、以及所謂百日維新之失敗。失敗的原因很多，作者部分歸咎在中央新舊勢力相差懸殊，以及中央無能力動員地方勢力上（頁九三）。戊戌政變是保守派的反撲，保守派進一步訴於羣眾的排外情緒，則演為義和團之亂。作者引述赫德的話，認為此亂乃由於外人對中國主權侵害太多，致得罪中國人民所致（頁一〇七）。

第三章「梁啟超對改革的辯護」，有三十八頁的篇幅，主要論述戊戌政變後迄於亥辛亥革命爆發前梁啟超在日本辦清議報、新民叢報時期的一些政治理念。直到一九〇五年民報創刊前，梁啟超的清議報和新民叢報是在日本宣傳革命與改革最重要的刊物。新民與強國是梁啟超的最大關懷，他不贊同義和團式的排外，認為如是必遭外國報復；他在自立軍運動前後雖一度傾心革命，終連續為文反對革命，認革命足以召瓜分，而中國民智也不足以立刻實行共和（頁一二九）。在政治上，梁主張以開明專制為過渡，導中國於君主立憲。梁也抗拒社會主義潮流，對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大加批判；他認為中國的社會問題在生產不足，不在分配不均（頁一四二）；因此他也衛護私人企業，反對企業國營。

第四章「孫中山與革命運動」，有八十二頁的篇幅，主要論述一八九四至一九一一年間以孫中山為中心的革命運動，包括興中會、同盟會等革命組織，民報等的革命宣傳，以及前仆後繼的革命起事。在中國現代歷史上，梁啟超以推動改革著名，孫中山以倡導革命著名，二者大部分時間在對抗中。本部分首先介紹孫中山的早年，然後論述興中會的成立及其革命起事（廣州之役、惠州之役）。在論述同盟會成立前後時，論及了來自華興會的黃興和宋教仁的角色。在論述民報的宣傳時，論及了幾位重要執筆者章炳麟、汪兆銘、胡漢民、朱執信等人的角色。在論述同盟會時期的革命起事時，論及了秘密社會、新軍、外國、基督教會等的角色。大體說來，本章並無突出之處。

第五章「無政府主義派的興起」，有二十八頁的篇幅，主要論述一九〇七～一九一一年間革命陣營中無政府主義分子的活動，包括吳敬恒、張人傑、李煜瀛等在巴黎辦「新世紀」，劉師培、何震等在東京辦「天義」等。無政府主義派成員雖少，在革命理論上，對梁啟超和孫中山都有批評，在知識界也造成不少影響。無政府主義派，反帝國主義、反政府組織、反民族主義、反武力、反宗教、反傳統、反家庭、反精英分子，主張無政府共產主義、主張男女平等、主張自由企業間的互助、主張人道主義、主張大同主義，以及主張自由、平等、獨立等（頁二三八），確是有助於革命運動的推展。無政府主義者不僅結合了國際上無政府主義者的力量，且把暗殺政要的方法傳給革命黨。本章因為過於簡略，有些提出來的問題並未深入探討，如謂無政府主義者反傳統、反國粹，何以著名的國粹派學者如章炳麟、劉師培等都一度投入了無政府主義運動（頁二五三～二五五）？

第六章「辛亥革命的到來」，有六十頁的篇幅，約有一半的篇幅論述清

末的教育、軍事等改革與預備立憲，其下即論述武昌革命爆發前的革命情勢以及武昌革命爆發後的狀況。關於革命情勢，作者雖然注意到武昌革命爆發前夕兩湖地區的經濟因素如長江水災及長沙搶米風潮等，並不認為農民問題對革命的發生有若何重要。作者對中共史家將辛亥革命解釋為「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也加反駁，認為當時中國並無有力的資產階級，此革命未能完全成功，即與資產階級的脆弱有關(頁三〇八～三〇九)。就作者看來，辛亥革命的發生有許多原因，包括制度的無效、官箴的敗壞、儒學權威的失墮、民族主義的興起、以及新知識分子的離心等(頁三一九)。諸多因素，使代表舊秩序的滿清敗亡，而舊秩序一旦敗亡，很難恢復，啟開了日後一連串革命。

第七章「共和主義——一個混亂的開始」，有八十三頁的篇幅，主要論述民國建立的頭二年，即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間中國的政治、外交及邊疆問題。在政治方面，先敘述南京臨時政府的建立及南北議和，次論述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及唐紹儀內閣的建立。在此前後，儘管內閣的改組有些衝突，國民黨與袁世凱的關係大體和諧，到一九一三年一月，國民黨決定選袁世凱為總統，而將國務總理的位置保留給宋教仁或黃興(頁三七〇)，看來民主政治可以順利發展，但由於國民黨在國會選舉中獲得勝利，袁世凱不願宋教仁為國務總理，接著宋教仁被暗殺，使國民黨與袁世凱之間立即陷入激烈的對抗，終導致國民黨的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敗不久，國會停頓，共和主義陷於危機。在外交方面，探討無多，主要處理列強承認問題。在邊疆問題方面，英國欲佔西藏、俄國欲侵外蒙、以及俄日對滿洲的窺伺，作者均曾注意及之。但外交及邊疆問題，似為概論性質，不如專寫革命中的外交問題，以符合全書旨趣。

第八章「分裂的威脅」，佔八十頁的篇幅，主要論述洪憲帝制、南北分裂、五四運動、軍閥混戰等方面。作者對洪憲帝制的本身論述無多，對反洪憲帝制的勢力，如梁啟超及蔡鍔的活動，以及中華革命黨的活動等，都有較廣泛的檢討。洪憲帝制失敗後，大總統黎元洪、國務總理段祺瑞均無統合全國的資望與能力，經張勳復辟後，造成南北分裂，而南北本身亦不統一(頁四四一)。軍閥的保權與爭權，以及對帝國主義國家的依恃，引起年輕一代知識分子的不滿，醞釀而成五四運動。五四以後，北京政府益不孚人望，國家分裂益甚。帝國主義國家利用時機，英國對西藏、俄國對滿蒙的壓力有增無已。中國進入一九二〇年代，看來一切無望，舊的恢復不起來，新的也建立不起來(頁四八三)，作者認為這是中共興起、國民黨改組的主要原因(

頁四八五)。

第九章「自由主義、社會主義與知識階層——對各種主義的反應」，佔三十一頁的篇幅，主要論述民國建立之初江亢虎的社會主義、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劉師復的無政府主義、以及吳敬恆的勤工儉學運動等。第十章「自由主義、社會主義、與知識階層——知識界的主流及其反對派」，佔五十一頁的篇幅，主要論述五四前後陳獨秀、李大釗的社會主義，以及胡適的自由主義。這兩章的論述，因以人物為中心，彼此界線分明。惟在論述無政府主義運動時，對自江亢虎的中國社會黨分裂而出的沙淦等人甚少論述，而對劉師復在民初無政府主義運動中的角色也沒有特別強調。

第十章所謂知識界的主流，指新青年周圍的一些人及其傳佈的思想，因此對陳獨秀、李大釗、胡適三人的思想介紹特多，三人中陳獨秀和李大釗大談社會主義，胡適則本其經驗哲學的訓練，勸人多研究問題少談主義，但胡適也是皈依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新青年」的真正反對者，在作者看來是梁啟超、梁漱溟、張君勱等人，因為他們都是衛護中國傳統文化的人（頁五六八）。衛護中國傳統文化的人當時屬於保守派，但作者卻未論及另一批保守派的學者——「學衡」周圍的一些人。

第十一章「布爾賽維克主義與中國——初期的影響」，佔五十六頁的篇幅，主要論述列寧早年對中國的了解、俄國革命成功後向中國的試探、共產國際在中國推展共產主義運動、以及留法勤工儉學生對共產主義運動的參與等。列寧在中華民國建立之年，對孫中山帶動的民主、自由頗加讚揚，對袁世凱透過借款與歐洲資本家相結則頗多批評。儘管列寧把孫中山的革命視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認為這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必經途徑，所以在俄國革命成功後即開始向中國試探，包括優林、維丁斯基的使華。另一方面，中國知識界也對俄國革命有了積極的反應，作者在此提到了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等人，對周恩來並有更多的介紹。中共的勢力所以在中國能夠成長，本章的論述至少可以顯示三點：①知識界的親俄傾向，②國民黨的聯俄容共政策，③留法勤工儉學生的大量投入共產主義運動。

第十二章「平地崛起——青年時期的蔣與毛」，有五十五頁的篇幅，主要論述一九二一年前的蔣中正與毛澤東。作者認為從蔣的早年看其能夠崛起，得力於五個因素：①出身於鄉下的中產之家，有能力外出受教育。②有勇氣、有決心，忠於長官。③是民族主義者，忠於中國民族與文化。④先後受到陳其美和孫中山的賞識與提拔。⑤自日本學得秩序、訓練與講求效率（

頁六三七——六三八)。毛澤東早年辦過湘江評論，作者花了很大的篇幅從湘江評論中檢討其早年思想。毛側身知識圈，對近代西方思想雖有了解，受中國傳統思想影響仍大。作者認為毛與蔣有共同之點，即二人皆不重物質享受，極需以權力改變無助無望的中國社會（頁六七八）。

第十三章「中國革命的根源」，為全書的結論，只有八頁的篇幅。作者認為近代中國革命的形成，有五個重要因素：一為領導的因素，意指江山代有才人出，自十九世紀中期以後，每逢危機存亡之秋，政場上總有一些有能力的人出現。二為制度的因素，意指當傳統中國制度不能應付新局勢時，一般領導人多以西方民主制度為典範，欲加引進，但愈來愈多的人則認為西方的制度並不適合中國。三為文化的因素，作者認為中國文化不適合西化，故早期的西化派均失敗，蔣中正與毛澤東所以能成功，乃因遵循中國傳統之故。四為空間的因素，指中國地大人多，尤其是內地及邊疆廣大，影響現代化。五為時間的因素，指當中國開始以西方民主制度為典範從事現代化時，西方本身對民主制度發生了懷疑，使部分中國領袖不得不另尋他途。作者最後強調，中國革命受傳統文化影響至大：洪秀全的政權以天國始以朝代終；戊戌變法以全面改革始以改良傳統終；辛亥革命以激進始以保守終；孫中山在二次革命後較傾向傳統，其後蔣中正返回儒家傳統，毛澤東死時有如皇帝，鄧小平上臺又訴於傳統道德。所以該書的最後一句話說：「古代社會的傳統政治文化，對追求的新事物產生很大的限制與影響。」

本書的特點有三：①作者為政治學者，處理歷史問題能運用社會科學中的各種概念，如對革命、反革命、叛變、政變、現代化、經濟成長等，都曾加以界定。②善用比較方法，如對中、日、俄、法等國的革命和現代化等有比較，對所論列的人物之間，亦間有比較。③以人物為中心，不涉及許多瑣碎的革命史實，較有可讀性。

本書的缺點是：①以一九四九年中共革命成功的史實追溯十九世紀中期至二十世紀初期的歷史，難免有一些先入為主的觀念。一切的解釋皆為中共的得勢鋪路，但在本書的下限一九二〇年，尚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中共的革命必然成功。中共的得勢，也許只是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間的中日戰爭造成的。②全書雖大體依照時間先後，論述不同的人物及其言行；但各章並不銜接，結構略嫌鬆弛。③有關中文的學術論著，參考不足，如頁三八九～四〇四論述民國初期的外交，張忠絳早有一本論證深入的專著，作者則全未用中文資料。雖然如此，第二、三冊早日問世，仍是史學界所期待的。

韓特著：斯文的福音

李又寧

Jane Hunter, *The Gospel of Gentility: American Women Missionaries in Turn of Century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318 pp., \$25.00

西方傳教士在近代中國的活動，層面廣闊，其影響歷久不衰。它是史學領域內一方豐盛的園地，有關的中文及外文史料與論述，為數甚多，其著者，如呂實強教授的「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

西方傳教士所以能長期作為被研究的對象，因素很多，其中之一是：他（她）們留下豐富的記錄。對西人來說，清末民初的中國，好似天方夜譚，奇怪荒誕，是書信和報告的新鮮資料。而且，在落後的「異教國」傳播「福音」，具有一種使命感，往往以所見所聞、所經所歷，載之於日記。這些書信、報告、日記，經個人及教會保存下來，數量龐大，為近代中國的研究，提供可貴的原始資料。美國數間大學圖書館，刻意收藏美國傳教士資料，並鼓勵學生利用這些資料，寫碩士、博士論文，其犖犖大者如：哈佛、耶魯、普林斯敦。亨利·魯斯基金會（Henry Luce Foundation）所資助的「在中國的基督教史計畫」（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Project），鼓勵後博士研究，並舉辦國際大會討論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交流。因此，傳教士在中國，是美國當今漢學的一個熱門。本文簡介者，「斯文的福音」，是此潮流中的一本傑出的著作。作者韓特女士，一九八一年得到耶魯大學博士學位。她的博士論文，題為：“Imperial Evangelism: American Women Missionaries in Turn-of-the-Century China”。這論文是此書之本，基本資料來自耶魯的收藏，另參考了其它傳教士檔案，如 Methodist Episcopal Woman's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及在奧耐剛大學圖書館（University of Oregon）的文件。

所引用的中文資料，屈指可數。

清末民初，在華美國女性傳教士，居美國在華全部傳教士半數以上。她們的主要工作分三類：醫護、教育、及傳教。工作可異，主旨爲一，即傳播「斯文的福音」，希望把中國婦女感化，教育成爲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典型女性——信仰基督、溫文守禮、勤儉持家。因爲她們並不鼓勵反逆或革命，而能踏實地介紹新知、啟發民智、醫病救人，甚受朝野的敬重。畢竟是外國人，以「西方的母老虎」視之者，亦不乏人。在心理上，她們不能與中國人認同，難免有孤寂落漠之感。而且，傳教工作與家庭生活，常難兼善。女性傳教士尤其深感這種衝突和矛盾。此書以四十餘位美國女性傳教士爲例，描述她們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在華的工作、生活、及心態。

第一章，簡述晚清在華傳教士的工作、及禁纏足、與女學的開始。

第二章，開始提供新鮮的資料。它探討數十位美國女性傳教士的家庭背景、職業技能、和往華傳教的動機。美國東北部的新英格蘭，是美國傳教運動的發源地。但是，在二十世紀，大部分的傳教士來自中西部農村。中西部的開發，晚於東北部，人們富於拓荒的精神。來華女教士中，來自中西部小城教士之家者甚眾。很多是家中的長女，有繼承父業之志，具爲母爭光之心。她們多是大學畢業，來華前有過職業經驗，不少曾在鄉村小學中教過幾年書。那時，美國的鄉村教師，薪俸微薄，升遷渺茫。往華傳教，好似探險拓荒，雖險猶榮，能得到社會的肯定、心理的補償、精神的提昇。而且，廿世紀初，基督教青年會、女青年會、學生志願運動團，在各大學徵召海外傳教工作者，宗教情緒高漲，蔚爲熱潮。志同道合的男女教士，不少在受訓期間，結爲伴侶，而後同赴中土，追求事業和人生的理想。

單身女性傳教士的比例甚大。第三章描述她們的生活，並與男性傳教士作一比較。因爲單身，她們格外想家。寫家信是她們生活中很重要的事，而且常寫得娓娓動人。

十九世紀在華的單身傳教士，多寄居於已婚傳教士之家。因爲中國人常懷疑這些單身女性傳教士，是寄居家男主人的姨太太，二十世紀後，各教會爲單身女教士另建宿舍。宿舍像個大家庭，年長者主持，物質上共通有無，感情上甚爲融洽。有的單身女教士情誼深切，同床而眠，時人並不以爲奇。

對單身女教士，男教士常以保護者自居，溫和有禮，親切恭維，可是背地裏常呼之爲「老姑娘」，憐之憫之，認爲她們是無可奈何，尋如意郎君而不可得。

在當時的各教會中，男女並不平等。女性傳教士的薪俸微薄，她們不能參與一般性的教會會議和決策，也沒有選舉權。有關婦女工作的會議，她們才有權發言。又因缺乏行政和組織的經驗，她們屈居從屬地位，惟以自我克制、自我犧牲作為精神的自解。教會不明文阻止女教士結婚，但含蓄地期望她們不婚。如果一位女教士在第一任期內結婚了，她必須退還教會所供給的路費及服裝費。

第四章描述已婚女傳教士的家庭和事業。約有半數的女教士，是在她們居華的第一年結婚的，在往華的海船上渡蜜月者甚眾。婚前，她們多覺得結婚有助傳教，未考慮家庭與事業的衝突。

家事是女教士的極大負擔。雖然都有佣人，但教士不信任中國的養育法。管教兒女幾乎是女教士的責任，從孩子生下到十二、三歲，都在家裏待著，讓母親灌輸美國教育。中國各教區，都有教會辦的小學，那是為中國孩子所設。傳教士決不送自己孩子上中國學校，不讓子女學中文，更不讓子女與中國小孩一道玩，唯恐下一代受中國的影響。這種「保護」教育法，養成美國孩子的自大感，以中國人為卑下。

在中國環境中，傳教士極不自在，也無意順應中國習俗，惟刻意在自己的家中，建立一個「安全島」。住處的四周，聳立有形的高牆；主人心中，也有文化的高牆。男女教士皆堅持美國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中國的人、事、物，拒而遠之。美國教會機構，原希望教士家庭在中國社會起示範作用，實際未符所望。

男教士出外傳教，其妻緊守「安全島」，不但時感寂寞，且覺對神有愧，因為初意是來華傳教，有其神職。忠於家，還是忠於職，常是已婚女教士心中矛盾的焦點。

在母親的「保護」教養下，兒女成長至十二、三歲，必歸美國上學。長年的離別，又使傳教士母親掛慮、憂傷。許多已婚女傳教士，中年以後，重拾傳教工作，實現早年的願望，覺得對上帝與家庭都克盡己職。

第五章，題為「家裏的帝國」，描寫未婚與已婚女傳教士的家居生活。她們的傢俱、地毯、用具，掛的畫，甚至於被單，都是從美國運來。吃的是西餐，用刀叉。食品多運自美國，喜肉類，不喜蔬菜。連中國的茶，都不愛喝。出外旅行，即使一、二日，像是搬家，什麼都帶。她們認為，美國中、上層階級所仿效的維多利亞後期的生活方式，是文明的象徵。在傳教士眼中，中國是野蠻的。

女傳教士很注重儀表和衣服。在中國，她們無須追隨美國當時流行的款式，這是她們的新自由，樂而享之。她們所喜的，是維多利亞式的緊腰長服，儘管當時的中國人看不慣，她們不願穿中國寬寬大大的袍服。出外時，長服上加一件較寬的短外套或披風，稍掩體態。帽子，是衣飾的一部分，也是講究的。若居通商大埠，出入種種西人聚會，周旋於外交人士及達官顯要之中，更須比美鬪妍。

廿世紀初的美國，國際聲勢日隆，美國居華傳教士亦覺與有榮焉。每家至少用三個佣人。縱使經濟不寬裕，體面總得維持的。華僕，是教徒、是侍從、是奴婢、是戰敗國的細民。喚奴使婢，有關國體。喚使之間，種族、文化、道德的優越感，畢露無遺。家即殖民地，帝國的具體而微。主僕之際，既使有感情，高下之分，豈能相忘?!

第六章，題為「帝國的傳教」，敘述女教士與中國婦女的关系。引導中國女性皈依基督教，是女教士的工作主旨；增加自己在中國的權威和提高中國婦女的社會地位，並非她們有意識的願望。

概而言之，傳教士的社會觀甚為保守。庚子後，少數中國女性邁出家門；民國後，女性的演變，甚令傳教士吃驚。繼之而認為，中國女界新得的自由，供給教士改造中國人性格和靈魂的良機。教士提倡女子教育、清潔衛生、道德的自制；鼓勵女性結婚，克盡家庭和社會的職責。傳教士以「家為女性最重要的領域」，以女性的柔順為美德。

女教士希望以仁愛打動中國人的心靈。窮苦無依的女性，她們予以經濟的援助和職業的訓練。窮人的孩子，她們收養。所收養的，大多數不跟她們一塊住，而是她們供給生活費，由親生父母帶養。行善，即為主服務，使她們體會己身的權力，因而有種成就感。

然而，親切的仁舉未能融釋種族的差異。西人眼中，中國人瘦小纖弱，營養不良；中國的男性不够男性，不論年紀多大，喜呼之為「男孩」，所喜的中國女性，女教士愛稱為「寶貝」、「寵物」。雖然她們認為中國男性孔武不足，卻能欣賞他們的溫文守禮。

女教士原以為來華是為上帝犧牲自我，為人服務。沒想到，貧窮落後的中國竟供給她們許多發現自己能力的機會，豐富了她們的生活內容，增加生命的意義。在華的經驗，是她們的一種 liberation。

第七章，題為「中國婦女與基督教身份」，討論中國女基督徒的出身、職業、及婚姻。

李健民著：五卅慘案後的反英運動

李 守 孔

書 名：五卅慘案後的反英運動
 作 者：李健民
 出 版 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53)
 出版年月：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月出版
 頁 數：二四〇頁

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的上海五卅慘案，引發全國之排英運動，其著者如六月十一日之漢口慘案、六月二十三日之廣州沙基慘案、七月二日之重慶慘案、七月三十一日之南京慘案等；其中尤以沙基慘案死傷高達五百餘人。此一運動延續逾一年之久，影響所及，促成國民革命軍之北伐與全國之統一，以及部分租借地之歸還，關稅之自主，和上海臨時法院之收回。

李健民先生所著「五卅慘案後的反英運動」，認為此一運動是近代中國民眾反壓迫求平等運動中最壯烈的一次運動，其所以能轟動全世界，主要在於全國民眾共同之奮鬥。其主旨不在詳述五卅慘案的經過，而在探討慘案發生後全國各界的反英運動及其影響。全書共分六章，連同所附徵引書目，共二四〇頁，約十五萬言，其中第二、三、五章係全書重點，所佔篇幅較多。

第一章，五卅慘案的背景和經過，佔二十三頁。作者指出五卅慘案的背景有三：（一）自鴉片戰爭百餘年來帝國主義侵略的結果，享盡在華特權，影響中國工商業之發展，加重民生之困難，使全國民眾遭受到強烈的心理挫折與壓迫感。（二）中國在列強勢力角逐下，各方面發生了鉅大的變化。（1）政治方面：民國十三年冬孫中山先生的北上宣言，主張對內打倒軍閥，對外廢除不平等條約，深扣國人之心弦。（2）財經與社會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中國萌芽的民族工業，再度受到摧殘。由於農村破產，人口向都市集中，提高了婦女工人商人和自由職業者的地位。（3）教育與思想方面：由於教育的推廣，西方民主自由平等思想和社會主義，引起國人的興趣。（三）上海係中外接觸的前哨，公共租界（英美租界合併而成）無異外國在華所建立的政權，係中國政令統一最大的障礙。

作者對民國十四年五月三十日上海慘案之記載，僅作簡要之說明，只佔

兩頁篇幅。謂公共租界英界南京路老關捕房附近，英巡捕（按：十一印捕，十二華捕）向無辜徒手遊行羣眾開槍射擊，當場死四人，另七人重傷送至醫院救治無效斃命，傷者無數。

第二章，五卅慘案後的反英宣傳，佔五十三頁。作者分就組織、方法、活動、內容、效果五部分加以說明，係全書研討重心之一。(一)宣傳團體的組織：促成民間愛國團體的振興，其中上海學生聯合會實居於領導之地位。(二)宣傳的方法：口頭法可分為座談、演講、話劇、歌謠、鼓詞、唱片及哭泣等。文字法可分為報紙、期刊、通電、宣言、議決案、啟事、廣告、壁報、招貼、標語、傳單、信函，及血書和絕命詞等。此外並採用圖畫、照片、畫像、明信片、電影、幻燈等技巧。(三)宣傳的活動：隨著時勢的發展可分為三個時期：(1)自民國十四年五月底至六月下旬，為宣傳的興盛時期。(2)自六月下旬至九月中旬，為宣傳的變相時期。(3)自九月中旬以後，為宣傳的衰落時期。各團體活動地區，以上海、北京、廣州三地為樞紐。(四)宣傳的內容：主要分為四項：(1)指責英國的侵略罪行，(2)駁斥英人掩蓋罪行的說辭，(3)激發國民的愛國意識，(4)提出對抗英國的辦法。(五)宣傳的效果：其豐碩成果有二：(1)促成國人的覺醒，使愛國心達到沸騰的程度。(2)博得外人對華的同情，各國多指責英人的暴行，在華外僑及傳教士咸發出人道的呼聲。

第三章，五卅慘案後對英的經濟抵制，佔六十二頁。作者分就組織、實施、衰落、效果四部分加以說明，係全書討論重心之二。(一)抵制的組織：作者指出當時各種愛國團體具有嚴謹性，普遍性，和分工專業性。並列舉廣東省港罷工委員會，和上海提倡國貨會兩團體加以詳細的說明。(二)抵制的實施：分抵制英貨，提倡國貨，和罷工三項。其中廣東省港大罷工尤為突出，罷工者高達二十餘萬人，對香港經濟造成重大之打擊。(三)抵制的衰落：由華北開其端，華中繼之，華南因國民政府資助，一直維持到民國十五年十月。作者檢討衰落的原因：(1)內亂的頻繁，(2)各團體間的不協調，(3)官方的抑制，(4)中國工商界無應變的實力，(5)天災與匪患，(6)募款的枯竭，(7)英人的反擊。(四)抵制的效果：作者列舉上海、寧波、鎮江、南京、九江、長沙、武漢、宜昌、重慶、昆明、廈門、汕頭、福州、廣州、梧州、瓊州、牛莊、山海關、天津、青島、濟南等城市，民國十三、四年間對英貿易之比較，輸出方面減少約百分之三十二，其中尤以民國十四年下半年最為顯著。輸入方面英國由對華貿易總額百分之一二·四，降為百分之九·八。

第四章，五卅慘案的募捐，佔二十六頁。作者以五卅慘案發生地上海為

討論重心，分募捐團體的組織、募捐的情況、募捐款項來源的分析、捐款總數的探討四項加以分析。(一)上海募捐重要團體有上海總商會五卅事件委員會、上海學生聯合會籌款部、上海總工會、上海臨時濟安會、工商學聯合會等。(二)上海募捐的方法分樂捐、勸募、迫捐三種。(三)上海捐款的來源包括各行業，及華僑社會和世界各國人民。(四)捐款總數，自五卅慘案發生後一年期間，全國約九百萬元，其中上海一地佔三百萬元，廣東佔五百萬元。

第五章，五卅慘案後反英運動的影響，佔三十八頁。作者分就政治、外交、教育、社會、財經五方面加以說明，係全書研討重心之三。(一)政治方面：協助廣東統一，引發軍閥大混戰，幫助國民革命軍北伐之成功，造成國民黨清黨之伏因。(二)外交方面：開廢除不平等條約之先聲，如民國十四年十一月北京關稅會議後，各國承認中國自民國十八年元月一日起實行關稅自主。民國十五年八月三十一日，上海領事團與江蘇省政府簽訂「收回上海會審公廨暫行章程」等。(三)教育方面：民族主義之發揚，軍事教育之重視，教育權的收回。(四)社會方面：工會的增加，農民團體的擴展，引發政府對勞工問題的重視。(五)財經方面：其優點給予中國政府整理財政，增收海關二五附加稅的良機。其缺點由於全國各地之總罷工，直接間接的損失難以估計。僅上海一地紗廠兩月之罷工，各廠直接間接之損失約三百三十萬元，加上工人工資高達兩千萬元。

第六章，結論，佔七頁。作者指出五卅運動基本上是反英愛國運動，廣東革命政府秉持反對帝國主義打倒軍閥之目標而奮鬥，北京政府在心態上則不免傾向退縮和保守。此一運動乃國人爭公理，爭人權，爭生存的運動，是民族主義精神的表露。參加人數之多，地區之廣，歷時之久，效果之顯著，為中國歷史上空前所未有。不僅使中外條約權利上產生了重大的變化，同時為條約口岸時代結束的前奏。

本書資料運用極為豐富，包括中國外交部檔案、英國國家檔案、華洋貿易總冊等原始史料，並參考近年出版之五卅運動、省港大罷工、工人運動、農民運動等有關專書及資料彙編，以及當時之報刊及雜誌等。全文觀點正確，論事平穩，所製各種統計圖表殊富功力，為截止目前國內研究五卅運動最佳之作品，可讀性甚高。較之中共出版之「五卅運動簡史」（任建樹、張銓合著，一九八五年五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五卅運動」（傅道慧著，一九八五年三月，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等書，以偏激之政治教條，歪曲此一運動係中共所領導之「反帝愛國運動」，其價值不可以道里計。



論文目錄

國內歷史研究所有關中國近代史研究之 博碩士論文目錄 (1985~1987) *

一、博士論文

畢業學校	作者	論 文 題 目	指導教授	畢業年月(民國)
師範大學	朱 鴻	明成祖與永樂政治①	李國祁	七十五年六月
師範大學	溫振華	二十世紀初之臺北都市化	張朋園	七十五年六月
師範大學	劉德美	阮元學術之研究	陸寶千	七十五年六月
師範大學	吳文星	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	林明德	七十五年六月
師範大學	張瑞德	中國現代鐵路事業管理的政治層面 分析(一八七六~一九三六)	張玉法	七十五年七月
文化大學	金鐘博	明代里甲制與賦役制度之關係及其 演變	宋 晞 吳緝華	七十四年六月
文化大學	蔡泰彬	明代漕河之整治與管理	程光裕	七十四年六月

二、碩士論文

畢業學校	作者	論 文 題 目	指導教授	畢業年月(民國)
臺灣大學	邱雯雯	現代華北四省煤礦業發展之研究(一八七五~一九三七)	劉翠溶	七十五年六月
臺灣大學	詹士模	宣統朝的政治領導階層(一九〇九~一九一二)	李守孔	七十五年六月
師範大學	黃麗生	淮河流域的水利事業(一九一二~一九三七)②	李國祁	七十四年六月
師範大學	李惠惠	新潮雜誌與五四新文化運動	張玉法	七十五年六月
師範大學	詹素娟	清代臺灣平埔族與漢人關係之研究	張朋園	七十五年六月
師範大學	章貞利	東北交通委員會與東北鐵路發展(一九二四~一九三一)	趙中孚	七十五年六月
師範大學	黃中興	楊度與民初政治(一九一一~一九	張玉法	七十五年六月

一六) ③

師範大學	林麗容	民初讀經問題初探 (一九一二~一九三七)	王家儉	七十五年六月
師範大學	許淑玲	幾社及其經世思想	李國祁	七十五年六月
師範大學	崔慶泳	錢穆史學思想初探	胡昌智	七十五年六月
師範大學	朴英順	薛福成經世思想之研究	陸寶千	七十五年六月
師範大學	張三郎	五四時期的女權運動 (一九一五~一九二三)	張玉法	七十五年六月
師範大學	韓靖宇	徐樹錚與皖系政權	林明德	七十五年六月
師範大學	李宇平	近代中國的貨幣改革思潮 (一九〇二~一九一四) ④	王樹槐	七十五年六月
師範大學	陳秀卿	華北農村信用合作運動 (一九一九~一九三七)	張玉法	七十五年六月
師範大學	謝蕙風	民國初年新聞自由的研究 (一九一二~一九二八)	張玉法	七十五年六月
師範大學	劉惠璇	中華教育改進社與教育獨立運動 (一九二一~一九二七)	蘇雲峯	七十五年六月
師範大學	陳純瑩	明鄭對臺灣的經營 (一六六一~一六八三)	李國祁	七十五年六月
師範大學	陳仲瑜	民國初年農業改良思想 (一九一二~一九三七)	張玉法	七十五年六月
師範大學	丁應求	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運動的研究	林明德	七十五年九月
政治大學	朴明熙	「五四」與「三一」發生背景之比較研究	胡春惠	七十五年一月
政治大學	安明子	盛宣懷與清末鐵路建設	王樹槐	七十五年六月
政治大學	俞忠烈	民國初年的無政府主義運動——劉師復與「民聲」	張玉法	七十五年六月
政治大學	吳蕙芳	民初直魯豫盜匪之研究	戴玄之	七十五年六月
政治大學	甘麗珍	袁世凱與南北議和	林能士	七十五年六月
政治大學	黃益謙	陸榮廷與廣西	陳存恭	七十五年六月
政治大學	林澤震	新生活運動——理論與實踐的分析 (一九三四~一九三七)	蔣永敬	七十五年六月
政治大學	陳德漢	山東義和團之研究	戴玄之	七十五年六月
政治大學	萬麗鵬	辛亥革命時期的社會主義思潮 (一八九五~一九一三)	張玉法	七十六年一月
輔仁大學	黃文齡	司徒雷登使華之研究	柯南希	七十五年六月

東海大學	黃正川	清初監察組織的發展與功能的演變 (天聰五年~雍正十三年)	古鴻廷	七十五年
東海大學	鍾美芳	日據時代樸社之研究	張勝彥 尹章義	七十五年
東海大學	賴盟騏	翁同龢與晚清政局	趙中孚 黃福慶	七十五年六月
東海大學	張永楨	清代臺灣後山開發之研究	張勝彥	七十五年
東海大學	王淑慧	清末學部之研究(一九〇五~一九一一)	陶英惠	七十六年一月
文化大學	郁維明	明代周忱對江南地區經濟社會的改革	程光裕	七十四年六月
文化大學	陳允成	明代鋪戶之研究	程光裕	七十四年六月
文化大學	廖瑞銘	余子俊研究	程光裕	七十四年六月
文化大學	計文德	從四庫全書探究明清間輸入之西學	吳哲夫	七十五年六月
文化大學	陳亦榮	清代漢人在臺灣地區遷徙之研究	楊家駱	七十五年六月
文化大學	張增信	明季東南中國的海上活動	梁嘉彬	七十五年七月

附註：* 有關一九五三~一九八六之博碩士論文目錄，請參見「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一期(民國七十五年三月出版)。

- ①師大歷史研究所專刊第十七種，預定七十六年十月出版
- ②師大歷史研究所專刊第十五種，七十五年十二月出版。
- ③師大歷史研究所專刊第十六種，七十五年十二月出版。
- ④師大歷史研究所專刊第十八種，預定七十六年十月出版。

(以上各項資料承蒙各校歷史研究所提供，特此致謝。)

日本早稻田大學人文社會各研究所 有關中國近代史研究論文目錄

一、文學研究所

作 者	論 文 題 目	指 導 教 授	畢 業 年 度	備 註
板敷庸一	胡適と新文化運動	福井康順	一九五八	東洋哲學
太田弘毅	清朝とビルマとの關係について	栗原朋信	一九六五	東洋史
董寶桓	中華民國社會保險制度と諸外國との比較研究	武田良三	一九六七	社 會

菱 沼 透	魯迅と日本近代文學	稻垣達郎	一九六七	日本文學
細野浩二	明末清初江南における農村社會經濟	栗原朋信	一九六八	東洋史
張 琴 挑	臺灣の都市化について	武田良三	一九六九	社 會
片倉俊太郎	日本人の中國觀	栗原朋信	一九六九	東洋史
浦邊正信	中國に於ける體制變革の問題	栗田直躬	一九七〇	東洋哲學
松 村 勇	對華二十一條要求の研究	深谷博治	一九七〇	日本史
武仲弘明	孫文の反帝國主義認識の發展過程——半植民地中國におけるナショナリズムに關連して	栗原朋信	一九七一	東洋史
高橋良政	曾國藩の思想と朱子學	原田正己	一九七二	東洋哲學
郭 秋 義	日本帝國主義の臺灣植民地教育	尾形俊雄	一九七三	教 育
尾形洋一	「滿州事變」直前の張學良政權	栗原朋信	一九七三	東洋史
渡 邊 豐	招商局の設立と發展	栗原朋信	一九七三	東洋史
柴田善雅	東三省の金融構造と日本帝國主義——九・一八以前の舊「滿州」における日本と中國の金融關係	洞 富 雄	一九七四	日本史
吉良芳恵	日本帝國主義の「滿州」侵略と鐵道問題——九・一八以前の「鐵道懸案」にみられる日中の對抗	洞 富 雄	一九七四	日本史
前 田 司	清代初期の保甲・鄉約	栗原朋信	一九七四	
張 美 慧	中國啟蒙思想家——梁啟超の研究	尾形俊雄	一九七五	教 育
竹治文雄	龔自珍の思想——清代後半期變革思想の一原點	栗原朋信	一九七五	東洋史
徐 邦 男	シベリア出兵をめぐる日中關係の展開	洞 富 雄	一九七六	日本史
森永優子	日中戰爭期の「和平」運動	栗原朋信	一九七六	東洋史
山本多佳子	日本帝國主義下の臺灣に於ける民族「同化」政策について	栗原朋信	一九七六	東洋史
王 豐 琢	臺灣に於ける親族關係と村落構成の研究	佐藤慶幸	一九七七	社 會

林 建 郎	太平天國對外關係史序説	古 賀 登	一九七七	東 洋 史
星野史雄	吳敬梓と「儒林外史」	蘆田孝昭	一九七九	中國文學
倉持責文	前期創造社における成仿吾 について	澤田瑞穂	一九七九	中國文學
小林共明	留日清國陸軍學生の研究	福井重雅	一九八〇	東 洋 史
太田美香	十七、八世紀にヨーロッパに 傳えられた「中國」	長澤和俊	一九八二	東 洋 史
彭 淑 楣	張之洞と中國近代教育	大 槻 健	一九八五	教 育 學
柳 澤 明	キャフタ條約締結に至る背 景	吉田順一	一九八五	東 洋 史
岡 洋 樹	乾隆期清朝のハルハニモンゴ ル支配	吉田順一	一九八五	東 洋 史

二、政治研究所

作 者	論 文 題 目	指 導 教 授	畢 業 年 度	備 註
申 國 柱	近代韓國の國際關係の研究 ——雲揚號事件より天津條 約前後に至る日清韓三國關係	信 夫 淳 平	一九五五	
岡 庭 健	アジアの政治經濟情勢と日本 賠償の問題	神 川 彦 松	一九五六	
李 綸	中國の政黨	吉 村 正	一九五六	
傅 進 三	近代中國における政黨の研究 ——特に中國國民黨と中國共 産黨を中心として	吉 村 正	一九五九	
許 世 楷	臺灣をめぐる日中關係 ——一八七一～一八七四年の 臺灣事件	田 中	一九六一	
木下平三郎	滿州事件をめぐる日米關係	吉 村 健 藏	一九六二	
潘 國 男	中華人民共和國に於ける地方 行政組織の新しい傾向	後 藤 一 郎	一九六二	
玉澤徳一郎	中ソ論争の研究 上下	吉 村 健 藏	一九六四	
原 彬 久	中國における國際政治思想の 研究——毛澤東思想を中心と して	吉 村 健 藏	一九六四	

木村和夫	中華人民共和國の對外政策 ——安全保障政策を中心と して	吉村健藏	一九六七
橋爪慶二	アメリカの對中國政策の研究	吉村健藏	一九六七
坂田博史	中國外交政策決定要因の研究	吉村健藏	一九六七
黃哲元	中華民國の政治體制——議院 內閣制か大統領制か	大西邦敏	一九六七
陳昭徳	行政訴訟制度の歴史的研究 ——特に中、日兩國の制度を 中心として	佐藤立夫	一九六九
小黑好雄	米中關係の展開	吉村健藏	一九七一
山下琢二	アメリカの對中國政策——一 九四五年～一九五五年	吉村健藏	一九七二
陳慶隆	中國民族運動に関する一考察 ——一八四二年の阿片戰爭か ら一八六四年の太平天國まで を中心として	吉村健藏	一九七二
高晃公	毛澤東思想と中國の政治	飯坂良明	一九七六
小林直樹	橋樑と中國——橋の「階級闘 争」觀	林茂	一九七九

三、經濟研究所

作 者	論 文 題 目	指 導 教 授	畢 業 年 度	備 註
張 啟 藏	臺灣における貨幣金融制度と 政策	鶴岡義一	一九七二	
傅 銘 川	統計上から見た臺灣の經濟事 情	保田順三郎	一九七二	
蔡 宗 義	戦後臺灣の資本蓄積と經濟發 展	小松雅雄	一九七八	
白木三秀	戦後臺灣労働市場の一分析	平田富太郎	一九七八	
李 明 彬	臺灣の經濟と金融	掘家文吉郎	一九八〇	
文 容 才	現代中國經濟における企業自 主權擴大——その背景と理論 に関する考察	堀江忠男	一九八二	

四、法學研究所

作 者	論 文 題 目	指 導 教 授	畢 業 年 度	備 註
宮 坂 宏	「太平天國」の土地政策—— 天朝田畝制度について		一九五七	
戸 塚 純 一	中國勞働運動と勞働法		一九六〇	
李 文 村	中華民國會社法改正草案に於 ける授權資本の制度について		一九六四	
簡 義 憲	日本と中華民國に於ける「不 動產物權と登記」の規定の比 較		一九六五	
韓 名 銅	中華民國株式會社法における 株主總會についての諸問題		一九六五	
黃 博 學	中華民國會社法審査修正草案 の比較法的考察		一九六六	
樂 民 生	中國勞働組合法の理論と實踐		一九六六	
西村幸次郎	中國に於ける「司法獨立」批 判		一九六七	
土 井 寬 治	人民公社化運動への過程とそ の内容（勞働者持株制に對す る一視點として）		一九六八	
土 岐 茂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 領に關する一考察		一九七四	
杉 中 俊 文	中國の社會主義的契約——供 給契約の形成と發展		一九七五	
木 間 正 道	中國革命における大眾路線と 法——革命的政法原理の形成 と發展		一九七六	
澤 田 治 夫	中國政府承認をめぐる一考察		一九七七	
野 澤 秀 樹	中國國民經濟復興期の勞資關 係——私營企業における管理 の民主化をめぐつて		一九七七	
國 谷 知 史	中國都市居民委員會		一九七八	
中 島 政 希	日中國交正常化の研究		一九七九	
道 生 健 太 郎	臺灣事件前夜にける鎮國令の 一背景		一九八四	
喜 多 三 佳	清代、地方段階における裁判 の實態について		一九八五	



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 (1986年7月至1987年3月)

本大事紀要記載內容以一九八六年七月至一九八七年三月國內外有關近代中國史之研究活動為主，包括：學術會議、學術演講、學人動態、學術交流、出版消息，以及與近代中國史研究有關之其他消息。因資料不足，掛一漏萬之處，尚祈補充指正。

(1986) 7.3 中共「全國華僑歷史學會第二次代表大會暨第三次學術討論會」在北平召開，為期六天（至 7.8）。共一百二十餘位學界、僑界人士參加，提出論文六十篇。

7.25 中共「北京師範大學」、「遼寧師範大學」、「遼寧大學」、「南開大學」、「山東大學」等團體合辦的「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在大連市召開，會期五天，中外學者一百四十餘人出席，提出論文九十餘篇。

8.6 日本辛亥革命研究會「夏期合宿」討論會在靜岡縣伊東市舉行，會期三天，包括中國大陸「北京大學」的王曉秋和「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沈祖燁等人，共有三十餘人與會。

8.6 中共「青海省地理學會」和「青海師大」等團體在西寧市召開「第三屆全國地學史學術討論會」，會期五天，共提出論文四十三篇，內容分西北開發史、區域地學史、海洋學史、地圖學史、地學思想史及地學史概論等幾個方面。

8.12 中共在廈門成立「廈門鄭成功研究會」。

8.13 中共「東北地區中日關係史研究會」等團體聯合召開的「東北地區中日關係史研究會第五次學術討論會」在齊齊哈爾市揭幕，會期六天（至

8.18) ，中外學者、專家一百三十餘人參加，提出論文八十餘篇。

8.14 首次「『鏡花緣』學術討論會」在江蘇連雲港市召開，會期四天。會議由中共「連雲港市文化局」、「教育學院」和「『鏡花緣』研究會」等團體合辦，學者五十餘人與會，提出論文四十餘篇。

8.18 中共在成都召開「第二屆明清實學思潮史學術討論會」，會期六天（至8.23止），學界共四十餘人參加。

8.18 韓國梨花女子大學史學科教授金稔子女士應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之邀擔任客座學人，為期一年，其研究範圍為近代中國婦女史和中國史學史。

8.21 中共「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甘肅省絲綢之路研究會」、「交通部交通史編委會」合辦的「歷史地理學術討論會」在蘭州召開，會期四天，學者、專家一百八十餘人出席，會議的主題為西北的開發與歷史地理問題。

8.22 日本學者二十二人以九州大學名譽教授岡田武彥為團長，組成「王陽明、東林儒者遺迹探訪友好訪華團」，至中國大陸訪問，為期九天（至8.30）。該團除訪問上海、杭州、餘姚、紹興、無錫、蘇州等地，考察王陽明、顧憲成、高攀龍、劉宗周、黃宗羲等人的活動遺迹外，並就王陽明、黃宗羲的哲學思想及其學術影響等專題與中共「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的研究人員進行討論。

8.23 由日本「中國勞動運動史研究會」主辦的「第二回中國近現代經濟史シンポジウム」，在箱根靜雲莊召開，主題為「近現代中國における國家と經濟」，會期三天，會議分清代、清末、民國初期、民國後期四部分進行。

八月 由中共「全國義和團研究會」主編的「義和團研究會通訊」創刊，本期共二十二頁，主要內容為報導「全國義和團運動史學術討論會暨義和團運動史研究會第三次年會」（1986.5.6~10召開）消息。

9.1 行政院國科會補助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熊秉真研究計畫，為期一年（1987.8.31），題目為「中國近世幼兒史研究（1600~1830）」，聘用助理馮彩雲小姐一名。

9.1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陳聖士教授至中研院近史所擔任訪問學人，為期一年，研究主題為「劉銘傳的海防思想」。

9.1 Su Shaozhi在國立澳洲大學 (National Australia University) 講演

“The Thought of Mao Zedong and Current Reforms in China.”

9.2 Penny Kane 教授在國立澳洲大學講演 “The Demography of the Chinese Famine, 1959-61.”

9.2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辦的「第三屆中歐學術會議」在臺北召開，為期四天，中外學者、專家五十餘人出席，提出論文十九篇。會議以「二十世紀中國之改革與革命」為主題，會中分「中國與現代世界」、「一九一一～一九四九年中國的改革與革命」、「一九四九年後中國大陸的改革與革命」及「一九四九年後中華民國的改革」四個子題進行討論。

9.6 聯合報國學文獻館在臺北舉行「先總統蔣公與國學文獻」專題學術演講會，分別由史學界李雲漢、蔣永敬、呂士朋、陸寶千、劉鳳翰、陳捷先等人主講。

9.6 丹麥哥本哈根大學歷史系教授李來福 (Leif Littrup) 至中研院近史所訪問，李教授研究範圍為明末清初山東的地方政治。

9.8 中共「廈門大學」等團體合辦的「魯迅學術討論會」在該校召開，會期六天（至9.13止），學界四十餘人參加，提出論文約三十篇，會議主題為「魯迅與中外文化」。

9.9 由中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主辦的「中國近代、現代、當代文學史分期討論會」在北平召開，學者六十餘人參加。

9.13 聯合報文化基金會與中國論壇社合辦的「知識分子與臺灣發展研討會」在新竹南園召開，為期三天，學者二十八人參加，提出論文十二篇，史學界王曉波、李筱峯、張玉法、張忠棟、張朋園等人與會。相關論文有：①尉天驄：危機中的覺醒——國際強權下的中國知識分子；②李筱峯：知識分子與政治革新運動；③張忠棟：為自由中國爭言論自由的胡適；④林正弘：一個自由主義者的民主科學觀——殷海光先生的西學中用；⑤韋政通：以傳統主義衛道，以自由主義論政——徐復觀先生的志業；⑥李鴻禧：迂迴邁向推展民主憲政的道路——陶百川的志業與生涯。

9.14 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與香港浸會學院歷史系合辦「中國歷史講座」，約二十五人參加，主講人、題目如下：中共「廈門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楊國楨：從明清時期閩北契約看一田二主的問題；中共「廣東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譚棟華：從珠江三角洲族譜看家族經營的問題。

9.15 中共「華南師範大學」等團體合辦的「廣東省第二屆陶行知學術討論會」在該校召開，會期三天，提出論文二十七篇。

9.16 韓書瑞 (Susan Naquin; Associate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在國立澳洲大學講演：“A New Look at Chinese Society in the 18th Century.”

9.20 侯繼明教授 (美國 Colgate University) 在中研院近史所主講：「從顧志耐的方法談中國經濟史研究」。

9.23 P-E. Will 在國立澳洲大學主講：“Hydrolic Management and the State in the 19th Century China.”

9.26 中共分別在河南信陽、江西南昌等地召開有關「長征」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

9.27 美國華盛頓特區喬治城大學 (Georgetown University) 歷史系舉辦「西安事變五十年研討會」，會中宣讀之論文有：①Sha Shung-tse, “Xi’an Incident: An Historical Overview,” ②Susan F. Tsu, “Zhang Xueliang and the Xi’an Incident: Some New Interpretations,” ③John Topping, “The Xi’an Incident and Its After-math: the Guomindang’s Response,” ④C. K. Yo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Xi’an Incident,” ⑤Marcia Ristaino, “Western Reactions to the Xi’an Incident,” ⑥Steven Mackinnon, “Agnes Smedley and the Xi’an Incident,” ⑦Pingfeng Chi (刁冰峯), “New Resources and Publications on the Xi’an Incident.”

9.29 「美國華人歷史圖片展覽」在北平「中國美術館」開幕，共展出三百餘幀歷史圖片、圖表及說明文字。

10.1 葉文心 (Yeh Wenxing) 在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主講：“The Alienated Academy: Cultural Politics in Higher Education in Republican China.”

10.3 美國亞洲學會中西區年會 (Midwest Conference on Asian Affairs)，會期三天，相關論文如下：①J. Nicolson, “The China Ch’ing Empire (1799-1820) and the Raj: A Comparison of Policies, Patterns and Qualities of Reform,” ②Parks M. Coble, “Blue Shirts in North China,” ③David D. Buck, “American Airpower in China during World War II,” ④Stephen Averill, “Jinggangshan Revisited: New Perspectives on Studying Party History in the PRC,” ⑤Roberta K. Gumport, “Chinese Women Past and Present.”

10.3 由北美二十世紀中國歷史學會 (The Historical Society for 20th Century China in North America) 等團體合辦的「西安事變五十週年紀念國際研討會」(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X'ian Incident,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在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 (University of Illinois, Champaign) 召開, 會期三天, 中外學者五十餘人參加, 提出論文十四篇。

10.4 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與香港浸會學院歷史系合辦「翻譯與歷史研究講座」, 約二十人參加, 相關講題為: 陳善偉 (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講師): 淺談中國近代史中專有名詞的翻譯; 林啟彥 (香港浸會學院歷史系講師): 日文資料的翻譯與中國近代史的研究。

10.7 中共在天津召開首屆「沿海城市經濟學術討論會」, 會期五天 (至10.11), 學界共一百二十餘人參加。會議重點為鴉片戰爭前中國沿海城市的都市化過程、西方列強與中國沿海城市近代化的關係和沿海中心城市與內陸腹地的關係等。

10.9 省立中興中學退休校長褚承志先生捐贈中研院近史所書冊一批, 其中包括書籍一千一百餘冊和有關教育史影印檔案、資料數十種。

10.9 中共「北京大學哲學系」等團體聯合主辦的「賀麟學術思想討論會」在北平召開, 會期三天, 學界六十餘人參加。

10.12 中共「上海師範大學」主辦的「孫中山誕辰一百二十週年學術報告討論會」在上海召開, 六十餘位學者參加, 共提出論文、報告三十三篇。

10.13 「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東方研究所」和「蘇聯漢學家協會」合辦的「孫中山誕辰一百二十週年科學討論會」, 在「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召開」, 會期兩天, 學者共百餘人參加, 由十五人作專題講演。

10.16 中共「軍事科學院」和「國防大學」主辦的「紅軍長征學術討論會」在北平開幕, 共一百三十三人與會, 提出論文八十餘篇。

10.16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兼系主任徐泓教授應韓國漢城大學東亞文化研究所之邀, 赴韓訪問一週, 訪問期間除在漢城大學講演「明末社會風氣的變遷」外, 並與高麗大學研究明清史師生進行座談。

10.17 中共「福建省晉江縣博物館」在施琅故鄉——晉江縣衙口村舉行「施琅紀念館成立慶典大會暨施琅歷史報告會」。

10.17 亞洲學會紐約區一九八六年年會 (New York Conference on Asian Studies) 在紐約州立大學 (SUNY at New Paltz) 召開, 會期二

天，相關論文如下：①Caroline Hui-yu Ts'ai (蔡慧玉)，"The Economic Role of the Hoko System (1898-1945) in Colonial Taiwan," ②Murray Rubinstein, "Evangelical Spring: The Origins of the True Jesus Church on Taiwan, 1926," ③Ou Zhengween, "The September 18th Incident: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10.18 日本「現代中國學會第三十六回全國學術大會」在橫濱市立大學召開，為期二天，發表論文如下：①沼正久：一九八五年一號文件以後の中國農業；②陳光輝：臺灣の工業化要因分析；③游仲勳：新中國經濟圈と環太平洋經濟——中國經濟發展と大陸外中國系人經濟；④針生誠吉：八六年中國經濟改革の實態と歴史的規定性；⑤辻康吾：政治體制改革をめぐる諸問題；⑥藤原康晴：中國における解放前・解放後の農村構造——江蘇省吳江縣を中心として；⑦中生勝美：「中國農村慣行調査」の限界と有効性——歷城縣冷水溝莊再調査を中心として；⑧湯本國穗：五四運動狀況と戴季陶の思想；⑨馬場毅：解放前中國農民についての階級規定——中國社會史論戰、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等を中心に；⑩近藤邦康：章炳麟と日本；⑪安藤正士：最近の中國における近代化論——近現代史の再評價をめぐる；⑫石田浩：中國農村の變容分析——解放前から現在に至る傳統村落の實像；⑬小島晉治：平均主義思想の歴史的根源と性格。

10.18 夏威夷大學歷史系教授藍厚理 (Harry J. Lamley) 在中研院近史所講演 "Hsieh-tou (械鬪) Violence: Manifestations of the Chinese Communal Feud in Fukien and Kwangtung."

10.18 中美學人在美國華盛頓特區 (Washington D.C.) 舉行「蔣中正先生與中國現代化」座談會，分由冷紹焜教授 (University of Virginia) 和丘宏達教授 (University of Maryland) 主持。

10.19 中共「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北平召開紀念魯迅逝世五十週年的「魯迅與中外文化學術討論會」，會期五天 (至 10.23 止)，中外學者、專家近四百人參加。

10.20 中共在浙江寧波召開「國際黃宗羲學術討論會」，為期六天 (至 10.25 止)，中外學者一百四十餘人參加。

十月中旬 中共在南京召開「紀念太平天國起義一百三十五週年暨慶祝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建館三十週年學術研討會」，學界百餘人參加。

10.20 中共「北京大學」和美國「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合辦的「中

美關係史（一九四四～一九五五）學術討論會」在北平召開。

10. 21 私立輔仁大學歷史系教授尹章義在私立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講演「社會學與歷史學——臺灣史研究的經驗」。

10. 23 中共在江西南昌召開「紀念『八大山人』誕辰三百六十周年學術研討會」，為期六天（至 10. 28），中外學者、畫家百餘人參加。

10. 24 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白吉爾教授(Prof. Marie-Claire Bergere, EHESS) 在中研院經濟所講演“Three Generations of Shanghai Entrepreneurs.”

10. 25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舉辦「The Post-Mao Decade」研討會，共發表論文八篇。

10. 25 日本「廣島史學研究會與中國四國歷史學地理學協會共同大會」在廣島大學召開，會期兩天，共提出論文五十餘篇，相關論文如下：①金子肇：上海資本家階級と國民黨統治（一九二七～二九）；②松田吉郎：清代後期廣東省廣州府の倉庫と善堂；③曾田三郎：中國蠶絲業の發展と日本；④中山義弘：辛亥革命と女性。

10. 26 由中國歷史學會、國史館、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中研院近史所合辦的「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討論會」在臺北開幕，會期五天，中外學者、專家二百餘人參加，提出論文一百篇。

10. 27 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尉天驄在該校歷史研究所講演「鄉村建設運動的理論與實際——從梁漱溟與晏陽初談中國」。

10. 27 中國土地改革協會主辦的「蔣公與土地改革」研討會在臺北召開，會期四天，中外學者、專家約一百二十人參加，提出論文四十篇。

10. 27 「第十屆亞洲歷史學者會議」在新加坡召開，會期五天，各國學者約二百五十人出席會議，分五十八個小組進行討論，提出論文一百八十餘篇。

10. 28 H. Dustan 在國立澳洲大學講演：“State and Commerce in 18th Century China: Government Use of the Commerical World.”

10. 30 Asian/Pacific Studies Institute 在杜克大學 (Duke University, Durham) 召開「馬克斯主義與中國經驗研討會」(Symposium on Marxism and the Chinese Experience)，會期三天，提出論文十九篇。

10. 30 亞洲學會西南區一九八六年年會 (Southwest Conference on Asian Studies) 在 Baylor University (Waco, TX.) 召開，會期三天，相

關論文如下：①Edward Rhoads, "The Anti-Manchu Critique in Late Qing China," ②Mark F. Wilkinson, "Revolution and Anti-Foreignism in Shanghai, 1945-1950," ③Richard J. Smith, "Knowing Fate: The Role of Divin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④Christina Gilmartin, "Mobilizing Women: The Early Experienc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0-1927," ⑤Eugene J. Corcoran, "China's London Embassy, 1890-1894."

10.31 香港珠海書院主辦「中國六十年來(1926~1986)之憂患與建設」國際學術會議，會期三天，中外學者六十餘人參加，共提出論文三十三篇。

10.31 中共上海史學界等成立「上海中山學社」，該社以推動孫中山先生研究為宗旨。

10.31 全美中國研究協會第二十八屆年會(28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AACS)在美國賓州匹茲堡(Pittsburgh)召開，會期三天。

10.31 美國亞洲學會中大西洋區一九八六年年會(Mid-Atlantic Conference on Asian Studies)在University of Delaware召開，會期三天，相關論文有：①Sha Shung-tse, "The Xi'an Incident: An Historical Overview," ②Susan Tsu, "Zhang Xueliang and the Xi'an Incident," ③John T. Topping, "The Xi'an Incident and Its Aftermath," ④C. G. Yo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and the Xi'an Incident," ⑤Marcia Ristaino, "Western Reactions to the Xi'an Incident," ⑥Chi Ping-feng, "New Research Resources on the Xi'an Incident," ⑦Ka-che Yip, "Health and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Rural Health in Pre-Communist China, 1927-1937," ⑧Lili Armstrong, "The Significance of Ethnicity for the Medical System in Taiwan, 1949-1985." 等。

11.4 P. Kenting 在國立澳洲大學太平洋研究院遠東歷史系講演 "Beyond Land Revolution: The Rent Reduction Campaigns in the Shaanganning Border Region, 1937-1946."

11.4 中共「中國孫中山研究會」等團體主辦的「孫中山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在廣州中山大學開幕，會期五天(11.5~9)，會議主題為「孫中山及其時代」，中外學者一百三十九人與會，提出論文一一二篇。

11.4 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張朋園在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講演「中國現代化的檢討」。

11.7 中共「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江蘇省孫中山研究會」等團體合辦的「孫中山學術討論會」在南京召開，會期六天（至 11.12），學界一百五十餘人出席，提出論文百餘篇。

11.8 中山大學教務長谷家垣博士與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中心東亞部門 (Hoover Institute, Stanford University) 負責人馬若孟教授 (Ramon H. Myers) 簽訂學術合作協定，計畫自一九八七年起將孫中山先生演講、論文、專書等翻譯並出版為專集。

11.8 東京大學文學部在該院校召開「日本史學會第八十四回大會」，會期二天，相關論文如下：①柳澤明：キャフタ條約への第一歩——清の通商停止策とイズマイロフの使節行をめぐつて；②岡洋樹：ハルハニモンゴルにおける盟旗制支配の確立過程——牧地の問題を中心に；③並木真人：朝鮮ジャーナリズムと國民革命期の中國；④上野章：廣東機器工會について——廣州、一九二七年「四・一五」の一側面；⑤張士陽：清代前期の臺灣渡航政策と「偷渡」問題について。

11.10 中研院三民所副研究員張炎憲在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講演「清末日據時期臺灣社會經濟之變遷」。

11.12 Joanna Hadlin Smith 在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講演“Benevolent Societies and the Reshaping of Charity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Ch'ing.”

11.14 中華民國史蹟研究中心與中研院三民所合辦的「臺灣史研究暨史料發掘研討會」在中研院三民所召開，會期二天，學界八十餘人參加，提出論文、史料介紹和史蹟研究共十八篇。

11.15 日本アジア政經學會第四十回全國大會在拓殖大學召開，共提出論文四十篇，相關論文如下：①小山三郎：現代中國における政治と文學；②平松茂雄：中國の近代化と體制改革；③石田浩：中國農村社會經濟構造の變容；④宇野重昭：孫文・毛澤東とその遺産。

11.15 中共「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研究室副主任」陳興唐在香港「中華書局」主辦的學術研討會上主講「民國檔案的保管和研究」。

11.15 亞洲學會新英格蘭區年會 (New England Conference on Asian Studies) 在耶魯大學 (Yale University) 召開。會中除由 Frederic Wakeman

講演“Doing Research on Social History in China”外，並進行分組討論，相關論文有：①Bruce Esposito,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Xinjiang since 1949,” ②Karen Gottschang, “The Lawful Ruler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③Beatrice Bartlett, “Rul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1.17 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教授賈士杰 (Don C. Price) 在中研院近史所講演「中國民主政治之發展」。

11.18 B. Martin 教授在國立澳洲大學太平洋研究院遠東歷史系講演“Gangsters and Warlords: The Origins of the Contraband Opium Monopoly in Shanghai, 1915-1926.”

11.20 馬若孟(Ramon H. Myers)教授在中研院三民所講演“Taiwan under Japan Wartime Rule and the Immediate Postwar Period.”

11.20 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張朋園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講演「近代中國的政黨政治」。

11.21 The Monter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舉辦「殖民意識研討會」(The Colonial Mind) 會期三天，相關論文有：①Jerry B. Briscoe “The Treaty-Port Mind as Seen in British Newspapers in China, 1921-27,” ②Douglas L. Fix “Between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Taiwanese Participation in Japan’s War,” ③Jung-fang Tsai “Ambivalence of the Colonial Mind: Chinese in Hong Kong under the British Rule, 1880-1914.”

11.22 「宋慶齡日本基金會」(Japanese S. C. L. Memorial Foundation) 主辦「孫文と宋慶齡」討論會，除由Israel Epstein 講演「孫文・宋慶齡とともに」外，並由東京大學小島晉治教授主持「日本と孫文・宋慶齡」討論會。

11.22 日本愛知大學與中日新聞社合辦的「日中國際シンポジウム」在名古屋電氣文化會館召開，為期二天，分四場討論會。

11.22 由中琉文化經濟協會主辦的「第一屆中琉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在國立中央圖書館開幕，會期五天，主題為「明清時代中琉歷史關係」，中外學者七十四人出席，提出論文二十二篇。

11.24 David Johnson 在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講演“Local Opera as Counter-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n Example from the Shadow Theater.”

11.25 中共「軍事科學院」、「國防大學」、「復旦大學」等聯合主

辦的「中國近代軍事史學術討論會，一八四〇～一九四九」在北平開幕，學者、專家一百餘人參加。

11.27 故宮博物院副研究員莊吉發在中研院近史所講演「如何有效利用故宮博物院所藏檔案」。

11.29 黎安友教授 (Andrew J. Nathan, Columbia University) 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演講「中國民間文化研究的方法及其意義」。

12.8 荷蘭萊頓大學漢學研究院 (Sinologisch Instituut, Leiden University) 召開「十七、十八世紀之福建國際研討會」 (Symposium on Fujian in the 17th/18th Century)，會期五天，共發表論文二十一篇。

12.11 中研院經濟所研究員劉翠溶在近史所講演「歷史人口研究的基本概念」。

12.12 中共「西安事變研究會」和「陝西省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合辦的「『西安事變』學術研討會」在西安召開，會期四天，學者、專家等共一百四十餘人出席，提出論文一百三十九篇。

12.13 韓國中國現代文學會主辦的「中國抗戰文學」國際學術會議在漢城召開，中、日、美、韓四國學者參加，提出論文七篇，相關論文有：楊昌年：中國抗戰文學的發展及其意義；陳映真：臺灣的抗戰文學。

12.15 國科會補助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許雪姬研究計畫，為期一年，題目為「臺灣傳統民居之個案研究——龍井林宅的歷史與建築」，聘用助理褚秀玲小姐一名。

12.15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主辦「臺灣社會結構系列演講」，主講人、講題、時間如下：①張炎憲（中研院三民所副研究員）：臺灣歷史發展的脈絡及其轉換（12.15）；②莊英章（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員）：臺灣漢人社會的家族及宗族組織（12.17）；③吳文星（師大歷史系講師）：清季及日據初期臺灣社會領導階級的初探（12.19）；④王世慶：從清代臺灣農田水利的開發看農村社會關係（12.22）；⑤施添福（師大地理系教授）：清代臺灣漢人的祖籍分布（12.24）。

12.17 中研院總辦事處主辦「胡故院長適之先生九十六歲誕辰紀念會」，由院士黃彰健講演「『戊戌變法史研究』的再檢討——並評介最近幾年國人研究戊戌變法的成績」。

12.18 中共在南寧舉行「廣西華僑歷史學會」成立大會，學界六十七人參加。

12.18 私立淡江大學歷史系主辦「第一屆中國近代政治與宗教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在臺北淡水召開，會期三天，中外學者近二百人參加。會議分理論、近世、近代、現代四組進行，共發表論文二十篇。相關論文有：①Joseph Sebes：明清時期耶穌會士與政府之關係（古偉瀛評）；②羅漁：近代中國與梵諦岡的外交關係（王芝芝評）；③Robert Entemann：十八世紀四川秘密天主教與政府的關係（朱秉欣評）；④莊吉發：清朝秘密宗教的政治意識（戴玄之評）；⑤Robert P. Weller：太平天國初期的基督教（段昌國評）；⑥查時傑：民初的政教關係，1911-1919，（林明德評）；⑦王成勉：北伐時期基督教知識分子對國事的反應，1925-1928（蔣永敬評）；⑧鮑家麟：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共政權與宗教（曹伯一評）等。

12.19 國際科學史與科學哲學聯合會科學史組中華民國委員會主辦的「第一屆科技史研討會」在臺北召開，會期兩天，香港大學何丙郁教授發表專題演講「科技史學與文學」，會中共提出論文十五篇，相關論文有陳勝崑：「復興民族」的生物學——九一八事變後中國生物學家對國難的反應。

12.20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主辦「中國歷代社會政治結構與思想發展」系列講座，分由三位中研院院士主講，主講人、講題、時間如下：（一）余英時：中國傳統與通俗文化（12.20, 22, 23, 27）；（二）楊聯陞：①論清華國學院（梁、王、趙、李）諸大師（1987.1.5），②王靜庵先生的文藝論與書法論（1.7）；（三）全漢昇：「明清經濟史專題」，①明清間中外交通與貿易：①中國與葡萄牙的交通與貿易（1.8）；②中國與荷蘭的交通與貿易（1.9）；③清代經濟概論：①人口與農業（1.12）；②貨幣與物價（1.13）；③近代工業化的歷史（1.14）。

12.21 香港大學校外課程部主辦的「臺灣歷史國際學術會議」在香港召開，會期二天，中外學者二十一人參加，會議主題為「近代臺灣的社會發展與民族意識」，共提出論文十六篇。

12.24 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和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舉辦第一百二十次學術討論會，主講「德國對中國近現史的研究」，學界百餘人出席。

12.25 中研院「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工作室出版「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第一期共十三頁，主要欄目有：研究計畫、國外的「臺灣研究」介紹、相關學術會議報導、學術動態、出版消息、工作室報導等。

12.29 中研院召開「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會期三天，其中「明清與近代史組」共由中研院近史所所長張玉法等學者提出論文四十六篇。

1987. 1. 10 中研院和北大同學會合辦「蔡元培先生一一九歲誕辰紀念演講會」，由中研院近史所所長張玉法主講「五四時期的思潮」。

1. 15 羅威廉教授(William T. Row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在中研院近史所講演“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Hankow.”

1. 15 亞洲學會東南區年會(Southeast Conference on Asian Studies)在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Chattanooga) 召開，會期三天。

1. 23 Yang Li-wem 在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講演“Rural Bases of the CCP during the Chinese Civil War.”

一月 「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會刊」創刊號出版，主要欄目有演講摘要、中文論文、英文論文、會務通訊、會務回顧等，共計四十八頁。按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於一九八五年正式成立，現任(1986. 7. 1~1987. 6. 30)會長為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楊意龍(D. J. Young)。

一月 中共「民國春秋」雙月刊創刊，本期由「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共六十四頁。

一月 「國史館館刊」復刊，第一期共三五〇頁，主要欄目有：演講、論著、專著、國史擬傳、碑傳備系、書評選載、史料選載、學術簡訊、館務報導等項。

2. 4 臺灣省文獻會與中研院近史所開始合作編纂「臺灣總督府檔案」目錄。

2. 8 中研院近史所所長張玉法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之邀，前往該所學術訪問一週，並發表專題演講，講題為「近代中國社會變遷」。其間除應邀在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發表講演「近代中國早期的現代化」外，並在珠海書院講演「臺灣的近代史研究機構」。

2. 9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講師吳文星在中研院民族所講演「日據初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肆應與變動」。

2. 12 胡碧薇(Bevenley Hooper)在澳洲國立大學太平洋研究學院現代中國研究中心和遠東歷史系合辦的研討會上主講“The End of the Western Presence in China, 1948-1950.”

2. 18 哈佛大學史學博士江勇振在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講演“The Social Sciences in Republican China: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Chinese Academic Enterprise.”

2. 21 韓書瑞 (Susan Naquin) 教授在中研院近史所講演「十八世紀的中國社會」。

2. 22 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王萍至哈佛大學 (Harvard University) 訪問研究，為期半年。

2. 24 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辦「胡適先生逝世廿五週年紀念演講會」，為期三天，每次主講人、講題、日期如下：①周策縱：胡適風格——特論態度與方法(2. 24)；②韋政通：胡適心目中的孔子(2. 25)；③唐德剛：胡適時代捲土重來(2. 26)。

2. 24 日本大學通信教育部專任講師高綱博文至中研院近史所訪問研究，為期一個月，其研究主題為「北洋政府的對外政策（五四時期～五卅時期）」。

3. 1 國科會補助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林滿紅研究計畫，為期十一個月，題目為「清朝嘉道年間之貨幣爭論」，聘用助理王靜霏小姐一名。

3. 9 中研院三民所研究員賴澤涵在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講演「光復後臺灣的政治發展」。

3. 11 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吳素樂前往歐洲蒐集「德意志帝國和中國之關係」史料，為時兩個月。

3. 15 「臺灣史研究會」在臺北成立。

3. 15 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陳存恭獲國科會補助，前往美國史丹福大學及哥倫比亞大學訪問研究，為期半年。

3. 20 中國新聞學會主辦「一代報人張季鸞先生百年誕辰紀念大會」，由中國歷史學會秦孝儀理事長主講「國民報國的典型——光明俊偉的張季鸞先生」。

3. 21 白威淑珍教授 (Suzanne Wilson Barnett, University of Puget Sound, Washington) 在中研院近史所講演“Foochow's Schools Public Ordering and Expanding Education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3. 21 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劉鳳翰應邀訪問香港中文大學二週，其間在中文大學歷史系和浸會學院歷史系發表二次講演，講題分別為「戊戌八月政變中的幾個關鍵人物」(3. 23)；「中國抗戰問題」(3. 24)。

3. 31 日本早稻田大學文學部教授細野浩二在中研院近史所訪問研究一年回國，研究主題為「清末對西方思想的受容問題」。



新書出版消息

一、史料及工具書部分

- 文海出版社編 中華民俗方言文獻選編 十冊（胡樸安編 中華全國風俗志四冊；蒲良柱編 風俗改革叢刊 一冊；董作賓等撰 方言調查研究 一冊；林語堂等撰 方言專號 一冊；張江裁撰 北平歲時志 二冊；清·顧祿撰 清嘉錄 一冊） 臺北 該社 一九八五、六
-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 「八一三」抗戰史料選編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六、五 六九七頁
- 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編 張維翰先生文集（上、下） 臺北 該會 一九八六、五 一二五八頁
- 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編 近百年來中日關係圖錄 臺北 該會 一九八六、十 二五三頁〔另有近百年來の中日關係圖錄（日本文）〕
- 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編 「國父年譜」增訂本（上、下） 臺北 該會 一九八六、十一 一四五八頁
-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 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上、下） 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六、九 七三四頁
- 江長仁編 三一八慘案資料匯編 北平 北平出版社 一九八五、五 五六八頁
- 安徽大學蘇聯問題研究所、四川省中共黨史研究會編譯 蘇聯「真理報」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選輯（第二輯）（一九二七～一九三七） 成都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一九八六、六六二四頁
- 沈雲龍訪問 陳存恭紀錄 劉景山先生訪問紀錄〔中研院近史所口述歷史叢書(13)〕 臺北 該所 一九八七、二 一三七頁
- 林恩顯主編 近代中國邊疆研究論著目錄 臺北 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

一九八六、六 三八二頁

周錦編注 中國現代文學鄉土語彙大辭典 臺北 智燕出版社 一九八六、九 九九二頁

余繩文編 張維翰先生年譜 臺北 黨史會 一九八六、五 八三〇頁

洪惟仁 臺灣禮俗語典 臺北 自立晚報社 一九八六、九 三五六頁

洪桂己編纂 近代中國外諜與內奸史料彙編（一八七一～一九四七） 臺北 國史館 一九八六、六 八二四頁

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經濟史研究室編 中國近代鹽務史資料選輯 天津 南開大學出版社 一九八五、一二 四六八頁

南方局黨史資料徵集小組編 南方局黨史資料（一、大事記）（中國共產黨歷史資料叢書） 重慶 重慶出版社 一九八六、二 四四〇頁

查建瑜 國民黨改組派資料選編 長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六、一 七〇四頁

香港「華商報」 十八冊（一九四一、四、八～一二、一〇；一九四六、一、四～一九四九、一〇、五） 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四

高宗魯譯注 中國留美幼童書信集 臺北 傳記文學社 一九八六、九 二三一頁

徐雪筠等譯編 上海近代社會經濟發展概況（一八八二～一九三一）——「海關十年報告」譯編 上海 上海社會科學院 一九八五、八 三九二頁

張靜如、蕭姓、姜華宣編著 五四以來歷史人物筆名別名錄 西安 陝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六、四 五五六頁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目組編 蔣中正先生論著目錄 臺北 該館 一九八六、一〇 五五七頁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 宮中檔乾隆朝奏摺 第五十輯至五十五輯（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至四十八年四月） 臺北 該院 一九八六、六～十一 每輯約八七〇頁

國史館輯 清史稿校註 第四冊 臺北 該館 一九八六、十 八五〇頁

國史館輯 清史稿校註 第五冊 臺北 該館 一九八七、二 八五三頁

國史館編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一至四月份 臺北 該館 一九八六、六 一二四二頁

陳周棠主編 廣東地區太平天國史料選編（廣東近代史料叢書） 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六、四 三〇一頁

- 程道德等編 中華民國外交史資料選編（一九一九～一九三一） 北平
 北京大學出版社 一九八五、一一 五九七頁
- 廣東婦女運動歷史資料編纂委員會編 抗日戰爭時期的廣東婦女運動 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一二 三二九頁
- 江口圭一編著 資料：日中戰爭期阿片政策——蒙疆政權を中心に 東京
 岩波書店 一九八五 六三五頁
- 村田和志郎 日中戰爭日記 七卷 東京 鵬和出版（一九八四、二～一
 九八六、八） 一七七二頁
- 岡田芳政等編 阿片問題（續・現代史資料十二） 東京 みすず書房 一
 九八六、六 六五六頁
- 海軍省軍事普及部 支那事變に於ける帝國海軍の行動（昭和十五年） 東
 京 鵬和出版 一九八五、一二 再版 五一七頁
- 陸軍參謀部編 滿洲を繞る國際戰（康德六年） 東京 鵬和出版 一九八
 六、八 再版 二一一頁
- 滿洲國通信社編 滿洲開拓年鑑（昭和十九年出版） 東京 鵬和出版 一
 九八六、二 再版 三二〇頁
- 滿洲國通信社編 滿洲國現勢（康德六年） 東京 鵬和出版 一九八六、
 九 再版 七四二頁
- Kuo, Tai-chu and Ramon H. Myers. *Understanding Communist
 China: Communist Chin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8*.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ford
 University, 1986, 172pp.
- Lodwick, Kathleen ed. *The Chinese Recorder Index: A Guide to
 Christian Missions in Asia, 1867-1941*. Vols. 1 and 2, Delaware:
 Scholarly Resources Inc., 1986, 800pp.

二、史學部分

- 文復會編 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 第二十三～三十編 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
 館 一九八六、六～九
- 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編 黃季陸先生與中國近代史研究 臺北 該會 一九八
 六、四 七三二頁

- 中研院近史所編 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論文集（上、下） 臺北、該所
一九八六、一二 九四七頁
- 天津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天津租界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
六、六 二八五頁
- 尹章義 臺灣近代史論 臺北 自立晚報社 一九八六、九 二六七頁
- 江地 捻軍史研究與調查 濟南 齊魯書社 一九八六、四 三四六頁
- 李華彬主編 天津港史（古、近代部分）（中國水運史叢書） 北平 人民
交通出版社 一九八六、四二 七一頁
- 李達嘉 民國初年的聯省自治運動 臺北 弘文館出版社 一九八六、七
二六七頁
- 李健民 五卅慘案後的反英運動 臺北 中研院近史所 一九八六、一〇
二四〇頁
- 「近代史研究」編輯部編 中國近代史研究專題述評（中國歷史研究叢書）
北平 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六、四 四七三頁
- 河北、北平、天津歷史學會編 太平天國北伐史論文集 石家莊 河北 人
民出版社 一九八六、二 三二〇頁
- 河北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河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河北近代大
事記（一八四〇～一九四九） 石家莊 河北 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六、
四 四二一頁
- 周明主編 歷史在這裡沉思：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年紀實 三卷 北平 華
夏出版社 一九八六、八 （收文五十三篇，約七十六萬字）
- 討論集編委會編 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討論集 五冊 臺北 黨史會
一九八六、一二 三〇七六頁
- 許倬雲、丘宏達編 抗戰勝利的代價——抗戰勝利四十週年學術論文 臺北
聯經出版公司 一九八六、九 二七四頁
- 張延中 劉銘傳參與平吳剿捻戰役之探討 臺北 文史哲出版社 一九八
六、一一 二四〇頁
- 張紫晨 中國民俗與民俗學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一〇 三
五四頁
- 陳在正等著 清代臺灣史研究 廈門 廈門大學出版社 一九八六、四 五
〇八頁
- 陳明鈺等編 中國與香港工運縱橫 香港 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 一九八

六、一〇 三二七頁

- 陳逢申 十七世紀西伯利亞情勢之發展與中俄早期關係 臺北 私立東吳大學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 一九八六、六 一三九頁
- 廣東省太平天國研究會 廣州市社會科學研究所編 洪秀全思想研究論文集 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一二 三三〇頁
- 潘喜廷等著 東北抗日義勇軍史(東北文史叢書) 瀋陽 遼寧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一二 五七七頁
- 鄭竹園 臺灣模式與大陸現代化 臺北 聯經出版公司 一九八六、八 四四六頁
- 劉家駒 清朝初期的中韓關係 臺北 文史哲出版社 一九八六、七 三九六頁
- 劉起釪 顧頡剛先生學述 北平 中華書局 一九八六、五 三八三頁
- 魏建獻主編 中國會黨史論著匯要 天津 南開大學出版社 一九八五、一二 六一八頁
- 嚴家其、高皋 中國「文革」十年史 上、下 香港大公報社 一九八六、一二 六八一頁
- 中國現代史研究會編 中國國民政府の研究 東京 汲古書院 一九八六、一二 四六八頁
- 日本教職員組合・國民教育研究所 南京大虐殺——日本軍の中國侵略と暴行 東京 該所 一九八六、五 一三五頁
- 本多勝美 南京への道 東京 朝日新聞社 一九八七、一 二六四頁
- 加加美光行編 現代中國のゆくえ(文化大革命の省察Ⅱ) 東京 アジア經濟研究所 一九八六、三 一六〇頁
- 石田浩 中國農村社會經濟構造の研究 東京 晃洋書房 一九八六、五 三二〇頁
- 竹內實等 歷史の中の毛澤東——その遺産と再生 蒼蒼社 一九八六、六一六七頁
- 俞辛焯 滿州事變期の中日外交史研究 東京 東方書店 一九八六、九 四五〇頁。
- 原覺夫 滿鐵調査部とアジア 東京 世界書院 一九八六、七 二七六頁
- 孫文研究會編 孫中山研究日中國際學術討論會報告集 京都 法律文化社 一九八六、一二 二七六頁

- 浅田喬二、小林英夫編 日本帝國主義の滿州支配 東京 時潮社 一九八六、二 九四一頁
- 野口鐵郎編 中國史における亂の構圖 東京 雄山閣 一九八六、一二 三九八頁
- 國家資本輸出研究會 日本の資本輸出——對中國借款の研究 東京 多賀出版 一九八六、三 四二三頁
- 澤田瑞穂 中國の庶民文藝——歌謠、說唱、演劇 東京 東方書店 一九八六、一一 四一七頁
- 橫山宏章 清末中國の青年羣像 東京 三省堂書店 一九八六、一〇 二五五頁
- 藤岡喜久男 張謇と辛亥革命 札幌 北海道大學圖書刊行會 一九八五、九 六八八頁
- Atwell, Pamela. *British Mandarins and Chinese Reformers: The British Administration of Weihaiwei (1898-1930) and the Territory's Return to Chinese Rule.* Hong Kong,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302pp.
- Baark, Erik and Andrew Jamison, eds.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n China, India and Japan.* Basingstoke and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6, 264pp.
- Bastid, Marianne, translated by Paul Bailey. *Aspects of Educational Reform in China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Publications, 1986, 200pp.
- Bauer, E. E. *China Takes Off: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Moderniza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6, 260pp.
- Bergère, Marie-Claire.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de 1949 à Nos Jour.* Paris: Armand Colin, 1987, 283pp.
- Bruner, Katherine F., John K. Fairbank, and Richard J. Smith eds. *Entering China's Service: Robert Hart's Journals, 1854-1863.*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400pp.
- Chan, Anita. *Children of Ma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Macmillan Publishing Inc.,

1985, 256 pp.

Chan, Sin-wai (陳善偉). *Buddhism in Late Ch'ing Political Thought*.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5, 192 pp.

Chang, Hao.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 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 1890-191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hang, Maria Hsia. *The Chinese Blue Shirt Society: Fascism and Developmental Nationalism*.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1985, 144 pp.

Chi, Wen-shun. *Ideological Conflicts in Modern China: Democracy and Authoritarianism*.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Books Rutgers-the State University Department, 1985, 430 pp.

Cleverley, John. *The Schooling of China: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in Chinese Education*. Winchester: Allen & Unwin, 1986, 319 pp.

Cole, James H. *Shaohsing (紹興):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86, 315 pp.

Edwards, R. Randle, Louis Henkin, and Andrew J. Nathan. *Human Rights in Contemporary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193 pp.

Fairbank, John K.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86, 396 pp.

Fewsmith, Joseph. *Party, State, 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 China: Me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 Shanghai, 1890-193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5, 275 pp.

Goldman, Merle e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May Fourth Era: A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Stud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448pp.

Harmrin, Carol Lee and Timothy Cheek eds. *China's Establishment Intellectuals*. New York: M. E. Shape, 1986, 266pp.

Hershatter, Gail, *The Workers of Tianjin, 1900-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328pp.

Honig, Emily, *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 Mills, 1919-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320pp.
- Hsüeh, Chün-tu e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1911: New Perspective*.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Co., 1986, 234 pp.
- Hung, Chang-tai. *Going to the Peopl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Folk Literature, 1918-193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275 pp.
- Johnson, David, Andrew J. Nathan, and Evelyn S. Rawski eds.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449 pp.
- Ku, Hung-ting comp. *Censorate-General in Ch'ing China, 1644-1911* (清代督察院大臣年表). San Francisco: CMC Publication, 1986, 180pp.
- Lampton, David M. *Paths to Power: Elite Mobi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Publications, 1986, 200pp.
- Lary, Diana. *Warlord Soldiers: Chinese Common Soldiers, 1911-193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177pp.
- Lauren, Paul Gordon ed. *The China Hand's Legacy: Ethics and Diplomac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6, 208pp.
- Lee, Leo Ou-fan. *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 A Study of Lu Xu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Levine, Steven I. *Anvil of Victory: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Manchur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384pp.
- Li, Guohao, Zhang Mengwen, and Cao Tianqin eds. *Explor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Books Rutgers-the State University Department, 1985, 835 pp.
- Martin, Edwin W. *Divided Counsel: The Anglo-American Response to Communist Victory in China*.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6, 265pp.
- Meerssche, P. Van de. *A Life to Treasure: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 of Han Lih-wu(杭立武). London: The Sherwood Press, 1987, 153 pp.
- Nathan, Andrew J. *Chinese Democrac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85, 313 pp.
- Perdue, Peter C. *Exhausting the Earth: State and Peasant in Hunan, 1500-185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400pp.
- Pong, David and Edmund S. K. Fung eds. *Idea and Reality: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Modern China, 1860-1949*.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5, 386 pp.
- Rankin, Mary Backus. *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Zhejiang Province, 1865-191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448pp.
- Rozman, Gilbert. *Soviet Studies of Premodern China: Assessments of Recent Scholarship*. (Michigan Monographs in Chinese Studies: No. 50).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5, 300pp.
- Scalapino, Robert A. and George T. Yu. *Modern China and Its Revolutionary Process: Recurrent Challenges to the Traditional Order, 1860-192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814 pp.
- Schwarcz, Vera.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393 pp.
- Sit, Victor F. S. ed. *Chinese Cities: The Growth of the Metropolis Since 194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276pp.
- Smith, Carl T. *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252 pp.
- Souza, G. B. *The Surviv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30-1754*.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00pp.
- Stross, Randall E. *The Stubborn Earth: American Agriculturalists on Chinese Soil, 1898-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468pp.

- Tang, Anthony M. *An Analy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Agriculture in Mainland China, 1952-1980*.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5, 248 pp.
- Tsai, Henry Shih-shan.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 Americ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256pp.
- Tsou, Ta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Post-Mao Reform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360 pp.
- Vohra, Ranbir. *China's Path to Modernization: A Historical Review from 1800 to the Present*.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Inc., 1987, 400p.
- Wagner, Donald B. *Dabieshan: Traditional Chinese Iron-production Techniques Practised in Southern Hena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Curzon Press Ltd., 1985, 113 pp.
- Wakeman, Frederic, Jr. *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1192pp.
- Walder, Andrew.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250pp.
- Wei, William. *Couterrevolution in China: The Nationalists in Jiangxi During the Soviet Period*.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5, 243 pp.
- Yen, Ching-hwang (顏清煌) . *Coolies and Mandarins: China's Protec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during the Late Ch'ing Period (1851-1911)*.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5, 413 pp.
- Yen, Ching-hwang (顏清煌) .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00-1911*.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433 pp.
- Young, Graham ed. *China: Dilemmas of Modernisation*. London: Croom Helm, 1985, 279 pp.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最新出版

專刊(53)：五卅慘案後的反英運動 精280元 平230元

李健民著，七十五年十月初版，二四〇頁

民國十四年五卅慘案後的反英運動在近代中國對外關係上，是劃時代的大事。作者認為其所以能轟動全世界，且引起中國歷史上重大變化，主要原因在於全國民眾共同奮鬥。據此觀點，本書首章先述慘案發生的背景和經過，繼則以當時中國全體民眾所做的主要工作——宣傳（第二章）、經濟抵制（第三章）和募捐（第四章）為內容，藉以明瞭全民總體的運作結合及孕育出來對各方面的影響（第五章）。本書之作以中國外交部檔案、英國國家檔案、華洋貿易總冊等原始史料為骨幹，參以近年來出版的五卅運動、省港大罷工、工人運動、農民運動等資料彙編，以及當年的報刊雜誌為輔。

口述歷史叢書(13)：劉景山先生訪問記錄

精170元 平120元

沈雲龍訪問，陳存恭紀錄，七十六年二月初版，一三七頁

劉景山先生（一八八五～一九七六），天津人，清末入北洋大學學習礦冶，旋赴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學習鐵路管理，獲經濟碩士學位。返國後受知於南通張季直先生，助其策劃導淮及整理鹽務。民二冬入交通部，直至民十七年，曾兩度出長路政司，北京政府有關交通之發展與經營，幾無不參與其事，如統一鐵路會計辦法之擬定與實施、中東路續訂合同之促或與執行、京奉路之整頓、東北三省築路之協助等；至若安福系謀借日資築滄石路之未成，尤為其傑作。國民政府成立後，先出任鐵道部顧問，再主持全國經濟委員會西北辦事處。抗戰前任中國建設銀公司協理，戮力於吸收外辦與策主權。勝利前後又與美國工業家訂立有關合同，欲藉此培養我國工業技術人才，促進工業發展，惜因局勢變化，未成其事。來臺後曾主持「中國手工業中心」三載，為臺省手工業開一坦途。本書所述均先生親歷，極為珍貴，足供治交通史者之參考。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十五期下冊

精400元 平350元

七十五年十二月出版，三五二頁，共收論文八篇：

趙中孚：清代東三省北部的開發與漢化

李國祁：道咸同時期我國的經世致用思想

陸寶千：論羅澤南的經世思想

張朋園：胡適與梁啟超——兩代知識分子的親和與排拒

張忠棟：在動亂中堅持民主的胡適

沈松橋：五四時期章士釗的保守思想

陳昭璇：日本與北京關稅特別會議

張力：一九三〇年代中國與國聯的技術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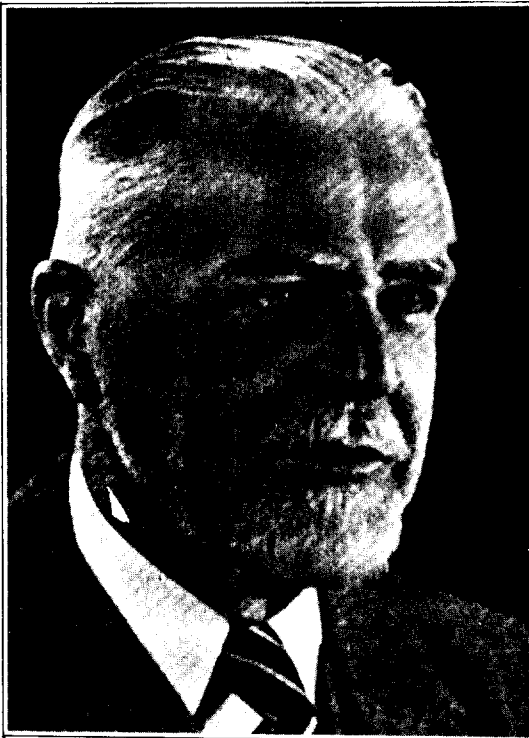
劉鳳翰：論太原會戰及其初期戰鬥——平型關作戰

※上述書籍均按定價七折發售，請利用郵局 1034172-5 「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帳戶劃撥購買。



日本東京大學名譽教授衛藤藩吉治學謹嚴，在國際關係和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方面享有盛名



開德國漢學研究先河的
Otto Franke 教授(1863—1946)

本期要目

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明清與近代史組

香港大學「臺灣歷史國際學術會議」

出席「西安事變五十週年國際學術討論會」之追憶

歷史人口研究的基本觀念

學人簡介——梁嘉彬、衛藤瀨吉、Otto Franke

簡介「早稻田大學中國近現代史學習會」

英國的中國通：量的觀察(二)

「中國近世幼兒史」研究

Research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in
West Europe(II):France

近史所中國近代經濟檔案保存與整編概況(二)

新出章炳麟致張學良兩函年代考

中研院近史所收藏報紙簡介

史卡拉賓諾、于子橋合著：現代中國及其革命歷程：

對傳統秩序的不斷挑戰(1850~1920)

韓特著：斯文的福音

李健民著：五卅慘案後的反英運動

國內史研所、日本早稻田大學研究所有關中國

近代史研究博碩士論文目錄

